



敦煌学研究丛书

主编 季羨林

邓文宽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是研究中国古代历法史的珍贵资料
也是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
《玄象诗》是比《步天歌》更古老的通俗识星作品
“年神方位图”的肇发其端者便是敦煌历日
敦煌本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上的两次月食预报
是现知中国最早的月食预报材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邓文宽著. —兰州:甘肃
教育出版社, 2002
(敦煌学研究丛书)
ISBN 7-5423-1046-1

I. 敦… II. 邓… III. 古历法—研究—中国
IV. P1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961 号

责任编辑:薛英昭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王保华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邓文宽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8 字数 300 千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7-5423-1046-1/P·4 定价:30.00 元



作者（右）与受业导师张广达教授在一起

（2000年8月27日于蒙特利尔）

作者与马克·卡林诺斯基教授、风仪诚先生探讨学问





作者在“第36届亚洲北非研究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演讲

（2000年8月28日于蒙特利尔）

作者在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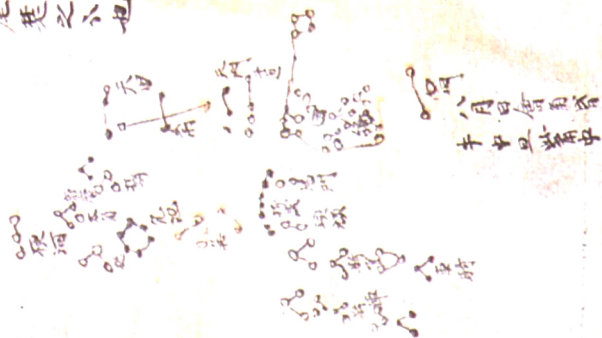
自平六度至柳一度平辰在末為觀音南方七宿具於象見并
為冠以柳為口鵝見也項也規曰觀首暴之小也



自柳元度至辰十七度辰辰在子為觀天而方舊大書五月乙酉陽無忌
或大星時中七星米穀之害故曰點大周之末也



目張大度名縣一處於辰在亡屬驕尾南方朱馬七宿以縣為尾



自軒子度我長身星三目之方初婚遂就我香案不覺各盡其
生而不厭夫故曰好愛敬之心

天宮上張其安尾北時燕臨在計南廟建星与天舟同

存背天舟中央古垣雖南側于二星光其中有帝坐像實東西側也
者宗正丞官側封年量宗人宗在左宗在假東廟亡宮与天紀市北中
行分南貴位紀女北區行房惟錄有天梧獨在此牆九次至幸中殿
女龕數千東周女位女上極珠府殿向天南際欲何時諸瓜左有天
下廣危所室臂兩星間上有橋匙舞王辰難五星並在中心許日東
北後門東羽林府土空合君臣苑別位俱在遠遠奎妻胃昂畢並在
天出閣道河中央傳路在其旁將軍在妻北後道路相當天船以北片
大陵以南畔卷名在其東雖繁有滌貫天倉天固北頭東向昂側天
關東柱南正是奈西北奈孤角寸量頭上戴一臂有膝玉并中左角余旗
廟當左足下廟南有天夫二南有併星廟東有軍市中左角余旗
狐六老人以漸遠出見穉祥美東并与五車俱河心裏水位南北列五侯車
並北以五侯北南以東漢東南有積薪西北有積水欲和言星處並在五
新步柳星輪田乘里北柳星為星中末穉乃殺三台自文昌劍連太微側
下台下有星少微与張翼並在星東太微當折北太微垣十星西八星直
其中五帝坐若依左色併在帝前安老津空後桓即位帝傳東星缺

敦煌文獻
P.2512《玄
象詩》(局
部)

天宮上張其安尾北時燕臨在計南廟建星与天舟同
存背天舟中央古垣雖南側于二星光其中有帝坐像實東西側也
者宗正丞官側封年量宗人宗在左宗在假東廟亡宮与天紀市北中
行分南貴位紀女北區行房惟錄有天梧獨在此牆九次至幸中殿
女龕數千東周女位女上極珠府殿向天南際欲何時諸瓜左有天
下廣危所室臂兩星間上有橋匙舞王辰難五星並在中心許日東
北後門東羽林府土空合君臣苑別位俱在遠遠奎妻胃昂畢並在
天出閣道河中央傳路在其旁將軍在妻北後道路相當天船以北片
大陵以南畔卷名在其東雖繁有滌貫天倉天固北頭東向昂側天
關東柱南正是奈西北奈孤角寸量頭上戴一臂有膝玉并中左角余旗
廟當左足下廟南有天夫二南有併星廟東有軍市中左角余旗
狐六老人以漸遠出見穉祥美東并与五車俱河心裏水位南北列五侯車
並北以五侯北南以東漢東南有積薪西北有積水欲和言星處並在五
新步柳星輪田乘里北柳星為星中末穉乃殺三台自文昌劍連太微側
下台下有星少微与張翼並在星東太微當折北太微垣十星西八星直
其中五帝坐若依左色併在帝前安老津空後桓即位帝傳東星缺

高昌延寿七年（630年）历
 日（残）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
寿七年（630年）历
日》（残）

天德元年											
廿九	廿八	廿七	廿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廿	十九	十八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敦煌文献“俄JX 02880”《唐大和八年甲
寅岁（834年）具注历日》（印本）

敦煌文献 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年)具注历日一卷并序》(部)



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
(1407年)具注历
日》(残)

序

季羨林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时间内，仅有极少数可称为先知先觉的中国学者，筚路蓝缕，置身于世界敦煌学研究行列中。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海峡两岸始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探幽烛微，健笔如椽，在文学、语言、历史、地理、考古、艺术、宗教、天文历法，以及敦煌学史和敦煌学理论等方面，都有水平相当高的著作，引起了国际敦煌学界的瞩目，为中华学术增光添彩，实为学界之盛事，中华之光荣。

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于对学术成绩的尊重，对乡土宝藏的珍爱，对祖国文化建设的责任，汇集十几位海峡两岸敦煌学研究者的专著和论集，一起出版，集中体现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敦煌学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些著作既是上个世纪敦煌学的总结，也是二十一世纪敦煌学的起点，不少文章昭示着新世纪敦煌学的方向。二〇〇〇年，在北京、敦煌、香港、东京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敦煌学百年的学术讨论

会。从去年到今年，在日本京都、中国的杭州和台湾嘉义，又陆续举办了专题或综合的敦煌学研讨会。今年八月，北京还将举行首次全面讨论敦煌学研究史的学术会议，这些都说明二十一世纪的敦煌学仍在蓬勃发展，而且研究的范围也在日益扩大。

我已年过九旬，仍愿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欣闻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敦煌学研究丛书”，特将近日一些想法写出，作为序言。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八日

序

■张广达

邓文宽教授的论文集《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即将出版。这是他继刊出《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之后的第二本论文集，也是与他的《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和《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两部大型文书汇刊与校释相配套的又一部力作。两部文书汇编和即将刊出的本论文集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反映了文宽多年来孜孜研究敦煌、吐鲁番、黑城子出土的以及散失天下若干晚期的天文历法文书的概貌。

文宽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之前，在北京天文台工作期间有过研究天文历法史的经历。这样，在他决心以研究唐史为志业，并肆力于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时候，已经具备了处理天文历法文献的独特条件。他以古天文知识为基础阅读历代正史中号称艰深的天官书和历法志就有较多的方便，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文宽治史的一种幸运。天文历法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关系着王朝的推考天人、校定正朔，下涉及小民日常生活的四时宜忌。我国古代最卓越的史学家大多精通天文历



象。例如，司马迁（公元前 145 或 135 ~ ?）是先与壶遂等人完成造历事业而后才继续其父述作之功的。司马光（1019 ~ 1086）也有《通历》八十卷之作，他在历法方面的准备功夫使他的《资治通鉴》得以建立在坚实准确的年代、正朔的考订基础之上，这反映在他的三十卷《资治通鉴目录》之中。《目录》以年为经，以国为纬，上栏著录岁阳岁名和依据刘羲叟（1017 ~ 1060）《长历》的气朔闰月及七政之变，下栏列举《通鉴》正文的历年大事纲要。刘羲叟生与司马光同时，强记多识，长于历数，通晓唐代八历，尤其推崇八历中的《大衍历》，撰有《刘氏辑历》，欧阳修专门委任他纂修《新唐书》律历、天文、五行诸志。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为了明了中国纪年和正朔体系这一时间框架，按理说应该懂得一些天文历象和历代历法，然而，由于这方面的训练过于专门，个人精力终有极限，因而往往无暇顾及，许多治史者常常以此为憾事。文宽现在的研究不仅发挥了他的特长，在天文历法方面开辟了崭新的园地，而且取得的研究成果起着部分历谱的作用，便于不熟悉历法的人们考史、证史之用，这是值得我们感谢的。

读文宽的论文使我对他的创获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例如，敦煌出土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的历书，经文宽的研究，证实了中国当时准确地预测到了两次月蚀。又如，文宽对唐文宗大和八年甲寅岁历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份 834 年的雕版印刷历本，应当是迄今人们找到的历史上标明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我国雕版印刷

术的发明年代现在还不能确指，推测当在7世纪。前此所知标明最早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现今收藏在伦敦英国图书馆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文宽考出的834年历本将雕版印刷术的实物证据提早了三十四年，许多权威著作在这一点上将会改写。本文集中还有一组论文涉及中国历史上历日与当代通书的文化联系。文宽发现，从1182年到1998年，中国传统历书使用二十八宿注历一天都不曾间断，而且从来没有发生错误。经文宽考证，穆宗长庆二年（822）颁布的《宣明历》一直使用到892年，并且在日本、朝鲜使用时间更长；这种唐代以来的具注历实际上与今天港、澳、台乃至东亚，1949年以前大陆上居家必备的《通书》、《通历》、《时宪书》等一脉相传，有千年以上的沿袭关系。

在这里，文宽的考证实际上阐发了东西文化史上久被忽视的重要篇章。早在187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约三十年，厦门的英国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首先注意到中国南方使用的历书中以“蜜”字注星期日的问题。他解释不出原因，于是在福州传教士保龄（Stephan Baldwin, 1835~1902）于1868年5月创刊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的《中国和日本札记与疑问》栏内刊登了一则有关的札记。这在传教士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当时参加讨论的知名传教士有德贞（Johm Dudgeon，即德约翰医生，1837~1901）、卫礼（Alexander Wylie，即伟烈亚力，1815



~1887) 以及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驻华布道团团长鲍乃迪大教长 (Palladius, 1817 ~ 1878) 等多人。卫礼在《教务杂志》第四卷 (1871 年 6 月号、7 月号) 刊出了一篇重要文章, 名《中国有关周末安息日的知识》。传教士出于职业原因, 对中国人居然也有周末安息日 (sabbath) 的记载非常感兴趣, 这是可以理解的。卫礼为研究这一问题而搜集了清代允禄等奉敕纂修的《钦定协纪辨方书》(1739 年刊本) 和当时华中、华南发售的《洪潮和曾孙堂燕通书便览》等时宪书, 指出了其中有关二十八宿和年神方位, 月事吉凶, 用事宜忌以及日月五星下值人间的七曜别行、禳灾法, 并将有关记载追溯到 759 ~ 764 年不空 (705 ~ 774) 和杨景风共译的《西域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收在本文集中的文宽的一系列有关时宪书或通书的论文, 实际上是以新资料对中断了将近一百三十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问题做了新的概括。

文宽的研究之所以多有发现, 原因在于他读书认真。从资料的搜集、文本的阅读到文章的营构断制, 心神贯注, 一丝不苟。这里可以举出文宽在校注《坛经》过程中从形 (文字校勘)、音 (音韵)、义 (训诂) 三方面, 特别是从方言、音韵方面着手突破“文字障”为例以作说明。为了持论有据, 文宽在处理方音替代字和注释中古口语词上下了功夫, 证实《坛经》不同文本中均为溪纽的“起”、“去”两字, 因西北方言中的止摄微韵与遇摄鱼韵混同而可以互注, 还有“端”“定”互注, 以“审”注“心”, 韵母“侵”“庚”互通, 等等。核以

高本汉（参看潘悟云等编译《汉文典》）、罗常培、董同龢、李荣、周法高、王力、普立本、白一平、李珍华与周长揖、高田时雄、平山久雄诸家有关的拟音，文宽找到的验证资料似是以上诸家未曾措意的。从1923年汪荣宝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引发的“鱼”、“虞”音值的辩论迄未终结，直到今天，这一讨论仍然不时出现在中、日和西方的汉语语言学家的专著和论文中。早在1923年，林语堂在读汪文之后写文章指出，“歌”、“鱼”合用现象，“须以方音解明它”，“所谓混用，未必是普通混用，未必不可寻出作家、地方有条理地区别出来”。其后，沉兼士为魏建功《古音系研究》作序也指出：“欲明古代文字之音，必先明现代方言之音，现代方言者，古音之尾闾也。”文宽追究方音转变流衍而做的校读工作，证实了先贤的卓识，激活了今后可以开拓的又一方面。文宽的创获，大多类此。

文宽早年寒苦，今日学业有成。两部论文集的出版，反映着他笃志向学、踏实勤恳的业绩，其中凝结着常年辛劳。今天，人们有多种计算机数据库可供检索词条，有电子扫描技术迅速输入资料。从一方面说，新技术大大方便了研究者搜集材料层次上的操作，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更加加重了研究者的思考负担。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原理（所谓“后设史学”、“元历史”、“大历史”、“大写历史”、“上层次历史”、“新历史主义”）和对具体历史撰述的操作（“小写历史”、“下层次历史”）都有所质疑。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史学的盘诘不



足以动摇史学本身，但是可以促进从事史学实际研究的学者注意新思潮的挑战，从而对自身业务做更周延精确的思考。新的形势要求人们治学更加刻苦认真，看来，只有更加辛勤耕耘，种出的庄稼才能籽粒饱满，写出的文章才能内容充实。

文宽为人亦如其文，朴实正直，作为有正义感的性情中人，有时不免迂执，近乎孔夫子所说的“狂狷”者流——“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二十多年来，我与文宽相知日深，每当我读文宽的新作，情亲意见，总不免产生想讲一讲心下感受的念头。现借书此短序之机，略抒浅见，宿愿得偿，心下十分喜悦。为学也可以用得上“任重道远”四个字，我愿与文宽继续相互勉励，继续辛勤耕耘，与日俱新。

二〇〇一年九月九日

目

录



序	张广达
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	1
新发现的敦煌写本杨炯《浑天赋》 残卷	9
比《步天歌》更古老的通俗识星作品 ——《玄象诗》	17
隋唐历史典籍校正三则 ——兼论 S.3326 星图的定名问题	25
跋两篇敦煌佛教天文学文献	38
敦煌吐鲁番历日略论	45
敦煌历日的现代流变 ——香港民用历书文化探源	60
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 的文化关联	79
敦煌古历丛识	105
敦煌吐鲁番历日的整理研究与展望 ...	123
传统历书以二十八宿注历的连续性 ...	129



从“历日”到“具注历日”的转变 …	134
出土历日掠影	145
敦煌残历定年	152
敦煌历日中的“年神方位图”及其 功能	167
重新面世的敦煌写本《大历序》	177
关于敦煌历日研究的几点意见	182
敦煌本北魏历日与中国古代月食预报	189
北大图书馆藏两件敦煌文献补说	201
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	205
我国发现的现存最早雕版印刷品 ——《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 具注历日》	216
敦煌文献 S.2620 号《唐年神方位图》 试释	218
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630) 历日》考	228
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	241
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八年(720)具注 历日》释文补正	251
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1407) 具注历日》考	255
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	



具注历日》考	262
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 具注历日》三断片考	271
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 《建除》	290
尹湾汉墓出土历谱补说	296
《20 世纪出土的第一支汉文简牍》 献疑	304
“20 世纪出土的第一支汉文简牍”新释 ——再与胡平生先生商榷	310
附录	
《敦煌吐鲁番研究》弁言	319
《法国汉学》第五辑（敦煌学专号） 编后记	321
“第 36 届亚洲北非研究国际会议” 简介	323
敦煌学科技著作评介	325
史道德族出西域胡人的天文学考察	332
凉山彝族二十八宿初探	339
斛律光寨巡礼	355
后记	359

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

在数万件敦煌文献中，天文历法文献虽然只有 60 余件，却以其独特的形制、丰富的内涵为人瞩目。

一、敦煌历日产生的背景

历书行用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王朝权力所及的重要标志。唐德宗贞元二年（786）以前，敦煌地区使用的就一直是唐王朝的历书。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吐蕃军队最后攻占了敦煌，敦煌同中原王朝的联系被割断，象征王权的中原历书也无法颁行到那里了。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这既不符合汉人行之有效的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的习惯，也无法满足敦煌汉人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敦煌地区开始出现当地自编的历书。六十余年后，尽管张议潮举义成功，使敦煌重新回到了唐王朝的怀抱，但敦煌地区自编历日已成习惯，民间仍继续使用自编历日。其时，不独敦煌一地，剑南西川（今四川）也在自编历日。敦煌历日中有一件唐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就是由成都流落到敦煌的私撰历日。相对于封建王朝颁行的历日来说，这些地方的历日常常被称作“小历”。从现存敦煌历日来看，敦煌地区自编历日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两个世纪之久。



二、敦煌历日的丰富内容

敦煌历日，广义上是指从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古代历日，既包括当地的，也包括来自中原王朝和外地的；狭义上则指敦煌地方自编的历日。在现存敦煌历日文献中，来自中原的历日为数寥寥，绝大部分是敦煌地方自编的历日。

敦煌历日中，现在可以明确肯定只有四件不属于敦煌地方自编。一件即前面提到的“樊赏家”私印历日，虽属印本，却只残存三行文字。一件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和十二年（451）历日》。历日内容至为简单，如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正月全部内容是“正月大，一日壬戌收，九日立春正月节，廿五日雨水”。其余各月间有社日、腊日、始耕（即籍田）的注记，仅此而已。其朔日干支同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则完全一致。这件历日的特点之一是改天干“癸”字为“水”，如太平真君十二年七月一日干支为“水未”，八月一日为“水丑”，大概是避讳北魏道武帝拓拔珪的“珪”字而改的。尽管内容极为简略，这件历日却是现存敦煌历日中年代最早的一件，而且也是现知惟一的北魏历日实物。第三件是《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印本历日》，此历存二月廿日至年末（中有残缺），是来自唐王朝的历日。可以说，这是现存敦煌历日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件。据严敦杰研究，此历用唐长庆宣明历术。历书内容分两部分，上部为历日，下部为各种迷信历注的推算方法。据原件末尾题识，此历估计是五代敦煌历法专家翟奉达的收藏品。第四件是印本《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虽仅存一小片，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本历日。

敦煌地方自编的历日，现知最早者为《唐元和三年（808）戊子岁具注历日》，是一个只存四月十二日至六月一日的断片，



最晚者为《宋淳化四年（993）癸巳岁历日》，总计有五十余件。这五十余件历日中，原有明确纪年的共有九件，最早的是唐大和八年（834）历日，最迟的是宋淳化四年（993）历日。其余多是断简残编。经过中外学者的艰苦努力，这些残历的年代也基本上被考订了出来。

从形制上看，敦煌历日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繁本，一种是简本。书写格式也有两种，一为通栏，一为双栏。双栏书写的历日一般上为单月，下为双月。这里我们仅以 P. 3403 《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并序》为例，介绍一下敦煌历日的内容，以便窥一斑而见全豹。

此历为安彦存撰，首尾完整，通栏书写，共 354 日。历日题名之后有一个长达 31 行的“序”。其中介绍了制历的重要意义，多是套话，然后介绍了本年几十种年神的方位，再次为“太岁将军同游日”，年、月九宫亦即“九宫飞位”，“三白诗”，“推七曜直日吉凶法”，各种宜吉日的选择和凶日的避忌，最末一行是全年各月的大小。除最末一行内容，几乎全带迷信说教。在历日序的中间顶端，画出了当年的年神方位图，与序言中的文字相辅相成。每月开头有当月的月九宫图、月大小、月建干支，其下为八种月神方位和太阳出入方位。历日部分由上而下分成八栏。最上一栏注“蜜”（星期日）；其次为日期、干支、六十甲子纳音和建除十二客，如正月一日是“一日庚午土定，岁首”，其中“土”为该日“庚午”的纳音，“定”是建除十二客。第三栏是弦、望、人日、祭风伯、祭雨师等注记。第四栏是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第五栏是极为繁杂的吉凶注，如正月一日注：“岁位、地囊、复，祭祀、加官、拜谒、裁衣吉。”地囊等迷信注记均有严格的排列规律，敦煌历日所以称作“具注历”也主要是因为有些吉凶注。第六栏为昼夜时刻，使用的是中国古代的百刻纪时制度，随节气变化昼夜互有增减，春秋二分日昼夜各五十刻。第七栏是



“人神”，第八栏是“日游”，这两栏内容均是不变的套数。总括看来，迷信和科学内容参半。

敦煌历日的朔日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历不尽一致，常有一到二日的差别；闰月也很少一致，比中原历或早或晚一二月。这种差别何以产生，目前尚无法说明，因为迄今仍未获知敦煌地方历日编制的依据。尽管如此，纪日干支同中原历却十分一致，表明中国古来干支纪日法的连续性并未因地方自编历日而中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知来自基督教的星期制度最早引入我国历法是从敦煌历开始的。一星期的各日在敦煌历日中依次称作“蜜”（星期日）、莫（星期一）、云汉（星期二）、喃（星期三）、温没斯（星期四）、那颀（星期五）、鸡缓（星期六）。一般来说，敦煌历日要在正月一日注上星期几，如 P.3403 正月一日顶端注“那颀日受岁”，意即这天是星期五，以后只在星期日那天注一“蜜”字。个别历日只在当年正月初一注上星期几，以下不注，人们自然可以由此去推算，只是麻烦一些罢了。至于这些奇怪的名称究竟来自哪里，目前说法不一，但所注的星期日除偶有抄错外，基本正确无误。

敦煌历日在我国历法史上地位十分重要。古代历日如何演进发展，以前因实物太少而难寻觅其发展轨迹，敦煌历日的问世，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从出土的秦汉简牍看，那时的历日内容都很简单，到北魏时仍极简略。吐鲁番出土的《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日》和《唐仪凤四年（679）具注历日》内容就比较丰富了，但大体也只是同敦煌发现的简本历日相仿。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繁本历日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基本上奠定了宋至清代历日的格局。敦煌历日所存的繁、简两种形制，恰好反映了古历由简到繁的演进过程。



三、精美的古代星图

在敦煌文献中，有两幅精美的古代星图，一幅是 S.3326《全天星图》，现藏英国图书馆；一幅是《紫薇垣星图》，现藏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画在《唐人写地志》（076号）残卷的背面。其中《全天星图》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1348颗）、最古老的一幅星图。《全天星图》从十二月开始画起，根据每月太阳位置的所在，把赤道带附近的星分成十二段，利用类似麦卡托（1512~1594）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来，最后再把紫薇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这比麦卡托发明此法早了七八百年。每月星图下面均有说明文字，其中太阳每月的位置所在，沿用的是《礼记·月令》中的说法，例如“二月日会奎，昏于星中，旦牛中”，并非绘图时的实际观测。这幅星图的画法在天文学史上是一个进步。此前星图的画法，一种是以北极为中心，把全天的星投影在一个圆形平面上，汉代的“盖图”大概都是如此，现存苏州的宋代石刻天文图仍无改变。这样的画法缺点很大：越到南天的星，彼此在图上相距越远，而实际上是相距越近。另一种办法是用直角坐标投影，把全天的星绘在所谓“横图”上，此法出现于隋代。采取这种办法，赤道附近的星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但北极附近的星就差得太远，根本无法会合到一起。为了克服这两种画法的缺点，只得把天球一分为二：把北极附近的星画在圆图上，把赤道附近的星画在横图上。《全天星图》就是我们现在所知按照这种办法画得最早的一幅。这种办法一直应用到现代，所不同的只是现在把南极附近的星再画在一张圆图上。

《全天星图》彩绘而成，其中甘德星用黑点，连以墨线，石申和巫咸星画成圆圈，连以橙红线。恒星的这种画法是继承了三国陈卓和刘宋钱乐之的办法。图中十二次的起讫度数和《晋书·



天文志》中所录陈卓的完全一样，说明文字则与唐《开元占经》卷64的《分野略例》大体相同。

我们称这幅星图为《全天星图》，是因为它囊括了当时北半球肉眼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恒星，当时看不到的南极及其附近恒星自然不在其中，这是它同现代《全天星图》的不同之处。

《全天星图》早就吸引了中外科技史专家的注意力。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教授在对比了我国古代各种星图包括这件《全天星图》同欧洲各种星图之后说：“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可以和中国天图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很少，甚至简直就没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中译本第253页）至于星图的绘成年代，李约瑟定在公元940年前后，马世长则根据同卷《气象杂占》中的“臣淳风言”、“民”字避讳缺末笔而不讳“旦”字，以及卷末电神的服饰特征等，认为应当抄绘于公元705年~710年之间。

《紫薇垣星图》也是彩图，画在两个同心圆上。在紫薇垣近阊阖门处，标注“紫薇宫”三字；垣的东西两侧分别标注“东番”和“西番”，意即“番卫”；内圆（即紫薇垣）画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垣的前后面都没有缺口作为垣门。图中的星点也用红、黑两种不同颜色。此外，凡是不属于“紫薇宫”的，虽离北极较近，例如造父和钩星，都略去不绘；反之，像传舍、八谷、玄戈、太阳守等，虽离北极较远，因属紫宫，仍予绘出。外圆直径26厘米，用以表示上规，即天极上北极出地的恒显圈。根据其中传舍、八谷和文昌等星推测，这幅星图观测地点的地理纬度约为北纬35°左右，相当于西安、洛阳等地。

四、遨游苍穹的《玄象诗》

P.2512是一卷重要的天文星占著作，残存内容包括四部分：



(1) 星占的残余部分；(2) 《二十八宿次位经》和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3) 《玄象诗》；(4) 日月旁气占，内容格外丰富。在《二十八宿次位经》之后有“自天皇以来至武德四年(621)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一百八岁”的记载，表明这一卷书是唐以前或唐初的著作。它的前两部分在辑佚和校勘方面十分重要。传世的《开元占经》由印度来华僧人瞿昙悉达编纂而成，该书卷66的最末一项内容为“太微星占四十六”，卷67的开端却是“三台占五十三”，两不衔接，中间缺了六个星官。所缺星官在P.2512的“石氏中官”里则完整无缺地保存着。

紧接三家星经之后的就是《玄象诗》。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夏夜星宿的妩媚、冬夜繁星的冷峻怀有浓厚的兴趣。可是要想记住天穹上各星官的位置和次序却非易事。于是古人创作了许多韵文和诗歌，借以介绍全天星官。唐以前的韵文作品中，大约以北魏张渊的《观象赋》为最早，时间约在公元438年；后来隋朝李播还作过《周天大象赋》。唐开元时王希明所作的《步天歌》，是后世流传最久的识星作品，这以前的恐怕也只有P.2512保存下来的《玄象诗》了。

《玄象诗》是配合它前面的三家星经作的，全篇五言为句，今存264句。其特点是先从角宿起叙石氏星经，再从角宿起叙甘氏星经，再从角宿起叙巫咸星经，最后将三家合在一起总叙紫微垣。这样，人们只要以这篇诗作为指南，便可迅速将全天主要星官铭记在心。如其开端：

角、亢、氏三宿，行位东西直。库楼在角南，平星库楼北。南门楼下安，骑官氏南植。摄、角、梗、招摇，以次当杓直。

这浅显易懂的诗句，十分便于记诵。把这264句诗背熟，再



去对照满天星斗，人们就可以在无限苍穹遨游了。

不过《玄象诗》也有缺点。它是按照三家星经编次而成的，故每回都要从角宿开始。要记住星官再去认星，便须顺次在天空转三圈，不甚方便。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有人便把《玄象诗》重新排列，尽量按照星官的次序依次对照，P.3589《玄象诗》残卷就是这样排列的。虽方便了许多，但仍不彻底，于是至唐代有《步天歌》出（见郑樵《通志·天文略》）。《步天歌》不再顾及三家星经的区分，而按三垣二十八宿的次序去编排，七言为句，配以星图，就更能满足人们记忆星官方便的需要了。这或许正是《步天歌》得以长久流传，而《玄象诗》未能传世的原因之所在。尽管如此，《玄象诗》毕竟反映了古人记忆星官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使我们得以明白古代这类作品的演进和发展过程。

（原载《文史知识·敦煌学专号》1988年8期，
第48~53页）

新发现的敦煌写本 杨炯《浑天赋》残卷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曾享誉诗坛，并与其他“三杰”一起为后人称颂。传世杨炯作品本已不多，古写本更属罕见。近年，我们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件杨炯的《浑天赋》残卷。

原卷编号 S.5777，藏英国图书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曾拟题为《天象赞》。1992 年夏，宋家钰先生等在编辑《英藏敦煌文献》时，对此卷的定名提出疑问。因我曾在敦煌天文历法文献方面用过一些力气，几位先生希望我能提供意见。遵先生们之命，我反复审览，觉得它有两个特点：（1）文体属于赋；（2）内容讲天象。所以我拟名之为“观象赋（？）”。我将此想法告知宋家钰先生，宋先生奋力查找，最终确认它就是杨炯的《浑天赋》残卷。

残卷纸幅大小未详，首尾均缺，残存文字 20 行，整行二十八九字。除前 2 行和末行下部残破外，其余 17 行文字完整。杨炯《浑天赋》在传世文献中见于《盈川集》卷一、《全唐文》卷一九〇、《文苑英华》卷一八。现据照片将残卷文字进行释录（行次为笔者所加，原为竖行），并与传世文献比勘，出校记予以说明。

[前缺]

1 听抱^①之碾碾。南斗主爵禄，东辟^②主□□^③

2 林之军所以除暴乱，垒辟^④之阵所以备非常。



□⑤

3 奎为封豕，参为白虎，胃为天仓，娄为众聚。氐⑤头之北，宰割⑦其胡虏⑧；

4 天毕之阴，蓄泄其云⑨雨。太阴⑩积尸之肃杀，参旗九游之部伍。焦⑪苏之地，

5 出入于苑园⑫；万亿之资⑬，填积于仓庾。 南宫则黄龙赋象，朱鸟成形。

6 五帝之坐⑭，三光之庭。伤成于钱⑮，诛成于质⑯。祸⑰成于井，德成于衡。执法者，

7 廷尉之曹，大夫⑱之象；少微者，储君之位，处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顾，军市晓

8 而鸡鸣。三川之交⑲，觜⑳火通其七曜㉑；七泽之国，翼轸寓其精。河南河北㉒，象阙于是

9 乎增峻；左辖右辖，边荒于是(?)㉓乎自宁。乃有金之散气，水之精液，法清渭㉔之

10 横桥，象昆池㉕之刻石。岁时占其水旱，沧溟应其朝夕㉖。织妇㉗之室，汉家之

11 使㉘可寻；饮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覩。 日㉙者众阳之长，人君之尊。天鸡晓唱，云

12 云乌㉚昼踰。扶桑临于大海，若木照于昆仑。太平太蒙㉛，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

13 所以肆㉜其寒温。龙山衡㉝烛，不能议其光景；夸父弃策，无以方其骏㉞奔。(此下空二字)

14 月㉟者，群阴之纪，上天之使，异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诸对而明水洽㊱，重晕匝而

15 边风驶。财㊲盈蚌蛤，则虏骑先侵；适斗麒麟，则暗虚㊳潜值。 五星者，木为

16 重华，火为焚或㊴。镇居戊己㊵，斯为土德。太白主㊶



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

17 观天则，北^{④②}参右肩之黄，如奎火^{④③}星之黑。五才^{④④}所以致用，七政由其^{④⑤}不忒。同舍而

18 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国。赤角犯我城，黄角地^{④⑥}之争。五星同色，天^{④⑦}偃兵。趋

19 前舍为盈，后^{④⑧}舍为缩。盈则侯王不宁，缩则有军^{④⑨}不复。或向而或背，或

20 迟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忧，岁镇居之而有福。观众星之部署，□□^{⑤①}

[后缺]

[校记]

①抱：《文苑英华》（以下简称《英华》）同。《杨炯集》（据中华书局1980年徐明霞点校本）、《全唐文》作“抱”。按，作“抱”是，残卷“手”、“木”不分，作“抱”误。《国语·齐语》：“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枹鼓”于此为星名，即河鼓星。又据三种文献，残卷“枹”下脱“鼓”字。

②辟：三种文献作“壁”，是。《隋书·天文志》（以下简称《隋志》）：“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残卷“辟”为通假字，敦煌写卷中多互代。

③据三种文献，此行残失文字是：“文章，须女主布帛，牵牛主关梁。羽。”

④辟：三种文献作“壁”，是。残卷为通假字，敦煌写卷中多互代。

⑤据三种文献，此行残失文字是：“西（《英华》作“四”，误）宫则天潢咸池，五车三柱。”

⑥毳：三种文献作“旄”，是。残卷为俗体字。《晋书·天文志》（以下称《晋志》）：“昴七星……又为旄头，胡星也。”



⑦割：三种文献作“制”，亦通。以残卷为胜。

⑧胡虏：《全唐文》作“边陲”，误。

⑨云：《杨炯集》作“雷”，误。

⑩太阴：《全唐文》、《英华》作“大陵”，《晋志》、《隋志》作“太陵”，均是。古语“大”、“太”多不分。《杨炯集》作“天陵”，误。残卷“太阴”亦误。

⑪樵：三种文献作“樵”，是。残卷误。

⑫苑园：三种文献作“园苑”，俱通。

⑬资：《全唐文》作“贲”，互通字。

⑭坐：《英华》同。《全唐文》、《杨炯集》作“座”。按，敦煌写本中二字多通用。此处指“五帝座”，故以“座”为是。

⑮钱：三种文献作“钺”，是。《晋志》、《隋志》：“钺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斩之。”残卷“钱”误。

⑯质：《英华》作“质”，又注曰“一作锁”。《全唐文》、《杨炯集》作“锁”，是。“锁”即“铁锁”星，“质”乃同音借字。

⑰祸：《全唐文》、《英华》作“福”；《杨炯集》作“祸”。《晋志》、《隋志》：“东井八星，天之南门，黄道所经，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则井星明而端列。”《开元占经》卷六十三：“东井占一”；“石氏曰：东井堕，天下涌水，井钺去，则水满。甘氏曰：‘用法平，王者心正，则井星明，行位直’。考上下文义，似当作‘福’。

⑱大夫：《杨炯集》作“大臣”，误。《晋志》：“东曰左执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执法，御史大夫之象也。”作“大夫”是。

⑲交：《英华》作“郊”，误。

⑳鹑：三种文献作“鹑”，是。“鹑火”为南方朱鸟七宿之总称。

㉑七曜：七，三种文献无，残卷涉下“七泽”致衍。曜，三种文献作“耀”，互通。



⑳河南河北：三种文献作“南河北河”，是。《晋志》：“南河曰南戌……北河曰北戌……两河戌间，日月五星之常道也。……南河南三星曰阙丘，主宫门外象魏也。”残卷误。

㉑残卷“于乎”右侧似补一“是”字，但照片十分模糊。三种文献有“是”字，是。

㉒清渭：《杨炯集》、《全唐文》作“渭水”，《英华》作“清渭”，俱通。按，成语“泾渭分明”，谓渭水清，泾水浊，作“清渭”为胜。

㉓昆池：《全唐文》同。《杨炯集》作“昆明”，误。《英华》作“昆明”，“明”下注曰“一作池”。昆池乃昆明池之简称，作“昆池”是。

㉔朝夕：《英华》同。《杨炯集》、《全唐文》作“潮汐”，误。

㉕织妇：三种文献作“织女”，是。残卷“织妇”亦通，但以星名当作“织女”。

㉖使：《杨炯集》、《全唐文》同。《英华》作“史”，是。《晋志》：“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妇人之微者，主传漏，故汉有侍史。”所谓“汉家之史”当即此。女史星在织女正北的紫微垣中。

㉗三种文献“日”下有“也”字。

㉘云乌：三种文献作“灵乌”，是。残卷误。

㉙太蒙：《杨炯集》作“太象”，校记云：“‘太象’应作‘太蒙’。”按，作“太蒙”是。《尔雅·释地》：“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古语“大”、“太”多不分。

㉚肆：三种文献作“节”，俱通。

㉛衡：三种文献作“街”，是。残卷“衡”误。

㉜骏：三种文献作“骏”，是。

㉝三种文献“月”下有“也”字。

㉞洽：《全唐文》同。《杨炯集》作“浹”。《英华》作“洽”，注曰“一作浹”，俱通，同义异文。



⑳财：三种文献作“裁”，俱误。《英华》注“一作才”。按，作“才”是。此“才”字与下文“适”为对文。

㉑暗虚：三种文献作“暗虎”，误。“暗虚”为古天文名词，指地球被太阳所照形成的暗影，月入其中则成月蚀。

㉒或：三种文献作“惑”。按，“或”通“惑”。

㉓己：《杨炯集》同。《全唐文》、《英华》作“巳”，形近致讹。

㉔主：《全唐文》作“土”，误。

㉕北：三种文献作“比”，是。敦煌文献中二字多不分。

㉖火：《全唐文》、《英华》作“大”，是。《杨炯集》作“火”，与残卷同误。

㉗五才：《全唐文》、《杨炯集》作“五材”。《英华》作“五才”。“才”下又注“一作材”。按，可互通，均指金、木、水、火、土。《左传·襄二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后汉书·马融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

㉘由其：三种文献作“于焉”，近义异文。传世文献偏文。

㉙地：《全唐文》同。《杨炯集》、《英华》作“天”。未知孰是，俟再校。

㉚三种文献“天”下有“下”字，是。残卷脱。

㉛三种文献“后”前有“退”字，是。残卷脱。

㉜有军：三种文献作“军旅”，文字更显畅。

㉝据三种文献，此二残字应是“历七”。

残卷书写不十分工整，错讹衍倒屡见。但有些地方对校勘却有大用。如第15行有“适斗麒麟，则暗虚潜值”一句，其中“暗虚”，传世文献讹作“暗虎”，盖因“虚”、“虎”形近而致误。残卷对于正确校勘这个词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传世杨炯《浑天赋》浑然一篇，不加分段。但残卷却有自然段落，用空两字的方法来表示。现存部分“西宫”（2行，已残，



但“西”字仍能识见残痕）下为一段，“南宫”（5行）下为一段，“日者”（11行）下为一段，“月者”（14行）下为一段，“五星者”（15行）下为一段，共五段文字。《晋志》、《隋志》的“二十八舍”次序，均为东、北、西、南。此残卷有“西宫”、“南宫”，则第1、2行的文字应属北宫。三种传世文献正作如是记载。残卷的分段显示杨炯《浑天赋》原有自然段落。仅此一端。亦可见残卷的价值不容小视。

杨炯在唐宋诗坛虽然名气颇大，但天不假年，约活了43岁（650~693?），大概也属于人们所说的“鬼才”之类。他在《浑天赋》序中说：“显庆五年（660），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676），始以应制举，补校书郎。朝夕灵台之下，备见铜浑之象。寻返初服，卧疾丘园。二十年而一徙官，斯亦拙之効也。代之言天体者，未知浑、盖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为祸福由人。故作《浑天赋》以辩之。”据此可知，《浑天赋》是他二十六岁补校书郎之后的作品。

我国古代的宇宙理论，至汉代，共形成三种观点：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宣夜说虽具有比较彻底的宇宙无限思想，认识论上较为进步，但在实际进行天文观测时用处不大，因此不久便失传。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是浑、盖两种宇宙观。盖天说最初认为天圆如伞盖，地方如棋盘。这实际只是对天空和大地的一种直观认识，因此屡受批评。后来这种宇宙观又修改为：天像一把向北斜靠着的伞，只是没伞把；地则像倒扣着的盘子；天地都是中间高，四周低。这虽比最初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但仍不能正确说明日月五星的视运动。浑天说以东汉科学家张衡为代表。他把天地比做一个鸡蛋：天圆得像蛋壳；地圆得像蛋黄，居于蛋壳内；“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浑天说虽也以地球为中心，但同天地结构的实际情形相接近，也能十分密合地解释日月五星的视运动。杨炯《浑天赋》中对三种宇宙理论进行了辨析，表明他的



主张，这正是他这篇作品以《浑天赋》为题的原因。其后他对日月星辰的描述即本于此。但其真实用意却是借天言“命”，辩白“祸福”是否“由人”。

《浑天赋》文字瑰丽，悦人耳目。杨炯将枯燥的星官概念巧妙地糅合到文学语言之中，读来琅琅上口，意味深长。这由残卷保存下来的那部分文字已见一斑。

S.5777号杨炯《浑天赋》残卷的确认，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份古写本资料。至于此卷的抄写年代，目前尚难考定，估计是在唐代或唐宋之际。

（原载《文物》1993年5期，第61~65页）

比《步天歌》更古老的通俗 识星作品——《玄象诗》

我国传世文献所收的古代通俗识星作品，素以唐开元年间王希明作的《步天歌》（见郑樵《通志·天文略》）为最古，并为人称道。此前的同类作品，如北魏张渊的《观象赋》、隋朝李播的《周天大象赋》，都属于文人骚客的赋兴之作，严格说来还算不上识星作品。令人欣慰的是，敦煌文献中保存下两份比《步天歌》更古老的通俗识星作品——《玄象诗》，编号为 P.2512 和 P.3589。其中 P.2512 一件，罗振玉曾录文刊布于《鸣沙石室佚书》。但罗氏只对原卷文字照描，识错的文字不在少数，不便使用。笔者试对这两篇识星诗作进行释文、断句，互为校勘，并略述个人的认识。校勘时，以 P.2512 为底本，称甲卷，以 P.3589 与甲卷互校，称乙卷，择善而从。原卷中的俗体字，直接录为现行文字；别字和形近而误的错字，在字后圆括号内写出正字、互通字；脱漏文字用方框表示；增补文字放入方括号内；尚未确释的字，其后标出“（？）”；原卷的错误径录不改，在校记中作说明；为便于排版，一律用简体字。校释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仍盼行家示正。

玄 象 诗

角、亢、氐三宿，行位东西直。库娄（楼）在角南，平星库



娄（楼）北。南门娄（楼）下安，骑官氏南植。摄、角、梗、招摇，以次当杓直。两咸俱近房，积卒在心旁。龟、鱼、傅尾侧，天江尾上张。箕安尾北畔，鳖在斗南厢。建星与天弁，南北正相当。建星在斗背（北），天弁河中央。市垣虽两扇，二十二星光。其中有帝座，候、官（宦）东、西厢。前者宗正立，官（宦）侧斗平量。宗人宗在^①左，宗在候东厢。七公与天纪，市北东西行。公南贯〔索〕^②位，纪女北正林^③。房^④。唯余有天棓，独在紫墙〔东〕^⑤。九坎至牵牛，织女、旗、河鼓。牛东须女位，女位^⑥。女上离珠府。败白天南际，瓠〔瓜〕^⑦河畔错（？）。瓜左有天津，津下虚、危所。室、壁两星间，上有腾蛇舞。王良虽五星，并在河心许。白东北落门，门东羽林府。土空、仓、囷、苑，例（列）位俱辽远。奎、娄、胃、昂、毕，并在中天出。阁道河中央，傅路在其旁。将军在娄北，阁道几相当。天船河北岸，大陵河南畔。卷舌在^⑧其东，虽繁有条贯。天仓天囷北^⑨，头东向昂侧。天关东（车）、柱南，正是参西北。参孤^⑩有十星，头上戴一觜。右脚玉井中，左角^⑪参旗〔意〕^⑫。厕当左足下，厕南有天矢（屎）。矢（屎）^⑬南有屏星，厕东有军市。市中有野鸡，东有狼、狐（弧）矢。老人以渐^⑭远，出见称祥美。东井与五车，俱〔在〕^⑮河心里。水位南北列，五侯东西齿。北河五侯北，南河河东溪。东南有积薪，西北有积水。欲知二星处，并在三台始。轩出柳星〔东〕^⑯，轮囷垂^⑰鬼北。柳左号为星，河末^⑱称为稷。三台自文昌，斜连太微侧。下台下有星，少微与张、翼。轸在翼〔星〕^⑲东，太微当^⑳轸北。太微垣十星，二曲八星直。其中五帝座，各各依本色。屏在帝前安，常阵（陈）坐后植。郎位常阵（陈）东，星繁遥似织女^㉑。郎将独易分，不与诸星逼。天门在角南，天田在角北。平道有二星，角半东西直。进贤平道西，乳星居氏北。车骑骑南隐，将军骑东匿。阵骑车北安^㉒，折威东西直。亢池摄提近，帝座^㉓梗河侧。周鼎东垣端，



依行^{②4}在垣北。日落房、心分，气廩^{②5}飘箕舌。□前库娄（楼）居，市内^{②6}。农、苟（狗）鳖旁边。天鸡〔与〕^{②7}苟（狗）国，南北正相当。天鸡近北畔，苟（狗）国在南方。罗堰牛东列，天田坎北张。败在瓠瓜侧，旗居河鼓旁。渐台将輦道，俱邻织女房。津东有造父，津北有扶匡（筐）。策在王良侧，车父（府）腾蛇旁。人在危星上，杵、臼人东厢。命、禄、危、非卦（？），重重虚上行。盖屋危星下，哭、泣在南方。八魁在壁外^{②8}，土吏危星背（北）。土公东壁藏，雷星营〔室盖〕^{②9}。壁西霹雳惊，羽林云雨霏。屏、溷居奎下，钁、库^{③0}在仓前。园、乌天苑接^{③1}，天节、九州连。二更夹娄侧，军门当奎北。天谗与尸、水^{③2}，处置依常式。咸池及五潢^{③3}，并在车中匿。厉石在河内，船、车两边逼。天高毕御（？）^{③4}东，诸王天高北。河月及天街，咸依毕、昴侧。军井屏星南^{③5}，九游玉井侧。司怪与坐旗，车东正南直。司怪井、钺近，坐旗车、柱逼。井北天樽位，井南水府域。市（屎）南丈、子、孙，井东^{③6}疏四渎。社出老人东，丘在狼、弧^{③7}北。外厨居柳下，天苟（狗）在厨边。内平列轩侧^{③8}，耀星鬼上悬。酒旗轩足^{③9}置，天纪在厨前。天庙东瓠接，青丘、器府连。明堂列宫外，灵台两相对。门东谒者旁，公、卿、五侯辈。太子当阵（陈）^{④0}前，从、幸西、东边。阳门库娄（楼）左，顿顽骑官侧。房下有从官，房西有天福。罚在东咸西，键闭钩铃北。屠肆与白（帛）度，次次宗旁息。列肆斗西维，车肆东南得。〔天〕^{④1}禽杓前置，天关次居北。奚仲天津北，钩星奚仲旁。天杼牛北累^{④2}，诸国次^{④3}东行。璃（离）瑜臼西隐，天苟^{④4}臼中藏。天钱北落北，天厖王良侧。铁钺^{④5}羽林藏，天纲羽门塞。虚梁危下安^{④6}，天阴毕头息。长垣少微下，賁位在魁前^{④7}。天（太）尊中台北^{④8}，天相七星边。司空器府北，军门轸下悬。紫微垣十五，南北两门通。七在宫门右，八在宫门东。钩陈与北极，俱在紫微宫。辰居四辅内，帝坐钩陈中。斗杓^{④9}将帝极，向



背悉皆同。华盖宫门北，传舍东西直。五帝、六甲坐^①，相^②旁近门阙。天厨及内皆（阶），宫外东西域。天柱、女御宫^③，并在钩陈侧。柱史及女史^④，尚书位攢逼。门内近极旁，大理与阴德。门外斗杓衡，门近天床塞^⑤。欲知门大小，衡端例同则。天一、太一神，衡北门西息。内厨以次设，后与夫人食。臣、相^⑥及枪、戈，攢聚杓旁得^⑦。执^⑧、守衡南隐，天理魁中匿。三公魁上安，天牢魁下植；以次至文昌，昌则^⑨开八谷。北斗不〔入咏〕^⑩，为是人皆识。正背^⑪有^⑫奎、娄，正南当轸、翼。以此^⑬记推步^⑭，众^⑮星安可匿？

〔校记〕

①宗在：误。当作“宗正”。

②索：原脱，径补。贯索一座在七公座南。

③纪女北正林：全句误。当作“纪北正女床”。女床一座在天纪座北。

④房：上下不相属，疑衍。

⑤东：原脱，径补。天梧一座在紫微垣墙之东。

⑥女位：承上文衍。

⑦瓜：原脱，径补。

⑧在：乙卷作“附”。

⑨天仓天囷北：乙卷作“天廩囷东北”是，甲卷误。

⑩参孤：乙卷作“参体”。

⑪左角：乙卷作“右角”，是，甲卷误。

⑫意：原脱，据乙卷补。

⑬矢：乙卷作“井”，是。甲卷误。

⑭以渐：乙卷作“已次”。

⑮在：原脱，据乙卷补。

⑯东：原脱，据乙卷补。



- ⑪垂：乙卷作“临”。
- ⑫河末：意义未详；乙卷作“星下”，意义明了。
- ⑬星：原脱，据乙卷补。
- ⑭当：乙卷作“居”。
- ⑮女：乙卷无，合本诗五言句式，但意义不及甲卷明了。
- ⑯阵骑车北安：当作“阵车骑北安”。阵车一座在骑官北。
- ⑰帝座：误。当作“帝席”。帝席一座在梗河西侧。
- ⑱依行：意义俟详。
- ⑲气廩：意义俟详。
- ⑳市内：上下有脱文。
- ㉑与：原脱，依上下文义径补。
- ㉒八魁在壁外：乙卷作“八魁壁垒外”。
- ㉓室盖：原脱，据乙卷补。
- ㉔库：乙卷作“庾”，是，甲卷误。
- ㉕园、乌天苑接：乙卷作“乌蒿（藁）天苑侧”。
- ㉖天谗与尸、水：乙卷作“尸、水与天谗”。
- ㉗五潢：乙卷作“天潢”，是，甲卷误。
- ㉘毕御（？）：乙卷作“毕口”，是，疑甲卷误。
- ㉙南：乙卷同，疑当作“北”。
- ㉚东：乙卷作“南”，是，甲卷误。
- ㉛狼、弧：乙卷作“狐（弧）、狼”。
- ㉜侧：乙卷作“腹”，胜甲卷。
- ㉝轩足：乙卷作“星上”。
- ㉞当阵（陈）：乙卷作“常阵（陈）”，是，甲卷误。
- ㉟天：原脱，径补。
- ㊱累：乙卷作“置”，胜甲卷。
- ㊲次：乙卷作“坎”，是，甲卷误。
- ㊳天苟：乙卷作“[天]垒”，是，甲卷误。



- ④⑤ 铁锁：乙卷同，若作“铁钺”更确切。
- ④⑥ 安：乙卷作“置”。
- ④⑦ 贵位在魁前：乙卷作“贵位下台前”，胜甲卷。
- ④⑧ 北：乙卷作“侧”。
- ④⑨ 斗杓：乙卷作“斗衡”。
- ⑤⑩ 五帝、六甲坐：乙卷作“六甲、五帝坐”。
- ⑤⑪ 相：乙卷作“杠”，是，甲卷误。
- ⑤⑫ 女御宫：乙卷作“御女宫”。
- ⑤⑬ 柱史及女史：乙卷作“女史及柱史”。
- ⑤⑭ 门外斗杓衡，门近天床塞：乙卷作“衡北至门南，中有天床塞”。
- ⑤⑮ 臣、相：乙卷作“公、相”，是，甲卷误。
- ⑤⑯ 攒聚杓旁得：乙卷作“以聚杓头息”。
- ⑤⑰ 执：乙卷作“势”，是，甲卷误。
- ⑤⑱ 则：乙卷作“前”，是，甲卷误。
- ⑤⑲ 入咏：胶卷上今为空洞，据乙卷补。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作“是气”二字，意义费解，亦不知其所据。
- ⑥⑩ 背：乙卷作“北”，是，甲卷误。
- ⑥⑪ 有：乙卷作“是”。
- ⑥⑫ 以此：乙卷作“以次”。
- ⑥⑬ 推步：乙卷作“推排”，文义不及甲卷。
- ⑥⑭ 众：乙卷作“诸”。

跋

《玄象诗》是一篇完整的古代通俗识星诗作。除个别文句脱漏，整理后存完整的诗句 264 句，1300 余字。全诗五言为句，通俗易懂。古人凭借这样一篇诗歌，便可迅速认出全天常见的主要



星座，在无限的苍穹遨游。从俗文学史角度看，它也不失为一篇琅琅上口的好作品。敦煌文献问世后，文学史家对其中的诗赋作品已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但因多数从事敦煌文学研究的学者对古天文知识不太熟悉，以致此诗少有问津。笔者认为，《玄象诗》在敦煌文学史乃至中国俗文学史上也应该占居一席之地。

现存两份《玄象诗》，甲卷（P. 2512）属于某种天文星占书的一部分。此卷共存四项内容：（1）星占的残余部分；（2）《廿八宿次位经》和《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经》；（3）《玄象诗》；（4）日月旁气占。《玄象诗》是配合它前面的《廿八宿次位经》和《三家星经》作的，因此，它是按照二十八宿和《三家星经》体系排列的：先从角宿起，叙石氏星经；再从角宿起，叙甘氏星经；再从角宿起，叙巫咸氏星经；最后将三家合在一起总叙紫微垣。因此，要凭借此一诗作识星，便需在周天转三圈，不甚方便，这是其主要缺陷。

乙卷（P. 3589）正、背两面均有文字。正面起于《玄象诗》残文，之后有《许七曜利害吉凶征应瞻》、太史令陈卓的《日月五星经纬出入瞻吉凶要诀（诀）》；背面为《相书一卷》。因此，乙卷也属于某种天文星占书的一部分。其排列则与甲卷不同。它是将完整的《玄象诗》分段拆开，按照在周天转一圈、一次达到识星目的的要求排列的。同时为区别《三家星经》和紫微垣，在各段诗句上面注明“赤”、“黑”、“黄”、“紫”，分别代表石氏、甘氏、巫咸氏和紫微垣。换言之，它已能达到在周天转一圈就可识星的目的，克服了甲卷的主要缺陷，这是乙卷的方便之处，也是它比甲卷进步之所在。但它仍未完全摆脱《三家星经》的羁绊。整理后，乙卷残存 161 句，其中石氏（赤星）52 句，甘氏（黑星）51 句，巫咸氏（黄星）16 句，紫微垣（紫星）42 句，约占《玄象诗》全文的五分之三。

尽管乙卷的排列方法比甲卷进步，但甲、乙二卷有共同的缺



陷，那就是不能摆脱《三家星经》的束缚；再者，大多未能表明各星座的具体星数，而只停留于对星座相对位置和形状的描述。于是，到唐开元时^[1]，有《步天歌》出。《步天歌》置《三家星经》于不顾，完全按照三垣二十八宿的次序叙述；不仅有各星官的相对位置，而且兼及星数，且有星图配合，文字也优于《玄象诗》，最终形成了更为成熟的通俗识星作品。因此，《步天歌》得以长久流传，而《玄象诗》却湮没不闻了^[2]。然而，《玄象诗》比《步天歌》早得多，它秘藏千年之久，使我们今天得以了解古代这类作品的演变发展过程，其珍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前已指出，甲卷《玄象诗》是配合它前面的《廿八宿次位经》和《三家星经》作的。就在同卷《廿八宿次位经》之后，注明了“自天皇已来至武德四年（621）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一百八岁”，表明这一天文星占书是唐以前或唐初的著作，《玄象诗》自应与之相当，因此它至少比开元时形成的《步天歌》早了二百年。至于乙卷，因为它是将完整的《玄象诗》拆开重排的，形成时间当在完整的《玄象诗》作成之后。现存甲、乙二卷抄于何时，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注释】

[1] 关于《步天歌》的作成年代，学术界尚有争议。本文采用的是夏鼐先生的意见。见夏鼐《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载《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 参阅席泽宗《敦煌卷子中的星经和玄象诗》，载薄树人主编《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探胜》第45~66页，科学出版社，1992年。

（原载《文物》1990年3期，第61~65页）

隋唐历史典籍校正三则

——兼论 S.3326 星图的定名问题

我在这里提出需要校正的隋唐历史典籍，除一则出自敦煌文献外，其余二则均出自我们经常使用的《隋书·经籍志》和《大唐六典》，内容均属于天文学方面。研读隋唐历史者或较为陌生，或措意不够，极易造成熟视无睹。故而不惮琐屑之讥，将读书中的愚者一得披露如后，以与诸大雅切磋云尔。

—

1973年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经籍三》“天文类”著录有“《石氏星簿经赞》一卷”^[1]，郑樵《通志》卷68“艺文六”之“天文略”有完全相同的著录。但《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为“《石氏星经簿赞》一卷，石申”^[2]；《旧唐书·经籍志》亦为“《石氏星经簿赞》一卷，石申甫撰”^[3]。“星簿”和“星经”何者为是？我颇疑当时校勘《隋书》和两《唐书》时，校者并非没有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对古天文知识过于生疏，以至于使之成为漏网之鱼。

我们知道，这几种书名中的“石氏”即石申或石申甫，是战国时代魏国人。据南朝·梁·阮孝绪《七录》记载，他曾著有《天文》8卷。这可能是其著作的本名。约在西汉后此书被尊称为《石氏星经》^[4]。《石氏星经》的内容今散见于《史记·天官书》、



《汉书·天文志》和《唐开元占经》。三国·吴·陈卓整理后的完本则见于敦煌文献 P.2515 号之《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经》^[5]。因此，单从石申此一著作的原名来看，两《唐书》经籍（艺文）志的“《石氏星经簿赞》一卷”是顺理成章的，而《隋书·经籍三》的“《石氏星簿经赞》一卷”则扞格难通。

所可注意者，这部书虽在中国早已遗失，但在日本却留下了相应的记录和近似于原本的传本。日本藤原佐世所撰《日本国见在书目》（约成于公元 890 年）著录：“簿赞三卷，石氏星经簿赞二卷。”卷数虽与两《唐书》有别，但书名却很一致。又据记载，日本天平二十年（唐天宝七载，748 年），奈良正仓院文书的《写章疏目录》中有如下记载：“石氏星经簿赞一卷，石申造；簿赞一卷，陈卓撰；传赞星经一卷”^[6]。除了上述两种日籍著录之外，1984 年，日本东京市若杉家将家藏阴阳书 2235 种赠给了“京都府立综合资料馆”。若杉家原为江户时代阴阳道土御门家的家司，而土御门家也就是平安时代世袭职司阴阳寮天文历算阴阳五行之学的安倍氏（安倍晴明）的后代。所赠第 82 号文书由“石氏簿赞”和“杂卦法”两部分相续而成。前者外题“石氏簿赞”，内题则作“石氏星官簿赞”，同时包含有“甘氏星官簿赞”和“巫咸星官簿赞”^[7]。“星官”与“星经”用字不同，但意义无别。

从以上日本旧籍著录和重新浮出水面的日藏中国古籍名称可以看出，《隋书·经籍三》之“《石氏星簿经赞》一卷”中的“簿”、“经”二字，属于误倒，应予纠正，当以两《唐书》著录为确。

附带指出，我国研究数学、天文学史的前辈学者钱宝琮先生也早就觉察到了《隋书·经籍志》的这一错误。1937 年，钱先生曾撰有《甘石星经源流考》，内云：“汉魏以来星占家数多至二十余，可谓盛矣。《隋书·经籍志》所载星占书标甘氏、石氏之名者有下列诸



种:《石氏浑天图》一卷、《石氏星经簿赞》一卷》……”[8]钱氏所引,显然是经他加以校正过的,因为这已非《隋书·经籍志》的原文了,可惜后来校勘《隋书》者未能读到钱先生的高论。校书之难,于此可见一斑。

二

现今治隋唐史者,谁也离不开唐代行政法典《大唐六典》一书。20世纪80年代以前,此书在中国没有太理想的本子。20世纪80年代后,共有两种版本正在流行:一种是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陈仲夫先生的点校本;一种便是日本广池千九郎训点、内田智雄补订,于昭和四十八年(1973)出版的校本。1981年,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昔日同室好友、加拿大留学生保罗·白瑞南(Paul Brennan)来华访问,我托他从日本给我买了一本广池本《大唐六典》。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应学术界急需,三秦出版社将此书加以翻印流布,所据便是我这本由朋友赠送的、被我视作珍宝的广池本《大唐六典》。当然,这些均是题外话。

我现在提出需要校正的正是广池本《大唐六典》中的一个错误。

此书卷十秘书省之太史局“灵台郎”条云:“掌观天文之变而占候之。凡二十八宿,分为十二次:寅为析木,燕之分(原小注: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巳为鹑尾,楚之分(原小注:自张十五度至轸十一度)……”[9]其余各“次”的次名,与十二支的对应关系,各“次”在二十八宿中的起讫度数,均见附表第一栏。

“十二次”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天文学名词,它是由“岁星纪年”产生的。所谓“岁星”,就是五大行星中的木星,其绕太阳



一周为 11.86 年，以整数计就是 12 年。岁星每年在周天走一“次”，十二年一周天，走完十二“次”。而要知道它每年所在天区的位置，则需以二十八宿为背景来观测。这样，二十八宿就被分配到十二次中去了。再者，中国古人认为太阳每天在天区运行一度，一年 $365 \frac{1}{4}$ 天，周天也就是 $365 \frac{1}{4}$ 度。将周天度数等分为十二份，于是便有了每“次”在二十八宿各宿间的起讫度数。一般认为，十二次产生于战国中期；至于将二十八宿分配到十二次中，现知始于班固撰《汉书·律历志》^[10]。

为了核对广池本《大唐六典》十二次起讫度数的准确与否，我将汉至唐代共八种记载十二次起讫度数的文献编为一表（见附表），以便省览与分析。

从附表可以看出，汉至唐代十二次的起讫度数共有三个系统：《大唐六典》、《晋书·天文志》和《乙巳占》是一个系统。它们中间仅“鹑尾”一次有差别，这正是我们将要校正的问题，容待后述。第二个系统是《汉书·律历志》和《唐开元占经》以及敦煌文献 S. 3326 星图，三者间仅有小讹。第三个系统便是两《唐书》“天文志”的材料。显然，《汉书·律历志》、《晋书·天文志》二系的材料是较早的，据说来自《三统历》^[11]。因此，现存这二系的材料差别很小，仅仅在“鹑尾”、“鹑火”两次的起讫度数上小有差别，其余全同。但两《唐书》一系与前二系差别就大了。原因是前二系所用是较古的材料，而两《唐书》所记是唐代的材料。《旧唐书·天文下》序云：“至开元初，沙门一行（按，即张遂）又增损其书，更为详密，既包今古，与旧有异同，颇裨后学，故录其文著于篇。”^[12]说明使用的是开元年间一行编制《大衍历》时所测的数据。至于今度与古度的差别，当由“岁差”所引起，这里不再赘述。

如前所述，十二次度数是将周天度数等分的结果。所以，仔



八种文献所载十二次起讫度数表

	《大唐六典》卷十	《晋书·天文上》[11]	《乙巳占》卷三[12]	《汉书·律历志下》[13]	《唐开元占经》卷六十四[14]	敦煌文献 S.3326 星图[15]	《旧唐书·天文志》下[16]	《新唐书·天文志》[17]
析木(寅)	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	同左	同左	初尾十度,终于斗十一度	同左	自尾十度,至斗十二度	起尾七度,终斗八度	同左
大火(卯)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	同左	同左	初氐十二度,终于尾六度	同左	同左	初氐二度,终尾六度	同左
寿星(辰)	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	同左	同左	初轸十二度,终于氐四度	同左	同左	起轸十度,终氐一度。	同左
鹑尾(巳)	自张十五度,至轸十一度	自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	同左	初张十八度,终于轸十一度	同左	同左	起张十五度,终轸九度	同左
鹑火(午)	自柳九度,至张十六度	同左	同左	初柳九度,终于张十七度	同左	同左	起柳七度,终张十四度	同左
鹑首(未)	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	同左	同左	初井十六度,终于柳八度	同左	同左	起井十二度,终于柳六度	同左
实沉(申)	自毕十二度,至井十五度	同左	同左	初毕十二度,终于井十五度	同左	同左	起毕十度,终井十一度	同左
大梁(酉)	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	同左	同左	初胃七度,终于毕十一度	同左	同左	起胃四度,终毕九度	同左
降娄(戌)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	同左	同左	初奎五度,终于胃六度	同左	同左	起奎二度,终胃三度	同左
嫩觜(亥)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	同左	同左	初危十六度,终于奎四度	同左	同左	起危十三度,终奎一度	同左
玄枵(子)	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	同左	同左	初婺女八度,终于危十五度	同左	同左	起女五度,终危十二度	同左
星纪(丑)	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	同左	同左	初斗十二度,终于婺女七度	同左	同左	起斗九度,终于女四度	同左



细读一下附表，就会发现，表上下面一次的“至××度”与上面一次的“自××度”度数都是衔接的，如“大火”次的“至尾九度”与“析木”次的“自尾十度”度数是衔接的，而且上面一次的起算度数大于下面一次的截至度数。这样一看，发现广池本《大唐六典》“鹑尾”一次的“自张十五度”出了问题。因为其下面一次为“鹑火”，截至度数是“至张十六度”，其上面一次的起度则应为“起张十七度”才是。《晋书·天文志》和《乙巳占》，这两种出自唐初天文星占学家李淳风之手的材料正作“自张十七度”，也是完全正确的。出问题的是广池本《大唐六典》。

我们再看一下陈仲夫先生的点校本。陈先生校点后的正文是：“巳为鹑尾，楚之分（小字注：自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13]在这句之下，陈先生做了一条校勘记：“自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七’字原本讹作‘五’，正德以下诸本皆然，据《晋书·天文志》改。”^[14]与上文所论相较，可以看出，陈先生的校改是完全正确的。《大唐六典》的这条错误存在了许久，广池本也未改正，而最终由陈仲夫先生纠正了过来，厥功难泯。顺便说一句，陈先生是邓之诚（文如）先生的学生，功底深厚。但一生坎坷，多历磨难。我在北大读书时，曾听过陈先生的古汉语课。他在黑板上写的大字极为漂亮，当年还是毛头小伙子的我十分惊叹和钦佩。30年过去了，依然记忆犹新。

按理说，这个问题到此已经清楚了。但我还有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大唐六典》成书于开元二十七年（739）。而此时，僧一行主持编撰的《大衍历》也已修成（729年始行用），是唐代当时行用的历法。《大唐六典》卷十亦云：“大衍历：开元十四年（726），嵩山僧一行承制旨而考定，最为详密，今见行焉。”^[15]《大唐六典》的作者既认为《大衍历》“最为详密”，那么，为何在十二次的起迄度数上不用《大衍历》的数据，反而用西汉时代《三统历》的数据呢？岂非厚古而薄今？再者，由华化印度人瞿



昙悉达编纂的《唐开元占经》成书于开元六年（718）至十六年（728）之间，与《大衍历》产生于同时，为何又取《汉书·律历志》一系的材料，也不肯用《大衍历》的数据呢？看来，《大衍历》最初的地位并非像后人看得那么高。这其中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也说不清。

三

第三则是关于敦煌文献 S. 3326 号星图的定名问题。

敦煌文献 S. 3326 号的内容由三部分构成：（1）气象占。内中有“臣淳风言”（43 行），尾部有给皇帝所上短奏，说明是李淳风从古书中抄撮的 48 条气象占验材料，上呈皇帝（唐太宗或高宗）参考使用的；（2）星图，共由十三幅分图组成，前十二幅图依十二次划分，最后是紫微垣星图；（3）画一神像持弓射箭，其右书“电神”二字，左书“其解梦及电经一卷”，似未抄完。显然，此卷现存内容是由几种天文气象占书籍汇抄而成的。

第二部分的星图十分或者说极端重要。它是现存中国乃至全世界时代最早的全天星图。其图用彩色绘成，用黑色代表三家星中的甘德星，以橙黄色、圆圈或外圆圈内橙黄点代表石申和巫咸星，石、巫二家区分不十分严格。其星数为 1300 多颗，在三国陈卓“定纪”的 1464 颗星数内，故而是现存陈卓“定纪”后一份最古的星图。英人李约瑟在评价这件星图时说：“了解到世界其他各地绘制天图的情况，我们就会明白，决不可轻视中国星图从汉到元、明这一完整的传统。公元 940 年左右的中国星图手稿是所有现存实物中最古老的一种。蒂勒（Thiele）、布朗（B. Brown）和《科学史导论》的作者萨顿（Sarton）都认为，从中世纪直到 14 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在这时期之前，只有粗糙的埃及示意图和主要具有美术性质的希



腊天图，后者所表现的只是星座的形象示意图，而不是星辰本身。”^[16]李约瑟认为 S. 3326 星图成于“公元 940 年左右”是不确切的，我们后面将会谈到。但他对这份星图的价值所做的评估却毫不过分。

这份星图绘在“气象占”的后面，内容是完整的，但却未留下一个准确的名称。这样，我们在对其性质和功用进行判断时就会产生不少困难。中国学者最早研究这份星图的，是中科院院士、著名天文学史专家席泽宗教授。1966 年席先生发表《敦煌星图》^[17]一文，对这份星图的内容做了考释和解读。后来，马世长学兄又发表《“敦煌星图”的年代》^[18]一文，据卷中讳“民”不讳“旦”，卷末“电神”服饰特征等，认为此图当抄绘于公元 705 年～710 年间，而不同意李约瑟所说的公元 940 年左右。马先生用“敦煌星图”指代此图，且加了引号，说明他只是踵继席泽宗先生的说法，而对此图的准确名称有保留意见。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我在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一书时，将此图称为“全天星图”，并解释说：“此件旧题《敦煌星图》，仅是突出地体现了它发现于敦煌，实际上它包容了古代北半球肉眼所能看到的主要星官，虽与现今《全天星图》相比还不完整，但在古人的认识范围内，已是《全天星图》。因此，我们不再踵用《敦煌星图》的说法，而改称为《全天星图》。”^[19]我将此图称为“全天星图”后，已有一些学者说到或改用这个名字了。如施萍婷先生在其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S. 3326 号下说：“按，中国学者席泽宗、马世长，英国学者李约瑟对此件均有研究专文，定名为‘敦煌星图’。邓文宽定名为‘全天星图’。”^[20]黄正建先生则径称为“全天星图”^[21]。现在的问题是，定名为“敦煌星图”固然不确，改称为“全天星图”就是正确的吗？当年在为此星图改定名称时，自己觉得是可行的，因为其内容确实是“全天星图”。但时间过去了十几年后，渐觉不



安，自己对自己屡屡提问：这样定名妥当吗？因为“全天星图”是一个很现代的名称。那么，这份星图的原始名称是什么呢？这正是我想继续探索的问题。

如前所述，马世长先生已考定此图抄绘于唐前期的公元 705 年~710 年间。而且此件第一部分的编者是唐初著名天文星占家李淳风（602~670），那么，此图就极可能同李淳风有关。因此，我们应当从唐初那些与李氏有关的典籍中寻找此图的原始名称。

众所周知，唐初由官方主持编修的《晋书》和《隋书》二“天文志”，均出自李淳风之手，李氏自己又有《乙巳占》一书传世。此外，李淳风也参与了“《隋书》十志”的编写工作^[22]。当然，唐代在李氏之后更著名的星占著作是《唐开元占经》。它们与 S. 3326 星图都是同时代存在或形成的，其间应有联系。我们即从上述这些文献入手寻找该星图的原名。

下面，我们举例将 S. 3326 星图的说明文字、《乙巳占》、《晋书·天文志》和《唐开元占经》的对应文句作一些比较：

关于“实沉”之次：

S.3326 星图：“自毕十二度至井十五度，于辰在申，为实沉。言七月之时，万物雄盛，阴气沉重，降实万物，故曰实沉。魏之分也。”

《乙巳占》卷三：“毕、觜、参，晋魏之分野。自毕十二度至井十五度，于辰在申，为实沉。言七月之时，万物极盛，阴气沉重，降实万物，故曰实沉。”^[23]

《晋书·天文志》：“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为实沉，于辰在申，魏之分野，属益州。”^[24]

《唐开元占经》卷六十四：“毕、觜、参，魏之分野。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于辰在申，为实沉。言七月之时，万物极茂，阴气沉重，降实万物，故曰实沉。”^[25]

关于“析木”之次：



S.3326星图：“自尾十度至斗十二（一）度，于辰在寅，为析木。尾，东方木宿之末；斗，北方水宿之初。次在其间，隔别水、木，故曰析木。燕之分也。”

《乙巳占》卷三：“尾、箕，燕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于辰在寅，为析木。尾，东方木宿之末；斗，北方水宿之初。次在其间，隔别水木，故曰析木。”^[26]

《晋书·天文志》：“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为析木，于辰在寅，燕之分野，属幽州。”^[27]

《唐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尾、箕，燕之分野。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于辰在寅，为析木。尾，东方木宿（按，脱“之末”二字）；斗，北方之（按，此“之”字衍）水宿宿（按，衍一“宿”字）之初。次在其间，隔别水木，故曰析木。”^[28]

其余十“次”的比较从略，读者可看原文。

从以上两组对比即可看出，《乙巳占》、《唐开元占经》的文字与S. 3326星图的文字几乎完全一致，仅有少数几个字有异，如“井”又作“东井”，“斗”又作“南斗”。另有少数几个字在流传中鲁鱼亥豕，发生讹变。最明显的差别则是，《乙巳占》和《唐开元占经》是将分野置于句首，而S. 3326星图则置于句末。不过，意义却完全相同。至于《晋书·天文志》的文字，则是将同样文句加以简化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李淳风在编《乙巳占》和《晋书·天文志》时，瞿昙悉达在编《唐开元占经》时，都曾使用过与S. 3326星图完全相同的材料；换言之，S. 3326星图是编写《乙巳占》、《晋书·天文志》和《唐开元占经》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之一种，殆无疑义。

前又说过，李淳风还参加过“隋书十志”的编写工作。也就是说，《隋书·经籍志》的“天文类”著作应该出于他之手，至少他看过或审定过。无论如何，这些“天文类”著作都同他有瓜葛。我们不能想象，他在编《晋书·天文志》和《乙巳占》时所



用过的一些重要书籍，如上面的星图，在《隋书·经籍志》“天文类”中不出现。那么，我们就查看一下《隋书·经籍志》“天文类”中有关星图的著录情况。计有：

天文横图一卷（原小注：高文洪撰）；

天文十二次图一卷（原小注：梁有天宫宿野图一卷，亡）；

杂星图五卷；

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

星图二卷（原小注：梁有星书图七卷）；

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图一卷；

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29]。

上面七种星图中，《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源自印度佛经，姑置不论。其余六种，何者是 S.3326 星图的原名呢？

我们看到，S.3326 星图说明文字的内容包含有十二次名及其意义；分野；在二十八宿中的起讫度数。这些说明文字，李淳风在《乙巳占》中是放在“分野第十五”一目下的^[30]；瞿昙悉达在《唐开元占经》中也是放在“分野略例”下的^[31]。也就是说，这两位当时使用过这份星图的天文星占家是将它放在“分野图”的范围来认识的。从实际文字看，各古国分野范围与十二次对应，十二次的各自范围又依二十八宿划分。因此，上述六种有关星图的书名中，最能与此相应的恐怕是“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了，此外，沾边的还有“天文十二次图一卷”，其余均相距甚远。

我最初怀疑此图的名称可能是“天文十二次图一卷”。为此我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刘乐贤博士和法国远东学院华澜博士这两位年轻学者。他们认为，与其认为是“天文十二次图一卷”，还不如认为是“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更合适。经过我们三人讨论，更经过上面的比较与论证，看来他们二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顺便指出，“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在绘画史上也占有重要



位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下载：“古之秘画珍图固多，散逸人间，不得见之。今粗举领袖，则有……二十八宿分野图一……上略举其大纲，凡九十有七，尚未尽载。”^[32]因此，这份星图不仅具有科学价值，也是上乘的绘画作品，其价值不容低估。

我现在将 S.3326 号星图更名为“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是耶？非耶？我相信，即便仍不能视作定论，总比用“敦煌星图”或“全天星图”都更靠近一些。否则，这么珍贵的古星图，我们连一个准确名称都给不出，实在说不过去。

【注释】

[1] 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第 1018 页。

[2] 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第 1544 页。

[3] 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第 2036 页。

[4] 参见王健民《石氏星经》。《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第 319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 年。

[5] 参见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3~32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年。

[6] 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料编纂挂编纂：《大日本古文书》卷三，90 页。转引自冯锦荣《敦煌本〈二十八宿次位经〉、〈三家星经〉（P.2512）与日本平安时期阴阳寮藏〈三家星官簿赞〉》，“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香港，2000 年 7 月 25~26 日。

[7] 村山修一（日）《若杉家旧藏の阴阳书について》，《史林》（京都），69 卷 6 号 127~146 页，1986 年。我已获得“三家星官簿赞”的照片，是由日本友人成家彻郎先生赠送的。谨志于此，没齿不忘。

[8] 钱宝琮《甘石星经源流考》，原载《浙江大学季刊》第一期，1937 年。今又见《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271~286 页，引文见第 278 页，科学出版社，1983 年。

[9] 广池本《大唐六典》第 226 页。

[10] 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 2 册，410~411 页，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2年。

[11]《晋书·天文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07页。又，李淳风在《乙巳占》卷三“分野第十五”开头也说：“今辄列古十二次、国号、星度，以为纪纲焉。其诸家星次、度数不同者，乃别考论，著于历象志云。”也说明他所用的是较古的材料。

[12] 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第1311页。

[13] 陈仲夫点校《唐六典》，第304页，中华书局，1992年。

[14] 同上书第319页，第[一〇一]条校记。

[15] 广池本《大唐六典》第225页。

[16]《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四卷“天学”第一分册，252~253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

[17] 见《文物》1966年3期，27~38页。

[18] 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195~198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19] 同注[5]，第72页。

[20]《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第101页，中华书局，2000年。

[21]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51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

[22] 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之“出版说明”，1973年版。

[23]《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四册，影印本，第492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24] 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第308页。

[25]《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五册，影印本，第547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26] 同注[23]，第490页。

[27] 同注[24]。

[28] 同注[25]，第543页。

[29] 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1019~1021页。

[30] 同注[23]，第489页。

[31] 同注[25]，第541页。

[32]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41页，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年。

跋两篇敦煌佛教 天文学文献

迄今为止，分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已被编为 5 万余号，宗教文献占了 90% 以上，个中又以佛教文献为主。这里我们介绍两篇印度佛教天文学文献，对研究印度天文学史、中印文化交流史和佛教文化，恐不无裨益。

这两篇文献是：藏在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的斯坦因“收集”品 S. 3374、S. 6024、S. 1648 和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 Дх00519 号。

经查对，S. 3374 为《摩登伽经》，传世本见日本《大正藏经》第 21 卷第 399~410 页。写本首尾均残，现存文字系原经中间部位的一部分，约占全经的 28%。S. 6024、S. 1648 和 Дх00519 为《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简称《舍头谏经》），传世本见《大正藏经》第 21 卷第 410~419 页。前两件前后残失，均系断片。但字迹相同，而且 S. 6024 的末端与 S. 1648 的开端之间仅缺 84 字。以写本每行 16~18 字计，两件间约残去 5 行文字。第三件为一小断片，但笔迹与前二件相同。因此，严格说来，此三号是同一写本的三个断片，我们理应将它们当作一篇文献来看待。此篇现存文字约占原经的 30% 左右。

《摩登伽经》和《舍头谏经》是早期传入中国的印度佛经，也是同一经典的不同译本，故一经而二名。《摩登伽经》的译者为支谦和竺律炎。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谦传》记载，支



谦系大月支人，祖父名法度，东汉灵帝时率族人归化。支谦少年聪敏，“十三学胡书，备通六国语”；“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汉献帝时，黄巾起事，中原板荡，支谦与数十乡人南向奔吴，见重于吴主孙权，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甚加宠秩”。支谦语言兼通华戎，有感于不少印度佛经虽传至中土，但尚未汉译，于是发奋译经。“自黄武元年（222）至建兴中（252~253），所出《维摩诘》、《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 27 经，曲得圣意，辞旨文雅”。据研究，《摩登伽经》是支谦和竺律炎在孙吴黄龙二年（230）共译于建康（今南京）的^[1]。

竺律炎，又称竺将炎、竺持炎，印度人，生卒年月与世寿不详。据记载，竺律炎于东吴黄武三年（224）与维祇难来到武昌，应吴人之请，二僧共同译出所携之《法句经》二卷。由于他们不大通晓汉语，故所译经典虽很质朴，但义多未尽。维祇难圆寂后，竺律炎才与支谦合译出《摩登伽经》。

《舍头谏经》的译者竺法护，更是西晋时期的译经名僧。其先祖也是月氏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后师事印度僧人竺高座，从俗改姓为竺。法护“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虽世务毁誉，未尝介于视听也”^[2]。晋武帝之世，京邑各处虽尊崇寺庙图像，而佛经要典仍藏在西域。于是，他随师到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有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晓”^[3]，为他从事译经工作打下丰厚坚实的基础。他还从西域带了很多梵文经典，归国后，“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4]。从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至愍帝建兴元年（313），译出佛典 154 部^[5]，309 卷。《舍头谏经》就是在这期间译出的。

支谦语通华戎，竺律炎虽不长于华语，但他来自天竺，又是学问僧，对梵语十分精解。所以，他们二人合译的《摩登伽经》，



文字晓畅，语义准确，至今读诵仍备觉畅朗。竺法护所译《舍头谏经》，比《摩登伽经》后出约半个世纪。由于译者风格不同，因此法护所译虽称忠实原典，文字质直，但读起来却屈居聱牙。

这部经典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叙说一个婚姻故事来宣讲众生平等、无有高下的佛教思想，以及宣传印度天文星占知识的。故事的梗概如下：

很久很久以前，印度恒河边有一个果园，园中有王名曰“帝胜伽”。帝胜伽本人很有智慧，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其子名曰“师子”，相貌堂堂，学问亦佳。帝胜伽觉得师子已长大成人，该为其婚娶了，于是考虑向何处求婚。那时，印度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婆罗门最尊贵，其次为刹帝利，第三等为吠舍，第四等为首陀罗，即贱民。而贱民中，男性贱民被称作“摩登伽”，女性贱民被称作“摩登祇”。帝胜伽及其家族即属于贱民阶级，故在此经中被称为“摩登伽”。其时，名为“大兴”的国王统辖下的一个聚落，受封者为“莲花实”，属于婆罗门种姓。莲花实有女名曰“本性”，“德貌殊胜，犹师子耳”^[6]。帝胜伽闻其名，遂由车马扈从陪同，往莲花实聚落为其子求婚。莲花实虽以礼相迎，却看不上他们的低下等级。他问帝胜伽：你是很卑下的等级，来此何干？帝胜伽以实相告，说明自己是来为儿子求婚的，希望允准。莲花实听言大怒，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问道：“汝梅陀罗自有种类，何故欲染清胜之人？”^[7]帝胜伽表示，我认为婆罗门与梅陀罗无别，种姓也不是生而就有的。他历数了婆罗门种姓所做的诸多坏事。莲花实听后更怒，向帝胜伽说明婆罗门种姓所以尊贵的原因，并要求他“可宜速还，莫得复语”^[8]！帝胜伽对莲花实的话给予了反驳，并阐明“一切众生，随业善恶而受果报，所谓端正丑陋，贫贱高贵，寿命终夭，愚痴智慧，如此等事，从业而有”^[9]，并非由出身种姓所决定。他又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诸种姓是平等的，自己有权利为儿子求婚，至于财宝，



任莲花实索取。帝胜伽接着又讲了许多许多道理，终于说服了莲花实，使其“生大欢喜”^[10]。莲花实要求知道帝胜伽的既往历史和知识的来源。帝胜伽说明自己的远祖也曾是婆罗门，只是后来才降低种姓的。莲花实又考问帝胜伽：“仁者岂知占星事不？”帝胜伽言：“大婆罗门，过此秘要，吾尚通达，况斯小事，而不知耶？汝当善听，吾今宣说。”^[11]此下内容，主要是印度的天文和星占知识。帝胜伽依次解说的内容是：（1）二十八宿的星名、星数、形状、各宿祭祀用品等；（2）月离位置（月亮运行所在二十八宿间的具体位置）与此时出生人的命运如何；（3）月离位置与所修城邑的吉凶善恶关系；（4）月离位置与下雨之关系；（5）月离位置与日月食所主之吉凶；（6）月离位置与所应举作之事；（7）各月地动所主灾异；（8）各月昼夜长短时节；（9）里数由旬之法，即长短等计量单位；（10）月离位置所主疾病及如何禳祭；（11）月离位置与系囚解脱迟速；（12）人体黑子（黑痣）所主吉凶；（13）月会诸宿及其昼夜时分；（14）历日置闰法，十九年七闰，五年再闰；（15）七曜周期；（16）二十八宿所主社会各种人等。帝胜伽终于以其辩才和丰富的知识说服了莲花实。“莲花实闻是语已，赞摩登伽：‘善哉！仁者所言诚谛。今以吾女用妻卿子。不须财物，可为婚姻。’”^[12]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很显然，此经是用一个美丽的婚姻故事作轴线，通过帝胜伽之口，将印度天文、星占知识全盘托出。在前述所列 16 项内容中，除第 7 项讲地动，第 12 项讲人体黑子所主吉凶，在中国人看来属于相术，其余全为天文与星占内容。尤其需加特别注意的是关于二十八宿的内容。

古代中国与印度均有二十八宿（或为二十七宿）。二十八宿是如何产生的？究竟是各自独立产生的，抑或是谁影响了谁？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竺可桢先生曾认为中国二十八宿起源于公元前二三千年^[13]；近年学者们的研究又有新进展：沈建华女



士从甲骨文中找出了二十八宿的一些星名^[14]，冯时先生揭出了河南濮阳西水坡 45 号仰韶文化时代墓中有用贝壳堆积而成的苍龙、白虎像^[15]。这些均说明，中国的二十八宿应该是独立产生的，而非受到外来影响的结果。但是，在四川大凉山彝族中流行的一种二十八宿体系，究竟来自何方，则是需要考究的。我们知道，从《史记·天官书》起，中国的二十八宿便是从东方苍龙七宿的“角”宿开始的，但凉山彝族除有此种二十八宿外，还有另外一种体系。1977 年秋，笔者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古天文组工作时，曾与陈宗祥、王胜利二先生对四川大小凉山地区的天文历法做过考察^[16]，发现凉山地区存在一种二十八宿系统，是以西方白虎七宿中的“昂”宿开头的，这与《摩登伽经》所载印度古代二十八宿以“昂”宿开头完全相同。二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尚难遽定。这里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现在再回到本文介绍的两篇敦煌所出佛教天文文献上来。《大正藏经》所收《摩登伽经》共分七品、上下二卷，一至五品为上卷，六、七两品为下卷。但 S. 3374《摩登伽经》分卷与此有别：在《观灾祥品第六》的中段，即讲完月离位置与日月食所主吉凶之后、月离与所应举作各事之前，标出“摩登伽经卷中”。既有“卷中”，则应有卷上和卷下。也就是说，写本是一个分上、中、下三卷的三卷本，而非二卷本。《开元释教录》卷二载：“《摩登伽经》三卷，或二卷。”可知，唐时二卷本与三卷本并存。《大正藏经》所收为二卷本，写本则是唐代流行的三卷本。

笔者将写本与《大正藏经》本对勘一过，发现文字小有区别，但多不害意。不过，有些字仍很有益于校勘工作，整理《摩登伽经》时应予参考。这里从略。

竺法护所译的《舍头谏经》不分卷、品，写本与《大正藏经》本相同，亦无卷、品分别。从内容方面来考察，S.6024 开



始的位置，相当于《大正藏经》卷 21 第 414 页中栏中间“我言至诚，当与仁家共结婚姻”一句；止于 415 页上栏倒 10 行“答曰宿止”之“答”字，S.1648 起于 415 页上栏倒 5 行“二曰长育”之“曰”字，止于同卷第 417 页上栏中间“又问何谓？则颂偈曰”一句。Jx00519 残存文字相当于同卷第 419 页中栏左侧的一部分文字。因下部残断，故不能连续成文，读偈颂单句则无问题。写本文字与《大正藏经》本也有少许区别，整理时亦应注意。

最后，由这两篇文献还引发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有连续的《支谦传》和《竺法护传》，记述了他们的译经事业，但并未提及《摩登伽经》和《舍头谏经》，说明此经在魏晋南北朝时并未十分受到重视。其所以如此，则是由于此经的主体内容是宣讲印度天文星占知识的，相对正统佛经而言就处于次要位置了。但用今人的眼光看，它却是极端宝贵的。同时，它也说明，中世纪的科学确实是神学的婢女。此其一。其二，英国研究中国科学与文明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曾经指出：“科学与方术在早期是不分的”^[17]；“在 16 世纪，科学一般被称为‘自然魔术’。开普勒就是作为一个星占家而活动的，甚至牛顿也不无道理地被称作‘最后的一位魔法师’。的确，科学和魔术的分化，是 17 世纪早期现代科学技术诞生以后的事。”^[18]《摩登伽经》（《舍头谏经》）不仅将天文学与占星术合在一起，而且也与佛教内容相混合。我们在对它的科学内容进行研究的同时，还应关注与之并存的其余内容。否则，人为地割裂开来，既无法将科学内容认识清楚，也不符合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

【注释】

[1] 参《佛光大辞典》第 4 册 3489 页上“竺律炎”条，《中国科学技术



典籍通汇·天文卷》第1册，钮卫星撰《摩登伽经附：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提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2]《出三藏记集》卷十三《竺法护传》。

[3]同注[2]。

[4]同注[2]。

[5]竺法护译出的佛典部数说法不一，一谓165部。

[6]《摩登伽经·明往缘品第二》。

[7]同注[6]。

[8]同注[6]。

[9]同注[6]。

[10]《摩登伽经·众相问品第四》。

[11]《摩登伽经·说星图品第五》。

[12]《摩登伽经·明时分别品第七》。

[13]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载《思想与时代》，1944年第34期，1~25页。

[14]沈建华《甲骨文中所见二十八宿星名初探》，载《中国文化》总第10集，77~87页。

[15]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载《文物》1990年3期，52~60页。

[16]考察报告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二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101~148页。并参同书所收笔者与陈宗祥合作的《凉山彝族二十八宿初探》一文。

[17]《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译本第35页，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0年。

[18]同注[17]。

(原载《文物》2000年1期，第83~88页)

敦煌吐鲁番历日略论

汉简历日、敦煌吐鲁番历日和明清历书，被称为中国古代历法史研究的三大资料渊藪。其中敦煌吐鲁番历日，以数量多、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为世所瞩目。这批文献或出自敦煌石室，或出自新疆吐鲁番古墓群，均是研究中古时代历法史、文化史和民俗学的珍贵资料。中外学人为研究这些中华瑰宝已付出很多精力，并取得了可喜成绩。随着研究工作的日趋深入，其价值将被进一步揭示出来。

一

从敦煌莫高窟今编 17 号窟发现的历日，现知有 50 余件；另有三件（编号孟 01542、孟 01543、孟 01544）仍藏俄罗斯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迄未公布。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发现的历日共 5 件。二者总量估计在 60 件左右。

这批文献中最早的一件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1]，最晚的一件是《北宋淳化四年（993）历日》（P.3507），前后跨度达 544 年，历 6 个世纪之久。在汉简历日和敦煌吐鲁番历日面世之前，我国传世历本以《南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2] 为最早，而汉简历日最晚者为东汉桓帝元嘉三年（153）历（见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中古时



代的历日惟赖敦煌吐鲁番历日方能明其究竟。这一时代正史为数虽多，但其《律历志》所载多是各种历法的编撰经过和推步数据，敦煌吐鲁番历日却展示了实用历本的真面目，可补正史之缺。

敦煌吐鲁番历日源自三个方面：（1）中原王朝颁布的历书，现知有北魏太平真君（450、451）历，唐显庆三年（658）（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仪凤四年（679）（载同上书第五册）、开元八年（720）（载同上书第八册）、乾符四年（877）^[3]各历；（2）由唐代剑南西川成都府流入敦煌的私家历日，如“樊赏家历”^[4]；（3）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和敦煌归义军时期（848~1036），敦煌本地编撰的历日，这是敦煌历日的主体部分。除中原王朝颁布的历日，各地自编历日均属“小历”性质。

以“天命攸归”自居的历代皇帝，一向视“颁正朔”为中央王朝的特权，历日行用区域自然也就成了王权所及的重要象征。北魏王朝颁历自不待言，就是唐王朝，它于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设西州，开始对高昌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唐显庆三年历、仪凤四年历、开元八年历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被发现，是其证明。诚然，历日在高昌地区的颁行也非孤立事件。唐在高昌设西州后，随之推行郡县制、均田制、户籍计账手实制以及各种法律行政军事制度，颁行历日仅是其行使权力的一个方面。

尽管历代封建国家操有颁历的垄断权力，每有禁绝天文图讖之举^[5]，但民间总有少数爱好天文历算的人士，甘冒危险自编历日。《新五代史·司天考》载，唐建中（780~783）时，有术士曹士芳制《符天历》，只行民间；后周广顺（951~953）中，“民间又有《万分历》”。及至王朝末日将临，皇权式微，民间制历者为数更多。王谠《唐语林》云：“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



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执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6]唐僖宗初次入蜀在中和元年（881）（《旧唐书·僖宗纪》），现存敦煌所出《唐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正是其时成都地区售卖的私印历日之一种。至于它是如何流入敦煌的，还有待探讨。

敦煌本地自编历日，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乱起，中原板荡，慌乱中调西北边军勤王，西北边防出现空隙，吐蕃便乘虚而入。此后吐蕃由东而西，逐步蚕食并侵占了河西走廊。唐德宗贞元二年（786），敦煌最终陷落于吐蕃手中。吐蕃统治敦煌直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象征王权的中原历日自然无法颁行到那里。吐蕃统治者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既不符合汉人行之已久的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习惯，也无法满足汉人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敦煌地区开始自编历日。六十余年后，虽然张议潮举义成功，使敦煌重归唐有，但当地编历已成习惯，且归义军政权处于半独立状态，故敦煌地区仍在使用自编历日。从现存敦煌历日看，敦煌地区行用自编历日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两个世纪之久。

敦煌本地历日多为私家撰修，现知撰人有翟奉达、翟文进和安彦存，所撰历日主要在五代至宋初阶段。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前期的撰历人则未详。从敦煌文献和石窟题记可知，翟氏是敦煌地区的望族之一。翟奉达自幼即爱好术数历算，成年后又在归义军节度使衙担任州学博士、随军参谋等幕职，担负撰历重任是责有攸归。翟文进名前常冠“子弟”二字，亦知他是翟奉达之后翟氏家族的成员之一。略而言之，五代时期的敦煌历日基本出于翟氏家族所撰；只是到了宋初，撰历重任才转入安氏家族，如安彦存之手。

敦煌私撰历日多题曰“撰上”。所谓“撰”，是说属何人所



撰，即编者是谁；所谓“上”，即上呈给归义军节度使衙。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虽然受命于中原王朝，但唐末五代战乱频仍，中原王朝对远在西北边陲的敦煌鞭长莫及，使这一政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至在唐末五代初年，张氏归义军政权的第三代传人张承奉一度建立了“西汉金山国”。翟奉达等将所编历日上呈给归义军节度使衙，节度使衙将历日颁发民间行用，其地方政权的权力由此也得到了体现，这与中央王朝以历书行用区域作为权力所及的象征相仿佛。

二

敦煌吐鲁番历日研究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敦煌文献面世至 1964 年。最早关注并研究敦煌历日者当推罗振玉氏。20 世纪 20 年代，罗振玉就他所能见到的几件历日录文排印，并写了跋语^[7]。但因未能解决定年方法，故时有错误。其后王重民于 1937 年发表《敦煌本历日之研究》^[8]一文，虽也未能解决定年方法，但确有不少发明。如提出“论敦煌历日与五代北宋历日不同”、“论据五代北宋历不能推敦煌历”、“论敦煌历日与唐不同始于陷蕃以后”等，都是真知灼见。1943 年董作宾发表《敦煌写本唐大顺元年残历考》^[9]，则是对罗振玉将一件残历错定年代的更正。1950 年，苏莹辉在台湾公布了《北魏太平真君历》的录文，同时也做了简单的研究。

第二阶段，自 1964 年 ~ 1983 年。此前学人们的研究工作一直处在摸索阶段，始终未能解决残历的定年方法。因敦煌历日约四分之三是断简残编，无明确纪年，只有解决定年方法，才能确定其准确年代，进而开展更深入的研究。1964 年，日本天文学史专家荻内清教授发表了《斯坦因敦煌文献中的历书》^[10]一文，首次将敦煌历日的定年方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具体方法详下



文)。可以说，这篇论文在敦煌历日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学人们虽也补充了若干方法，但基本方法却是蕞内清教授确立的。1973年，日本敦煌学家藤枝晃教授发表《敦煌历日谱》^[11]长文一篇，就是利用蕞内清的方法对敦煌残历逐件定年。十年后，我国学者施萍婷又发表《敦煌历日研究》^[12]一文，在藤枝氏基础上又有新进展，并纠正了前人的某些错失。此后，席泽宗、邓文宽补充了利用年神方位确定年地支的方法^[13]；严敦杰补充了利用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判定残历年代的方法^[14]；邓文宽提出了利用纪日地支和建除十二客对应关系判定残历星命月份的方法^[15]。迄今为止，敦煌历日的定年方法已趋完备。

以上学者们研究出的定年方法，可概括为如下各项：

(1) 利用正月纪月干支确定年天干。其对应关系是：

正月纪月干支	对应年天干	口诀（见敦煌文献 S.0612 背）
丙寅	甲、己	甲、己之年丙作首
戊寅	乙、庚	乙、庚之岁戊为头
庚寅	丙、辛	丙、辛之年庚次第
壬寅	丁、壬	丁、壬还作顺行流
甲寅	戊、癸	戊、癸既从运位起，正月直须向甲寅求

(2) 利用年九宫或正月九宫确定年地支。其对应关系是：

年九宫（中宫）	正月九宫（中宫）	对应年地支
一、四、七	八	子、卯、午、酉（仲年）
二、五、八	二	巳、亥、寅、申（孟年）
三、六、九	五	丑、未、辰、戌（季年）

(3) 将上述所得两个年天干和四个年地支配成四组干支，即



该残历可能的四个年份。

(4) 利用残历提供的条件，及其他可参考的资料，最大限度地排出残历各月的月朔。

(5) 以前面排出的四个干支年份为对象，利用排出的月朔，同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或其他类似年表对照，找出朔日相近的年份。

(6) 如果原历有“蜜”日（星期日）注记，则对照《朔闰表》一书后面所附的《日曜表》进行最后核定。

(7) 如果原历有年神方位，仅是题年已残，利用《年神方位表》可以直接找出该年的纪年地支，而不再用第(2)项方法。

(8) 在残历断缺严重的情况下，可利用残存节气和物候注记推算年代。但此项方法使用时要慎重，不宜轻易案断。

(9) 即使是只存一行的残历片，只要有该日的纪日地支和建除十二客，利用二者对应关系，便可定出其星命月份，时间跨度只在两个临近的节气（非中气）之间。

上述各种方法全是结论，具体推导过程从略，可参前述有关学者的论著。正是利用这一套方法，中外学人已将敦煌吐鲁番历日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定出了准确年代。其余小残片，只要具备必需的条件，也可考知其所在节气范围。

第三阶段，自1983年至今。学者们除了补充、完善敦煌吐鲁番历日的定年方法外，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这批文献的工作已在进行。笔者在席泽宗教授指导下，1989年即完成《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一书，但因学术著作出版困难，至今未能同学人见面。

中外学人已经和正在究明我国历法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比如唐仪凤三年的闰月问题，《旧唐书·高宗纪》为闰十月，《新唐书·高宗纪》为闰十一月，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两说并存，遂成难解之谜，利用吐鲁番出土《唐仪凤四年历》的节气记载，推



得仪凤三年十月后的一个月是无中气之月，故仪凤三年当闰十月而非十一月^[16]。敦煌文献 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有“唐仪凤三年闰十月”^[17]的记事，与上述推算结果如合符契，此谜于是得以解开。

古代历日内容如何演进发展，以往由于实物太少而无从寻觅其轨迹。跨度达六个世纪的敦煌吐鲁番历日，使我们有了粗略地勾画历日内容演进轨迹的可能。

银雀山二号汉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历谱》，复原后正月的全部内容是：“正月大 戊午 [己未] 庚申反 辛酉 壬戌 [癸] 亥 甲子 [乙丑] 丙寅反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 [未] □ 壬申反 立春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反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反 乙酉 丙戌 丁亥。”^[18]

二百余年后的东汉和帝《永元六年（94）历》，十二月的内容是：“十二月大 一日癸丑建大口（寒） 二日甲寅除八魁……十六日戊辰平□ 十七日己巳平□八魁 十八日庚午定反支□ 十九日辛未执……”（按，十六日为立春）^[19]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日迄未发现。

敦煌所出北魏太平真君历，历日首端有帝王纪年和年神方位注记，其十一年（450）历首为：“太平真君十一年历 [日] [太] 岁在庚寅 大（太）阴大将军在子。”同年二月的全部内容是：“二月小 一日壬辰满 十日惊蛰二月节 廿五日春分 廿七日社。”

迄今为止，虽然我们仍旧受到出土资料的严格限制，但从上述三种历日仍可看出，自西汉中叶至北魏，在长达 585 年的时间里，我国古代历日内容变化不大。三种历日均有月大小、纪日干支和节气。《元光元年历》的丛辰项目仅有“反”，亦即《永元六年历》的“反支”。此外，《元光元年历》有三伏和腊日注记，



《永元六年历》因不全而未见，但比前者增加了“八魁”和“血忌”等丛辰项目以及建除内容。《北魏太平真君历》在年首增加了三个年神，此外有“社”、“腊”、“始耕”（即籍田）等注记。总体上说，这个时期的历注内容十分简单，历日内容演进得也十分缓慢。

进入唐代，情况迥然有别。《唐显庆三年历》虽然残破过甚，但从残存序言部分可知它有“天恩”、“天赦”、“母仓”等丛辰说明，并一次性给出全年各月的大小。各日内容亦增多起来。如正月四日的全部内容是：“四日丁亥土收，岁对小岁后，嫁娶、母仓、移徙、修宅吉。”“收”字为建除内容，已见于东汉《永元六年历》和《北魏太平真君历》。但“土”字所代表的六十甲子纳音却是此前历注中所不曾有的。至于各日铺注的选择事项，更是前所未见。此外，此历还有“上弦”、“下弦”、“[望]”注记，也属新增。同一时代的《仪凤四年历》、《开元八年历》内容大致相同。《唐六典》卷14太卜署记：“凡历注之用六：一曰大会，二曰小会，三曰杂会，四曰岁会，五曰建除，六曰人神。”出土历日与唐代行政法典的规定基本一致。由上可知，唐前期比汉至南北朝历日内容已有增多，具有这一历史时代的特征——它可以看作古历内容由简到繁的过渡时期。

据张培瑜教授等研究，历注内容由简到繁，唐代僧一行（张遂）开元时的《大衍历》是个转折点^[20]。这一论断为敦煌历日所证实。如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它有很长的序文：先介绍了该年的年神方位，计31项，配之以年神方位图；次有男女命宫，魁罡之月；再次有“推七曜直日吉凶法”，即将由西方传入的星期制度七日各配以吉凶宜忌；再次对历日注中丛辰项目如九焦、九坎、血忌、归忌等进行概述；再次为五音（宫、商、角、徵、羽）宜忌；序末最后说明年中各月之大小，然后才转入历日正文。进入正文后，每月又有月序，包括



月大小、月建干支、月九宫、得节日期、天道行向、月神日期方位（共8项）宜忌、四大吉时、日出入方位。每日又包括八项内容：（1）“蜜”日（星期日）注；（2）日期、干支、纳音、建除；（3）弦、望、没、往亡、籍田、社日、释典等注记；（4）节气和物候；（5）吉凶注；（6）昼夜时刻；（7）人神；（8）日游。敦煌历日所以称作“具注历”，也是由于它注入了上述内容。诚然，并非每日都含八项内容，但在 P. 3403 中（2）、（5）、（7）、（8）四项则是每日必备的。其余有则注之，无则不注。这些繁杂的内容，不只敦煌本地的“小历”多具备，以“宣明历术”为依据的敦煌出《唐乾符四年（877）历》内容更为复杂。它分作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历注，下部为各种吉凶宜忌的推算方法和说明。如“六十甲子宫宿法”，依次表列了从唐兴元元年（784）上元甲子开始，至唐乾符四年（877）共 94 年间每年的男女命宫。其余如“洗头日”告知何日洗头为吉，“五姓种蒔日”告知种禾、豆、荞、麦、床、稻的吉日，如此等等。敦煌历日的繁杂内容，奠定了宋以后历日内容的基本格局。

至此，我们可将我国古代历日内容的演进做如下勾画：自西汉至南北朝，为历日的早期阶段，内容极为简略；唐代前期，历日内容开始增多，为由简到繁的过渡时期；唐中叶起，历日内容突飞猛进地增多，且奠定了宋以后历日的基本格局。虽然仍嫌疏阔，但若没有敦煌吐鲁番历日，我们连这样的勾画也做不出。

敦煌历日中还有一些问题尚未研究清楚。事实表明，敦煌历日的朔日与同年中原历往往有一二日之差，遇有闰月之年差别更大；与中原历闰在同月者极少，往往有一个月之差。由于尚未发现敦煌本土历日编撰时的岁实、朔策等依据，至今仍不能给予科学的说明。这些，仍有待学者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三

敦煌吐鲁番历日具有丰富的文化和民俗内涵。中古时代历日的功能比现今民用历日大得多。现行民用历日主要是公历月日、星期和各种节日；在我国又有农历月日、二十四节气、三伏、数九等，但总体上说极为简略。它表明，在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后，历日又有了返朴归真的倾向。但从上节介绍可知，敦煌吐鲁番历日完全是另一番面貌，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民用小百科全书”。

敦煌吐鲁番历日的文化内容，科学和迷信掺杂。其科学内容主要表现在历法本身——它所具有的历学和数学价值。这一方面，可以通过阅读有关天文学史和历法史的著作加以透视^[21]，本文不赘。此处着重说明一下它那些迷信、半迷信的成分。因为即令不科学，也是我们祖宗苦苦思索的产物，曾经广泛而深入地影响过我们祖先的思想和生活，今日人们也还不能完全摆脱它们的影子。

被称作“数字魔方”的九宫，马王堆帛书中已见一件，传说起源于《洛书》。汉徐岳《数述记遗》云：“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甄鸾注：“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画成图形如图一；换成八卦如图二；至唐代，又有用颜色代数字者（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如图三：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图一

巽	离	坤
震	中	兑
艮	坎	乾

图二

绿	紫	黑
碧	黄	赤
白	白	白

图三



在基本图形（图一）的基础上，各种数字递减一（九退后为一，一退后为九），很快就可产生九幅不同的九宫图^[22]。现存敦煌历日的年九宫、月九宫也就是以这些图形配入的。将敦煌历日中的各种九宫图综合研究，可知它共有三种表示方法：一是数字，二是表示颜色的字，三是直接用各种颜色涂成彩图^[23]。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其内涵则完全一致。

敦煌历日的九宫图形是用以推算吉凶祸福的，特别是同“男女命宫”相联系后，成为星命家必须掌握的方法之一。但剔除其中的迷信成分，是否也有科学因素呢？恐怕也可以研究。起源于《周易》的“纳甲”（又称“六十甲子纳音”），由于文献记载不足，宋时沈括还在苦苦考索（见《梦溪笔谈》卷七）；至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纳音说》曾给予精确的文字表述。我们将钱氏的论说绘成表格，与敦煌历日的“六十甲子纳音”相对照，结果无一不合。同时也得以究明，纳音术本是以六十甲子与五音（宫、商、角、徵、羽）相配合，五音又与五行（土、金、木、火、水）相配，于是使用五行代五音，从而绘制出完整的六十甲子纳音表及干支与五行对应关系表^[24]，进而有可能对古历的纳音内容进行正确校读。显然，这对理解《周易》的相关内容也不无裨益。

渗入古历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建除十二客（又称“建除十二辰”）。至晚从东汉《永元六年历》开始，建除已入历日。后经北魏、唐，直至宋代以降，历日一直沿用不衰。建除十二客是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共十二字各主一定吉凶^[25]，配入历日。通过对敦煌历日研究，得知它有三个特征：（1）从立春正月节之后的第一个“寅”日注“建”字，顺序循环下排；（2）凡遇节气（非中气）所在之日，重复其前日的十二客一次，再继续下排；（3）由于十二地支和建除十二客均以十二为周期，又使用了节气之日重复其前日一次的方法，导致



了各星命月（临近的两个节气间为一星命月，不同于历法月）中建除十二客与上一星命月纪日地支相差一日，从而形成了二者间的固定对应关系。又经与天水放马滩战国秦简对照，表明其固定对应关系早在战国时即已形成^[26]，也可知“建除家”在秦汉时代作为术士中的一派，曾经十分活跃^[27]。

除上述论及的三项之外，属于阴阳术数文化的还有年神方位、月神日期方位、星命月份、魁罡之月、六壬十二神、选择事项，以及源自道家的人神流注等，内容庞杂，这里从略。

敦煌历日中的民俗文化同样丰富多彩。注入历日的“籍田”（北魏称“始耕”）是古代三公九卿的重要礼仪制度，其用意在于倡导天下崇本，勤于农作。“社”日祭祀土神，每年两次，反映了农业大国对土地的倚重。“腊”日祭百神，正是汉民族多神教具有的特征。“释典”礼是对儒家鼻祖孔丘及其高足颜回的祭奠，反映了学徒对祖师的崇敬。“洗头日”注入历中，虽然本无吉凶之分，但也表现了讲卫生的良好习惯。“不煞生”注入历中，则说明佛教文化在敦煌的发达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总之，敦煌历日的民俗学内容是很值得重视的。敦煌历日的另一价值是它所透露出的与外来文化交融现象。在《宋太平兴国六年辛巳岁（981）具注历日》（S.6886 背）的六月二十六日下，注有“马平水身亡”，七日后的七月三日注“开七了”，以后每隔七日注“二七”、“三七”直至“七七”。至十月七天下注“百日”。这是时人为马平水举行“亡七斋”和“百日祭”的记录。为活人作“生七斋”和为死者作“亡七斋”，都不是中国的传统民俗，而是来自佛教^[28]。佛教文化艺术传入中国后，为在中国扎根，吸收了中国的儒、道思想，从而具有了中国特色。这种吸收，不仅表现在一些石窟壁画艺术中，同时也渗透到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里，“亡七斋”被注入历日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寄托了中国民众对父母生前的孝养和死后的追念，在文化和心理习惯上找到了结合



点。这一习俗至今仍被广泛地保存在中国民间以及东亚汉文化圈中。

另一现象是历日中的“蜜”日（星期日）注。星期制度来自西方，它被注入敦煌历日仅具占卜吉凶的意义^[29]，还未能同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相结合。所以如此，是由于古代中国是多神教（如“腊”祭），而基督教（唐称“景教”）却是一神教，二者相去甚远。就其实用性而言，当时中国官方实行旬假制，十日一沐浴假^[30]，星期制度却是七日一礼拜，二者也难找到结合点。这一制度只有在辛亥革命我国开始行用公历后，才被广泛地应用起来，而它那套占卜吉凶的内容却被无情地抛弃了。

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先生曾论道：“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枘凿，势不得不然也。”^[31]陈寅恪先生这段论述，其意义不限于佛教，对一切外来文化都适用。由敦煌历日反映出的“亡七斋”和“星期制度”这两种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不同遭遇和命运，也应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注释】

[1] 此历原件下落不明。前人曾公布过两种录文，一见苏莹辉《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原载台湾《大陆杂志》一卷九期；一见刘操南《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残历读记》，载《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1997年后，原件由日本返回中国，今藏甘肃省敦煌研究院。

[2] 日本金泽文库藏宋刊本具注历半页，共9行。影片见《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三号插图。



[3] 原件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66~67页。

[4] 斯坦因编号 P. 10，藏英国图书馆。

[5] 如《全唐文》卷410常袞撰《禁藏天文图讖制》。其中“元象器物”、“天文图书”、“讖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均在禁绝之列。

[6] 《唐语林》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6页。

[7] 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东方学会印，1925年；《松翁近稿》，1922年。罗跋三种后收入王重民编《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160~163页。

[8] 原载《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九期，1937年5月。后收入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116~133页。

[9] 《图书月刊》三卷一期，1943年11月，7~10页。

[10] 《东方学报》（京都版）第35期，543~549页。我国有朴宽哲译文，题为《研讨推定斯坦因收集的敦煌遗书中的历书年代的方法》，载《西北史地》1985年2期，115~118页。

[11] 《东方学报》（京都版）45期，377~441页。

[12] 《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305~366页。

[13] 席泽宗、邓文宽《敦煌残历定年》，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2期，1989年，12~22页。

[14] 严敦杰《跋敦煌唐乾符四年历书》，载《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243~251页。

[15] 邓文宽《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年12期，58~62页；《敦煌古历丛识》，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1期，107~118页；《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载《文物》1990年9期，82~84页。

[16] 见上揭邓文宽《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

[17] 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0页。

[18]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插页《元光元年历谱》（复原表）。



[19] 转引自张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载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

[20] 张培瑜等《古代历注简论》，载《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1期，101~108页。

[21] 可参：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科学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前掲施萍婷文。

[22] 详见前掲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第1659页。

[23] 参见前掲邓文宽《敦煌古历丛识》；《敦煌文献 S. 2620 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载《文物》1988年2期，63~68页。

[24] 见前掲邓文宽《敦煌古历丛识》一文。

[25] 见前掲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1666~1667页。

[26] 见前掲邓文宽《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一文。

[27] 《史记·日者列传》：褚先生曰：“臣为侍郎，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合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从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可证。

[28] 参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11页。

[29] 参前掲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第七至一〇节。

[30] 《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员外郎”条、《唐会要》卷82《休假》条。

[3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50~252页。

（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3期，第40~48页）

敦煌历日的现代流变—— 香港民用历书文化探源

众所周知，祖国大陆现行民用历书，种类虽多，但内容却很简单，原因在于，自 1949 年后，传统历书中的许多文化内容被视为迷信而被彻底摒弃了。1994 年末，我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之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为期三个月的敦煌学专题研究，得以接触并阅读香港现行民用历书，引起极大兴趣。由于此前长期致力于敦煌吐鲁番出土天文历法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对古历文化内容有所了解，所以一经与香港现行民用历书对比，便惊奇地发现，香港民用历书同敦煌历日的文化内容如出一辙；从历法史角度去考察，香港民用历书的文化源头是在唐代。

敦煌藏经洞所出历日，现知有五十余份，其中最早的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原件下落长期不明。新近得知，此件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已流落到日本某位收藏家之手，收藏者今已辞世，是否转手，尚未得知。其余多是唐元和年间（806~820）至北宋淳化年间（990~994）的实用历日，时间跨度近二百年。其中可知，有一份《唐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是由四川成都流入敦煌的私家历日；又有三份是中原王朝颁行的历日，如《唐乾符四年（877）历日》等；其余则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敦煌汉人编制并行用的历日。在历法史上，除官颁历日外，其余均属“小历”性质。对于敦煌所出历



日，我们可从两个角度去考察：一是历学。我们发现，当地行用的这些历日，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月大小、朔日干支，与同年中原官颁历日不太一致，遇有闰月之年，不同的月份则更多；闰月位置也很少相同，一般均有一到两月的差异。对此，至今未能给出科学的合乎实际的解释，仍是未来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二是文化。从文化角度看，敦煌当地历日同中原王朝官颁历日很少不同，而这些文化内容又与香港现行民用历书大同小异，这便是它们的内在联系，也正是本文将要加以考察的。

如果将香港民用历书同敦煌历日全面对比，则需写一本专著，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职是之故，我们仅拈出其中一些主要的、带有共同规律性的文化内容加以对比，并配以图表，给予说明。

一、建除十二客

建除十二客，又称“建除十二直”、“建除十二辰”，是由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二个字组成，每字各主一定吉凶，配入历日每日地支下面。其本始起源，据传同“破军星”有关，是否如此，仍需证实。

就现有出土资料看，建除的排列规则至晚在战国已经形成，可由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战国秦简得到证实^[1]。《史记·日者列传》又有“建除家”，可知他们是当时术数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但建除入历却是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年间的事。山东银雀山二号汉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历谱》^[2]，建除尚未入历，东汉和帝《永元六年（94）历谱》^[3]中，建除则已入历了。此后经各朝各代，直至香港现行民用历书，均有建除内容，其规则历2000余年而未变。

建除十二客在独立存在时期和编入历日后，都遵循以下编排



规则：

(1) 只同纪日地支相配，而同纪日天干无涉；

(2) 约在东汉后根据“星命月”（详下节）安排，而不依历法月份进行；

(3) 不考虑每年“立春正月节”那天所在的历法月份，但见“立春正月节”后的第一个“寅”日即注“建”字，顺序下排；

表一 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对应关系表

纪 日 星 命 月 份	建 除 十二客	建	除	满 (盈)	平	定	执	破 (彼)	危	成	收	开	闭
正月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二月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三月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四月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五月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六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七月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八月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九月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十月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十一月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十二月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4) 凡节气（非中气）之日，所注建除需重复前日一次，再



接续下排；

(5) 每年十二个月，地支和建除都是十二个，因为使用了第(4)项的重复方法，故形成一种固定对应关系。如表一。

无论用此表检查出土简牍和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抑或用之检查现行香港民用历书，均屡试不爽，应当成为文史工作者熟悉的工具之一。附带说明，表中“满”字在天水放马滩秦简中作“盈”，二字同义互训，可能是汉代避讳始改作“满”；“破”字在放马滩秦简中作“彼”，二字古亦通用。

二、星命月份

星命月份是历日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在历日编排上起着重要作用。但“星命月”三个字在历书中却不明确注出，而是暗含于其中。如果不明了这项内容，那么无论是整理古历或有关出土文献，还是阅读现行香港民用历书，都会发生很大混乱，从而也就不可能读懂。顾名思义，“星命月”是星命学家的月份，而不同于历书中的农历月份。它的编排规则是以二十四节气中的节气（非中气）进行的。比如，从“立春正月节”那天开始，至“惊蛰二月节”的前一天为“正月”；从“惊蛰二月节”那天开始，至“清明三月节”的前一天为“二月”；如此等等。至于立春和惊蛰间的中气雨水，惊蛰和清明间的中气春分等等，都不加考虑。由此也就形成了星命学家的“正月”到“十二月”。星命月在历书中起何种作用呢？前节指出，建除十二客的排列规则之一便是以星命月为依据。此外，古历中的月神（天德、月德、合德、月厌、月煞、月破、月刑、月空），大量的日神（即丛辰，详第五节），也都是以星命月为依据编进历书的。比如，敦煌历日中常见的日神项目如九焦、九坎、天李、地李、血忌、归忌、天门、天尸、大败、煞阴、天火、地火、复日、重日、不将日、



地囊日等等，全是依据星命月编排的。如编历时规定，“天李日”正月在“子”日，故星命月正月的子日则需注上天李，如此等等。又举香港现行民用历书为例。郑智恒先生编著的《猪年（1995）运程》有：“农历正月，戊寅月，一九九五年，二月四日至三月五日。”人们知道，一九九五年农历正月初一是在公历一月三十一日，为何此书却将正月一日注在公历二月四日？翻看后面的历日表就会发现，公历二月四日是立春，三月六日是惊蛰，由二月四日至三月五日正是星月命的正月。其余各月同此。这同敦煌历日的编排完全一致，只是敦煌历日无公历日期而已。

就目前所知，星命月至晚在东汉已经产生，因为东汉历日中编排建除时已在使用。实际产生年代是否更早，仍有待新资料的出土。星命月同样是治文史者的重要工具，兹列为表二，以便使用。

表二 各星命月起迄表

星 命 月 份	起 迄 时 间
正 月	立春日至惊蛰前一日
二 月	惊蛰日至清明前一日
三 月	清明日至立夏前一日
四 月	立夏日至芒种前一日
五 月	芒种日至小暑前一日
六 月	小暑日至立秋前一日
七 月	立秋日至白露前一日
八 月	白露日至寒露前一日
九 月	寒露日至立冬前一日
十 月	立冬至大雪前一日
十一月	大雪日至小寒前一日
十二月	小寒日至立春前一日



附带指出，中国古代历法自东汉后有两种月份：农历月份和星命月份。祖国大陆现行民用历书也有两种月份：农历月份和公历月份。而现行香港民用历书则有三种月份：公历月份、农历月份和星命月份。读者不可不察。

三、九宫图形

九宫图形是历书中更为有趣的一项文化内容。仔细把玩，不仅可以读懂历书，而且可以增加许多古文化知识。由于内容太多，本文不可能细述，有些仅论及结论部分。但它又是严整的文化内容，不可随意图画，而应遵循其规则。

从现有材料看，九宫最晚产生于西汉，马王堆帛书中即出土一件九宫基本图形（“五居中央”）。构图规则是：“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画成图形如图一。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图一

巽	离	坤
震	中	兑
艮	坎	乾

图二

绿	紫	黑
碧	黄	赤
白	白	白

图三

九宫基本图形也可以换成八卦表示，即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五中）、乾六、兑七、艮八、离九（图二）。到了唐代，又有人用颜色代替数字，即“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基本图形换成颜色表示即图三。以上三种九宫图形的对应关系自古迄今不变，也是其余八宫图形形成的基础。

九宫共有九幅图，“五居中央”仅是基本图形，其余八宫图



形如图四：

9	5	7
8	1	3
4	6	2

(一宫图形)

1	6	8
9	2	4
5	7	3

(二宫图形)

2	7	9
1	3	5
6	8	4

(三宫图形)

3	8	1
2	4	6
7	9	5

(四宫图形)

4	9	2
3	5	7
8	1	6

(基本图形)

5	1	3
4	6	8
9	2	7

(六宫图形)

6	2	4
5	7	9
1	3	8

(七宫图形)

7	3	5
6	8	1
2	4	9

(八宫图形)

8	4	6
7	9	2
3	5	1

(九宫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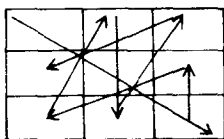
图四

图四所包含的九幅图全是用数字表示的。依据前举基本图形同八卦及颜色的对应关系，我们随时可将其中的任何一幅换成八卦或颜色来表示。

这九幅图表面上使人眼花缭乱，但却有共同的构图规则。其规则如下：(1) 先确定中宫数字，要画几宫图就在中宫位置填上几；(2) 由左上斜到右下，三个数字要相连（以下几步均是数字相连）；(3) 右下到右中；(4) 右中到左下；(5) 左下到上中；(6) 上中到下中；(7) 下中到右上；(8) 右上到左中。其步骤可



表示如图五：



图五

掌握了九宫图形的构图规则和方法，随时都可以把它画出来。九宫图形在历书中又是如何使用的呢？

第一，先说三元甲子年。

敦煌历日和香港民用历书均有三元甲子之说。三元甲子规定，以隋仁寿四年（604）甲子配一宫，次年（605）起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次序配入九宫，反复无穷。因九同六十的最小公倍数是一百八十，合三个甲子，分称为上元、中元、下元年，反复配入，即形成表三：

表三 三元甲子首年表

上元	中元	下元
604	664	724
784	844	904
964	1024	1084
1144	1204	1264
1324	1384	1444
1504	1564	1624
1684	1744	1804
1864	1924	1984



不难看出，从 1984 年甲子年进入下元年中。换言之，依历家所言，我们现处于下元年中。

第二，求取任何一个公元年代的九宫图形。如上所述，九宫配年是从公元 604 年开始的，又从 605 年起不断以从九到一的次序倒转，故可用下列公式求得：

$$(\text{公元年} - 604) \div 9 = x \cdots \cdots \text{余数}。$$

我们要找的是余数。余几，就从九倒数几个数，所得便是该公元年应配入的九宫图形。例如：

$(1980 - 604) \div 9 = 152 \cdots \cdots \text{余 } 8$ ，从九倒数 8 个数得 2，则 1980 年应配入二宫图形。

$(1995 - 604) \div 9 = 154 \cdots \cdots \text{余 } 5$ ，从九倒数 5 个数得 5，则 1995 年应配入五宫图形（基本图形）。用这个公式验算敦煌历日或香港民用历书，以及推算未来任何年代的九宫图形都适用。

第三，月九宫图。

由于每年有十二个月，九宫图有九幅，依次配入各月，九同十二的最小公倍数是三十六，合三年，于是便出现如下规律：连续年代中的正月九宫图是按 8、5、2、8、5、2、8、5、2……次序排进去的。若今年正月九宫图是八宫，明年正月九宫图必是五宫，后年正月二宫，大后天正月又回到八宫，循环往复无穷。但现行香港民用历书有的已不用月九宫了，而在敦煌历日中却保存得很好。

第四，年九宫、正月九宫同本年纪年地支的对应关系。在反复排列中，我们发现，年九宫、正月九宫同纪年地支（而非纪年天干）间有着固定对应关系，如表四：



表四 年九宫、正月九宫同纪年地支对应关系表

年九宫（中宫）	正月九宫（中宫）	对应年地支
一、四、七	八	子、卯、午、酉（仲年）
二、五、八	二	巳、亥、寅、申（孟年）
三、六、九	五	丑、未、辰、戌（季年）

1995 年是乙亥年，“亥”与五宫能对应，恰好今年的年九宫是五黄。如果用月九宫配入，今年正月二宫，二月一宫，三月九宫、四月八宫……

第五，男女命宫推算法。所谓“男女命宫”，也是由九宫衍化出来的。其安排遵循如下规则：

(1) 男宫逆行（由 9 到 1 排列），女宫顺行（由 1 到 9 排列）。

(2) 男宫循环的起点，在女宫一循环的中央，反之也是一样。如公元 604 年男一宫，则该年女宫是五宫，由此开始，男逆女顺，反复排列。

同三元甲子联系起来，便有如下规律，如表五：

表五 三元甲子男女命宫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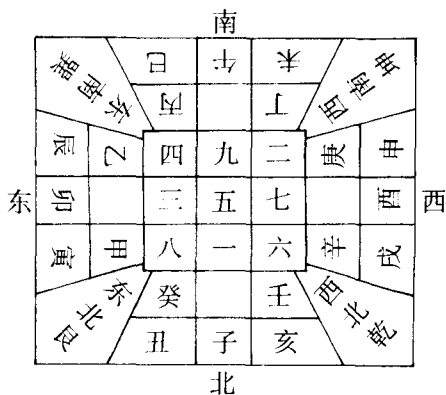
	上元	中元	下元
男宫起点	一	四	七
女宫起点	五	二	八

前已得知，1984 年进入下元年，则该年为男七宫，女八宫。以下依男逆女顺运行，可推得 1995 年男五宫，女一宫。往前往后的男女命宫我们可结合表三去推算。



第六，九宫图配方位图。

无论敦煌历日，还是现行香港民用历书，命宫、神煞都是同方位系统结合使用的，因此必须明了方位系统。古代方位一般是二十四个，选取天干中的八个（甲、乙、丙、丁、庚、辛、壬、癸；不用戊、己，因戊、己居中宫位），地支十二个和八卦中的四个（乾、坤、巽、艮，居四维位），构成一个方位系统。如图六：



图六

这个方位图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同现代地图完全相反。所以如此，盖因古代天子面南而坐，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所致耳。九宫图可以变化，但方位图不变。从传统天文学角度看，则南北向为子午线，东西向为卯酉线。从现有材料看，九宫作为一项文化内容，在西汉时虽已产生，但进入历书大致是在唐代。此后一直保存在历书中，直至香港现行民用历书。总之，九宫图形换成八卦或颜色来表示，全部九幅图的构图规则、画法及步骤，



三元甲子年及其推算，年九宫同纪年地支的对应关系，男女命宫的推算方法等等，香港民用历书同敦煌历日都完全一致。

四、六甲纳音

六甲纳音同样是一项十分古老的文化内容，在敦煌历日和香港民用历书中都使用。纳音起源于《周易》，但因文献记载不足，至宋代，沈括仍在苦加考索^[4]。清儒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卷三《纳音说》中曾给予了精确的文字表述。我曾据钱说绘成表格，与敦煌历日对照，无不相合。现在再同香港民用历书对照，也毫厘不爽。

既称之为“纳音”，则必同五音（宫、商、角、徵、羽）有关。又因五音可同五行相配，故又用五行代替五音。其配合关系是：宫——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敦煌历日和香港民用历书都不直接用五音，而是用五行代替五音。

我在敦煌文献中共找到四件《六甲纳音歌诀》，S. 1815 (2)、S. 3724 (3)、P. 3984V、P. 4711。其共同读法是：“甲子、乙丑金、丙寅、丁卯火……”正是以下《六甲纳音表》（表六）所反映的内容。不过，单有一个《六甲纳音表》，读历仍有不便之处。因为任何一个干支也可同五行配合，如甲子读成“木水”，己巳读成“土火”，癸亥读成“水水”等。这就必须找出干支同五行的配合关系，最终只用五行便可将干支及其纳音读出来。天干、地支同五行的配合关系如下：

甲——木，乙——木，丙——火，丁——火，戊——土，己——土，庚——金，辛——金，壬——水，癸——水；

子——水，丑——土，寅——木，卯——木，辰——土，巳——火，午——火，未——土，申——金，酉——金，戌——土，亥——水。



我们可在《六甲纳音表》上附加天干、地支对应的五行，形成表六：

表六 六甲纳音表（附天干与五行对应关系表）

甲木 子水 (金)	乙木 丑土 (金)	丙火 寅木 (火)	丁火 卯木 (火)	戊土 辰土 (木)	己土 巳火 (木)	庚金 午火 (土)	辛金 未土 (土)	壬水 申金 (金)	癸水 酉金 (金)
甲木 戌土 (火)	乙木 亥水 (火)	丙火 子水 (水)	丁火 丑土 (水)	戊土 寅木 (土)	己土 卯木 (土)	庚金 辰土 (金)	辛金 巳火 (金)	壬水 午火 (木)	癸水 未土 (木)
甲木 申金 (水)	乙木 酉金 (水)	丙火 戌土 (土)	丁火 亥水 (土)	戊土 子水 (火)	己土 丑土 (火)	庚金 寅木 (木)	辛金 卯木 (木)	壬水 辰土 (水)	癸水 巳火 (水)
甲木 午火 (金)	乙木 未土 (金)	丙火 申金 (火)	丁火 酉金 (火)	戊土 戌土 (木)	己土 亥水 (木)	庚金 子水 (土)	辛金 丑土 (土)	壬水 寅木 (金)	癸水 卯木 (金)
甲木 辰土 (火)	乙木 巳火 (火)	丙火 午火 (水)	丁火 未土 (水)	戊土 申金 (土)	己土 酉金 (土)	庚金 戌土 (金)	辛金 亥水 (金)	壬水 子水 (木)	癸水 丑土 (木)
甲木 寅木 (水)	乙木 卯木 (水)	丙火 辰土 (土)	丁火 巳火 (土)	戊土 午火 (火)	己土 未土 (火)	庚金 申金 (木)	辛金 酉金 (木)	壬水 戌土 (水)	癸水 亥水 (水)

上表的读法是：(1) 每格左边是干支，右边是其对应的五行；(2) 每格下面“()”中的字便是该干支的纳音（用五行表示）。如第一格甲子读作“干木支水纳音金”，第二格乙丑读作“干木支土纳音金”，其余类此。用此表检查敦煌历日，如 P. 3403 《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历日题年之后，便有“干火支土纳音土”一句，同表六对照，“丙戌”正好是“干火支土纳音土”，相合不悖。郑智恒先生所编《猪年



(1995)运程》前言中说,1955年“乙亥是木火之年”,同表六对照,知“木火”是“木水”之误。表六的功用由此可见一斑。

六甲纳音形成虽早,但纳入历书却是较晚的事情。出土汉简历日、敦煌出北魏太平真君历日、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630)历日》^[5],均未使用。现知使用此项文化内容入历最早的历日,是吐鲁番出土的《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日》^[6],估计它的入历是在隋至唐初的一段时间内。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直至现行香港民用历日。

五、选 择

所谓选择,就是选择吉凶宜忌,历法史上也称“丛辰”。丛辰包括年、月、日、时各种神煞的安排规则及其所主吉凶各事。这里只讲其安排规则。

就年神方位来说,我们仅从敦煌历日便排出表七。当然,也还有一些项目如“年黑方”,因资料太少尚未找出其排列规则。

表七 年年神方位表

方 位 年 神	年 地 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岁德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太岁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岁破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大将军		酉	酉	子	子	子	卯	卯	卯	午	午	午	酉
奏书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博士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续表

方 年	位 神	年 地 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力士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蚕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蚕官		未	未	戌	戌	戌	丑	丑	丑	辰	辰	辰	未
	蚕命		申	申	亥	亥	亥	寅	寅	寅	巳	巳	巳	申
	丧门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太阴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官符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白虎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黄幡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豹尾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病符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死符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劫杀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灾杀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岁杀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伏兵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岁刑		卯	戌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大杀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飞鹿		申	酉	戌	巳	午	未	寅	卯	辰	亥	子	丑
	害气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续表

方 年	位 神	年 地 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三公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九卿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九卿食舍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畜官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发盗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天皇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地皇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人皇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上丧门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下丧门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生符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王符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五鬼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就月神日期、方位来说，我们也排出表八。

值得提醒的是，表八中的月份也是星命月(详第二节)，而非历法中的农历月份。

日神内容就更丰富了，本文第二节中已提到九焦、九坎、天李、地李等。据统计，敦煌历日中的日神近二百个，香港民用历书也俯拾即是。各种日神也均有其排列规则，有的同天干相联系，有的同地支相联系，有的同建除相联系，有的同天干相联系



限定在某月或某个季节，内容庞杂，不一一具述。但可以肯定，它们绝非是没有编排规则而随意放进历书中的。

表八 月神日期、方位表

日期 月	方位 神	月 份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天德		丁	坤	壬	辛	乾	甲	癸	艮	丙	乙	巽	庚
月德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合德		辛	巳	丁	乙	辛	巳	丁	乙	辛	巳	丁	乙
月厌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月煞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月破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月刑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卯	戌
月空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六、小 结

以上我们对香港民用历书的五种主要文化内容，同敦煌出土历日作了对比和考察。但是，要对香港民用历书的文化渊源做出全面评估，还必须把它放入中国古代历法发展的总背景中进行。

在中国古代历法史上，汉简历日、敦煌吐鲁番历日、明清历书是研究工作的三大资料渊藪。魏晋南朝历日实物出缺。尽管如此，我们仍可对历日发展的总线索和演变轨迹做出描述。大体来说，汉代到唐初历日内容均很简略，唐代前期是历日内容由简到



繁的过渡时期。唐开元年间僧一行(张遂)的《大衍历》是历日内容由简到繁的转折点^[7], 历日内容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并由此奠定了后世历书内容的基本格局, 直至现行香港民用历日。我们既不排除香港民用历书中的一些文化项目起源很古, 如建除可追溯到战国, 入历是在东汉, 九宫可追溯到西汉, 入历是在唐代; 也不排除有些内容晚于唐代, 如二十八宿连续配日是在宋代才出现的。但就其总体内容而言, 它的文化源头应在唐代历书。这样, 我们可获得如下几点认识:

(1) 现行香港民用历书主体文化内容的源头在唐代, 距今已一千三百多年之久;

(2) 现行香港民用历书一些文化内容历史十分悠久,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现行香港民用历书同大陆 1949 年前的历书具有同根性。

附带说明, 文中所附图表, 笔者在整理敦煌历日时反复验证, 屡试不爽, 欢迎港、台治文史者使用并提出修正意见。

(本文据笔者 1995 年 1 月 7 日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公开演讲稿修改而成, 原演讲题目是“从香港民用历书反观敦煌历日”。现谨以此文祝贺潘石禅先生 90 华诞)

【注释】

[1] 参见拙作《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 载《文物》1990 年 9 期, 83~84 页。

[2] 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 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插页《元光元年历谱》(复原表)。

[3] 参见张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 载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续集》,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第 136 页。

[4] 见《梦溪笔谈》卷七。

[5] 参拙作《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考》, 载《文物》1996 年 2 期, 34~40 页。



[6] 参拙作《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年12期，58~62页。

[7] 张培瑜等《古代历注简论》，载《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1期，101~108页。

（原载《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
第249~266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9月）

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 “通书”的文化关联

中国传统民用历书的内容，自古迄于上世纪中叶是连绵不断的，而且在东亚地区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不过，1949 后却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传统历书在祖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仍旧兴盛不衰，但在祖国大陆地区，其术数文化内容因受到严厉批判而被抛弃，从而产生了中断。因此，历日中一些本来极为普通而在民众中十分普及的内容，对于大陆的多数人，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变得十分陌生了。本人也不例外。1994 年末至 1995 年初，我受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之邀，在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指导下做为期三个月的研究工作，开始关注香港流行的“通书”。经与敦煌历日比较，我惊奇地发现，香港民用“通书”与敦煌历日主体文化内容是一致的，遵循着完全相同或基本一致的编排规则，甚至其中个别编错的地方，我也可以依据敦煌历日去加以纠正。此后数年中，我一直着力收集东亚地区现行民用“通书”的实物样本并加以研究。其间曾得到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先生、新加坡古正美博士、台北宗山居士、中山大学林悟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育成先生的协助与支持。因此，本课题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与上述一些朋友的支持分不开的，这里首先要向他们深致谢忱。



一、敦煌历日与“通书”文化内容之比较

我们拿来与敦煌历日进行比较的当代东亚民用“通书”主要有：(1) 日本平成十年（1998）高岛易观象学会本部编纂的《平成十年观象宝运历》；(2) 日本平成十一年（1999）高岛易断所本部编纂的《平成十一年神圣馆开运历》；(3) 1995 年台湾大义出版社出版、刘德义编著的《大义福禄寿历书》；(4) 1995 年台湾华淋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我国民历》；(5) 1995 年台湾正海出版社出版、高铭德编著的《台湾农民历》；(6) 1970 年香港蔡伯励择日堪舆馆编纂的“永经堂”《日历通胜》；(7) 1995 年香港郑智恒易理命相玄学院出版、郑智恒编著的《猪年运程》；(8) 1999 年新加坡增订本《万字通胜》。以上 8 种通书，除《猪年运程》系笔者购自香港市廛，其余 7 种全部得自前述各位朋友的馈赠。也就是说，它们的来源有较多的随意性，并非为了论证之需要而挑拣的。另一方面，我所掌握的这 8 种通书，在整个东亚地区名目繁多的“通书”或“通胜”中恐怕微不足道，算不得丰富，但就我们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来看，恐怕也还是够用的了。

下面我们将对一些主要项目进行比较。

（一）建除十二客

关于建除十二客，我已在多篇文章中有过论列^[1]。现在只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香港、台湾民用“通书”与敦煌历日均以建除十二客注历，而且遵循着共同的排列规则；

第二，在这些历书中，建除注历只与纪日地支相配，而同纪日天干无涉；

第三，根据“星命月”（详下）进行安排，而不依历法月份进行；



第四，不考虑每年“立春正月节”那天所在的历法月份，但见“立春正月节”后的第一个“寅”日即注“建”字，顺序下排：

第五，凡节气（非中气）之日，所注建除需重复前日一次，再接序下排；

第六，每年十二个月，地支和建除都是十二个，因为使用了上一项的重复方法，故形成了各星命月中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间的固定对应关系。

就建除十二客所用的十二个字来说，除日本历书“收”字作“纳”，其余全同。

日本《簠簋》一书在解释完建除十二客各自所主吉凶之后，又强调说：“所谓此十二运者任节，故譬虽至月，节不到，则不可成当月，运宜可准先月者也。”^[2]这句话颇值得注意。其意思是说，上面建除十二客是按节气进行的。虽然进入某月，然而未至节气所在之日，仍不能算当月，节气日之前各日算作前一个月。就是强调说，建除安排是依“星命月”进行的。这与港、台通书，与敦煌具注历日完全一致。

（二）九宫图形

从现有材料看，九宫最晚产生于西汉。马王堆帛书中即出土一件九宫基本图形（“五居中央”）^[3]，构图规则是“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画成图形如图一：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图一

巽	离	坤
震	中	兑
艮	坎	乾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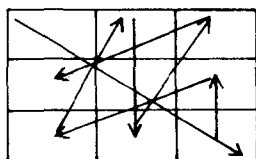
绿	紫	黑
碧	黄	赤
白	白	白

图三



九宫基本图形也可以换成八卦表示，即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五中）、乾六、兑七、艮八、离九（图二）。到了唐代，又有人用颜色代替数字，即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基本图形换成颜色表示即图三。以上三种九宫图形的对应关系自古迄今不变，也是其余八宫图形形成的基础。

关于九宫图形的构图规则。这九幅图表面上花里胡哨，但却按照同一个严格的构图原则画成的。陈遵妣先生曾在《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里有过解说^[4]。我现在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表述如下：九宫图形的画法遵循如下步骤：（1）先确定中宫数字，要画几宫图就在中宫位置填上几；（2）由左上斜到右下，三个数字要相连（以下几步均是数字相连）；（3）右下到右中；（4）右中到左下；（5）左下到上中；（6）上中到下中；（7）下中到右上；（8）右上到左中。其步骤可表示如图四。



图四

求取任何一个公元年代的九宫图形。

九宫配年是从公元 604 年开始的，又从 605 年起不断以从九到一的次序倒转，故可用下列公式求得：

$(\text{公元年} - 604) \div 9 = X \cdots \cdots \text{余数}$ 。我们要找的是余数。余几，就从九倒数几个数，所得便是该公元年应配入的九宫图形。例如： $(1980 - 604) \div 9 = 152 \cdots \cdots \text{余} 8$ ，从九倒数 8 个数得 2，则



1980 年应配入二宫图形。

$(1995 - 604) \div 9 = 154 \cdots \cdots \text{余 } 5$ ，从九倒数 5 个数得 5，则 1995 年应配入五宫图形（基本图形）。用这个公式验算敦煌历日或东亚民用通书，以及推算未来任何年代的九宫图形都适用。

现在我们再根据九宫图形的这些特点对东亚民用通书与敦煌具注历日加以比较，可得如下认识：

1. 这些历书均是以隋仁寿四年甲子岁（604）为起始点，按照九宫排列规则进行的。

2. 敦煌历日一般强调的是年九宫、月九宫。对日九宫强调得很少，但偶尔也有提及，见于 S. 1473《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982）具注历日》序：“今年年起八宫，月起六（八）宫，日起一宫。”

日本“通书”同时重视年九宫、月九宫和日九宫。

台湾“通书”各家着眼点不尽相同。《我国民历》和《台湾农民历》有年九宫和日九宫，而无月九宫，《福祿寿历书》则年、月、日九宫一应俱全。

香港“永经堂”日历通常有年九宫和月九宫，而无日九宫；《猪年运程》则有年九宫和日九宫，但无月九宫。

由上可知，就九宫而言，各地各家虽小有区别，但总体上差别不大，是沿着一个总的套路发展下来的。对此，陈遵妣先生曾指出：“日本把九星配于年及日，不大用以配月，我国不但配月，有时还用以配时。配于年月日的九星术，叫做三轮，始于唐代；配于年月日时的，叫做四柱，始于宋代。”^[5]今日东亚民用“通书”各地各家在编历时体现了各自的视角，但总体上源自唐代，殆无疑义。

3. 关于日九宫的安排规则。由于敦煌历日只有三次提到日九宫，材料过少，我们还难于对其排列规则进行最后确认。但是，既是中国传统历日的一个分支，估计它也不会脱离中国中原



历日构成的基本规则。对于中国古代历日安排日九宫的规则，陈遵炳先生也曾论道：“九星除配年与月外，也有用以配日的。它取靠近冬至的甲子日，以它为阳始遁而是阴始得势的日子，以一白水星定为入中宫的星；翌日入中宫的星为二黑土星，再翌日为三碧木星，随后为四绿木星、五黄土星等等。即以九星图形(5)^[6]配绘靠近冬至的甲子日，随后顺次配以(4)、(3)、(2)、(1)、(9)、(8)^[7]等等；这样则一百八十天，干支与九星恢复原状，甲子日入中宫的星复为一白水星。靠近夏至的甲子日，入中宫的星虽然没有规定，但一定是九紫火星，其翌日乙丑入中宫之星为八白土星，接着是七赤金星、六白金星、五黄土星等等；这样可知九星配合的移动方法和冬至以后不同。”^[8]以此与日本平成十年、十一年历对照，完全吻合。香港《猪年运程》日九宫排列与日本历同。但是，台湾“通书”却是按另一套规则排列的。对此，《福禄寿历书》曾详作解释云：“值日九星：每日均有一星掌事，该星便是日九星。换言之，每日均有一星飞入中宫，该中宫之星即为日九星。值日九星或分为顺行与逆行两种，其推法如下：凡冬至后甲子日起一白星，乙丑日起二黑……雨水后甲子日起七赤星，乙丑日起八白……谷雨后天子日起四绿，乙丑日起五黄……以上均顺布九星。夏至后甲子日起九紫星，乙丑日起八白……处暑后天子日起三碧星，乙丑日起二黑……霜降后天子日起六白星，乙丑日起五黄……以上均逆布九星。”^[9]我们虽然不能确指这套日九星安排规则的来源^[10]，但它是由传统日九星术衍化出来的，当无疑问。传统日九星只以冬至、夏至二中气附近的甲子日为始点进行安排，现在则除冬夏至外，又以雨水、谷雨、处暑、霜降四中气之后的甲子日为始点进行安排了。其总体设计，仍未脱离传统历书的窠臼，只是变得花样更多、更复杂而已。

(三) 星命月

“星命月”这个概念是我使用的，于书未征，仅仅是为了表



述方便而已。陈遵妣先生在解释建除十二直的排列规则时说：“它的循环排列是每逢一个月的开始就重复一次，这里所谓一个月的开始是指星命家的月，即以节气起算。”^[11] 我将陈氏所说“星命家的月”简化为“星命月”而运用之。可以说，陈先生已使用在先，并非我的首创。

但是，星命月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在历日安排上极端重要：几乎所有的神煞与选择项目都是以它为据的。那么，星命月是如何计算的呢？简言之，它是以每年各月“节气”（非中气）为每月之始，至下一节气（非中气）前一日为一月。全年十二个星命月如下表所示（表一）。

表一 各星命月起止日期表

星命月份	起 止 日 期
正 月	立春日至惊蛰前一日
二 月	惊蛰日至清明前一日
三 月	清明日至立夏前一日
四 月	立夏日至芒种前一日
五 月	芒种日至小暑前一日
六 月	小暑日至立秋前一日
七 月	立秋日至白露前一日
八 月	白露日至寒露前一日
九 月	寒露日至立冬前一日
十 月	立冬日至大雪前一日
十一月	大雪日至小寒前一日
十二月	小寒日至立春前一日



由上表可知，星命月是以本月节气所在之日为开始的，而不管该节气日排在历表中农历的哪一天。

关于日本通书用星命月，我们在比较各历建除时已提到过。现在再具体到通书本身。日本平成十年历公历二月栏下注有：“二月四日立春开始，三月五日结束。”查此历日，公历二月四日为旧历一月八日，即立春日，公历三月六日为“启蛰”，即汉历惊蛰，五日为惊蛰前一日。故本年公历二月四日至三月五日为星命月之正月。历日注明“二月四日立春开始，三月五日结束”，也就是说这是星命月正月的日期范围，使用历书时当以此为据。其余十一个月也有类似的说明，意义同此，不赘。

香港《猪年运程》曾分论各月运道。而在“农历二月，己卯”下注明：“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四月四日。”我们查此“通书”后面历表，农历二月初一辛卯日是在公历三月一日，显然，前述所注二月范围不是指农历月。再查历表，公历三月六日为“惊蛰”二月节，四月五日为“清明”三月节，其前一日为四月四日。由此可知，《猪年运程》所说各月运道完全是按照星命月进行的，农历月份反而退居次要位置了。

台湾通书星命月情况亦相仿佛。

星命月份在敦煌所出具注历日中也是十分醒目地加以说明的。比如，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云：“自正月十九日惊蛰，已得二月之节。即：天道西南行……”历日是在提示人们，自农历正月十九日已进入星命月之二月了，看历书时当以二月之神煞与选择视之。所有敦煌历日的星命月份，都是以各月节气所在之日为始，而以下一节气所在日之前一日为终，如我们在前面用表所示。

（四）六甲纳音

六甲纳音也是一项古老的文化内容，现在所见文字材料以云梦睡虎地秦简为最早^[12]。至于其编排规则，清儒钱大昕在《潜



研堂文集》卷三《纳音说》曾给予精确的文字表述。我曾据钱说绘成表格，与敦煌历日对照，无不相合；再与东亚民用通书对照，也毫厘不爽^[13]。

既称之为“纳音”，则必同五音（宫、商、角、徵、羽）有关。又因五音可同五行相配，故又用五行代替五音。其配合关系是：宫——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敦煌历日和东亚通书都不直接用五音，而是用五行代替五音。

不过，单有一个《六甲纳音表》，读历仍有不便之处。因为任何一个干支也可同五行配合，如甲子读成“木水”，己巳读成“土火”，癸亥读成“水水”等。

我们可在《六甲纳音表》上附加天干、地支对应的五行，形成表二：

表二 六甲纳音表（附干支与五行对应关系）

甲木 子水 (金)	乙木 丑土 (金)	丙火 寅木 (火)	丁火 卯木 (火)	戊土 辰土 (木)	己土 巳火 (木)	庚金 午火 (土)	辛金 未土 (土)	壬水 申金 (金)	癸水 酉金 (金)
甲木 戌土 (火)	乙木 亥水 (火)	丙火 子水 (水)	丁火 丑土 (水)	戊土 寅木 (土)	己土 卯木 (土)	庚金 辰土 (金)	辛金 巳火 (金)	壬水 午火 (木)	癸水 未土 (木)
甲木 申金 (水)	乙木 酉金 (水)	丙火 戌土 (土)	丁火 亥水 (土)	戊土 子水 (火)	己土 丑土 (火)	庚金 寅木 (木)	辛金 卯木 (木)	壬水 辰土 (水)	癸水 巳火 (水)
甲木 午火 (金)	乙木 未土 (金)	丙火 申金 (火)	丁火 酉金 (火)	戊土 戌土 (木)	己土 亥水 (木)	庚金 子水 (土)	辛金 丑土 (土)	壬水 寅木 (金)	癸水 卯木 (金)
甲木 辰土 (火)	乙木 巳火 (火)	丙火 午火 (水)	丁火 未土 (水)	戊土 申金 (土)	己土 酉金 (土)	庚金 戌土 (金)	辛金 亥水 (金)	壬水 子水 (木)	癸水 丑土 (木)
甲木 寅木 (水)	乙木 卯木 (水)	丙火 辰土 (土)	丁火 巳火 (土)	戊土 午火 (火)	己土 未土 (火)	庚金 申金 (木)	辛金 酉金 (木)	壬水 戌土 (水)	癸水 亥水 (水)



上表的读法是：(1) 每格左边是干支，右边是其对应的五行；(2) 每格下面“()”中的字便是该干支的纳音(用五行表示)。如第一格甲子读作“干木支水纳音金”，第二格乙丑读作“干木支土纳音金”，其余类此。

下面我们将运用表二对敦煌历日和东亚通书进行检验。

敦煌出土《后唐同光四年丙戌岁(92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14]原题：“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日]一卷(原注：干火支土纳音土)……”查表二，干支丙戌确为干火支土纳音土，二者相合。《后周显德三年丙辰岁(956)具注历日并序》^[15]原题：“显德三年丙辰岁具注历日并序(原注：干火支土纳音土)……”查表二亦相合。

香港“永经堂”《日历通胜》云：“天干属金，地支属土，纳音属金。”此历为1970年即庚戌年历书。查表二，庚戌读作“干金支土纳音金”，二者相合。《猪年运程》原在“前言”中有云：“乙亥年是为木火之年。”查表二，乙亥为“干木支水纳音火”，如排除纳音不论，单说五行，则乙亥是木水年而非木火年，制历者失检。

台湾《福祿寿历书》原注：“干木支水纳音属火。”因此历为乙亥年历，故完全正确，不赘。《台湾农民历》和《我国民历》因是同年历书，所注此项全同，且正确无误。

遗憾的是，我们手中保存的两本日本平成十年、十一年的通书，均未见“六甲纳音”注历的痕迹。是否由于这两本历书的编撰者不太看重纳音在历书中的用处呢？不得而知。同样，我们也不能依据这两本历书就认为当代日本通书全无纳音内容。因为毕竟我所见到的日本通书十分有限，还不能排除别的编历者也有用纳音注历的可能。

由上述讨论可知，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六甲纳音”项目完全相同，即遵循着共同的规则。



(五) 选择

从秦汉时代起，历日中用于选择的神煞名目不断增多，仅敦煌历日即达 200 余项。这里我们主要就敦煌历日中的年神、月神的排列规则与东亚民用通书进行比较，别的暂略。

我们从敦煌历日排出其规律的年神计 39 项，另有几项因资料过少而未排出规律。现将已排出规律的列为表三。在表三之右侧附上比较结果，有同项内容者划√，否则出缺。

表三 年神方位之比较

方 位 年 神	年 地 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日本 历	香港 历	台湾 历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岁德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		
太岁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	√	√
岁破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	√	
大将军		酉	酉	子	子	子	卯	卯	卯	午	午	午	酉	√	√	
奏书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	√
博士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	√
力士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	√	√
蚕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	√
蚕官		未	未	戌	戌	戌	丑	丑	丑	辰	辰	辰	未			
蚕命		申	申	亥	亥	亥	寅	寅	寅	巳	巳	巳	申			
丧门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太阴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		
官符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	



续表

方 年	位 神	年 地 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日本 历	香港 历	台湾 历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日本 历	香港 历	台湾 历
白虎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			
黄幡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			
豹尾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			
病符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			
死符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			
劫杀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	✓		
灾杀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	✓		
岁杀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	✓		
伏兵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岁刑		卯	戌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			
大杀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飞鹿		申	酉	戌	巳	午	未	寅	卯	辰	亥	子	丑				
害气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三公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九卿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九卿食舍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畜官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发盗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天皇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地皇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续表

方 位 年 神	年 地 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日本 历	香港 历	台湾 历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人皇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上丧门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下丧门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生符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王符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五鬼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	

在进行上述统计对比时，我们是将各地区数量不等的通书按地区综合计入的，而不限于某地区的某一历书。结果是，在敦煌历日中曾经使用过的 39 个年神中，两本日本历书尚存有 15 个，占 38.46%；香港历书有 12 个，占 30.76%；台湾历书有 5 个，占 12.82%。由于敦煌历日各年神是在近 200 年中 50 余份历日的总计，而所使用的日本、台湾、香港通书数量均很少，所以这种统计的科学性不宜估计过高。它只是表示，敦煌历日和当代东亚通书中均包含一些共同的年神项目，且均按共同规则来排列（如表三）。

从唐代迄今，历史毕竟过去了一千三百多年。虽说中国传统历书总体上从形制到内容是被继承下来的，且在当代东亚地区影响十分广泛；但是，各地民用通书的部分内容却发生了嬗变，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一些被制历者认为已陈旧的内容减少或被完全淘汰了，又有一些新的神煞被创造了出来取而代之，历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步步演变过来的。

下面我们再对“月神日期方位”加以比较。



月神在敦煌历日中最常见的有八个，如表四所示。我们也在其后侧将比较结果列出。

表四 月神日期方位之比较

日期 月 神	月 份	正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日本 历	香港 历	台湾 历
天 德		丁	坤	壬	辛	乾	甲	癸	艮	丙	乙	巽	庚	✓	✓	✓
月 德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	✓	✓
合 德		辛	巳	丁	乙	辛	巳	丁	乙	辛	巳	丁	乙	✓	✓	✓
月 厌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	
月 煞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	
月 破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	
月 刑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卯	戌		✓	
月 空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

从上表可以看出，月神在日本当代通书中地位已退居到十分次要的位置。当代日本通书最看重的是所谓“六辉”，即先胜、友引、先负、佛灭、大安和赤口，在历表中有专门的“六辉”一栏。台湾历书已很少关注传统历书中的月神；香港历书虽然固有的八个月神名目仍存，但也已与各种日神混合使用，显然退居次要地位了。但在敦煌具注历日中，完本历日中八个月神几乎在每月的月序中都要出现，处在十分显赫的位置。这些，如同年神发生的部分嬗变一样，也是历书内容在历史长河中渐次衍变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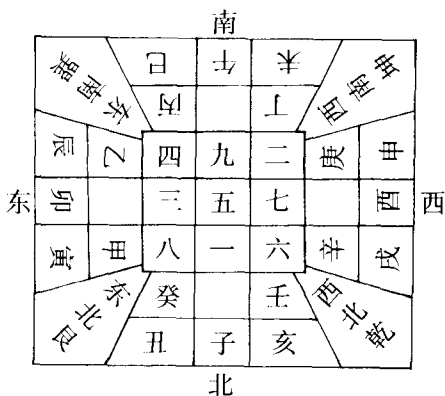
（六）历书编排形式

在讨论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文化关联时，历日的



主要文化内容无疑是其核心部分，但从其编排形式，我们也可窥知其关联的一个侧面。由于敦煌历日多数集中在唐后期至宋初的近二百年中，而且越是往后，其内容越是繁复，所以我们用那些最能代表敦煌历日全面形态的历日，如 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与东亚民用通书加以比较。当然，我们选用的东亚民用通书的形制亦非完全相同，我们只取那些与敦煌历日有可比性的历日项目进行比较。

1. 日出日入方位与时刻。敦煌历日的日出入是以方位表示的。因为在每份具注历的开端，均绘有一个年神方位图，日出日入方位亦通过此图来显示，其方位图如图五，其各月出入位置如表五。



图五



表五 各月日出日入方位

月 份	日出方位	日入方位
正 月	乙	庚
二 月	卯	酉
三 月	甲	辛
四 月	寅	戌
五 月	艮	乾
六 月	寅	戌
七 月	甲	辛
八 月	卯	酉
九 月	乙	庚
十 月	辰	申
十一月	巽	坤
十二月	辰	申

敦煌历日告诉人们的是日出日入的大致方位，有些粗疏。东亚民用通书告诉人们的是日出日入的准确时刻，这或许对民居、出行生活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比如，日本平成十年通书告知，在东京，二月一日、十一日和二十一日，日出日入各在几点几分。其余各月均有告白。《台湾农民历》、《我国民历》和《福禄寿历书》均是在二十四节气当日注明当天的日出日入时刻。两份香港通书却未注明日出时刻或方位。由此可见，当代东亚各地通书不仅关心的内容有异，而且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在历日中标明日出日入的方式和内容也已改变。

2. 年神方位图。方位图如图五所示，共用了十二个地支，戌、己之外的八个天干，另有乾、坤、巽、艮四个八卦方位，共



组成二十四个方位^[16]。在此基础上，因各年年神所在位置有别，便需据本文的表三在方位图上确定其位置，进而判断吉凶。图五中部九格是年九宫。我们惊奇地发现，敦煌历日与当代日本、香港、台湾通书的方位图完全一致。历书中大量术数文化内容要通过方位图去观察、去阅读，因此，共同的文化内涵要求必须有共同的表现形式，这就是方位图如此一致的真实原因。

3. 岁时记事。古代历日中有“岁时记事”一类内容，我们在敦煌历日中仅见到一例：S. 612号《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应天具注历日》序有云：“六日得辛，七龙治水。”由此我们得知此历当年正月六日为辛卯，七日为壬辰，从而推知正月朔日为丙戌。此历不是敦煌当地自编历日，而是一份由中原地区传去的历日，因此较多地体现了当时中原历日的内容。我手中的三份台湾通书也有相似的内容，如《我国民历》云：“七龙治水，大（六）姑把蚕，十日得辛，蚕食七叶，四牛耕地。”可推知正月一日为壬戌。香港“永经堂”《日历通胜》亦有云：“十二龙治水，五日得辛，九牛耕地，三姑把蚕，蚕食四叶。”可推知正月朔日为丁巳。这些岁时内容虽无科学性可言，但我们却可通过比较看出其关联。

4. 历日栏次。完本敦煌具注历日一般分八栏，自上至下依次是：（1）“蜜”日（星期日）注；（2）日期、干支、纳音、建除；（3）弦、望、灭、没、往亡、籍田、社日、释典等注记；（4）节气和物候；（5）吉凶注；（6）昼夜时刻；（7）人神；（8）日游。日本平成十一年历书也分八栏，自上至下依次为：（1）公历日期；（2）曜日（星期几）；（3）该日干支；（4）九星（日九宫）；（5）六辉；（6）行事，内含节气、上下弦、望、朔晦，各种节日、吉凶选择等；（7）旧历月日；（8）建除十二直。香港《猪年运程》共13栏，自上至下依次为：（1）公历月日；（2）星期；（3）日吉神将；（4）是日吉时；（5）是日忌事；（6）（旧历）日



序、干支、纳音、二十八宿值星及建除：(7) 紫白日星（日九宫）；(8) 是日宜事；(9) 冲忌；(10) 财神方；(11) 喜神方；(12) 鹤神方；(13) 胎神。台湾《福祿寿历书》共 10 栏，自上至下为：(1) 节日；(2) 公历日期、星期；(3) 神煞名；(4) 吉中吉时与凶时；(5) 选择忌事；(6) 旧历日序、干支、纳音、二十八宿值星、建除、节气与物候，特殊日期如“土王用事”等；(7) 日九宫；(8) 选择宜事；(9) 冲煞；(10) 胎神。

从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栏次设置可知，千余年来，历日中的一些内容已发生嬗变。比如，敦煌历日所关注的日游和人神已消失了，而宋以后新加入的二十八宿值日却很“火爆”。但是也有一些却是经久不衰的，比如旧历日序、干支、纳音、建除、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甚至“星期”这种由西方舶来的文化，在唐代历日中使用过一阵子后曾被放弃，后来又被“拾”了起来，以致成为当代生活与工作的重要时间依据，在通书中十分显赫。我们不能不承认历史是发展的，所以历日中的不少内容已经变化；我们也必须承认，历日文化是有传统联系的，否则我们就无法从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中找到那么多共同的内容。

那么，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文化关联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唐代《宣明历》——连接敦煌 历日与东亚民用通书的纽带

当我们在寻求敦煌历日与东亚民用通书的文化关联时，我们发现，唐代的《宣明历》是这几种历日文化的交汇点。关于唐代的改历情况，《新唐书·历志一》载：“唐终始二百九十余年，而历八改。初曰《戊寅元历》，曰《麟德甲子元历》，曰《开元大衍



历》，曰《宝应五纪历》，曰《建中正元历》，曰《元和观象历》，曰《长庆宣明历》，曰《景福崇元历》而止矣。”而在这八种历中，麟德、大衍和宣明是三大著名历法。至于《宣明历》在唐代的实行时间，《新唐书·历志六》又云：“起长庆二年（822），用宣明历。自敬宗至于僖宗，皆遵用之。虽朝廷多故，不暇讨论，然《大衍历》后，法制简易，合望密近，无能出其右者。讫景福元年（892）。”可知《宣明历》在唐朝共行用了71年。至于《宣明历》的优点，则在于它改进了《麟德历》、《大衍历》日月五星运动的法数和周期，精度有所提高；计算简化了僧一行的内插公式，使理论易于了解，应用更加简便；更重要的是，在日食计算中首倡时、气、刻三差，使日食计算有了很大进步。

如果说《宣明历》在有唐一代仅行用了71年的话，那么，它在唐朝以外的日本、朝鲜半岛行用的时间就十分长久了；它对敦煌本地历日的编撰也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港澳台地区，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宣明历》的投影。以下我们将分别加以说明。

（一）关于《宣明历》对唐末五代宋初敦煌本土历日的文化影响

敦煌当地自编行用的历书，自9世纪初至10世纪末，有将近200年的时间跨度。这两个世纪中，敦煌情况也曾发生过不少变化。公元786年至848年为吐蕃占领时期，851年张氏归义军政权成立后，虽然名义上臣属于唐朝，但并不完全奉唐正朔，而是延续吐蕃统治时的习俗，继续自编自行历日，直至10世纪末，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吐蕃统治敦煌时，中原与敦煌来往极少，不易得到822年开始行用的《宣明历》，《宣明历》对敦煌当地自编历日的影响主要发生在9世纪中叶至10世纪的后半期。这里，我们介绍两件相关的敦煌文献为证。

S. P. 6号《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是一件



唐王朝官颁历日，而且是《宣明历》的实行历日^[18]。此历正文之外，有收藏者书写的题记二行：“四月十六日都头、守州学博士兼御史中丞翟（此下一草书字未认出）书。报鞠大德永世为父子，莫忘恩也。”

同伴的背面又有如下内容：“翟都头赠送东行鞠大德，且充此文书一本。后若再来之日，更有要者，我不惜与也。得则莫改行相，称为父子之义也。”

从上面两条题记，我们可以看出，都头翟某对高僧鞠某感激涕零，以至二人之间结下“父子之义”。翟都头将某种“文书一本”赠给了鞠大德，而且自己表示，只要他还要，自己将“不惜与也”。而他是将这些话写在这份《宣明历》的实行历书上的。于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份唐王朝官颁历日可能是由鞠氏高僧送给翟氏都头的，翟氏如获至宝，才写了上面那两条题记。

那么，这位翟都头是何许人？他在什么时间得到这份历日的呢？

在讨论敦煌具注历日时，我们自然会想到那位著名的制历专家翟奉达。翟奉达主要活动于10世纪的前半叶。而就现有材料而言，翟奉达有过“州学博士”和“兼御史中丞”的官衔，但尚未看到他有“都头”一职。第一条题记中的“翟□书”，翟下一字是关键字，但尚难准确识读，因此，还不能把得到这份《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的翟都头指认为翟奉达。不过，我们知道，翟氏家族属于敦煌望族之一，这位翟都头和翟奉达，以及翟奉达的侄子翟文进，都是敦煌当地历日的编纂者，否则，他得到唐王朝的实行历日，那么激动，对赠送者那么感激不尽，是无法解释的。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有理由认为，敦煌翟氏编历者，在编历时是参考了唐王朝《宣明历》的实行历日的。我在整理敦煌历日时，将敦煌当地历日中的术数文化、编排方法，与此《宣明



历》实行历书做过比较，结果是几无区别。当然，此乾符历下面那些具体的术数内容则不见于敦煌本土的历书，但就历日部分来说差别不大，也可见它们之间存在着文化关联。

（二）关于日本通书与《宣明历》的文化关联

日本历法的情况，我们要较多地借助于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加以说明^[19]。下面我将直接抄录《中日文化交流大系·科技卷》的几段文字。

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日本从 690 年开始行用中国的元嘉历起，到 1684 年采用日本自己的贞享历为止，其间一直是直接使用中国的历法，共近千年之久。此间，除元嘉历、仪凤历之外，还陆续采用过僧一行的大衍历、郭献之的五纪历、徐昂的宣明历。……宣明历在日本的行用时间最长，它制定于 822 年，861 年开始在日本采用，直至江户中期，行用时间达 823 年之久。9 世纪以后，中国屡经改历，而日本却一直沿用徐昂的宣明历。^[20]

以上是日本行用唐朝《宣明历》的基本情况。下面再看一下日本历书的编制机构与编历过程。

阴阳寮是大和朝廷掌管天文、历、漏刻和阴阳卜筮的一个机构，是模仿唐朝的体制设立的。不过，在《唐六典》中却见不到“阴阳寮”这样的称呼。如果把《唐六典》和日本的《养老律令》（718）加以比较就可看出，“阴阳寮”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太史局”。中国太史局的首长名之为“太史令”；日本阴阳寮的首长则名之为“阴阳头”。不过阴阳寮也并非简单地模仿太史局，而是根据日本的国情，略有变通。例如，中国除太史局之外，还另设有太卜署，专司丞、卜的职务；而日本的阴阳寮则是把太史局和太卜署的功能全纳入一个统一的体制之中^[21]。

日本历书的历注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日本的历注几乎全是模仿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历注书是《董簠》，其全名为《三国相传阴阳辖辖董簠内传金乌玉兔集》，据说是由阴阳家、天文博士安倍晴明编撰。参与贞享改历的阴阳头安倍泰福（安倍晴明的后裔）声称：“《董簠》，真言宗僧作之，安家无之，天文吉备公入唐传来，晴明受之，祭事祓事。安家一子相传也。”不论此说的真伪程度如何，它作为一部秘传书是以唐代的历经（《宣明历经》）为原本，大概不成问题。”[22]

而现存《董簠》一书每卷之末的尾题均作“三国相传宣明历经卷第×终”[23]。

我们知道，日本在行用中国《宣明历》822年后，又吸收了中国元朝《授时历》之优点，产生了涩川春海编撰的日本自己的《贞享历》[24]。而此后的历书编制机构发生过变化，在江户时代设立了“天文方”代替“阴阳寮”。天文方的工作情况[25]如下：

幕府设立天文方之后，结束了阴阳寮垄断天文历学的局面。按过去王朝时代的传统，改历、颁历的工作全是在京都土御门、幸德井家族的世袭控制之下。贞享改历以后，在天文历学中属于观测、计算之类科学性工作的实权，几乎全部转移到关东的天文方。在颁历的时候，先是由江户的天文方计算、编制历的上段属于科学的部分（如月的大小、节气、日月食等），然后再送往京都的阴阳寮添加历的中下段属于迷信性质的历注。

很显然，日本的贞享改历，主要是将历日的科学部分，吸收《授时历》而加以改进，而属于术数文化的历注部分，基本仍旧遵循此前行用的《宣明历》内容。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日本历日文化之根即在于唐之《宣明历》。



（三）关于朝鲜半岛之通书与唐代《宣明历》的文化关联

在研究这个课题时，我一直考虑要顾及到朝鲜半岛的通书情况，但至写作时止，仍未获得朝鲜与韩国的民用通书。因此，这里我们要借助于前贤的研究成果加以说明。研究中朝关系史的专家杨昭全先生指出：“新罗曾派人赴唐学习历法，并采用唐之历法。公元647年，新罗之德福从唐学习李淳风创造之麟德历回国。是年，新罗遂改用麟德历（《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7）。其后，新罗宪德王时（810~826），又改用唐穆宗时（821~824）创造之宣明历，后沿用至高丽朝：‘高丽不别治历，承用唐宣明历，自长庆壬寅下距太祖开国殆逾百年。’（《高丽史》卷50，历志1）。”^[26]

历法史专家张培瑜先生曾论道：

高丽建国即用宣明历，直到中宣王（1309~1313）改用元授时历。而交会术仍循宣明归术，直至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止，行用了也约400年^[27]。

可知，《宣明历》在半岛曾行用400年之久。虽然也像日本一样后来改用了中国的《授时历》，但《宣明历》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

（四）关于香港、澳门、台湾的历书与唐代《宣明历》的文化关联

本文使用了香港和台湾的通书，而未获得澳门华人使用的通书，是个缺憾。但就经验与文化来说，澳门华人使用的通书与香港华人所用不应有太大区别，这是可以预料的。而港、澳、台三地，虽然正式归入中国版图都是宋以后的事，但众所周知，中国历代统治王朝均视颁历为权力所及的重要象征。因此，这三地所用中国历书应该是宋元明清各朝所用官历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各种



《敦煌古历丛识》，《敦煌学辑刊》1989年1期；《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文物》1990年9期；《关于敦煌历日研究的几点意见》，《敦煌研究》1993年1期。

[2] 引自《筮簪》，见中村璋八著《日本阴阳道书的研究》，262~263页，汲古书院，1985年出版，1994年第2次印行。

[3] 见《马王堆汉墓文物》，134~135页，湖南出版社，1992年。

[4] 《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16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5] 同[4]，第1661页。

[6] 据陈先生书前所画九宫图，此“(5)”即指“一白中宫”图。

[7] 顺次指“二黑中宫”、“三碧中宫”、“四绿中宫”、“五黄中宫”、“六白中宫”、“七赤中宫”各图。

[8] 同[4]，第1661页。

[9] 见《福禄寿历书》第123页下栏。

[10] 愿知者有以教之。

[11] 同[4]，第1647页注⑤。

[12] 见《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上)第49页“禹须臾”一节，人民出版社，1993年。并参饶宗颐《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载《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刘乐贤《五行三合局与纳音说》，载《江汉考古》1992年1期，89~91页。

[13] 后知(清)李光地等奉敕编撰的《御定星历考源》卷一“纳音五行”也有同样的表格。我的表格比之增加了各干支对应的五行，读历时更为方便而已。

[14] 编号为P.3247，背加罗1。

[15] 编号为S.0095。

[16] 有些图上有离、坎、兑、震，但与干、支所示方位重合，一般不计。

[17] 参张培瑜等《宣明历定朔计算和历书研究》，《紫金山天文台台刊》第11卷2期，1992年6月，121~155页。

[18] 参见注[17]引张培瑜等《宣明历定朔计算和历书研究》。又，严敦杰《跋敦煌唐乾符四年历书》，载《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243~251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19] 主要参考李廷举、吉田忠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日文化交流大系》全十卷由著名学人周一良教授总主编。

[20] 同上书，27~28页。

[21] 同上书，29~30页。

[22] 同上书，32~33页。

[23] 见（日）中村璋八《日本阴阳道书之研究》，汲古书院，1985年。

[24] 同 [19]，33~34页。

[25] 同 [19]，37~38页。

[26] 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第3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

[27] 同 [17]，第121页。

（本文系作者出席“第36届亚洲北非研究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本次大会2000年8月27日至9月3日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召开。原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编《国学研究》第八卷，335~3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敦煌古历丛识

敦煌文献中存北魏至宋初历日五十余件，自面世以来，中外学人就不断刻意研讨。我国最早研究敦煌历日者当推罗振玉，但他未能解决定年方法，故时有错误。其后王重民先生于 1937 年发表《敦煌本历日之研究》^[1]，虽多有发明，但也未能解决定年方法问题。直至 1964 年，日本天文学史专家薮内清教授发表《斯坦因敦煌文献中的历书》^[2]一文，首次将敦煌历日的定年方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1973 年藤枝晃教授发表《敦煌历日谱》^[3]长文一篇，就是利用薮内清的方法对敦煌历日逐件定年。近年来，我国学者施萍婷先生发表《敦煌历日研究》^[4]一文，在藤枝氏基础上又有新进展，并纠正了前人的某些错失。对于敦煌古历的定年方法和依据，施先生作了比薮内清和藤枝晃更为详细的解说，笔者曾受益良多。1985 年，席泽宗教授与笔者合撰《敦煌残历定年》^[5]一文，补充了利用年神确定年地支的方法^[6]。就定年方法论，虽可能还有新术，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可对敦煌残历的多数定出准确年代，殆无疑义。如今面临的新问题是，应当深入探索敦煌历日的内容，以便进一步认识其价值。近年来，由于笔者担负着《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天文历法专辑》的校辑工作，迫使我必须深入历日内容本身，逐日逐字检核。饮甘茹苦之后，虽然仍有一些内容未获确解，但对其大部分内容已有了认识。在整理过程中，深感有不少问题值得研讨。这些问题如能认识清楚，不仅对校读敦煌历日，且对认识吐



鲁番文书乃至秦汉简牍中的历日都有裨益，并可逐步摸清其渊源流变。现将部分札记汇集成篇，恳望有识及同好者指正。

一、九宫图形

九宫又称九星术、九宫算，是把《洛书》方阵的各数，加上颜色名称，分配在年、月、日、时，再考虑五行生克，用以鉴定人事吉凶的方法。敦煌历日中，一般只有年九宫和月九宫，日九宫偶尔在历日序言中提及，不具注于各日之下，与时相配的九宫则未见到。年九宫放在历日序中，与年神方位图画在一起，月九宫放在每月之首。近年法国学者矛甘（Morgan）发表了《敦煌写本中的九宫》^[7]一文，可知西人于此也有同好者。

九宫起源甚古，马王堆帛书中就有一件，李均明先生曾向笔者见示。其基本图形是“五居中央”。汉徐岳《数述记遗》云：“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甄鸾注：“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绘成图形就是：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若换以八卦，即如下图：

巽	离	坤
震	中	兑
艮	坎	乾



据天文学史专家陈遵妣先生的意见，至唐代，九宫始以颜色来代替^[8]，即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因此，九宫基本图形又可换成颜色如下图：

绿	紫	黑
碧	黄	赤
白	白	白

敦煌历日中九宫图形最常见的表示方法就是用颜色，只是在历日序的文字中才说“今年年起×宫，月起×宫”，这×是用数字表示的，其对应的颜色见上图。因此，只要掌握了每宫的颜色，就可立即将数字换成颜色，反之也是一样。掌握了它同八卦的对应关系，也可立即将颜色和数字换成八卦。

九宫颜色所主吉凶，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序中有《三白诗》一首，文曰：“上利兴功紫白方，碧绿之地患痈疮。黄赤之方遭疾病，黑方动土主凶丧。五姓但能依此用，一年之内乐堂堂。”其意大略如此。

年九宫的起算点是以隋仁寿四年上元甲子（604）为坎一，之后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次序倒转，依次下排。掌握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在历史年表上添上该年的九宫，使用起来极为方便。需要注意的是，这样添出的仅是该年的中宫数字，其余八宫数字及颜色详见陈遵妣先生《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1656页，这里不再画出。

同样，正月九宫的排列也有其严格规律，其规律来源可参前揭施萍婷文。正月九宫的连续性是8、5、2、8、5、2、8、5、2，……也是从隋仁寿四年（604）开始。这样，也可以在一份年表上逐年添上它的正月九宫之中宫数。结合前述所添的年九宫之中



宫，我们随时即可获知该年的年九宫和月九宫。

九星术虽纯属迷信说教，但年九宫、每月九宫同该年地支却有固定对应关系。日本学者数内清教授正是利用这一对应关系找出了确定敦煌残历年地支的方法；施萍婷先生的解说更为详细，不过她是将两表分开的。我现在把二表合并起来，绘成简表如下，以便研究者检核使用：

年九宫、正月九宫与年地支对应关系表

年九宫（中宫）	正月九宫（中宫）	对应年地支
一、四、七	八	子、卯、午、酉（仲年）
二、五、八	二	巳、亥、寅、申（孟年）
三、六、九	五	丑、未、辰、戌（季年）

当然，敦煌历日多数是断简残编，除年九宫画在历日序中且多已残失外，正月九宫也很少能直接见到。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年九宫，还是月九宫，其排列都是从九至一倒转的，因此，知道残历某月九宫，便可反推出正月九宫，然后找出年地支范围。假如某历残存六月以后，六月为六宫，则其前五月为七宫，四月为八宫，三月为九宫，二月为一宫，正月为二宫，正月二宫对应的年地支是巳、亥、寅、申，这便是该历的年地支范围。再依据正月建寅找出年天干，以及月朔、蜜日注等条件，便可定出该历的准确年代来。

敦煌历日中的九宫图，除绝大多数是以表示颜色的字画画出外，还有直接用颜色绘成的，斯坦因编号 P·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历日》^[9]，每月九宫图，内部用表示颜色的字，外圈便配以对应的颜色；S.2620《唐年神方位图》^[10]，现存部分是唐大历十



三年（778）至建中四年（783）共六年的年神方位图，其年九宫也配以相应的颜色，两件均堪称图文并茂，只是在黑白照片上不能完全反映出来，致使研究者往往弄错。由是亦知，年九宫和月九宫图，在敦煌历日中共有三种表示方法，一是数字，二是表示颜色的字，三是直接用各种颜色涂成，其中以第二种居多。

二、干支五行与六十甲子纳音

敦煌历日有明确纪年者，常在历日题名之下注明该年干支五行与甲子纳音。如 P.3403 前题“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干火支土纳音土”；S.1473 前题“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具注历日并序，干水支火纳音木”。又历日每日干支之下也有纳音，如 S.1473 正月一日是“一日癸巳水定”，这个“水”即是该日干支“癸巳”的纳音。

六十甲子纳音，本是以六十甲子配上五音（宫、商、角、徵、羽），五音又可与五行相配，于是便用五行代五音。其配合方法，清儒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纳音说》解释甚详，陈遵妫先生《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 1647 页注③也有简略的说明，兹不赘述。我曾将钱氏《纳音说》的文字改绘成表，与敦煌历日对照，除个别抄错者外，几乎无一不合。至于干支与五行的配合关系，陈著第 1652 ~ 1653 页也有列表说明。为便于使用，现将钱、陈二氏之说合为一表如下：



六十甲子纳音表（附干支与五行对应关系）

甲木 子水 (金)	乙木 丑土 (金)	丙火 寅木 (火)	丁火 卯木 (火)	戊土 辰土 (木)	己土 巳火 (木)	庚金 午火 (土)	辛金 未土 (土)	壬水 申金 (金)	癸水 酉金 (金)
甲木 戌土 (火)	乙木 亥水 (火)	丙火 子水 (水)	丁火 丑土 (水)	戊土 寅木 (土)	己土 卯木 (土)	庚金 辰土 (金)	辛金 巳火 (金)	壬水 午火 (木)	癸水 未土 (木)
甲木 申金 (水)	乙木 酉金 (水)	丙火 戌土 (土)	丁火 亥水 (土)	戊土 子水 (火)	己土 丑土 (火)	庚金 寅木 (木)	辛金 卯木 (木)	壬水 辰土 (水)	癸水 巳火 (水)
甲木 午火 (金)	乙木 未土 (金)	丙火 申金 (火)	丁火 酉金 (火)	戊土 戌土 (木)	己土 亥水 (木)	庚金 子水 (土)	辛金 丑土 (土)	壬水 寅木 (金)	癸水 卯木 (金)
甲木 辰土 (火)	乙木 巳火 (火)	丙火 午火 (水)	丁火 未土 (水)	戊土 申金 (土)	己土 酉金 (土)	庚金 戌土 (金)	辛金 亥水 (金)	壬水 子水 (木)	癸水 丑土 (木)
甲木 寅木 (水)	乙木 卯木 (水)	丙火 辰土 (土)	丁火 巳火 (土)	戊土 午火 (火)	己土 未土 (火)	庚金 申金 (木)	辛金 酉金 (木)	壬水 戌土 (水)	癸水 亥水 (水)

此表每格左边为干支，右边为该干支对应的五行，下面中间括号中的字为该干支的纳音。如第二行第一栏干支为“甲戌”，对应的五行是“干木支土”，纳音为“火”，合在一起就是“干木支土纳音火”。其余同此。以此检查 P.3403《宋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该年干支为“丙戌”，“下注”“干火支土纳音土”，完全对应；太平兴国七年历也相合不悖。

当然，并非所有敦煌历日的干支五行和甲子纳音均正确无误。如 P.2765，与上表对照，该年干支为“甲寅”，则五行和纳音应是“干木支木纳音水”，可是该历第六行却记为“今年干木支火纳音水”，可知“火”字乃“木”字之误。此表还可用为识



读出土历日的工具。《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第 231 ~ 235 页收有一件《唐历》^[11]，第 10 行原编者释为“廿六日甲戌土□”，与表对照，知“土”乃“火”之误释。

利用此表还可将历日的某些残字补齐。P.3555（背）前题“贞明八年岁次壬午具注历日一卷并序，节度押衙干水□□□”，表中“壬午”为“干水支火纳音木”，则“干水”二字下当补“支火纳音木”五字。

六十甲子纳音，敦煌文献中存四件，编号为 S.1815（2）、S.3724（3）、P.3984 背和 P.4711。但编目者不详其意，题作“干支配合歌诀（拟）”或“干支五行配属表”，颇涉望文生义。这四件的内容大同小异，均是“甲子乙丑金，丙寅丁卯火”等等，全是六十甲子与纳音的关系，而不是干支与五行的配合关系，故应题为“六十甲子纳音”。

三、建除十二客

建除十二客是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二字配于历日每日之下，各主一定吉凶。P.2765《甲寅年历日》序云：“除、平、定、成、收、开、闭，次吉日；……建、满、执、破、危……亦须避会（讳），吉。”即其意之一解。

不过，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干支间却无固定配属关系，而是按另外的规律排列的。其主要排列特点是，“立春正月节”后之“寅”日为“建”，由此开始下排，概因古历正月建寅也。然后每逢节气之日（非中气）即须重复前日一次；如上引 P.2765《甲寅年历日》二月廿日为“开”，廿一日为“青（清）明三月节”，则此日仍为“开”，廿二日才作“闭”。由于有此排列规律，故形成了“建”字与各“月”（指星命家的月份，详下节“迷信历注的月份”）纪日地支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星命家的月份	“建”字对应的纪日地支
正月（立春——惊蛰前一日）	寅
二月（惊蛰——清明前一日）	卯
三月（清明——立夏前一日）	辰
四月（立夏——芒种前一日）	巳
五月（芒种——小暑前一日）	午
六月（小暑——立秋前一日）	未
七月（立秋——白露前一日）	申
八月（白露——寒露前一日）	酉
九月（寒露——立冬前一日）	戌
十月（立冬——大雪前一日）	亥
十一月（大雪——小寒前一日）	子
十二月（小寒——立春前一日）	丑

概而言之，建除十二客的排列特点主要有二：一是节气之日重复前一日，二是“建”字与各“月”纪日地支间有固定对应关系，而与纪日天干无涉。掌握了这个规律，再去检查敦煌历日，就会发现，除个别抄错者外，基本正确无误。

以上建除十二客的两大特点对我们认识古历颇有帮助。下举二例以见一斑。《流沙坠简·术数类·永元六年历谱》简面载：“十六日戊辰平□；十七日己巳平□八魁。”十六、十七日建除十二客均作“平”。王国维考证云：“简上十六日戊辰平之平当作满，缮写之讹字也。”^[12]按，该历前云“十二月大，一日癸丑建大□”，一日为建，则十三日仍为建，十四日为除，十五日为“满”，十六日焉能再作“满”？质言之，十六、十七日均当作“平”，原简无误，且十七日是节气之日（当是立春正月节），故重复前一日，而非“缮写之讹字”。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第231~235页《唐仪凤四年具注历日》断片，“廿一日己巳木开”，以下至卅日共九日残建除十二



客。第15行上部存“土危”二字，日期干支缺失。假设这是一件连续书写的历日，我们由第22行某月八日“处暑七月中”即知“立秋七月节”在此前十五日多（唐代仍用平气，每气间隔15.218425日），当在第七行“廿三日辛未土□”之下。廿一日为“开”，廿二日则当为“闭”。廿三日既是节气所在之日，则仍作“闭”。以下廿四日建，廿五日除，廿六日满，廿七日平，廿八日定，廿九日执，卅日破，下月一日当作“危”，残历15行有“土危”二字，正相衔接。由建除十二客即可判断残历的连续性。再考以残存的纪日地支和六十甲子纳音，完全可以证实这段历日是连续书写的。我在《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一文中已作过详细考述，不再赘论。

又由推得廿四日建除十二客为“建”，该日干支为“壬申”，“建”与“申”对应，由前述“建”字与各“月”纪日地支间的对应关系，即可获知这段历日是在立秋七月节和白露八月节之间，进而考知其月份，亦详前揭拙文。

建除十二客也有与年份相配的，见于S.2620《唐年神方位图》，仅存连续六年。由于资料太少，我们还难以确知它与年份配合的方法以及它在这种情况下的排列规律。

总之，建除十二客虽属古代方士的无稽之谈，但只要掌握其排列规律，在校补及判断古历月份时仍不失为一有效手段。

四、迷信历注的“月份”

陈遵妣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1647页注⑤说，建除十二神的“循环排列是每逢一个月的开始重复一次，这里所谓一个月的开始是指星命家的月，即从节气起算”。其实，不仅建除十二客，敦煌历日中大量的迷信历注都是按星命家的“月”来排列的。历日逐日吉凶注最常见的一些迷信项目如九焦、九



坎、天李、地李、血忌、归忌、天门、天尸、煞阴、大败、天火、地火、复日、重日、不将日、地囊等等，其排列起点均是按星命家的“月”计算的。以天李为例，正月在“子”日，这个正月即由“立春正月节”那天开始；二月在“卯”日，二月即由“惊蛰二月节”那天开始。若按通常所说的正、二、三月等去检核，势必大乱，也无法找出其对应关系并判断正误。这是我们整理古历时必须记在心里的一项知识。同时，二十四节气中，十二为节气，十二为中气，星命家的“月”由节气而不由中气起算，也是不容混淆的。十二个节气是：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十二个中气是：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

五、男女九宫

清《钦定协纪辨方书》卷三十五《男女九宫》条引《三元经》曰：“九宫建宅，男命上元甲子起坎一，中元甲子起巽四，下元甲子起兑七，逆行九宫。女命上元甲子起中五，中元甲子起坤二，下元甲子起艮八，顺行九宫。”陈遵妣先生《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1637页注①曰：“男宫逐年减一，一之后为九；女宫逐年加一，九之后为一。男宫循环的起点，在女宫一循环的中央，反之，也是一样。”排列结果，陈先生的推算方法与上引《钦定协纪辨方书》相同。

但是，敦煌古历所记男女九宫的推算方法与以上所说略异。

S.612《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应天具注历日》之《六十相属宫宿法》云：“一岁戊寅土，太平兴国三年，男二宫，女一宫。”

S.1473《宋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982）具注历日》序云：



“今年生男起七宫，女起五宫。”

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序云：“今年生男起三宫，女起九宫。”

以上三历，以太平兴国三年（978）为最早。若以该年“男二宫”为起点，逆行九宫（即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则太平兴国七年适得“男起七宫”，雍熙三年适得“男起三宫”；若以太平兴国三年“女一宫”为起点，顺行九宫（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则太平兴国七年适得“女起五宫”，雍熙三年适得“女起九宫”；因此，这三份历书男女九宫并无矛盾。

星命家所说的上元、中元、下元，概以隋仁寿四年甲子岁（604）为上元，664年为中元，724年为下元，784年又为上元，以此循环，往复不绝。至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又是上元甲子。我们以太平兴国三年“男二宫，女一宫”反推回去，则乾德二年以上元甲子岁为男七宫，女五宫；再往上推，可得唐天复四年下元甲子（904）男四宫，女八宫；唐会昌四年中元甲子（844）为男一宫，女二宫。继续推至隋仁寿四年上元甲子，中间男女九宫与此均同。

以上推算结果，还可同斯坦因编号 P.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中的《六十甲子宫宿法》相印证。在那里，唐兴元元年（784）为上元甲子，男起七宫，女起五宫；会昌四年（844）为中元甲子，男起一宫，女起二宫；再往下排，也能得出唐天复四年（904）下元甲子为男起四宫，女起八宫。同上述推算结果完全相合。

由此可知，男女九宫的推算方法，在现存敦煌历日中，上元甲子为男七宫，女五宫，中元甲子为男一宫，女二宫，下元甲子为男四宫，女八宫。比较《三元经》所记，女宫推算方法相同，男宫则整个提前了一个甲子。上面征引的敦煌历日文献，前后相



距二百余年，既有中原王朝的历日，也有敦煌本地的历日，但男女九宫排列法却十分一致，很有条贯。《三元经》和敦煌历日的男女九宫法何者为是，仍需研究。

六、始耕即籍田

籍田是古代封建帝王的一项重要礼仪，以示率先于农，倡导天下崇本。其礼仪沿革，《通典》卷四十六、《初学记》卷十四均有详载。至其称谓，《初学记》云：“凡称籍田为千亩，亦曰帝籍，亦曰耕籍，亦曰东耕，亦曰亲耕，亦曰王籍。”惟独不记称作“始耕”。

《通典》云：“（汉）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于怀县。其《籍田仪》：正月始耕，常以乙日；……是月令郡国守皆劝人始耕。”可知，远在东汉时，始耕就是籍田的同义词，并著于仪注。敦煌所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历日》云：“正月小。一日丙戌成，二日始耕。”^[13]吐鲁番出土一件《高昌章和五年（535）取牛羊供祀帐》，内载：“章和五年乙卯岁正月日，取严天奴羊一口，供始耕”；旁添小字一行：“辰英羊一口，供始耕，合二口。”^[14]可知北魏和麴氏高昌也将籍田称作始耕。

《魏书》卷二《太祖纪》记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三年……二月丁亥，诏有司祀日于东郊，始耕籍田”。“始耕”与“籍田”并称。《通典》卷四十六记为：“后魏太（道）武帝天兴三年（400）春，始躬耕籍田，祭先农用羊一。”由是又知，“始耕”之本意即皇帝“始躬耕籍田”，而且北魏是用羊祭祀先农。同时看出，北魏始耕用羊祭祀先农历史颇久，且一直影响到麴氏高昌，为前引章和五年取牛羊供祀帐（同账）所证实。



七、北魏避讳改干支

敦煌和吐鲁番所出历日，有些干支改“丙”为“景”，是为避唐先祖“李昞”名讳而改，故断为唐代或后唐是不会有错误的，且为人所熟知。其实，因避讳而改干支北魏时就已有过。北魏道武帝名拓跋珪。“珪”与天干之“癸”同音，故北魏曾改“癸”为“水”，且为西魏所沿用。S.613《西魏大统十三年计账文书》有如下记载：

刘文成户：“息女黄口，水亥生，年仵，小女。”

侯老生户：“户主侯老生，水酉生，年仵拾仵，白丁。”

其天婆罗门户：“息男归安，水丑生，年拾仵，中男。”

邓（？）延天富户：“母白乙升，水亥生，年陆拾伍，死。”

以上四例干支中的“水”，本均作“癸”，皆因避讳“珪”而改之。

前引敦煌所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历日》内云“七月大，一日水未”，“八月大，一日水丑”，显然，这两个“水”也是改“癸”而成的。

陈垣先生《史讳举例》搜罗宏富，成为治史之必备工具。在该书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名下仅举“上邽县改上封”^[15]，而未举出改干支的实例，故补记如上，以备参考。

八、年神方位与月神方位、日期

完整的敦煌历日序言中，往往开列数十种年神名称及其所在



方位，是与本年纪年地支相对应的（部分与天干对应），如 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云“今年太岁在丙、戌，大将军在午，太阴在中，岁刑在未”等等。其各月月序中则详列月神名称及其所在方位、日期，如同历正月云：“自去（旧）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已得正月之节，（小注略）天德在丁，月德在丙，合德在辛，（小注略），月厌在戌，月煞在丑，月破在申，月刑在巳，月空在壬。”共列出八种月神名称及其所在方位、日期。众多的年神名称，其对应年地支及所在方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知道某个年神的方位，便可立即找到该年的纪年地支，成为判断残历年份的重要方法之一。其对应关系，清《钦定协纪辨方书》卷九《立成》列出不少，但敦煌历日中的一部分年神名称却不见于此书记载。陈遵妫先生《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 1644 ~ 1645 页列出一个年神方位表，使用起来很方便。但此表有两个缺陷：一是自 1645 页的“飞鹿”以上的年神方位是与年地支对应的，而以下的岁德、岁德合、岁干合、破败五鬼、金神则与年天干对应，陈书未加区分，全绘在一个表上，似乎都是与年地支对应的，这就容易引起混乱；二是除去那些与年天干对应的年神外，陈表就只有 25 个年神名称了，数量不多。我在整理敦煌历日时反复排比，虽然仍有一些年神如天杀、地杀、三兵、年黑方等尚未找出其排列规律，但见于敦煌历日的绝大部分年神及其对应年地支方位均已找出，故在陈表的基础上扩而大之，列成一表，以便利用（与年天干对应的未列入）。至于月神方位、日期，只有 8 个，固定不变，也列成一表。需要注意的是，这月神的月份仍是阴阳家的月份（详“迷信历注的月份”一节），决不可同历日月份相混淆。



年神方位表

方 年	位 神	年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岁德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太岁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岁破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大将军		酉	酉	子	子	子	卯	卯	卯	午	午	午	酉
奏书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博士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力士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蚕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蚕官		未	未	戌	戌	戌	丑	丑	丑	辰	辰	辰	未
蚕命		申	申	亥	亥	亥	寅	寅	寅	巳	巳	巳	申
丧门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太阴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官符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白虎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黄幡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豹尾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病符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死符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劫杀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灾杀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续表

方 年	位 神	年 地 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岁杀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伏兵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岁刑			卯	戌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大杀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飞鹿			申	酉	戌	巳	午	未	寅	卯	辰	亥	子	丑
害气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三公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九卿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九卿食舍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畜官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发盗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天皇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地皇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人皇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上丧门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下丧门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生符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王符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五鬼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月神方位、日期表

日期 月 神	月 份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天德	丁	坤	壬	辛	乾	甲	癸	艮	丙	乙	巽	庚	
月德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合德	辛	巳	丁	乙	辛	巳	丁	乙	辛	巳	丁	乙	
月厌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月煞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月破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月刑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卯	戌	
月空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注释】

[1] 《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九期，1937年。

[2] 《东方学报》（京都版）第35期，1964年。我国有朴宽哲的译文，题为《研讨推定斯坦因收集的敦煌遗书中的历书年代的方法》，载《西北史地》1985年2期。其实，关于古历的定年方法，我国数学史专家严敦杰先生早在1946年就发表过《飞九宫考》（《东方杂志》第42卷第14号），并不比日人为晚。

[3] 《东方学报》（京都版）第45期，1973年。

[4] 《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2期，1989年，12~22页。

[6] 关于此法，参本文《年神方位与月神方位、日期》一节。

[7] 耿昇《八十年代的法国敦煌学论著简介》，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我未睹原文。

[8] 陈著《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1655 页。

[9] 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66～67 页。

[10] 参拙作《敦煌文献 S.2620 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载《文物》1986 年第 12 期。

[11] 实为《唐仪凤四年（679 年）具注历日》，详拙作《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 年 12 期。

[12] 《流沙坠简》第 90 页，中华书局，1993 年版。

[13] 苏莹辉将录文刊布于所作《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一文，载台湾《大陆杂志》1 卷 9 期。

[14]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2 册，第 39 页，文物出版社，1981 年。

[15]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42 页。

（原载《敦煌学辑刊》1989 年 1 期，第 107～118 页）

敦煌吐鲁番历日的 整理研究与展望

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是研究中国古代历法史的珍贵资料，也是古代先民对科技史研究者的慷慨赐予。拥有并研究这批资料，实在是当代中外学者的莫大幸运。

从敦煌石窟和吐鲁番古墓发现的历日，现知已有 60 多个编号，其中确切年代已被考知者共 42 件。这 42 件中，有 5 件残历出自吐鲁番古墓群，年代均已考知（高昌延寿七年，唐显庆三年、仪凤四年、开元八年和明永乐五年）。另 37 件均出自莫高窟今编第 17 窟，年代最早者为《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其余多是 9 世纪初至 10 世纪末，敦煌当地编撰的历日，在历法史上被视作“小历”。尚未公布的有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藏孟 1542、孟 1543、孟 1544 三号，以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散目”229、230 号（不排除此 2 号与已公布者可能重复）。由此可知，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确实是为数众多，年代跨度亦长，受到中外学人的重视势所必然。

最早刊布敦煌历日者是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不过，真正揭开研究序幕的是王重民先生，他于 1937 年发表了《敦煌本历日之研究》^[1]；1942 年，日本上田穰先生发表《具注历断简》一文；1964 年，日本著名的中国天文学史专家薮内清先生发表《斯坦因敦煌文献中的历书》^[2]，文章虽短，却首次将敦煌历日的定年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1973 年，日本敦煌学专家藤枝



晁先生发表《敦煌历日谱》^[3]，运用数内清的方法对一批残历定年；10 年后的 1983 年，中国学者施萍婷先生将这项成果进一步扩大^[4]。在这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研究文章虽然不多，也偶有失误，但中外学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筚路蓝缕之功，却永远值得后来者景仰。

笔者于 1982 年从北京大学读完硕士学位后，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后归入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由于此前曾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工作过四年，对古天文知识略有所知，于是开始着手全面整理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天文历法文献，其间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史专家席泽宗教授的关怀与指教。迄今为止，共完成两部书：《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5 月出版；《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图文对照本），收在薄树人教授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之第一册，1997 年 5 月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如果说《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偏重于保存原始资料，那么《辑校》一书则有较浓的研究、考证色彩。此书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天文书、星图”，下编即“历书”。这一部分共收入历书 61 号，编为 44 件，其中被考出确切年代者共有 35 件。每件原则上包括 4 项内容：①准确的题名与年代；②原件释录；③题解：研究考证、交待定年的依据等；④校勘记。书末附有 13 种表格，多从古历中提炼而成，可视作整理研究出土历日的工具。这部书曾被施萍婷先生评论为“到目前为止收集得最全、校注最准确、考证最详尽的敦煌天文历法文献集成”。

吐鲁番出土 5 件残历的研究工作，分别见笔者的 4 篇研究论文：《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考》^[5]、《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6]，《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八年具注历日〉释文补正》^[7]和《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具注历日〉考》^[8]。



通过上面的工作，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

(1) 多数残历的年代得以考定。这方面笔者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对前贤已有成果的扩大和延伸。日人藤枝晃曾收集了 26 个号，考证了 25 件历日写本；国人施萍婷收集了 34 号，推算了 28 件历日；笔者共引用 64 号，收录 55 件历日，论证并推算了 37 件历日（因残甚而无法推算者 15 件），加上吐鲁番出土的 5 件，共论证推算了 42 件。

(2) 对敦煌历日的编排规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识。这主要是《辑校》一书所附的 13 种表格。这些表格有些是前辈学者考定的，如“正月月建与年天干对应关系表”；“年九宫、正月九宫与年地支对应关系表”，虽由我作了新的整合，但前期成果仍来自前贤的研究。有些表，如“年神方位表”、“月神方位、日期表”、“六十甲子纳音表和干支五行对照表”、“各星命月中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对应关系表”，则是我在工作中不断摸索、归纳出来的。迄今为止，这些表格已带有工具性质，在工作中屡试不爽。

(3) 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历日》曾做过两次准确的月食预报。这与现代天文学计算结果、文献著录都十分契合。公元 451 年，北魏行用三国曹魏尚书郎杨伟编制的《景初历》，而史书记载，此历历术的最大特色是善于进行日月食的预推，由此项研究得到证实。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历史上有可靠记载的最早的月食预报，因而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

(4) 确认了立国于西陲的古高昌国曾经有自己的历法。已故李征先生生前曾据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国文书的纪年资料，认为该国有自己的历法，我的同事王素先生也进行过推补^[9]，但只有新的出土材料问世，才获得了可靠的证据。

(5) 确定了敦煌历日在中国古代历法史上的地位。当我们将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放在中国古代历法演进的总背景上考察时，



发现敦煌历日处在由简到繁的转化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6) 当我们将现行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日本、新加坡、泰国华人所用通书同敦煌历日加以对照时，发现很多内容的编排规则十分一致，说明它们具有同根性——均出自唐代中期僧一行的《大衍历》以及穆宗长庆二年颁行的徐昂的《宣明历》。它表明，敦煌历日所表现出的中古历日文化，至今在东亚汉文化圈中仍有强劲的生命力。

在整理研究敦煌吐鲁番历日方面，中外学人已经走过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的认识已臻完备。恰恰相反，还有许多工作正等着我们去进行：

(1) 人们发现，敦煌陷蕃（786）以后，直至 10 世纪末，当地编撰的历日与同年中原历日月朔多有不同，闰月也有 1~2 月的差别。这是为什么？

(2) 历日中的阴阳术数文化内容十分丰富。表面上花里胡哨，但每项都有其排列规则。我们对其中的大多数已有认识，但一些项目仍未找出其排列规则。即使是那些已找出排列规则的历日文化项目，多数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比如建除十二客，天水放马滩秦简、睡虎地秦简均有著录，排列规则与后世基本相同，也有对“建”、“除”等十二个字所主吉凶的解释。但若问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就很难回答。历日中术数文化牵涉的知识面很宽，只有对中古乃至上古此类文化的整体获得深层认识，才能对它们在历日中的意义产生真切的理解。

(3) 现存敦煌当地历日时间集中在 9 世纪初至 10 世纪末，不足 200 年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敦煌石窟题记、写本文献题记为数最多，价值也最高。可以肯定，这些题记用的历法是敦煌历而非中原历。但 200 年左右的时间里，只有 40 几份历日留存，且多数都已残破。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可否利用已知的敦煌历日和纪年纪日材料，将这 200 年的敦煌历谱复原出来呢？如果



将这 200 年的历谱复原出来，那么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时间坐标，所有题记资料各就其位；进而，那些无纪年题记，而有相关信息的写本、石窟资料、绘画资料等，就可以进入相对乃至绝对的时间坐标位置。若此，将大大推进石窟与文献的定年工作。

这项工作早已为“敦煌学”界翘首以待，只是由于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为数太少，才迟迟未能进行。在学术界同仁的鼓励下，笔者于 1994 年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申报了《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研究》项目，已获批准。目前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这项工作十分艰苦。除了运用必要的历法知识排出历谱，更重要的是要运用已经存在的纪年资料对排出的历谱进行检验。我们不排除已有的纪年材料有一些错误。但应当确信，多数材料是依据当时的历日书写的，从而是可信的。这样，就必须将这些十分零碎、分散的纪年材料收集整理在一起，然后进行分析。前人虽也做过一些收集工作，但仍旧不够。这一方面，不能有太大的疏漏，否则，所排出的历谱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从而影响其科学性和学术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笔者在读书时特别关心以下三类纪年资料：①有闰月的材料；②有纪日干支的材料；③有第三十日从而可以考知月大小的材料。显然，这三类资料都同排定历谱密切相关。

附带提及，由历日中的术数文化使我想到了，敦煌文献中有 200 多个卷号是有关阴阳术数文化的，但尚未得到深入研究。这方面，较有成就的是法国汉学家、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宗教科学系的马克·卡林诺斯基教授。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却几乎无人问津！

我们知道，中古时代，科学同术数文化是无法分割的；术数文化中虽有不少迷信，但上自皇帝，下及平民，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并运用它，因此，术数又是当时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而可知，无论从真切地认识自然科学史，还是了解当时的人文风貌，不了解、不研究术数文化都是说不通的。

除了上面罗列的几项之外，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还有哪些可以深入开展的课题，欢迎学术界同仁给予指教。不过，我总是相信，通过大家长期不懈地艰苦工作，这笔宝贵财富的价值将被进一步揭示出来。

【注释】

[1] 原载《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九期，1937年7月。后收入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116~133页。

[2] 《东方学报》（京都版）第35册，543~549页，1964年。

[3] 《东方学报》（京都版）第45册，377~441页，1973年。

[4] 《敦煌历日研究》，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305~366页。

[5] 《文物》1996年2期，34~40页。

[6] 《文物》1986年12期，58~62页。

[7] 《文物》1992年6期，92~93页。

[8] 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263~2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9] 《龔氏高昌历法初探》，载《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148~180页。

（原载《古天文与中华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会
议论文集》——《紫金山天文台台刊·特刊》，
第33~36页，1998年7月）

传统历书以二十八宿 注历的连续性

二十八宿连续注历，是自南宋开始传统历书新增的一项辅助内容。其法是按一定规则，将二十八宿各宿分别注于每日之下，循环往复地进行。自南宋以来，这项历日内容是否长期连绵不断呢？从道理上说应该如此。但以往由于资料缺乏而难以证明。近年来，由于有几件宋以后的出土历书相继刊布，再结合传世历书和现行民用“通书”，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证便成为可能。本文旨在以实证方式证明，自南宋淳熙九年（1182）至 20 世纪末的 1998 年，中国传统历书以二十八宿注历是长期连续进行的，也未发生过错误。

为什么要以南宋淳熙九年作为检验的起点呢？这是由于，《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1]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用二十八宿连续注历的最早历书实物。此件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是一件印本历日残片。原件藏俄罗斯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俄 TK297”。年代由我考证而得^[2]。从历日残存的二十八宿辅助内容，可以推知正月七日所注为“角”，而“角”宿是中国传统二十八宿的第一宿。由此确知，宋淳熙九年正月七日是历注中某一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的开始。

在此件历日之后，我们能看到的是传世本《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此历三月最末一天为“三十日辛酉木



执轸”^[3]。“轸”宿是二十八宿的最末一宿。这就是说，此日是历注中某一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的结束。自宋淳熙九年正月七日至宝祐四年三月三十日，共有 27104 天^[4]。 $27104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968 \text{ (周)}$ 。可知，这期间共将 968 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传世《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四月一日注“角”，又是一个二十八宿周期的开始。此下则是一件出自黑城的元朝历书^[5]，它也是一件印本历日的小残片，原件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经张培瑜教授考证，确定为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的历日^[6]。此历七月五日为“七月五日辛酉木满轸”，可知是某一个二十八宿周期之末。自宋宝祐四年四月一日至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五日，共有 39900 天。 $39900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1425 \text{ (周)}$ 。由此得知，这期间共将 1425 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在元朝历书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件从吐鲁番出土的明永乐五年的历书。此件现藏德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 Ch. 3506，照片由荣新江教授从德国购回，年代则由我考证得出^[7]。此件也是一份印本历日的残片，其六月二十三日为“二十三日乙巳火开轸”，是某一个二十八宿周期之末。而前引元至正二十五年历书的七月六日注“角”，则为某个二十八宿周期之始。我们又可以据此对这两个年代之间的二十八宿周期进行计算。自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六日至明永乐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共有 15344 天。 $15344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548 \text{ (周)}$ 。可知，这期间共将 548 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大约从明朝中叶起，明清两朝近 400 年的历书被保存了下来。但是如果一天天地去对照原历，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我们依然采取上面所用的方法进行抽样检查，并企求得出一个可信的结论。



清乾隆六十年（1795）“时宪书”的一部分内容，曾被已故天文学史专家陈遵妫先生用作书影照片加以刊布^[8]。此历正月二十二日注“轸”，是某个二十八宿周期之末。而前引明永乐五年具注历日六月二十四日为“角”，是某个二十八宿周期之始。自明永乐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至清乾隆六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共有141540天。 $141540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5055 \text{ (周)}$ 。可知，在这390多年时间里，共将5055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中国传统民用“通书”中的术数内容，1949年后在大陆地区被废弃。因此，二十八宿注历这项历日文化在祖国大陆未能沿用下来。但在中国的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在日本、新加坡、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民用“通书”中依然包含着二十八宿注历的内容。我们对其连续性检验如下：

1970年香港出版的“永经堂”民用“通书”，其农历正月十三日为“十三己巳木轸平”，可知为某个二十八宿周期之末。而前引清乾隆六十年“时宪书”正月二十三日注“角”。自清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二十三日至1970年农历正月十三日，共有63924天。 $63924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2283 \text{ (周)}$ 。其间曾将2283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1995年，台湾正海出版社出版的高铭德先生编《台湾农民历》，其正月十六日注“轸”，又是某个二十八宿周期之末。而前引香港“永经堂”1970年民用通书正月十四日注“角”。自1970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到1995年正月十六日，共有9128天。 $9128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326 \text{ (周)}$ 。其间共将326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日本“高岛易观象学会本部”编纂的《平成十年（1998）观象宝运历》，其旧历一月十五日注“轸”，为二十八宿某周期之末。而前引1995年《台湾农民历》之正月十七日注“角”。自1995年正月十七日至1998年正月十五日，共有1092天。



$\div 28 \text{ 天} = 39 \text{ (周)}$ 。可知，其间又将 39 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将以上分段计算的结果综合起来便是：自南宋淳熙九年正月七日，至公元 1998 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共有 298032 天，其间共将 10644 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298032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10644 \text{ (周)}$]。

以上我们对南宋淳熙九年（1182）至公元 1998 年这 816 年间传统历书使用二十八宿注历的情况进行了检验。所使用的历书实物既有传世的，也有出土的；既有中国历史上曾经行用过的，也有当今港、澳、台地区和日本国仍在行用的。结论表明，自南宋以来，传统历书使用二十八宿注历一直连绵未断，而且正确无误。毋庸置疑，它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历日文化内容。

但是，中国古人给传统天文学中的二十八宿配以吉凶宜忌的内容，却不是从南宋才开始的。就目前已知的材料看，至晚到战国末年就已存在。1975 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已有此项内容的记载了^[9]。千余年后，宋人为了“演禽术”的需要，才将其引入历书，此后便一直延续不衰。至于用二十八宿注历始于南宋何年，目前仍难确知，有待出土资料的增加，才有可能最终加以解决。

【注释】

[1] 图版见《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第 4 册，第 385 页下栏至 386 页上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2] 参拙作《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刊于《华学》第 4 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年。

[3] 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 1 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695 页。

[4] 本文所用日期数据，全部根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统计而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



[5] 图版见《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所附“图三七历书(F19:W18)”,载《文物》1987年7期。

[6] 张培瑜《黑城新出天文历法文书残页的几点附记》,《文物》1988年4期,91~92页。

[7] 参拙作《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1407)具注历日〉考》,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63~268页。

[8] 陈著《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617~1620页。

[9] 见《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24~25页、60~62页。

(原载《历史研究》2000年6期,173~175页)

从“历日”到“具注 历日”的转变

20世纪以来，从地下出土的古历实物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要求人们给予解答。统观已有的出土资料，人们不难发现，从秦朝至北朝的古历原名“历日”，而唐朝及其以后的古历，原名多为“具注历日”（清朝称为“时宪书”），这是为什么呢？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般又将汉简历日称作“历谱”，而将唐代及其以后的历日称作“历书”。“历谱”与“历书”的区别界限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古人都未给我们留下现成的答案，有待今人的研究与探讨。

江晓原博士曾就历谱与历书的区别做了专门探讨。他指出：“楚帛书及秦简《日书》为现今所见最早之历忌专书。但择吉择日之类的思想，很可能早在远古时则已发端……”^[1]而至汉代，王充在《论衡·讥日篇》篇中指出的“历忌”之书大约有如下六类：葬历——专讲葬事择日；祭祀之历——专讲祭祀活动之择日；沐书——有关沐浴、洗头的各种时日吉凶宜忌；裁衣之书——讲裁衣之时日吉凶；工伎之书——讲造房、装车、治船、掘井等事之择日；堪舆书——较普通的择吉之书，说明“择吉”（或曰选择）在汉代已十分发达。我们也还注意到，秦汉时代的《日书》虽然是配合历谱使用的，但多数情况下单独存在。在《元延三年五月历谱》中，已将八项历忌项目抄在历谱的顶端，



观看历谱而使用之^[2]。但也诚如江晓原先生所指出，“不可简单地认为历书即历忌之学与历谱结合而成——因为早在汉简历谱中就已屡见历注”了。他在将汉《永元六年历谱》、敦煌《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日》和《宋宝祐四年会天万年具注历日》的内容做过比较后说：“最重要、最关键之点则在于：永元六年残谱虽是汉简历谱中历注最繁者，已有建除十二直、反支、天李等历忌项目，却并无任何吉凶宜忌之结论。也就是说，历谱中虽注有历忌项目，但仅可免去人们推算之劳，而欲知该项目出现之日行事究竟有何宜忌，仍须从历忌之书中去查检其结论——秦简《日书》即此种工具书之典型样本。举例来说，使用汉简历谱，虽能知某日为建、某日反支等等，但还不能得知建日是否宜于入人、反支日是否利于出行之类。而另一方面，以上引第二、第三例为代表之唐宋历书，则已将历忌项目（当然较汉代增加了许多）与有关该项目之吉凶宜忌一起结合进来。在唐宋历书中，人们可以直接得到对日常行事吉凶宜忌之若干具体指导。”江博士最终给历谱和历书下了定义：“历书：历注中有吉凶宜忌之说者。历谱：无历注或历注中无吉凶宜忌之说者。”有无吉凶宜忌内容便成了划分历书和历谱的标准。

对于江氏的这个结论，我原则上表示认同。不过，需要做一些补充说明。其实，历谱与历书的不同，早在它们的原始题名上已经体现出来。见于汉简的完整历谱有原始题名者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原题“七年历日”^[3]；而唐前期的显庆三年、仪凤四年、开元八年三份具注历日^[4]，原始题名虽然已残，但其内容、书写格式与敦煌所出唐宋“具注历日”，大同小异，由此也可推知，它们的原始名称是“××（年号）××（年次）××（干支）岁具注历日”。简言之，原名“历日”者是历谱，原名“具注历日”者是历书。那么“具注历日”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历日”二字的意义不难理解，关键在“具注”二字。《唐六典》



卷十四太常寺“太仆署”条：“凡历注之用六：一曰大会，二曰小会，三曰杂会，四曰岁会，五曰建除，六曰人神。”可知，大、小岁会，建除和人神，以及在汉代用于注历的“反支”，统称为“历注”，这一点，自汉迄今无别。至于“具”字，《说文解字》云：“共置也，从升从贝省。”“共置”，即放在一起的意思。《礼记·乐记》：“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备”与“具”互文见义，即完备、齐全之意。结合“具注历日”而言，在未将“吉凶宜忌”等历忌（选择）内容列入之前，历日已有反支、建除等“历注”，但尚不完备。只有将“吉凶宜忌”同时列入历日，与历注放在一起（共置）才是内容“完备”的历日，也才是“具注历日”。这应该就是“具注历日”的本始含义。

按照上面划分历谱与历书的标准去衡量，《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5]和《高昌延寿七年历日》^[6]就只能属于历谱而非历书了。再比照它们与汉简历谱的形制，可以确认，北魏历日与汉简历谱中的“单板纵读式”简便年历谱相似，而《高昌延寿七年历日》则与汉简历谱中的“编册横读式”年历谱相一致。其区别仅仅在于，这两份北朝历日是写在纸上而非写在简牍上的历谱。

那么，历谱转变为历书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呢？江晓原认为：“在现今已见并可确定年份的全部古历实物中，451AD之前没有历书，而658AD之后没有历谱！由此当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自历谱至历书，其演变过程完成于451~658AD之间。今后伴随出土文物增加，上述时段可望进一步缩小。”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日》和唐代的《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日》，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这些材料本身也还是受到了限制。以公元658年为下限，恐不会有太大问题；但若以公元450年作为历谱转变为历书的上限就可能会有困难。其一，迄今为止出土文物中尚未见到西晋、东晋、宋、齐、梁、陈



和隋代的历书实物，而太平真君十一年时北魏偏居平城（山西大同），它所使用的历谱内容是否具有普遍性，令人怀疑；其二，如果按照江先生的意见，后来我们又看到了《高昌延寿七年（630）历日》这个历谱，那么可否将历谱到历书的转变时限改划为630~658AD这二十几年之间呢？看来有点悬。其三，由历谱到历书的转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进去，那就是文字载体的变化。在既知的秦汉简牍历谱时代，文字载体是竹简和木牍，容量十分有限，因此历日和《日书》虽然配合使用，但却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尽管我们在《元延三年五月历谱》上也看到历忌项目在历谱上成组列出，却还容纳不了“吉凶宜忌”的内容。自西汉时代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技术起，文字载体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纸张数量的增多，书写更加容易，将“吉凶宜忌”等内容由原来分开存在而合并书写在一起，以方便检索行事，则是必然趋势。迄今由出土文物得知，西晋是竹简和纸张并用的时代，到东晋纸张则完全取代了竹木简牍而成为文字载体。由此我推测，在两晋时代，大概是历谱和历书并存的时期。也就是说，敦煌所出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日》恐怕不能完全代表这一时代的历日或历书面貌，也许历书的出现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些。实际情况如何，仍有俟未来出土文物的检验。

至于历谱为何会转变为历书，其契机是什么？江晓原先生说：“此事或可与以传入中土之佛教为代表的异域文化之启发影响不无关系。”然后他举了唐中叶不空翻译的《宿曜经》和此前由支谦和竺律炎合译的《摩登伽经》的一部分内容为证。为了便于讨论问题，我们现将江氏所引的两段文字逐录如下：

《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大正藏》NO.1299）卷下“七曜直日历品第八”云：

夫七曜者，所谓日月五星下直人间，一日一易，七日周



而复始。其所用各各于事有宜者、不宜者，请细详用之。

……

太阳直日：其日宜册命拜官受职见大人，教旗斗战申威，及金银作持咒行医 猎放群牧，王公百官等东西南北送行，及造福礼拜设斋供养诸天神，所求皆遂。合药、服食、割甲、洗头、造宅、种树、内仓库、捉获走失、入学、经官，理当并吉。其日不宜诤竞作誓，行奸必败，不宜先战，不宜买奴婢。……

太阴直日：其日宜造功德，必得成就。作喜乐朋僚，教女人裁衣服，造家具、安坐席、穿渠、造堤塘、修井灶、买卖财物、仓库内财、洗头、割甲、著新衣并大吉。其日不嫁娶、入宅、结交私情、出行。不向近远行大凶，奴婢逃走难得，禁者出迟，杀生、行恶、入贼者必凶。

荧惑直日：……

此为七曜直日吉凶宜忌之说。

第二种时日宜忌见《摩登伽经》（《大正藏》NO.1300）卷下“观灾祥品第六”：

……我今复说月在众星所应为事：

月在毕日：宜应耕垦、婚姻、盖宅、出财、调兽、裁衣等事，不宜责敛、斗战、造酒。其日雨吉。生者慈悲，多欲贪味，丰有财物，寿命延长。

月在轸日：一切事吉，是日生者，端严殊特，聪慧强识，亡失还得。其日有雨，秋稼成熟。

月在轸宿：一切皆吉。宜调象马、授官、造池。不利窃盗。其日有雨必当流溢。生者勇健，盗而多智，长寿少病。

此为月在各宿宜忌之说。

江氏继续指出：“佛经中这些时日吉凶宜忌之说，在六朝隋



唐之际广泛流传于中土。例如,《隋书》经籍志三历数类七曜术(或称七曜历)著作被著录者达二十二种。”他最终论道:“作为历书中吉凶宜忌之说理论基础的历忌之学,在中土本自源远流长,其内容与稍后佛经中输入之异域吉凶宜忌之说也无太大不同。然而中土历忌之学长期未与历谱发生直接结合,历谱中虽有少数历忌项目之历注,但始终未能为日常行事宜忌提供直接指示。至历书出现,乃成为具有指示日常行事宜忌功能之直接指南。而另一方面,佛经中如《宿曜经》、《摩登伽经》等经品却具有同样功能(江氏原注:据笔者初步搜索,汉文《大藏经》中此类作品至少有十五种左右)。……由此推论,历书之出现或系受到佛经作品之启发,确实大有可能。当然,因文献不足,此事尚难成为定论。”

应该说,江先生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学者,他为自己的“推论”留下了足够多的讨论余地。不过,坦白地说,我不太赞同他的这个“推论”。

第一,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在以竹木简牍为主要文字载体的时代,“历日”和《日书》虽然分开书写,但它们是配合起来使用的,而不像江先生所说“中土历忌之学长期未与历谱发生直接结合”,“始终未能为日常行事宜忌提供直接指示”。我们在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看到这样的记载:“春三月季庚辛,夏三月季壬癸,秋三月季甲乙,冬三月季丙丁,此大败日,娶妻,不终;盖屋燔;行,傅;毋可有为,日冲。……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7]显然,历忌“大败日”所在的季节和干支,只有结合历谱才能发生作用,否则是没有意义的。再比如,《后汉书·王符传》转引《潜夫论·爱日篇》说:“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而关于反支,目前可知至晚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上已



用于注历了。那份历谱上只注一“反”字，并未注明“反支日不受章奏”，可是在东汉明帝时历谱上的“反”字却用于指导具体的生活行事。如果历谱上的“反”字不与《日书》结合使用，所注“反”字还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总之，在汉简历谱时代，《日书》离不开历谱，就像历谱离不开《日书》一样，二者只有相结合才能有用，并用于指导行事。这些都被历日、《日书》以及文献所证实。

第二，我们要知道，秦汉时代由于文字载体的限制，历谱的流通是有限的，不会像我们今天每户都有一份到几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时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也很少，多数人不能直接看历日。在民间，普通百姓如有事情想知道“吉凶宜忌”，一般要去请教“术士”。我推测，术士们既拥有历日，也拥有《日书》。历日每年变化，但《日书》却是稳定的。术士们只要将当年历日的纪日干支同《日书》相对照，便可回答民众的提问。

第三，东汉时王充在《论衡·讥日篇》中已指出：“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信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时日之书，众多非一。略举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时之人，将一疑而倍之。”前已指出，王充举出的“较著”名而加以批判的有《葬历》、《祭祀之历》、《沐书》、《裁衣》、《工伎》、《堪舆》等六大类。而这些内容转化为“具注历日”中“吉凶宜忌”的用语，便是殡（葬）埋、祭祀、沐浴、洗头、裁衣、修车、造井、坏土墙、修宫室、修碓磑等的吉与不吉。这在唐初三历中也俯拾即是，读者可以详参。它说明，一直到唐代初期，移植到“具注历日”中的“吉凶宜忌”内容基本仍是来自汉代以来的各种历忌之书。由此也可以反证，那些历忌之书本来就是配合历日使用的，只是到了晋和南北朝以后，由于文



字载体的变化，容量扩大，把本来分开存在的内容合并在一起罢了（“具”即“共置”）。

第四，由于考古发掘出土了几种《日书》，使我们对中古“具注历日”中“吉凶宜忌”内容的来源加以追溯成为可能，试举证如下：

关于裁衣。睡虎地秦简《日书》：“衣良日：乙丑、巳、酉、辛巳、丑、酉、吉。丁丑材（裁）衣，媚人。入七月七日乙酉，十一月丁酉材（裁）衣，终身衣丝。十月丁酉材（裁）衣，不卒岁必衣丝。衣忌日：己、戊、壬、癸、丙申、丁亥，必鼠（子）死者。癸丑、寅、申、亥，秋丙、辛材（裁）衣，必入之。五月六月，不可为复衣。月不尽五日，不可材（裁）衣，丁酉材（裁）衣常（裳），以西有（又）以东行，以坐而饮酉（酒），失兵不入于身，身不伤。”^[8]这是关于在何日干支裁衣吉与不吉的“历忌”内容。

关于盖屋。秦简《日书》：“春庚、辛，夏壬、癸，季秋甲、乙，季冬丙、丁，勿以作事，复（覆）内、暴屋。以此日暴屋，屋以此日为盖屋，屋不坏折，主人必大伤。”^[9]这是关于何日干支盖屋吉与不吉的“历忌”内容。

关于扫屋舍。秦简《日书》：“庚申、丁酉、丁亥、辛卯，以除室，百虫弗居。”^[10]这是关于何日干支打扫室内卫生吉与不吉的“历忌”内容。

关于葬埋。秦简《日书》：“葬日，子、卯、巳、酉、戌，是胃（谓）男日。午、未、申、丑、亥、辰，是胃（谓）女日。女日死，女日葬，必复之。男子亦然。凡丁、丑不可以葬，葬必参。”^[11]这是关于何日干支葬埋吉与不吉的“历忌”内容。

关于娶妻。秦简《日书》：“取妻龙日，丁巳、癸丑、辛酉、辛亥、乙酉，及春之未、戌，秋丑、辰，冬戌、亥。丁丑，己丑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12]这



是关于何日干支娶妻吉与不吉的“历忌”内容。

关于朝见与拜谒。秦简《日书》：“吏：子，朝见，有告，听。晏见，有告，不听……丑，朝见，有奴（怒）。晏见，有美言。昼见，禺（遇）奴（怒）。日𠂔见，有告，听。夕见，有恶言。”^[13]这是某地支日朝拜吉与不吉的“历忌”内容。

秦简《日书》中涉及“历忌”之学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举出上述数种，是由于这几种“历忌”内容在中古“具注历日”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再结合前引《论衡·讥日篇》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具注历日”中的那些选择内容至晚在战国时就已存在；而且，《日书》与历谱是配合使用的，只要文字载体允许容量扩大，它们合并书写在一起是完全自然的事，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换言之，由历谱转化为历书，完全可以由中国历法与术数文化自身生发出来，不待有域外文化的影响才产生。

第五，如前所述，江晓原先生举出了《宿曜经》中的“七曜直日”历忌内容。不错，学者们对七曜日的来源虽未能取得共识，但它来自域外却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否对中国古历由历谱到历书的转变发生过启迪作用呢？恐怕不是。因为我们在本文前面已经看到，至晚到唐初，历谱（历日）已经转变为历书（具注历日），但中国人尚未用七曜历日的“历忌”内容注历。用七曜直日历忌注历，目前所见，大约从9世纪初才开始，也许时间会更早一些，但唐初官颁三历尚未用七曜直日历忌注历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认为，与其说七曜历日历忌内容影响了中国古历由历谱到历书的转变，毋宁说中国古历自身由历谱转化为历书后，由于受域外文化的影响，又将七曜直日历忌内容吸纳进本土历书，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至于江先生所举《摩登伽经》月在二十八宿宜忌之说，以为域外历法影响了中国古历由历谱到历书的转变，恐更难成立。因为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已有二十八宿各主吉凶宜忌的文字



记载。今摘引如下：

角，利祠及行，吉。不可盖屋。取妻，妻妒。生子，为[吏]。

亢，祠，为门、行，吉。可入货。生子，必有爵。

(氏)，祠及行、出入货，吉。取妻，妻贫。生子，巧。
(中略)

东辟(壁)，不可行。百事凶。以生子，不完。不可为它事。

奎，祠及行，吉。以取妻，女子爱而口臭。生子，为吏。(中略)

参，百事吉，取妻，吉。唯生子不吉。

东井，百事凶。以死，必五人死；以杀生(牲)，必五生(牲)死。取妻，多子，生子，旬而死。可以为土事。
.....[14]

显然，远在《摩登伽经》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几百年前，中国不仅有自己的二十八宿体系，而且也被术士们赋予了“吉凶宜忌”的历忌内容。前引《摩登伽经》告诉我们，印度有其二十七宿(有时作二十八宿)体系及相应的宜忌选择事项。但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二十八宿毫不逊色。至于二十八宿各主吉凶被连续引入历书，目前所知，是南宋的事。但在南宋以前的千数百年，这项文化早被储蓄了，只是届时引入历书而已，以至在当代东亚汉文化圈的民用“通书”中仍旧普遍使用。显然，《摩登伽经》的相关内容也不能成为中国古历由历谱转化为历书的启迪因素。

概括言之，历谱转化为历书，是由于历谱中增加了“吉凶宜忌”的内容，而从其原始题名上就可反映出来，具体表现为“历日”和“具注历日”的不同。再者，由历谱转变为历书，是从中



国古历内容及书写质材的变化生发出来的，而不待来自域外文化的启迪。

【注释】

[1] 江晓原《历书起源考》，载《中国文化》总第6期，150~159页。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出。

[2] 见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合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21~22页。

[3] 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233页及插图“元光元年历谱（复原表）”。

[4] 此三历释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73~76页，第5册231~235页，第8册130~131页。考证文字参拙作《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年12期58~62页；《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八年具注历日〉释文补正》，载《文物》1992年6期92~93页。

[5] 今编号为“敦研0368背”。参拙作《敦煌本北魏历日与中国古代月食预报》，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360~372页。

[6] 参拙作《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考》，载《文物》1996年2期，34~40页。江氏撰文时此历尚未正式发表。

[7] 见《中国古代方术概观·选择卷》，人民中国出版社，第39页，1993年。

[8] 同[7]，第51页。

[9] 同[7]，第63~64页。

[10] 同[7]，第64页。

[11] 同[7]，第21页。

[12] 同[7]，第37页。

[13] 同[7]，第37页。

[14] 同[7]，24~25页。

出土历日掠影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月亮圆缺，晦而复明；草木荣枯，寒来暑往：日、月、年这些最基本的时间单位，正是人们制定历法的主要依据。作为以农立国的中华先民，颁历授时在数千年前即已开始，仅因历史资料的湮没，早期的历日实物我们却无从寓目了。

本世纪之前，我国传世历书以南宋《宝祐四年（1256）会万年具注天历》^[1]为最古；这以前的历日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只能凭借文献记载去猜测。20 世纪以来，伴随大批竹木简牍和纸质文献的相继面世，一批古代历日实物陆续呈现在世人面前。当代人的幸运在于：出土历日不仅使我们眼界大开，给研究工作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使我们逐步得以看清中华历日文化是多么的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据不完全统计，汉简历日约有 40 件左右。除极少量出自内地，绝大多数出自甘肃敦煌和内蒙古居延。其中年代最早者，目前首推山东临沂银雀山二号汉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 年）历日》^[2]，最晚者为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 年）历日》，时间跨度达 287 年，几近三个世纪。不过，业经公布的这些历日，仍恐非已知历日的全部。因为迄今还有许多简牍仍在整理之中，有些历日，如汉宣帝《地节元年（前 69）历日》^[3]，乃是新近公布，而为此前所不曾见到。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整理



工作的深入，还会有新的历日陆续面世。

敦煌吐鲁番历日主要出自敦煌石室（今编第 17 窟）和吐鲁番晋—唐古墓群，其物质特征是以纸为书写质材，这是与汉简历日所不相同的。现知它有 50 余份，年代最早者为《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最晚者为《北宋淳化四年（993）具注历日》，时间跨度达 543 年。就其所属朝代而论，北魏王朝和麴氏高昌国各 1 件，唐前期 3 件（显庆三年历、仪凤四年历、开元八年历），其余多是吐蕃占领敦煌（786）以及归义军政权建立（851）后，当地汉人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自编的历日^[4]，性质属于“小历”。

由上可知，如果说前代学者以看到宋历为幸事，那么，比起当代学人，他们应该自叹弗如了。人们的视野一步跨入前此千余年的汉代，怎能不舒心快慰！而且，自汉迄宋的这些历日实物，除三国、两晋、南朝和隋代尚无实物，其余分布的朝代亦较宽广，也就使我们有了粗略地勾画历日演进轨迹的可能，这也是前代学者所不能同年而语的。

从编制形式来说，有学者曾将汉简历谱分作四种类型，即：（1）单板横读月历谱；（2）单板直读月历谱；（3）单板直读简便年历谱；（4）编册横读日历谱。形式不同，却都以实用为首要特征。其中编册横读日历谱恐怕最具代表性，如汉宣帝《神爵三年（前 59 年）历谱》。这种历谱一般由 32 枚竹简编册而成：最右一枚书写历日年代题名；第二枚从上到下连续书写一年的月份；其余 30 枚由右至左，顶端书写日期，每简一日，从一日到卅日。然后在各月该日内容中书写纪日干支以及相应的历注（二十四节气、三伏、腊、建除、反支等），实际相当于一个表格^[5]，使用起来极为便利。敦煌石室所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日》的形式，相当于汉简的简便年历谱；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延寿七年（630）历日》，其形制同前述汉简编册横读日历谱一脉相



承^[6]。从现存材料看，汉至北朝历日形制未起太大的变化。

隋朝历日亦未发现。入唐以后，历日从形制到内容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日》。单就每日内容来说，就有日期、干支、六甲纳音和建除，其次有弦、望、节气等注记，再次有吉凶注，即宜忌选择事项。这些已经丰富起来的历日内容，充其量也还只能算作过渡状态。据历法专家张培瑜教授研究，历注由简到繁，唐代僧一行（张遂）开元时的《大衍历》是个转折点^[7]。敦煌所出历日虽多属“小历”，但仍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古时代历日的基本面貌。如《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繁化了的历日：它有很长的序文，内容复杂，每月又有月序，内容也老多不少；每日内容比唐初历日又多了“蜜”日（星期日）、昼夜时刻、人神、日游等项。其丰富内容奠定了宋以后历日内容的基本格局，流韵所及，直至于今日港台以及东亚地区的民用通书。

显然，唐代历日内容所以变得繁杂起来，则是因为此前一些单独行用的术数文化（如九宫、六甲纳音），以及新创的一些术数内容（如一些年神、月神等），被陆续吸纳加入历日。历日的基本功能（年、月、日）未发生变异，但“性命”和吉凶宜忌却日益跃居重要位置。细心的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我们在前面使用了“历日”、“历书”、“具注历日”等不同概念。这是因为，一般说来，“历日”中的历注都很简略，历注的繁化就使历日变为“具注历日”；“具注历日”则是因其有大量科学、不科学的历注才形成的名称。名称有异，自身已暗含了历法由简到繁的发展、演进过程。

出土历日的研究价值也是多层面的，这里仅对其研究历史科学和天文学史的价值略作介绍。

年代学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其成立的基础便是历法。20世纪20年代，史学家陈垣先生编著的《二十史朔闰表》，



至今仍是治文史者的重要案头书。但由于未能运用出土历日，其间仍有错误和悬案遗留。人们知道，汉代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颁行的《太初历》始用夏正，正月建寅，而此前西汉历法的真实面貌却有疑问：《汉书·律历志》、《后汉书·志三》均认为汉初行用《颛顼历》；后世治历者刘羲叟、汪曰桢等则倾向于行用《殷历》。陈垣先生受后者影响，就是用《殷历》排表的。可是，银雀山所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只有用《颛顼历》推算才能契合，而与《殷历》相悖，从而由汉高祖元年（前206）至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共102年的历谱，需要重加排定^[8]。又如唐仪凤三年（678）的闰月问题：《旧唐书·高宗纪》为闰十月，《新唐书·高宗纪》为闰十一月，陈垣先生难于案断，于是两说并存，遂成悬案。而利用吐鲁番出土的《唐仪凤四年（679）具注历日》推得，仪凤三年当闰十月而非十一月，敦煌文献 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也有仪凤三年闰十月的纪事，陈垣先生未能解决的悬案由此冰消冻解^[9]。出土历日在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时的作用是无须赘言的。

一般来说，古代历日是不记日月食预报的，但也有罕见并十分珍贵的资料被发现和认知。《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历日》分别在二月十六日（公历4月2日）和八月十六日（公历9月27日）著录了两次月食预报。而据研究，此年仅有两次月食发生，并且就是历日预报的这两天，虽然一次月食（4月2日）实际发生在北京时的中午前后，中国全境皆不可见。此时北魏王朝行用三国曹魏的《景初历》，此历是由尚书郎杨伟创造的，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对日月食的预推。它从曹魏景初元年（237）开始行用，至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已使用了215年，所作月食预报依然如此准确，怎能不说是对我们祖先聪明才智的真实写照，从而使我们由衷地为之自豪呢^[10]？

我们说敦煌历日流韵所及，直至于港台和东亚地区的现行民



用通书，也非无稽之谈。宋以后的中国历书，直至1949年前的通书（民间称为“黄历”），其主体内容大同小异，只是祖国大陆1949年后将其中的术数内容摒弃了出去，但在港台地区，术数内容至今仍有强劲的生命力，广为流行，盛而不衰。

我曾将香港民用通书同敦煌具注历日进行过对照，并以《从香港民用历书反观敦煌历日》为题，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作公开演讲^[11]，引起听众的很大兴趣。就一些主要文化项目来看，香港现行民用通书同敦煌历日惊人的一致或相似。比如：建除十二客遵循着相同的排列规则，历日中的“星命月份”具有共同的起讫日期；九宫术都以隋仁寿四年（604）为起算点而连续不断，九宫图具有相同的构图方法，由此排出的三元甲子年及男女命宫也很一致；历日中的“六甲纳音”、“年神方位”、“月神日期方位”也是从同一个轨迹上演化下来的。这样，我们很自然地获得三点认识：（1）现行香港民用通书主体文化内容的源头在唐代，距今已1300多年；（2）其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与大陆1949年前的“通书”具有同根性。相信凡是尊重客观实际的人，都会承认这些看法是实事求是的、允当的。同理，这些认识对台湾现行民用通书也完全适用。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汉简历日发展、衍化而成的敦煌吐鲁番具注历日，尤其是繁化了的历日，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民用小百科全书。除了上面说到的历法和术数文化，还有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内容，如源自基督教（唐称“景教”）的星期制度传入我国，始自敦煌历日；由佛教“亡七斋”演变出的中国民俗之一——为死者“做七”和“百日”，也在历日中留下了使用痕迹。其他一些重要节日和习俗，如“社”日祭后土，“腊”日祭百神，“释典”礼敬儒家鼻祖孔子等，都同其时的民生息息相关。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绝非这篇小文所能涵盖得了。有兴趣的读者，



不妨下一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功夫，从而对出土历日产生更为直接、真切的认识。

【注释】

[1] 日本金泽文库藏宋刊本具注历，影片见《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三号插图；又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613～1615页。

[2] 原件存山东省博物馆，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28～35页。

[3] 图版见《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封底内面。

[4] 详参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5] 参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插图“元光元年历谱（复原表）”。

[6] 参拙作《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考》，载《文物》1996年2期，34～40页。又见该期39页“高昌延寿七年（630）历日复原表”。

[7] 张培瑜等《古代历注简论》，载《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1期，101～108页。

[8] 参见陈久金、陈美东《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载《文物》1974年3期，59～68页。秦和汉初的历法仍在研究之中，尚无定论。

[9] 参拙作《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年12期，58～62页。

[10] 参见拙作《敦煌本北魏历日与中国古代月食预报》，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360～372页。

[11] 此演讲稿后改题为《敦煌历日的现代流变——香港民用历书文化探源》，刊载于台湾出版的《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240～266页。

（原载《文物天地》1997年第2期，26～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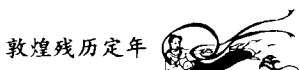
【附记】

截至1999年，我们能看到的中国最古的实行历日，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历日》。参见彭锦华《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日”释文与考释》，载《文物》1999年6期63~69页。图版见《关沮秦汉墓简牍》一书，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

敦煌残历定年

现存中国古代所用的历日，以 1973 年在山东临沂发现的元光元年（前 134）的历日为最早^[1]，它是写在竹简上的。写在竹简上的历日还有在此以前在西北地区先后发现的 15 份历日，它们分属于公元前 72 年、70 年、63 年、61 年、59 年、57 年、39 年、17 年、13 年、5 年和公元后 6 年、8 年、94 年、105 年、153 年^[2]。在此以后，从公元 3 世纪到 7 世纪的历本至今几未发现。接着就是写在卷子上保藏在敦煌石窟中的从晚唐到宋初的历本。这些历本的绝大部分于本世纪初被斯坦因（M. A. Stein, 1862 ~ 1943）和伯希和（P. Pelliot, 1878 ~ 1945）运到了伦敦英国博物馆（1972 年后改藏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保存在国内的已极少。对于这些历本，法国沙畹（E. Chavannes, 1865 ~ 1918）^[3]，中国王重民（1903 ~ 1975）^[4]，日本数内清^[5]和藤枝晃^[6]都做过一些研究。尤其是藤枝晃，他不但收集了历本，而且将敦煌文献中有年、月、日的记载尽量录出，很是系统。不过，从施萍婷的最近研究^[7]来看，藤枝晃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本文则在藤枝晃和施萍婷研究的基础上，就历日方面的已有成果予以列表概括，并就断定年代的方法予以详细论证。

中国古代所使用的历本，要比我们现在的月历、日历复杂得多，除给出年份、各月大小、闰月安排、日名干支、晦朔弦望、廿四节气、昼夜长短及日出入时刻等天文内容外，还有大量的关



于各日吉凶、宜忌用事等供占卜、选择用的事项，这些内容称之为“历注”。历注的内容由简到繁，而唐代一行（683~727）的《大衍历》是个转折点^[8]。敦煌发现的历本基本上在《大衍历》之后，都有历注，所以叫“具注历”。一份完整的具注历，不但有天文和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有民俗学上的意义。可惜现在的历本大都残缺不全，有明确年份的很少。怎样由断简残编来确定该历本的年份，这大有学问，根据前人的不断摸索，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方法。

一、有明确纪年，一望即知

例如，英国图书馆藏的 S. 1473 号卷子一开头写有“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具注历日并序”，不用研究，即知此为 982 年历本。但将其序言中所记各月大小和由残存日历推知的朔日干支，与陈垣（1880~1971）《二十史朔闰表》中所载由当时中原所用的历法推得的朔日干支相比时发现，正、二、三、五、八、十、十一和闰十二月的朔日，敦煌历比中原历各早一日。在一年中，竟有 1/3 的月份，其朔日不一致。而且不只一份如此。在有明确年代的 9 份卷子（A. D. 450 和 451, 922, 926, 956, 959, 981, 982, 986, 993）中，竟没有一份是和中原历完全吻合的！这是由于安史之乱（755~763）以后，中央政权对于这一地区，已是鞭长莫及，终于在 786 年沦入吐蕃之手。其后，848 年当地汉人豪族张议潮趁吐蕃内讧之机起兵与吐蕃对峙，并于 851 年成为归义军节度使，受唐封位；922 年张氏政权为曹议金所代，924 年受后唐册封，仍为归义军节度使。但此一时期在敦煌和长安之间有一西夏存在，张、曹政权好像孤岛一样存在于西部地区，和中央联系相对较少，且其政权也有相对独立性，他们所用的历本大都是根据中原历法在本地区编的，因而朔、闰往往稍有差异。



二、由年九宫决定年干支

在敦煌卷子 S. 2404 具注历中，不幸年份部分脱落，但在序言中有“九宫之中，年起五宫，月起四宫，日起二宫”，并绘有一图。为了研究方便，将此图重绘为图一，并加数码。

绿 (4)	紫 (9)	黑 (2)
碧 (3)	黄 (5)	赤 (7)
白 (8)	白 (1)	白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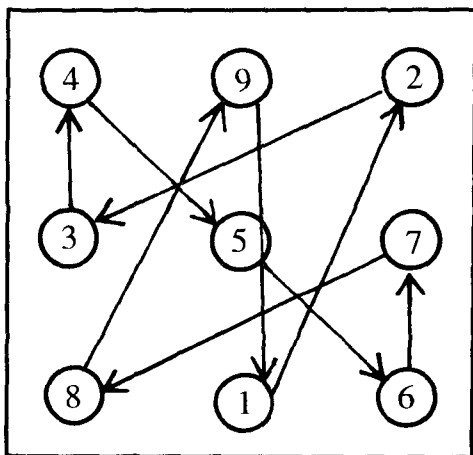
图一

碧 (3)	白 (8)	白 (1)
黑 (2)	绿 (4)	白 (6)
赤 (7)	紫 (9)	黄 (5)

图二

此图名九宫图，在汉朝已经有了。公元 133 年张衡（78 ~ 139）《请禁绝图讖疏》中就有“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9]一语。所谓“年起五宫”，是因为居中央的黄色，按数字编号为 5，数字与颜色的对应关系为：1 白，2 黑，3 碧，4 绿，5 黄，6 白，7 赤，8 白，9 紫。将每格的数字减 1，并换成其对应的颜色，即得次年的九宫图（图二）；如此递减，可得九幅不同的九宫图。按图三移位办法，也可同样得到九幅不同的九宫图，这叫“太一行九宫”。

9 与 60 的最小公倍数为 180，故干支纪年与九宫纪年的关系为 180 年 1 个周期。又因 180 为 60 的 3 倍，故又有上、中、下三



图三

元甲子之称。若上元甲子年为一宫（即 1 白居中），则中元甲子年为四宫（4 绿居中），下元甲子年为七宫（7 赤居中），因 $9 \div 60$ 余 6， $1 + (9 - 6) = 4$ ， $4 + (9 - 6) = 7$ 。上、中、下三元九宫与干支的关系见表二。要利用表二，首先得知道第一个上元的年份。按照算命先生的说法，这要由天意来决定，它被定在隋仁寿四年（604）。往下推，1864 年为上元甲子，1924 年为中元甲子，1984 年为下元甲子。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784 ~ 843 年属上元，844 ~ 903 年属中元，904 ~ 963 年属下元。如果我们有办法知道某一残历在哪一历元范围内，就可以用表二来断定其年代。S. 2404 残历上正好保存有“随军参谋翟奉达撰”字样。据向达（1900 ~ 1966）研究^[10]，翟奉达生于 883 年，902 年时他仅 20 岁，因此残历 S. 2404 应属于 904 ~ 963 年下元范围内。在此范围内，与九宫图 5 黄居中对应的年干支应为下列七者之一：3（丙寅），12（乙亥），21（甲申），30（癸巳），39（壬寅），48（辛亥）或 57（庚申）。



表一 干支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0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10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20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30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40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50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表二 年干支与九宫关系表

		括号内为中宫颜色数								
上元		(1)	(9)	(8)	(7)	(6)	(5)	(4)	(3)	(2)
中元		(4)	(3)	(2)	(1)	(9)	(8)	(7)	(6)	(5)
下元		(7)	(6)	(5)	(4)	(3)	(2)	(1)	(9)	(8)
干支序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如果不能确定属于上、中、下哪一元，也可以利用表二，不过一个九宫图所对应的年干支就有 20~21 个之多，更难确定具体年份了。

三、由月九宫求年地支

部分具注历每月的开头，也有个九宫图。因为 $4 \times 9 = 3 \times 12$ ，故九宫图每九个月循环一次，三年完成一次大循环，第四年正月和第一年正月的九宫图一样。但三年只是以十二支命名的十二年的四分之一，故一个九宫图对应四个年地支。根据中国历法传统，以含有冬至的十一月建子之月为岁首，1 白居中宫，十二月建丑 9 紫居中宫，甲子年的正月建寅 8 白居中宫，这样，九宫图和年地支就有表三的关系。

从表三得知，S. 2404 中的“月起四宫”是错误的，只有“月起二宫”才能与“年起五宫”相吻合，所对应的年地支为寅、巳、申或亥。

表三 月九宫与年地支的关系

正月九宫图中 宫颜色序号 Z ₁	年 地 支
8 白	子 卯 午 酉
5 黄	丑 辰 未 戌
2 黑	寅 巳 申 亥

设一年中第 n 月的月九宫图中宫的颜色为 Z_n ，正月中宫的颜色为 Z_1 ，则

$$Z_1 = Z_n + (n - 1) \cdots \cdots (1)$$



其中 $n=2, 3, 4, 5\cdots\cdots 9$ ，十月可当作 1，11 月可当作 2，12 月可当作 3。因此，只要知道任何一个月的九宫图，就可求出相应的年地支。

四、由月天干求年天干

中国古时不仅以干支纪年，自唐代起也以干支纪月。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闰月无干支和九宫图），故十二支与十二月的关系是固定的，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十二月建丑。因 $5 \times 12 = 6 \times 10$ ，故月天干五年一循环，每一月天干对应两个年天干，在 S. 0612 背面有“五子元例正建法”说明这种关系，其文曰：

甲、己之年丙作首，乙、庚之岁戊为头；丙、辛之年庚次第，丁、壬还作顺行流；戊、癸既从运位起，正月直须向甲寅求。

1949 年以前算命先生所用的歌诀，与此大同小异，头两句完全一样，后四句是“丙、辛必定寻庚起，丁、壬壬位顺行流；更有戊、癸何方觉，甲寅之上好追求”。把这些歌诀用表格表示出来（见表四），更一目了然。

表四 正月干支与年天干的关系表

正 月			
干支序数	干 支		
3	丙	寅	甲 己
15	戊		乙 庚
27	庚		丙 辛
39	壬		丁 壬
51	甲		戊 癸



设一年中第 n 月的干支序数为 g_n ，正月干支序数为 g_1 ，则：

$$g_1 = g_n - (n - 1) \cdots \cdots (2)$$

其中 $n = 2, 3, 4, 5 \cdots \cdots 12$ 。因此，只要知道任何一个月的干支，就可用公式 (2) 和表一、表四求出其年天干。例如，S. 2404 中有“正月小，建丙寅”，由此得出其年天干为甲或己。将此结果与由第二种方法所得的七个干支结合来看，只有一个甲申是共同的，由此我们可以确认这份残历属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即 924 年的历日。

五、朔闰对比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将敦煌具注历日中的日与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的朔日、干支对照时经常有一二日之差，闰月对照时有一二月之差。但在用本文第二、三、四部分所述的方法求出其可能的年干支后，仍可用这个办法寻找其最佳吻合者，确定其年代。例如，抄在 S. 1439 背面的历日，残存正月初一日到五月二十四日的部分，由正月建甲寅，知年天干为戊或癸，以此与晚唐至宋初期间戊、癸年的朔闰干支对比，数内清和藤枝晃都把它断为唐大中十二年戊寅岁 (858)，虽然此历闰正月比《二十史朔闰表》中闰二月早一月，五月朔迟一日。

六、星期对比

中国古代不用星期制度，惟独这一段时间用，常常将星期日用红颜色的“蜜”字注出。据 S. 2404 序言中的“推七曜直用日吉凶法”，当时七曜的名称为：第一“蜜”，太阳直日；第二“莫”，太阴直日；第三“云汉”，火星直日；第四“滴”，水星直日；第五“温没斯”，木星直日；第六“那颡”，金星直日；第七



“鸡缓”，土星直日。759 年在华印度僧人不空（Amoghavajra）译的《宿曜经》称这些名词为胡语。1913 年沙畹和伯希和考证^[11]，认为这里所说的胡人系指住在西域康居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一带）说索格底（Sogdian）语的民族。这七个名词的索格底语是 Mir, Map, Wipān, Tīr, Wmzt, Nagit, Kewan, 发音与 S. 2404 中的相近，不过最近也有人认为，这些名词来源于波斯语，Mi 即 Mithras 的第一个音节^[12]。

索格底、希腊、罗马、波斯的星期日制度都有一个共同起源，均以公元元年 1 月 1 日为星期日，这一天相当于汉元寿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根据这一事实，陈垣在《二十史朔闰表》中也附载了《日曜表》，可以用来查考中国历史上的某日属星期几。在可能的年份知道以后，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表来确定残历的具体年代。例如，S. 1439 上的历日，蕞内清和藤枝晃用方法四和方法五定为 858 年；我们又在二月二日上发现一“蜜”字，用陈垣的表一查，858 年二月初二日果然是星期日，进一步确认了他们二人的断定是正确的。

七、利用年神方位定年干支

最近出版的陈遵妣《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七编第三章中有岁德方位、金神方位和年天干的关系，太岁等年神方位和年地支的关系，现将其稍作修正，转录如下：（见表五、六）。

S. 2404 残历中有“今年岁德在甲”，“今年太岁在申，太阴在午……”等记载，由此亦可得出此年为甲申，与由方法二、四所断定者一致。

最后，我们再举综合运用以上几种方法的一个例子，作为本文的结束。在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刊有正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二日不足一月的一段日历，看看如何决定它的年份。



1. 由二月九宫图 1 白居中, 根据方法三得知正月为二黑居中, 年地支为寅、巳、申或亥;

2. 由二月建丁卯, 根据方法四得知正月建丙寅, 年天干为甲或己;

3. 将方法二、一结合, 利用表一可得年干支为甲寅、甲申、己巳或己亥;

4. 将历日中的“正月大, 癸亥朔”, “二月小, 癸酉朔”, 以及由此推出的三月壬寅朔, 与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晚唐至宋初一段中甲寅、甲申、己巳、己亥之年这两个月的朔日干支进行对比, 发现与后晋天福四年己亥岁(939)的一致;

5. 在二月初三、初十、十七这三天的顶部注有红色“蜜”字, 将之与陈垣书中 939 年的《日曜表》进行对比, 果然也是吻合的, 从而我们可最后断定这份最短的残历属于 939 年。

表五 太岁等年神方位和年地支的关系

年神 年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1. 太岁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2. 太阴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3. 大将军	酉	戌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4. 黄幡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5. 豹尾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6. 岁杀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7. 岁刑	卯	戌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8. 岁破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9. 奏书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10. 博士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11. 力士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12. 蚕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13. 蚕官	未	未	戌	戌	戌	丑	丑	丑	辰	辰	辰	未
14. 蚕命	申	申	亥	亥	亥	寅	寅	寅	巳	巳	巳	申
15. 丧门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续表

年神	年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白虎	符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16.	官病	符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17.	死	符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18.	劫	杀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19.	灾	杀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20.	火	杀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21.	大	杀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22.	飞	鹿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表六 岁德等年神方位和年天干的关系

年天干	岁德方位	金神方位
甲, 己	甲	午, 未, 申, 酉
乙, 庚	庚	辰, 巳
丙, 辛	丙	子, 丑, 寅, 卯, 午, 未
丁, 壬	壬	寅, 卯, 辰, 巳
戊, 癸	戊	子, 丑, 寅, 卯

就像这个例子一样,我们将至今所收集到的 39 项材料一一做了研究,现将结果按年代顺序汇总在表七中。

在表七第五栏中, S. 表示斯坦因收藏, P. 表示伯希和收藏, L 表示罗振玉收藏, “背”表示写在卷子的背面。第六栏“4:12—6:1”表示残存 4 月 12 日至 6 月 1 日的历日。第八栏 S 表示朔, R 表示闰, “-1”表示敦煌历比中原历早一日或一月, “+1”表示迟一日或一月。第十栏 F 表示藤枝晃, Ft 表示藤文照片, S 表示施萍婷, St 表示施文中的表, Y 表示薮内清, L 表示罗振玉, W 表示王重民。序号前加“△”者表示原件有明确的纪年。此外, 第 4、5、6、15、20 诸件, 因原历提供条件太少, 所定年代可信度较低, 暂作如此断定, 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七 敦煌历日年表

序号	帝王纪年	干支纪年	公元	资料来源	现存内容	编写者	朔闰情况	方法	备注
△1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	庚寅	450	《大统杂志》第1卷9期苏莹辉文	1~12月		相同	a	藤施未著录
2	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	辛卯	451	同上	1~12月		同上	a	同上
	吐蕃占领时期								
3	唐元和三年	戊子	808	S-Tib. 109(残)	4:12-6:1		朔各早一日	d+e	F.
4	唐元和四年	己丑	809	P3900背(残)	4:11-6:6		闰4S+1.6S-1	e	S
5	唐元和十四年	己亥	819	S3824(残)	5:18-6:9		5S.7S-1	d+e	藤误为876
6	唐长庆元年	辛丑	821	P2583(残)	2:28-4:1		相同	e	F11+S14
7	唐大和三年	己酉	829	P2797背(残)	11:22-12:5		S12-1	a+e	藤施均著录,照片4
8	唐大和八年	甲寅	834	P2765(残)	1:1-4:7		1S.4S-1,11S+1	a+e+f	F2+S15
	张氏政权时期								
9	唐大中十二年	戊寅	858	SI439背(残)	1:1-5:24		5S+1, R-1	d+e+f	F1+Y3+S16
10	唐咸通五年	甲申	864	P3284背(残)	1:1-5:21		相同	d+e+f	S17
11	唐乾符四年	丁酉	877	S-P.6(残)	2:11-12:30		相同	a+c+d+e+f	F4
12	唐中和二年	壬寅	882	S-P.10(残)	只剩标题				F15, 来自成都
13	唐光启四年	戊申	888	P3492(残)	9:7-11:29		9S, 11S+1	d+e	S18



续表

序号	帝王纪年	干支纪年	公元	资料来源	现存内容	编写者	朔闰情况	方法	备注
14	唐大顺元年	庚戌	890	I3(残)	2:1-2:4		8S+1	d+c	Ff6+Si19
15	唐景福元年	壬子	892	P4983(残)	11:29-12:30	王文君书	11S+1	d+e	Si20
16	唐景福二年	癸丑	893	P4996+P3476(残)	4:17-12:29	吕定德写	R+1:6S, 10S, 7S, 9S, 11S, 12S+1, 8S, 10S+2	d+e+f	Ff7+Si21
17	唐乾宁二年	乙卯	895	P5548(残)	3:4-10:7		3S, 5S, 7S+1, 8S-11S+2	e+d+f	Si22
18	唐乾宁四年	丁巳	897	P3248(残)	3:6-8:10		1S, 2S+1	e+d+f	Ff+Si23
19	唐乾宁四年	丁巳	897	I4(残)	1:1-4:29		1S, 2S+1	d+e	F. 罗误为 990
20	唐天复五年	乙丑	905	P2506(残)	1:1-2:18		1S+2, 2S+1	d+e	Si24
	曹氏政权时期								
△21	后梁贞明八年	壬午	922	P3555(残)	1:2-5:26		2S-1	a	Si5
22	后梁龙德三年	癸未	923	P3555B14(残)	10:1-12:30		10S+2, 11S, 12S+1	d+e	藤施未著录, 照片 5
23	后唐同光二年	甲申	924	S2404(残)	1:1-1:4	翟奉达编	1-3S, 11S+1; 7S, 9S-1	b+c+d+e+f+g	Ff9+Si25
△24	后唐同光四年	丙戌	926	3347背+L ₁ (全)	全年	翟奉达编	R+1, 2S, 4S, 6-8S, 10-11S-1, 9S, 12S-2	a	Ff10+W+Si6
25	后唐天成三年	戊子	928	向达书 438 页(残)	只有序言	翟奉达编		a	F
26	后唐长兴四年	癸巳	933	S0276(残)	3:10-7:13		7S+1	c+d+e+f	Ff11+Y2+Si26



续表

序号	帝王纪年	干支纪年	公元	资料来源	现存内容	编写者	朔闰情况	方法	备注
27	后晋天福四年	己亥	939	L2(残)	1:28-2:22		3S-1	c+d+e+f	F+S27
28	后晋天福九年	甲辰	944	P2591(残)	4:8-6:1		5-7S+1	c+d+e+f	F12+S28
29	后晋天福十年	乙巳	945	S0560(残)	只留标题			a	F
30	后晋天福十年	乙巳	945	S0681背(残)	1:1-2:12		8S+1	b+c+d+e+f	F13+Y1+S29
△31	后周显德三年	丙辰	956	S0095(全)	全年	翟奉达编	1-3S,10S,12S-1,8S+1	a	F14+S7
△32	后周显德六年	己未	959	P2623(残)	1:1-1:3	翟奉达编	2S+1,6S,8S-1	a	F15+S8
33	宋太平兴国三年	戊寅	978	S0612(残)	只留标题和序言	王文坦编		a	F16
△34	宋太平兴国六年	辛巳	981	S6886背(全)	全年		1S-1,6S,8S,9S+1	a	F17+S9
△35	宋太平兴国七年	壬午	982	S1473+S11427BV(残)	1:1-5:6	翟文进编	1-3S,5S,8S,10S,11S,同12S-1	a	S18+S10
△36	宋雍熙三年	丙戌	986	P3403(全)	全年	安彦存编	2S,6S,7S,12S-1	a	F19+S11
37	宋端拱二年	己丑	989	S3985(残)	只留标题			a	
38	宋端拱二年	己丑	989	P2705(残)	10:18-12:29		11S,12S+1	c+d+e+f	F20+S31
△39	宋淳化四年	癸巳	993	P3507(残)	1:1-3:23		R+1,4S-1,8S,10S,11S,同11S,12S+1	a	F21+S12

·后梁于贞明七年五月朔已改年号为龙德,所谓贞明八年即龙德二年,敦煌与中原交通不便,不知梁已改元,仍用贞明。

·此件为双栏书写,现仅存上半部分。



【注释】

[1] 陈久金、陈美东《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文物》1974年3期，59~68页。

[2] 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考古学报》，1965年2期，103~149页。

[3] E. Chavanes: Documents Chinoiseses Decouvertes Par A. Stein, Paris, 1913.

[4] 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东方杂志》，1937年三十四卷九期，13~20页。

[5] 数内清《斯坦因敦煌文献中的历书》，《东方学报》（京都版），1964年，第35期，543~549页。又见《中国的天文历法》第192~201页，东京平凡社，1969年。

[6] 藤枝晃《敦煌历日谱》，《东方学报》（京都版），1973年，第45期，377~441页。

[7] 施萍婷《敦煌历日研究》，1983年8月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已收入此次会议论文集。

[8] 张培瑜等《古代历注简论》，《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1期，101~108页。

[9] 《后汉书》卷59《张衡传》。

[10]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37~439页，三联书店，1957年。

[11] E. Chavanes and P. Pelliot: 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e en China, Journal Asiatique; II èvie, t1, P.162, 1913.

[12] Ho Peng Yoke: 《Li, Qi and Shu》（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 16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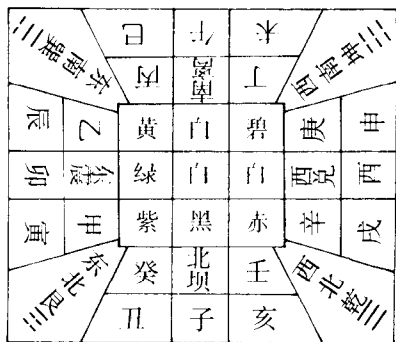
（与席泽宗先生合撰。原载《中国历史博物馆
馆刊》总第12期，1989年，12~22页）

敦煌历日中的“年神方位图”及其功能

大约从唐末五代时起,一种被称作“年神方位图”的图形出现在敦煌历日之中,而为此前的历日所未见。此种图形一直为宋元明清历日所使用,以至港台地区现行民用通书也还有其孑遗。就现有材料看,肇发其端者,便是敦煌历日。因此有必要对其构成和功能作以探讨。

我们未从敦煌历日中直接看到此类图形的名称。现在所以名之曰“年神方位图”，是因同类图形在清代历日中仍有其名，如《大清乾隆六十年岁次乙卯（1795）时宪书》称作“年神方位之图”^[1]，正可作为我们给以确切定名的依据。

下面以 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的“年神方位图”为例给予解读。





此图共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中间九格填以“黄”、“白”、“碧”、“绿”、“赤”、“紫”、“黑”等表示颜色的字，是表示此年的年九宫图；九宫图以外的部分是方位系统。

九宫图最初是以从一到九的数字来表示的。到了唐代，才有人将数字换成颜色，即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九宫图共有九幅^[2]，按照一定的规则编入各年。而每年究竟用九幅图中的哪一幅，则由其中宫数字来确定。术数家们曾规定，以隋仁寿四年甲子岁（604）为一宫，此后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次序，反复将九宫图配入各年。由于有此规定，我们便可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求得任何一个公元年代应配入的年九宫图形。如：

$$(986 - 604) \div 9 = 42 \cdots \cdots \text{余 } 4$$

也就是说，由公元 605 年起，至宋雍熙三年，九宫图已配入 42 个整周期，第 43 个周期的此年应配入由 9 到 1 的第四位数，即六宫图形。此图恰是六宫居中，与计算结果相合。

如果从术数家的角度看，我们也可用同一公式求出公元 1996 年的九宫图形：

$$(1996 - 604) \div 9 = 154 \cdots \cdots \text{余 } 6$$

从 9 到 1 的第六位数是四，即 1996 年用四宫图形，港台现行民用通书正是如此。

上述公式的核心是找到那个准确的余数，然后再从 9 倒数过来，便可求得年九宫图形（无余数的年份用一宫图形）。现存敦煌历日的年代虽很少连续性，但由于掌握了上述公式，任何一年该用什么图形都可迅速地推求出来，其图形本身的神秘性也就不攻自破了。

如果说九宫图形因用九幅图形循环配入各年而有周期性的变化，那么，此“年神方位图”的方位系统却是固定不变的。

我们首先看到，九宫图之外即有“东”、“南”、“西”、“北”



的方位字，而且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现代地图方向完全相反。其所以如此，是因中国古代皇帝坐朝时是面南而坐，自然是左东、右西、前南、后北，画在平面图上也就是左东、右西、上南、下北了。而现代地图是以北极点为中心的，画图时面北背南，平面图的方向正好反过来。这个基本方位概念十分重要，否则在阅读古书或出土文献时就易产生混乱。从传统天文学的角度看，此图南北向（上下）是子午线，东西向（左右）是卯酉线，图上用地支表示方位的字也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此图的四角有“西北乾”、“西南坤”、“东南巽”和“东北艮”以及各自相应的八卦符号。这是表示“四维”（四隅）方向的。有了四向（东南西北）和四维，基本方位系统（四方、四维）便可确定下来。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北”下有“坎”字，“东”下有“震”字，“南”下有“离”字，“西”下有“兑”字。八卦中的这四个字在此与子、卯、午、酉所在方位重合。严格说来，它们只表示东西南北在八卦图中的位置，而不确指方位^[3]。因此，一般在观看和使用此类图形时，注意到表示四维的四个八卦字（乾、坤、巽、艮）也就够了。

再次，在四方、四维的基本方向确定之后，更细的方位则是用天干和地支表示的。但天干中只用了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个字，而未用戊和己。其所以如此，概因戊、己居中宫（中央）位置。虽然图上未显示出戊、己二字，但“戊、己居中宫”则是确定无疑的。换言之，在涉及中央方位时，我们应知道，那里就是戊、己的位置。

图上最外一圈字是用十二地支表示的方位，其中子、卯、午、酉正好在北、东、南、西的位置。

概括地说，“年神方位图”的方位系统共含二十四个方位，即：十二地支十二个，八卦四个和天干八个，各自的具体位置如图所示。如果再同五行相配，就会产生出一些很自然的说法，如



“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中央戊己土”。这些话在秦汉简牍和魏晋镇墓类文字中都是屡见不鲜的，并不陌生。

“年神方位图”的构成如上所述。它在历日中的功能又是什么呢？我们仍以 P. 3403 之宋代敦煌历日为例，逐项予以说明。

（一）与年神的配合使用

既名之曰“年神方位图”，则此图的方位系统必须同年神相配才能使用。历日序云：“凡人年内造作，举动百事，先须看太岁及己下诸神将并魁罡，犯之凶，避之吉。今年太岁在丙戌，大将军在午，太阴在申，岁刑在未……”共列出三十一个年神的名称及其各自所在方位，只有结合“年神方位图”才能读懂。这些年神在这一年中的方位，是由其纪年地支“戌”来决定的。纪年地支一变化，它们各自的方位即发生变化，详参拙作《敦煌古历从识》^[4]一文所附之“年神方位表”，这里不赘。至于这些年神的各自含义，古代术数类著作亦有解释。如对于“黄幡”的解释，《协纪辨方书》引《乾坤宝典》曰：“黄幡者，旌旗也。常居三合墓辰。所理之地不可开门、取土、嫁娶、纳财、市买及有造作，犯之者主有损亡。”^[5]“戌”年黄幡在戌位（图上西偏北），自然那里不宜兴作，否则是会有“损亡”的。术数家作如是说，信不信则是读者自己的事了（下同）。

（二）与太岁、将军同游日的配合使用

太岁和将军（又名大将军）是术数家心目中的二大煞神，威力无比，故不可触犯。《神枢经》曰：“太岁，人君之象，率领诸神，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总成岁功……若国家巡狩省方、出师略地、营造宫阙、开拓封疆，不可向之；黎庶修营宅舍、筑垒墙垣，并须回避。”^[6]“大将军者，岁之大将也，统御威武，总领战伐。若国家命将出师、攻城、战阵，则宜背之，凡兴造皆不可犯。”^[7]因此，历日先作如下规定：“太岁、将军同游日：甲子日



东游，癸巳日还；丙子日南游，辛巳日还；庚子日西游，乙巳日还；壬子日北游，丁巳日还；戊子日中游，癸巳日还。”即在五方各游五日，然后还位。历日接着十分吓人地说：“犯太岁妨家长，犯太阴害家母，犯将军煞男女。太岁所游不在之日，修营无妨。”依照上述规定，一个甲子 60 天中，有 25 天属于太岁将军同游日，所游之方要格外小心。但若问为何是“甲子日东游”呢？原因是“甲”在东方（“东方甲乙木”），故从甲子日起游东方。同样，“戊子日中游”，也是因“戊”居中央位（“中央戊己土”）也。这颇带有文字游戏的色彩。而就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来说，它也是同方位系统配合使用的。

（三）九方色与方位选择

图中表示九宫的七种颜色也有吉凶之分。历日云：“九方色之中，但依紫、白二方修造法，出贵子，加官晋职，横得财物，婚嫁酒食，所作通达，合家吉庆。”接着又用诗歌（名曰“三白诗”）的形式将各色吉凶加以总括：“上利兴功紫白方，碧绿之地患痢疮。黄赤之方遭疾病，黑方动土主凶丧。五姓但能依此用，一年之内乐堂堂。”我们知道，九方色中白色用三次，紫色用一次，合共四次，指示四个方位，是为吉色方位，其余碧、绿、黄、赤、黑五色均为凶色方位，人们可以活动的范围岂不太狭窄了吗？又因九宫图有九幅，九年中每年不同，故要求每年注意朝紫、白二方兴作。恐怕也都是无稽之谈。

（四）与天道行向的配合使用

繁本敦煌历日在进入各月之后，都要在月序中说明“天道行向”。所谓“天道”，《乾坤宝典》曰：“天道者，天之元阳顺理之方也。其地宜兴举众务，向之上吉。”^[8]《考原》曰：“天道者，天德所在之方也。”^[9]换言之，天道所行之方，也就是天德所在之方。术数家的意思是要求人们“顺天行事”。比如，雍熙三年历日正月月序云：“天道南行，宜向南行，宜修南方。”为何正月



天道南行？因正月“天德在丁”；天干丁所示方位，恰在“年神方位图”的南方（“南方丙丁火”）。可见，天道所行方向是由天德所在方位决定的。下面将此历各月天德和天道行向抄录如下：

正月，天德在丁，天道南行；
二月，天德在坤，天道西南行；
三月，天德在壬，天道北行；
四月，天德在辛，天道西行；
五月，天德在乾，天道西北行；
六月，天德在甲，天道东行；
七月，天德在癸，天道北行；
八月，天德在艮，天道东北行；
九月，天德在丙，天道南行；
十月，天德在乙，天道东行；
十一月，天德在巽，天道东南行；
十二月，天德在庚，天道西行。

与“年神方位图”对照，天道所行之方，全是天德所在之方，二者无不相合。因此，只要熟悉该图的方位系统，随便说出天德所在之方，就能立即说出天道行向，反过来也是一样。

（五）与月德、月德合的配合使用

历日各月月序在“天道”、“天德”项后，又有“月德”、“月德合”二项。如该历正月月序又云：“月德在丙，合德在辛（小注：丙、辛上取土及宜修造吉）。”所谓“月德”，《天宝历》曰：“月德者，月之德神也。取土、修营宜向其方，宴乐、上官利用其日。”^[10]所谓“月德合”，《五行论》曰：“月德合者，五行之精符会为合也。所理之地众恶皆消，所值之日百福并集，利以出师命将、上册受封、祠祀星辰、营建宫室。”^[11]可见月德、月德



合所在方位均是吉地，故宜于“取土及宜修造”。现将此历各月月德、月德合及宜取土、修造方位抄录如下：

正月，月德在丙，合德在辛，丙、辛上取土及宜修造吉。

二月，月德在甲，合德在己，甲、己上取土及宜修造吉。

三月，月德在壬，合德在丁，丁、壬上取土及宜修造吉。

四月，月德在庚，合德在乙，乙、庚上取土及宜修造吉。

五月，月德在丙，合德在辛，丙、辛上取土及宜修造吉。

六月，月德在甲，合德在己，甲、己上取土及宜修造吉。

七月，月德在壬，合德在丁，丁、壬上取土及宜修造吉。

八月，月德在庚，合德在乙，乙、庚上取土及宜修造吉。

九月，月德在丙，合德在辛，丙、辛上取土及宜修造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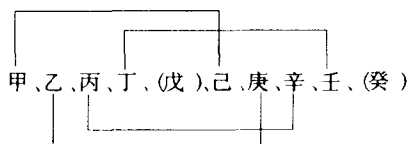
十月，月德在甲，合德在己，甲、己上取土及宜修造吉。

十一月，月德在壬，合德在丁，丁、壬上取土及宜修造吉。

十二月，月德在庚，合德在乙，乙、庚上取土及宜修造吉。



我们注意到，月德、月德合只使用了天干中的八个，而不用戊、癸。对此，术数家有其解释^[12]，这里不赘。更需注意的是，什么样的月德配什么样的合德，有着固定搭配关系。可图示如下：



可见，一个月德所配之合德，便是其天干后的第四位（不计戊、癸），甲同己、丁同壬、乙同庚、丙同辛之间都存在这种关系，怎能不说这是一种有趣的游戏呢？自然，各月中的“月德”和“合德”之吉地，也只有使用“年神方位图”才能迅速找到。

（六）与日出、日入方位的配合使用

如果说前述“年神方位图”的各项用途带有很浓的迷信色彩，那么它用以指示日出日入方位，则是完全科学的。历日各月月序均指出日出日入方位，具体是：

月份	日出方位	日入方位
正月	乙	庚
二月	卯	酉
三月	甲	申（辛）
四月	寅	戌
五月	艮	乾
六月	寅	戌
七月	甲	辛
八月	卯	酉



九月	乙	庚
十月	辰	申
十一月	巽	坤
十二月	辰	申

首先，各月的日出日入方位在“年神方位图”上全是东西向的，这是古人对太阳“东升西落”的直觉（即视运动）。因为那时人们尚无太阳不动、地球由西向东自转并围绕太阳公转的科学认识，仅凭直觉看到各月太阳升落位置在循环变化。其次，这里的月份是“星命月”而非历法月。如正月是指从立春正月节到惊蛰二月节的前一日，二月指惊蛰二月节到清明三月节的前一日，如此等等。由于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运行设计的，所以使用“星命月”就更接近实际天象。

再者，太阳在二月和八月均是“出卯入酉”。因二月中气为春分，八月中气为秋分，太阳出入正当赤道，故在“年神方位图”上经过卯酉线。太阳在五月“出艮入乾”，该月中气为夏至，在“年神方位图”上是最北边。十一月太阳“出巽入坤”，该月中气是冬至，在“年神方位图”上是最南边。十二月至五月日出方位逐渐北移，六月至十一月逐渐南移，完全符合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太阳运行的实际感觉。因此我们认为，“年神方位图”的这项用途是完全科学的。

以上我们对敦煌历日“年神方位图”的构成和功能做了解读和考察。不难看出，无论是其构成，还是具体运用，都是科学同迷信相混杂。尤其是其中的术数文化内容，如不解读，也就无法读懂历日。因而，我们的任务不是宣扬迷信，而是要澄清其本来面目从而加以破除。不加澄清的所谓“破除”，恐怕只能是一句空话。



【注释】

[1] 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16~1619页。

[2] 见施萍婷《敦煌历日研究》，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7页；同注[1]，第1659页。

[3] 参见《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所收清代《协记辨方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20页。

[4] 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1期，第107~118页。

[5] 《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第155页。

[6] 《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第146页。

[7] 《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第148页。

[8] 《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第198页。

[9] 《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第198页。

[10] 《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第200页。

[11] 《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第202页。

[12] 《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第202页。

(原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254~259页)

重新面世的敦煌 写本《大历序》

1944年，向达先生在《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1]一文中曾提及：

余在敦煌见一石室卷子，一面为《毛诗诂训传》卷十六《大雅文王之什》，背面书《逆刺占》，为奉达书。末记云：“于时天复贰载岁在壬戌四月丁丑朔七日，河西敦煌郡州学上足子弟翟再温记。”姓名旁注曰，“再温字奉达也”。奉达为历学世家，其所纂历今残存五种，俱题曰奉达，无作再温者，疑其后即以字行也。奉达所纂有天成三年戊子岁《具注历日》一卷，序文尚残存少许，即粘于《逆刺占》卷首，题：“随军参谋翟奉达撰。”^[2]

向先生著录的翟奉达撰《后唐天成三年戊子岁（928）具注历日一卷》之序文，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学者们再无缘目睹。1985年，我在同席泽宗教授合写的《敦煌残历定年》^[3]一文的《敦煌历书年表》第25项，所列《后唐天成三年历》，依据便是上引向先生的著录。20世纪80年代，我在撰写《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一书时，因不知原件下落，也看不到照片，故无从校理。1992年9月下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北京房山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曾组织与会学者到北京图书馆参观敦煌文献，终于看到这件与世人久未谋面的历日序，编号为“北图新



〇八三六”（今又统编为“BD14636”号）。欣喜之情，无从言表，反复审览，随手笔录。现将其原文校录于后，并略申管见，以饯同好及敦煌学界同仁。

1 大历序

2 唐天成三年戊子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随军参谋翟奉达撰上，
干土支水纳音火。

凡三百八十□^①日。

3 夫^②历日者，是阴阳之纲纪，造化之根源。元块未分，混为一气。

4 玄^③黄乃判，故立二仪。然则昼见金乌，宵呈玉兔，阴阳有序，

5 昏晓^④无亏。廿四气成规，七十二候方列。运移寒暑，宜辩（辨）

6 吉^⑤凶。日往月来，须明祸福。今故注一年之善恶□□□□。

7 终篇并列于卷也。今年太岁在子（下残）。

以下三行原书于“大历序”三字下的空白处：

1 （前残）先申日也。祭^⑥川原，谷雨前后吉日也。启源（原）祭^⑦，獭祭鱼前后开。

2 三伏：夏至后第三庚，初；大暑后一庚，中^⑧；立秋后一庚，后也。

3 腊近大寒前后辰日，亦曰冬至后三辰。

〔校记〕

①“十”下原有一字，墨重不清，难于辨识。

②夫：原残，参 S.95 翟奉达撰《后周显德三年丙辰岁具注历日并序》补。

③玄：原残，据文义补。



④昏晓：原残，参 P.2623 翟奉达撰《后周显德六年己未岁具注历日并序》“昏晓无亏”句例补。

⑤吉：原残，据文义补。

⑥祭：原无，参 S.1473《宋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具注历日并序》、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并序》补。

⑦祭：原无，补据同⑥。

⑧大暑后一度，中：传统历书认为中伏在夏至后第四庚日，详见正文。

撰历者翟奉达，乃五代时敦煌地区一知名文人。他所属的翟氏家族依郡望称作“浔阳翟氏”。这一望族屡见于敦煌石室所出谱学资料^[4]。以石窟而论，莫高窟第 220 窟是初唐所开的翟家窟，翟奉达曾重修此窟甬道北壁，并画“新样”《文殊变》一铺供养^[5]。职是之故，生活于地方豪强家族的翟奉达，自小便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此其一。其二，翟奉达所以能成为五代敦煌地区的历学名家，同他个人的兴趣不无关系。前引向达先生著录，翟再温（即奉达）在抄写《逆刺占一卷》时，还是州学生，时在天复二年（902），显示出他本人自幼即对术数、天文、律历之学有浓厚兴趣。正是优越的家庭条件同个人兴趣的结合，成就了这位撰历者。

在已知 50 余件敦煌历日文献中，明确记载为翟奉达编纂者有 5 份，依次是：后唐同光二年（924）历，后唐同光四年（926）历，后唐天成三年（928）历，后周显德三年（956）历，后周显德六年（959）历。此外，P.3555 背《后梁贞明八年壬午岁（922）具注历日一卷并序》，撰者题名仅存“节度押衙”四字，其余残失。但同光二年历撰者是“〔押〕衙守随军参谋翟奉达”，同光四年历题名是“随军参谋翟奉达”。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贞明八年历也是翟奉达撰修的。如果推断不谬，则现存五十



余件敦煌历日文献中就有 6 件为翟奉达所修成。诚然，他实际撰成的历日绝非这 6 件，至少从公元 924 年到公元 959 年的 36 年中，似乎他一直担负着修撰历日的任务。

翟奉达所修历日多题“撰上”，应予注意。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历日颁行区域是国家权力的标志之一，因此封建国家对制历一直保持垄断权，擅制历书要被斩首。尽管在唐末五代纷乱时期，地方如成都出现了私历，像敦煌文献中的“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长安“上都东市大刁家历日”等，但翟奉达所修历日却是为归义军政权服务的。所谓“撰”，是说明他是作者；所谓“上”，即上呈归义军节度使衙。节度使衙将翟奉达撰成的历日颁发到民间行用，其地方政权的权力亦从一个方面得以体现。这同翟奉达的身分相一致，因为他本人便是归义军权力结构中的一分子。

从该年历日序“凡三百八十□日”一语可知，敦煌历后唐天成三年有闰月。因农历平年一般仅三百五十余日。同年中原历闰八月。根据对敦煌历日闰月的考察，敦煌历同中原历闰月或在同月（极少），或有一两月之差。因此，后唐天成三年敦煌历闰月亦应在八月前后。但从敦煌写本中尚未见到该年闰月的直接材料，故其准确闰月仍有待深究。

所谓“大历序”，在敦煌历日中仅此一见，此前尚未见到。仔细观察，“大历序”三字及此历日序言的笔迹，同翟奉达抄写的《逆刺占一卷》字迹差异极大，因此我怀疑现存内容并非翟奉达的手笔，而是他人所抄。抄写者并未准备将全年历日抄写一遍，仅打算抄其序言部分，故在其前题作“大历序”。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

“大历序”三字下的三行字，不属于历日序内容，而是部分历日项目在历日中的安排方法，各专门名称在敦煌历日中屡次看到。这里着重讨论一下中伏的安排问题。我国传统历日中的三



伏，用以标示一年中最热的天气，唐以后一般以夏至后第三庚日为初伏，第四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庚日为后伏或末伏。但本件却记为“大暑后一庚，中”，即大暑后的第一个庚日为中伏，与传统历书不同。唐五代时我国历书仍用平气，每二节气间隔时间为 15. 218425 日。夏至为五月中气，小暑为六月节气，大暑为六月中气。自夏至到大暑的时间间隔为： $15. 218425 \text{ 日} \times 2 = 30. 43685 \text{ 日}$ ，差不多 30 天半。而天干中的两个庚日间距为 10 天。如果夏至所在的那天是庚日，则第三庚在其后 20 天，第四庚日在其后 30 天，时在大暑前或与大暑同日，而非大暑后也。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八年具注历日》即属此类。该历夏至在五月八日庚申，第二庚日在五月十八日庚午，第三庚日在五月二十八日庚辰，为初伏日。因五月是小月，第四庚日在六月初九，为中伏日，大暑亦在同日^[6]，而不在大暑后。正因有此情况，传统历日定中伏在夏至后第四庚日，而不说在“大暑后一庚”。由此可知，此件所记“大暑后一庚，中（伏）”的表述是不准确的。这是翟奉达早期所撰历日，其对中伏的表述仍不免有些稚拙。

【注释】

[1] 原载《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五卷第四期，1~11 页，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29~442 页，三联书店，1957 年。

[2] 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37~438 页。

[3] 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 12 期，1989 年，12~22 页。

[4] 参王仲荦《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第三辑，8~19 页。

[5]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220 页。

[6] 参拙作《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八年具注历日〉释文补正》，载《文物》1992 年 6 期。

（原载香港《九州学刊》6 卷 4 期，
第 155~158 页，1995 年 3 月）

关于敦煌历日研究 的几点意见

敦煌历日文献现知只有五十余件，在全部五万余号敦煌文献中不啻九牛一毛。但历日却是科技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敦煌历日文献的四分之三是残篇，无明确纪年，研究起来并非易事。令人欣慰的是，中外学者多倾力攻关，对敦煌历日研究已取得高水平的成果。中外学人的贡献有迹可寻，这里不一一胪列。

近年来，刘操南先生已发表两篇研究敦煌历日的文章。一篇题为《敦煌问世历日辨析——冥志室札记之一》^[1]。另一篇题为《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残历读记》^[2]（以下将两文分别简称为《辨析》和《读记》）。我未有幸同刘先生谋面，但从行文语气看，应是一位年事较高的老先生，且国学功底极为深厚。对于敦煌历日，先生也十分关心并用功研讨。数年前，我在读过《辨析》一文的当日，即向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一位同仁寄去一信，希望向刘先生转达我对《辨析》一文的一点意见，也不知老先生看到否？今读《读记》一文，又有一些看法。作为后学，我十分踌躇。但思忖再三，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惟有切磋，才能推进学术事业，故草此小文，以与刘先生商榷并请教。

先谈对《辨析》一文的两点意见。刘先生文中说：“刘复《敦煌掇琐》中之大唐同光四年具历（笔者按，当补为‘具注历’），与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之后唐天成元年残历，原为一卷，分裂为二，惜时贤未之察也。”接着分析了两残



历破裂处的拼合关系。之后，先生慨叹道：“千年神物，虽有离立，若有呵护，今得若合符节矣。”刘复《敦煌掇琐》中之“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就是现在编为 P. 3247 背面的那件；罗振玉《丛残》中的那件，通常编为罗 1 号。两件本为一历，割裂为二。但二者的拼合连缀关系，王重民先生早在 1937 年就已发现。王重民先生曾写有《敦煌本历日之研究》一文，原载《东方杂志》34 卷 9 期，发表于 1937 年 5 月。1984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已将此文收入。其论述两残历连缀关系的文字，见于该书第 122 页“论据五代北宋历不能推敦煌历”一节。1979 年，中华书局新版王重民先生的《敦煌古籍叙录》，在该书第 161 页上对两残历的拼合关系有更加明确的叙述。《东方杂志》今日不易查找，王重民先生的这两本文集容易见到。

刘先生又说：“《丛残》原题‘后晋天福十一年’。历书二月朔丁巳，当为天福十二年；罗氏博学审问，盖失之眉睫间耳。”刘先生这里所说罗振玉《丛残》中的另一件历，通常编为罗 3 号。罗氏当年考订敦煌历日年代时，因未弄懂敦煌残历的断年方法，仅以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与之对照，故时有错误。他将此残历定为“后晋天福十一年”，固属错误，但刘先生定为“天福十二年”同样不确。如同罗振玉不懂敦煌残历的定年方法一样，刘先生也是与《历代长术辑要》进行简单对照的。这件历日的正确年代是唐大顺元年（890），日人藤枝晃在 1973 年发表的《敦煌历日谱》一文中已纠正了罗氏之误^[3]。1983 年，施萍婷先生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敦煌历日研究》一文中也讨论过这件历日^[4]，定年与藤枝晃同。席泽宗先生和我合撰的《敦煌残历定年》表七“敦煌历书年表”中也列有这件历日^[5]，定年亦在大顺元年，均可参阅。

次谈《读记》一文。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公布了他手中所藏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两历日的录文，并加以考订，实是



敦煌历日研究中的一件幸事。这份历日原件下落至今不明。我在写作《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一书时，也未见到原件。1985年初，我到敦煌莫高窟工作，李永宁先生知我正在研读敦煌历日，遂将台湾学者苏莹辉先生《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一文复印赠我。此后我就是以这篇文章中的录文为依据进行工作的。现在见到刘先生的抄本，虽非原物，但也十分快意，因为毕竟有了两个抄本可以进行比较。据苏文介绍，他的写本“系友人董君（董作宾）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冬得之于敦煌市廛”，至“三十七年（1948）秋，董君自杭垣以此历抄本寄示，并嘱为考证发表”。苏氏做了简单的考证，并将录文公布，原文载台湾《大陆杂志》1卷9期，后收入苏著《敦煌论集》第305至308页，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出版。但据刘操南先生《读记》介绍，他的抄本则是“1943年西安李俨乐知先生悉余之好历算也，书以递示，余移录之，而奉赵焉”。这就是说，1943年时，此北魏历日已有抄本，而1944年时原件落入董作宾之手，后去向不明。董作宾寄赠此历予苏莹辉先生是在1948年，而刘操南先生的抄本得之于1943年，比苏抄本早5年，应当更加珍贵。将两位先生公布的抄本加以比较，发现仅是个别文字的差别。问题却在于这两篇文章都有考订，但错误之处却不在少数，今综合分析各自得失如后。

（一）原件题“太平真君十一年历”，为刘抄本，而苏抄本却少一“年”字，可据刘抄本补。

（二）“大阴大将军”。两抄本同。刘注：“原有缺损。”按：此句确有缺字。太平真君十一年干支为庚寅，寅年太阴、大将军均在“子”。古语大、太通用，大阴即太阴，故当补足为“大阴、大将军〔在子〕”。参前引《敦煌残历定年》之表五。

（三）“四月小一日辛卯开”。此为刘抄本，而苏抄本“开”字作“用”。无论作“开”或“用”均是错误的。历日中纪日干



支后的这个字属于建除十二客的内容。建除十二客共 12 个字：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各主一定吉凶。其在历日中的排列特点有三：一是依星命月份而不依历日月份。星命月份是从立春正月节那天开始为正月，从惊蛰二月节那天开始为二月，以此类推，即均以节气所在之日为一星命月之始。二是从立春正月节后的第一个“寅”日开始注“建”字，逐日顺序下排。三是凡节气（非中气）所在之日的建除十二客必须重复前日的建除十二客一次。由于纪日地支与建除十二客均是 12 个字，又使用了节气之日重复建除十二客一次的方法，由此形成了各星命月份中建除十二客同纪日地支间的固定对应关系。从地下出土材料看，这种对应关系至晚在战国时即已形成。我在《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6]和《敦煌古历丛识》^[7]两文中均有论述。在讨论天水放马滩秦简的那篇文章中，我曾给出一个二者对应关系表，应该说是有用的。凡遇此类问题，只要用这个表进行对照，就能立即准确判断其正误，学者们不妨一试。对于太平真君历日中的这个字，用此表检查，发现应用“闭”字。因为历口虽是“四月一日辛卯”，但星命月却在清明三月节与立夏四月节之间，故应以星命三月中卯日与建除十二客的对应关系去检查。抄本作“开”、“用”二字均误，概因其繁体与“闭”字繁体近似而致误。

（四）“七〔月〕大”。刘抄本注：“月字原缺”，但苏抄本却有“月”字，是其差别。

（五）“闰〔月〕大一日己丑执”。刘抄本注：“闰字已蚀。”但苏抄本有“闰”字。“月”字刘抄本为补字，苏抄本原有，是其不同。又，关于此闰月之大小，刘抄本为大月，苏抄本为小月。按：此闰七月朔日为“己丑”，下月即八月朔日为“戊午”。由两个朔日干支的日期关系，一望便知是小月而非大月，故刘抄本误。



(六) 十月“四月小雪”。苏抄本“月”作“日”，是，刘抄本可能是排字错误或笔误。

(七) “十一月小一日丁亥开”。“开”字苏抄本又作“用”，同误。此十一月朔日在星命月份之十一月，亥日对应的建除十二客只能是“闭”，详见上文之（三）项。

(八) 十二月之“三日臈”。苏抄本作“十三日腊”。按：十二月朔日为丙辰，三日干支为戊午，十三日干支为戊辰。《初学记》卷四《腊第十三》记“魏辰、晋丑”，即腊祭魏在辰日，晋在丑日。此魏为三国魏而非北魏。但北魏既以魏为国名，其腊祭亦应在辰日。《旧唐书·礼仪四》：“季冬……辰日腊享于太庙。”可知刘抄本之“三日”当为“十三日”之误，脱“十”字。至于“臈”、“腊”二字，本可互通，但为何同一写本历日却有两种字体？孰是孰非，今尚难定。

以下讨论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

(九) “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其年改为正平元年”。刘注：“其年八字，原为旁行，疑为增入。”苏抄本无此八字，可证确为后人增入。

(十) “大将军在卯”。二抄本同。按，太平真君十二年干支为辛卯，卯年大将军当在“子”。参拙作《敦煌古历丛识》之“年神方位表”。

(十一) 正月“二日始祈”。刘注：“始祈二字，原迹不清。”苏抄本作“二日始耕。”两抄本释文均误。按：正月朔日丙戌，二日则为丁亥。《魏书》卷2《太祖记》载，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三年……二月丁亥，诏有司祀日于东郊，始耕籍田”。《旧唐书·礼仪四》：“孟春吉亥，祭帝社于籍田，天子亲耕。”中古时代籍田礼多于亥日举行。至于始耕是籍田的同义语，可参拙作《敦煌古历丛识》之“始耕即籍田”一节。

(十二) 正月“廿一日惊蛰”。苏抄本作“廿一日惊蛰二月



节”。依此太平真君十一、十二两年历例，凡节气之日均注全名，中气则注简称，而惟独刘抄本脱“二月节”三字，当以苏抄本为是。

（十三）“二月大一日乙卯建”。“建”字苏抄本作“黑”。按，此星命月份中二月卯日与建相对应，不误。但同一写本，为何一抄为“建”，一却作“黑”？我们知道，北魏“昭成皇帝讳什翼犍”^[8]，犍与建同音。北魏王室虽出自北方拓跋鲜卑族，但后来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亦行避讳制度（详下文），故改“建”为“黑”，当是因避什翼犍名讳所致。可是十一年历中“七月大一日己未建”，建字未改，或许是失检造成？我意当以苏抄本为是。

（十四）“七月大一日水未开。”刘注：“癸作水，疑避拓跋（跋）珪讳。”北魏避讳改天干癸为水，详拙作《敦煌古历丛识》之“北魏避讳改干支”一节，不必疑。“开”字苏抄本作“用”，同误，当作“闭”，详上文（三）项。

（十五）八月“十六日社会乙廿七日寒露九月节”。刘注：“会下乙，月下节，俱书在旁，为原补字。”“会乙”二字，苏抄本作“念月”。二本均未得通解，望有识者指教。

（十六）十一月“十五日冬”。苏抄本作“十五日冬至”。依本历例，“冬”后当有“至”字，以苏抄本为是。抑或“至”字是排字脱漏。

（十七）十二月“十六日大寒”。“大寒”苏抄本为“大腊”。按，大寒为十二月中气，刘抄本是，苏抄本误。

（十八）十二月“十八日臈”。“臈”字苏抄本作“腊”，二字字体不同，详上文（八）项。

（十九）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日后刘考：“元嘉历闰十月，朔丁巳，八月己丑，九月戊午，十月戊子。”是。但在文末却将“八月己丑”书成“八日朔乙丑”。是排字错误，还是原稿笔误？

以上就刘、苏两抄本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日之异



同及正误逐条予以辨析。虽说刘抄本的面世使我兴奋异常，但仍以未能得睹原写本或其照片为憾事。但望天下公私有知其下落者赐告笔者，以便对这件历日的研究能更深入一步。

本文提出的问题也说明，我们在某些方面确实应当引起注意。那就是要尽可能地搜集已有的研究成果，吸取精华，摒弃谬说，才有可能使研究工作深入。国内学人因受各种条件限制，对海外信息不太灵通，故而常有炒冷饭之嫌，以致重复前人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谅解。但有些书，尤其是新出的书，常常就在手边，不需花太大的力气就能找到，我们还是尽力搜求为好。我不敢以此责难刘操南老先生，因为自己学识溷陋，也常常不免失之交臂。所以将这番心里话抖出，也只是希望各位同仁共勉而已。

【注释】

- [1] 载《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 [2] 载《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
- [3] 载《东方学报》（京都版）第45册，见399~400页。
- [4] 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5] 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2期，1989年。
- [6] 载《文物》1990年第9期。
- [7] 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 [8] 《魏书·序记第一》。

（原载《敦煌研究》1993年1期，第69~72页）

【附记】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已于1997年由日本返回中国。现存甘肃省敦煌研究院，编号为“敦研〇三六八V”。

敦煌本北魏历日与中国 古代月食预报

在 50 余件敦煌历日文献中,《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历日和十二年(451)历日》是最早的一份,也是现知惟一的北朝历书实物,但原件下落至今不明。1950 年,台湾学者苏莹辉先生在《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1]一文中公布了一个录文;1992 年,祖国大陆学者刘操南先生在《敦煌本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残历读记》^[2]一文中公布了另一个录文。由于近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文献的研究,所以对这方面的新材料十分重视和敏感。两个录文的公布,尤其是刘操南先生新公布的录文,给我的工作提供了诸多方便。同时也发现两种录文均存在错误和不达一间之处。于是,在 1992 年 9 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敦煌所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日抄本合校》的论文,并呼吁:“望天下公私有知其下落者赐告笔者或馈赠照片,以便对这份珍贵的古写本历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的报告甫一结束,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当即表示,他收藏有此历日的复印件,愿意送我研究。本文使用的原始资料就是由池田温先生提供的。在此,我谨向池田温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需要说明的是,据前述苏、刘二先生的录文,此两年历日共有 27 行文字,但现在只能看到前面 24 行,缺尾部 3 行。我曾就此请教过池田温先生。



因他的复印件也是别人赠送的，所以原因尚未查明。

此两年历日抄于《国语》卷三《周语下》韦昭解的背面，纸幅大小未详。正面《国语》文字隶意浓重，带有明显的北朝特征。背面历日近于行书，字迹也带有北朝特征。现据复印件重新释文并校补；对于前述两种录文的错失一并指出，出校记说明。原卷竖写，今改为横书；俗体字一律改为现行标准汉字；为便于省览，每行前加上了行号。

[释文]

1 太平真君十一年^①历 [日]^② [太]^③岁在庚寅 大阴^④
大将军 [在子]^⑤

2 正月大一日壬戌收 九日立春正月节 廿五日雨水

3 二月小一日壬辰满 十日惊蛰^⑥二月节 廿五日春分
廿七日社

4 三月大一日辛酉破 十一日清明三月节 廿六日谷雨

5 四月小一日辛卯闭^⑦ 十二日立夏四月节 廿七日小满

6 五月大一日庚申平 十三日望种^⑧五月节 廿八日夏至

7 六月小一日庚寅成 十四日小暑^⑨六月节 廿九日大暑

8 七 [月]^⑩大一日己未建 十五日立秋七月节 卅日处暑

9 [闰]^⑪月小^⑫一日己丑执 十五日白露八月节

10 八月大一日戊午收 社 二日秋分 十七日寒露九月节

11 九月小一日戊子满 二日霜降 十七日立冬十月节

12 十月大一日丁巳破 四日^⑬小雪 十九日大雪十一月节

13 十一月小一日丁亥闭^⑭ 四日冬至 十九日小寒十二月
节

14 十二月大一日丙辰平 五日大寒 十^⑮三日腊 廿一日
立春正月节

15 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 其年改为正平元年^⑯ 太岁在辛



卯 大将军在卯^{①⑦} 大阴在丑

16 正月小一日丙戌成 二日始耕^{①⑧} 六日雨水 廿一日惊蛰^{①⑨} 二月节^②

17 二月大一日乙卯建^{②①} 四日社 七日春分 十六日月食^{②②} 廿二日清明三月节

18 [三]^{②③}月大一日乙酉执 八日谷雨 廿三日立夏四月节

19 四月小一日乙卯开 八日小满 廿三日望种五月节

20 五月大一日甲申满 十日夏至 廿五日小暑六月节

21 六月小一日甲寅危 十日大暑 廿五日立秋七月节

22 七月大一日水未^{②④}闭^{②⑤} 十一日处暑 廿七日白露八月节

23 八月小一日水丑^{②⑥}定 十二日秋分 十六日社月食^{②⑦} 廿七日寒露九月节

24 九月大一日壬午成 十三日霜降 廿九日立冬十月节

(以下三行据两种录文校补)

25 十月小一日壬子除 十四日小雪 廿九日大雪十一月节

26 十一月大一日辛巳执 十五日冬至^{②⑧} 卅日小寒十二月节

27 十二月小一日辛亥开 十六日大寒^{②⑨} 十八日腊

[校记]

①年：原有，苏抄本脱。

②日：原卷及两种抄本均无，据下文第 15 行“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例补。

③太：原卷及两种抄本均无，据下文第 15 行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之“太岁在辛卯”例补。

④大阴：古历年神多作“太阴”。大、太古语多不分，“大



阴”即“太阴”。下不出校。

⑤在子：两种抄本均无。原卷二字残，但仔细辨认，仍可看出字痕。又，“寅”年太阴、大将军二年神均在“子”位，参拙作《敦煌古历丛识》之“年神方位表”，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在子”二字可确认。

⑥蜚：刘抄本作“蜚”，误。

⑦闭：苏抄本释作“用”，刘抄本释作“开”，且眉批：“开或作用”，均误。参拙作《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载《文物》1990年第9期。

⑧望种：刘抄本眉批：“芒字作望。”按，西北方音中“望”与“芒”音近，故得通借。此点蒙杭州大学黄征、张涌泉二先生见告，谨致谢忱。下不出校。

⑨暑：原字作“𩇛”，即“暑”之俗体，乃北朝写法。参秦公《碑别字新编》引《魏镇北大将军元思墓志》，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42页。下不出校。

⑩月：刘抄本眉批：“月字原缺。”苏抄本有“月”字。按，原无，今据此两年历例补。

⑪闰：刘抄本眉批“闰字已蚀”，是。但将补字符号[]误放在下文“月”字上。苏抄本有“闰”字，今从复印件看已蚀。

⑫小：刘抄本作“大”，误。此闰七月朔日己丑，下月（八月）朔日为戊午，由两月朔日日期关系亦可知当作“闰月小”，原本不误。

⑬日：刘抄本作“月”，误。

⑭闭：刘抄本作“开”，苏抄本作“用”，均误。见校记⑦。

⑮十：刘抄本脱。

⑯其年改为正平元年：刘抄本眉批：“其年八字，原为旁行，疑为增入。”苏抄本无。今从复印件可知，此八字确系增入，且笔迹与原抄本为同一人，刘抄本是。我在《关于敦煌历日研究的



几点意见》(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中说:“苏抄本无此八字,可证确为后人增入。”因未见照片判断失当,今改正。

⑪卯:两种抄本同。按,原卷误。“卯”年大将军在“子”位,参前揭拙作《敦煌古历丛识》之“年神方位表”。此“卯”字系涉上文“太岁在辛卯”句致讹。

⑫始耕:刘抄本作“始祈”,苏抄本作“始耕”,释文均误。参前揭拙作《敦煌古历丛识》之“始耕即籍田”一节。

⑬蜚:刘抄本作“蜚”,误。

⑭二月节:原有,刘抄本脱。

⑮建:刘抄本同,苏抄本作“黑”。我在《关于敦煌历日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认为“苏抄本为是”,并解释为北魏避昭成皇帝什翼犍名讳而改,系判断失当,今改正。

⑯月食:两种抄本均作“月会”,误。“食”字识读,得到祁德贵、王素、苏士澍诸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⑰三:两种抄本均有。复印件上已蚀。

⑱水未:即癸未。“水”系避讳改字。参前揭拙作《敦煌古历丛识》之“北魏避讳改干支”一节。

⑲闭:刘抄本作“开”,苏抄本作“用”,均误。见校记⑦。

⑳水丑:即癸丑。“水”亦避讳改字。见校记⑭。

㉑十六日社月食:刘抄本作“十六日社会乙”,且眉批:“会下乙……书在旁,原为补字。”苏抄本作“十六日社念月”。均误。细审原卷,“十六日社”以下字先写作“食月”,又在右侧加一倒钩符号“乙”,故当读作“月食”。“食”字左下有一污点,或系抄写时不慎点入,造成识读困难。

㉒至:苏抄本有,刘抄本无。按,“冬至”为十一月中气,故苏抄本是。原卷如何,今未得知。

㉓大寒:苏抄本作“大腊”,误。按,“大寒”为十二月中气。原卷如何,今未得知。



跋

以下研究与本太平真君历日相关的四个问题。

（一）此北魏历日的出土地点问题

据苏莹辉先生在《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一文中介绍，原写本于1944年冬由董作宾先生得于敦煌市廛；1948年，董先生将一份抄本寄示苏先生，并嘱其考证发表，从而推测说：“其出处可能与敦煌艺术研究所新发现之写经六十余种同一来源。”而刘操南先生则云：“1943年西安李俨乐知先生悉余之好历算也，书以递示，余移录之，而奉赵焉。”说明至晚在1943年李俨先生就已有此历的抄本。所谓“敦煌艺术研究所新发现之写经六十余种”，就是通常所说的土地庙遗书。而土地庙遗书却是1944年8月30日和31日才被发现的^[3]。如果此历日属于土地庙遗书，断然不可能在1943年时就已有了抄本。由此可以肯定，此北魏太平真君写本历日同出于敦煌莫高窟今编17号窟，即通常所说的“敦煌石室”。后来原件又在社会上辗转流传。

（二）历注中的“社”和“腊”

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日在二月二十七日和八月一日，十二年历日在二月四日和八月十六日均注“社”。“社”即社祭，为祭祀土地神的典礼。十一年二月壬辰朔，二十七日干支为戊午；八月一日干支亦戊午。十二年二月乙卯朔，四日干支戊午；八月水（癸）丑朔，十六日干支为戊辰。可知，此两年历日中四次“社”祭均在“戊”日。我国自汉以后，以立春后第五戊日为春社，以立秋后第五戊日为秋社^[4]。此两年历日中的“社”祭日与此相合不悖。但此前的汉简历日，尚未见以“社”日注历者。以“社”日注历，此北魏历日是现知最早的一份。

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日在十二月十三日，十二年历日在十二月



十八日均注“腊”，即腊祭百神日。两日干支均为戊辰。《初学记》卷四《腊第十三》：“汉以戌日为腊，魏以辰，晋以丑。”即腊祭汉在戌日，魏在辰日，晋在丑日。此“魏”为三国曹魏而非北魏。但北魏既以“魏”为国名，其“腊”祭亦应在“辰”日。《旧唐书·礼仪四》：“季冬（十二月）……辰日腊享于太庙。”唐朝于“辰”日腊祭，沿用的亦是曹魏制度。

（三）北魏太平真君历日的历法依据

《魏书·律历志》载：“太祖天兴初（398）命太史令晁崇修浑仪以观星象，仍用《景初历》。岁年积久，颇以为疏。世祖平凉土（440），得赵馥所修《玄始历》，后谓为密，以代《景初》。”“高宗践祚（452），乃用敦煌赵馥《甲寅》之历。”《魏书》这段记载可能有误。实际上，直到太平真君十二年，北魏仍在《景初历》。现据张培瑜先生据《景初历》术推算此北魏历日的月朔、节气、中气结果如下表：

纪年	月大小	朔日	节气	中气
太平真君十二年	正月大	壬戌	立春庚午	雨水丙戌
	二月小	壬辰	惊蛰辛丑	春分丙辰
	三月大	辛酉	清明辛未	谷雨丙戌
	四月小	辛卯	立夏壬寅	小满丁巳
	五月大	庚申	芒种壬申	夏至丁亥
	六月小	庚寅	小暑癸卯	大暑戊午
	七月大	己未	立秋癸酉	处暑戊子
	闰月小	己丑	白露癸卯	
	八月大	戊午	秋分己未	寒露甲戌
	九月小	戊子	霜降己丑	立冬甲辰
	十月大	丁巳	小雪庚申	大雪乙亥
	十一月小	丁亥	冬至庚寅	小寒乙巳
	十二月大	丙辰	大寒庚申	立春丙子



纪年	月大小	朔日	节气	中气
太平真君十二年	正月小	丙戌	雨水辛卯	惊蛰丙午
	二月大	乙卯	春分辛酉	清明丙子
	三月大	乙酉	谷雨壬辰	立夏丁丑
	四月小	乙卯	小满壬戌	芒种丁丑
	五月大	甲申	夏至癸巳	小暑戊申
	六月小	甲寅	大暑癸亥	立秋戊寅
	七月大	癸未	处暑癸巳	白露己酉
	八月小	癸丑	秋分甲子	寒露己卯
	九月大	壬午	霜降甲午	立冬庚戌
	十月小	壬子	小雪乙丑	大雪庚辰
	十一月大	辛巳	冬至乙未	小寒庚戌
	十二月小	辛亥	大寒丙寅	立春辛巳

1. 此表中的节气、中气栏，因太平真君十一年闰七月，故自该年八月以下，“节气”栏为“中气”，“中气”栏为“节气”。

2. 太平真君十二年十二月小，辛亥朔，二十九日干支为己卯；“立春辛巳”实在次年正月二日。原历中仅有十二月中气大寒，无立春正月节。以此表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日对照，其月序、月大小、朔日干支、闰月位置、中节日序干支等历日事项无一不合^[5]。由此可以确定，此北魏太平真君历日的历法依据是《景初历》。

(四) 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中的两次月食预报

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共提到两次月食。一次在二月十六日庚午，即公元451年4月2日；另一次在八月十六日戊辰，即公元451年9月27日。当我初步认为这是两次月食后，为慎重起见，曾就该年的月食次数、见食范围等天文学问题，请教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教授。张先生在1993年3月10日的回信中



答复说：

这年月食简况如下：公元 451 年总共只有二次月食发生，并且的确都是历书上记载的这两天。（1）451 年 4 月 2 日，月偏食，发生在中午，北京时 12:45 望，食分 0.653，初亏 11:24，食甚 12:53，复圆 14:21。这次月偏食中国全境皆不得见。（2）451 年 9 月 27 日，月偏食，发生在凌晨。北京时 2:35 望，食分 0.814，初亏 1:10，食甚 2:41，复圆 4:13，中国全境皆可见。我认为此历书所注的应是月食预报，不是观测记录。原因有二：（1）4 月 2 日月食，中国绝不可见（因为月亮在地下），故定非月食记录。（2）9 月 27 日月食，中国全境可见。但月食观测记录应记作“9 月 26 日晚四更、五更食”，或“八月十五日晚日加丑月加未食”，不会记作十六日（9 月 27 日）。但预报以历书计算为准，历书是以子夜（夜半）作为日的分界的。这确是一项重要的发现。即使月食预报，丝毫不比月食记录逊色。这反映了我国是时对日月食的认识以及推算的精确程度。您的这一发现，值得庆贺。

张培瑜教授是我国著名历法专家和天文学史学家，享誉国际天文学史学界，他的意见值得重视。上文所引两次月食数据也是他的计算结果。张先生认为这是两次月食预报而非月食记录也完全正确。经核对，我国历史文献中，公元 451 年只有一次月食记录，见于《宋书·律历下》：“〔元嘉〕二十八年（451）八月十五日丁夜月食。”^{〔6〕}这个“八月十五日丁夜”即公历 9 月 26 日夜间 2 时左右。由于记录时间是从天亮到天亮为一天，而预报则以夜半为日的分界，故比预报发生的月食早记一天。这正与前述张培瑜先生的解释相符合。此外，北魏历书上的“月食”若是月食记录，则



该年4月2日的月食也不应在传世文献中无任何记载。现将这两次月食的有关资料绘表如下（望和月食有关数据均为北京时）：

历史纪年	太平真君十二年 二月十六日	太平真君十二年 八月十六日
公元纪年	451年4月2日	451年9月27日
月蚀	月偏食	月偏食
望	12:45'	2:35'
初亏	11:24'	1:10'
蚀甚	12:53'	2:41'
复圆	14:21'	4:13'
蚀分	0.653	0.814
文献记载	无	《宋书·律历下》： “〔元嘉〕二十八年八月 十五日丁夜月食。”

如前所述，此北魏太平真君历日的历法依据是《景初历》。同样，这两次月蚀预报的推算依据也是《景初历》的有关数据。

《景初历》是三国曹魏尚书郎杨伟在东汉末年刘洪《乾象历》基础上创造的，开始行用于曹魏景初元年（237），故名。《景初历》改进了朔望月的数据，以 $365\frac{455}{1843}$ 日为岁实，以 $29\frac{2419}{4559}$ 日为朔策，仍用汉以来的19年7闰法。它的另一特点是，年月日数的分数，虽各以纪法、日法的不同数值，而其他法数，均以日法为分母。刘宋时何承天称《景初历》比《乾象历》优点更多，当是事实。因此，这部历法虽然在曹魏仅行用了28年，但西晋泰始元年（265）改用的《泰始历》，刘宋永初元年（420）改用



的《永初历》，实际都是《景初历》术，北魏使用它直到太平真君十二年。这部历法前后实际行用了215年之久^[7]。

《景初历》更主要的优点是对日月食的预推。推食分多少、日食亏起方位等是其特创^[8]。它以朔望位置在黄白道交点十五度（在赤道上计算）以内为发生交食的必要条件，这同现代日食内限值十分密近。清代阮元在《畴人传》中曾评论说：“至其推交会月食，以去交度十五为法，论亏之多少，以先会后交，先交后会，论亏起角之东西南北，皆密于前术，足以为后世法者也。”^[9]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是《景初历》行用的最后一年，对月食的预报仍然如此准确，确令今人叹服！

敦煌本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上的两次月食预报，为迄今出土的汉简历日和敦煌吐鲁番历日所仅见，也是现知中国最早的月食预报材料，且极为准确，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注释】

[1] 原载台湾《大陆杂志》一卷九期，后收入苏著《敦煌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305~308页。

[2] 载《敦煌研究》1992年1期，43~44页。

[3] 参见李正宇《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载《敦煌研究》1985年3期，92~97页。

[4] 参见陈久金、卢莲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6页。

[5] 见张培瑜《试论新发现的四种古历残卷》，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五集，科学出版社，1989年，104~125页。

[6] 中华书局标点本《宋书》，第310页。

[7] 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444~1445页。

[8] 参见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9页。

[9] 《畴人传》卷五《杨伟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5月重印本，



第1册，第61页。

(原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
献出版社，1996年，第360~372页)

北大图书馆藏两件 敦煌文献补说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组织编辑、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The Corpus of Dunhuang – Turfan Manuscripts）正在将各地藏品陆续印行刊出，嘉惠学林，功莫大焉，为盖世学者有目共睹。同时，由于敦煌吐鲁番文献内容庞杂，门类众多，以及编辑工作方面的一些原因，也还有一些不周乃至错失，需要进行补正，以便修改得更好。

该《集成》以两巨册全部影印刊布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1]。这批藏品绝大多数是首次面世，刊布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我在这里对其中两件给予补说，以便符合其内容实际并增加了解。

一件是“北大 D198”号，题名“具注历”。前些年，张玉范先生在其所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以下简称《遗书目》）中，对此件曾作如下注记：“历书残片。存不规则一片，粗麻纸，高廿二厘米，广约六厘米，凡六行。”^[2]，应该说，确定此件性质为“具注历”是完全正确的。

问题在于，此件早被公布过，其准确年代也已被考知，而《遗书目》和《集成》均未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并加以反映。最早公布此件的是罗振玉。1939年，罗振玉在其晚年，以珂罗版影印刊布了一批敦煌文献，书名《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此件具注历日即被收录其中，后被研究者编为“罗3号”。但罗氏原



题此历为“后晋天福十一年(946)”却是错误的。罗振玉刊布不久,董作宾便提出不同意见。董氏撰有《敦煌写本唐大顺元年残历考》^[3]一文,定为大顺元年(890),比罗氏所定早56年。至1973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发表《敦煌历日谱》^[4],1983年施萍婷先生发表《敦煌历日研究》^[5],均定为大顺元年而无异议。应该说,根据残历所能提供的条件,定在唐大顺元年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此残历惟一正确的年代。

从以上介绍可知,此件题名应作“唐大顺元年(890)具注历日”。若如此,读者便会对其准确年代获得认知。同时,应在书末的“叙录”注明,此件已被罗振玉刊布在《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

另一件是“北大D195V”,亦题名“具注历”。此件是北大图书馆藏品195号背面的内容。张玉范先生曾注记云:“纸背书干支禁忌诀数行。”^[6]如果说这个注记尚未能准确反映此件内容的话,那么,《集成》名之曰“具注历”就失之更远了。

细审此件内容,虽同具注历日有关,但绝非具注历日本身。此件前残,现存部分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残存二行:

1 甲辰乙巳火,丙午丁未水

2 甲寅乙卯木(旁注:天地合),丙辰丁巳土,戊午

从其内容可知,其基本内容是“六甲纳音歌诀”。这个歌诀以六十甲子为基础,编成30句文字,即“甲子乙丑金,丙寅丁卯火,戊辰己巳木,庚午辛未土……”^[7]现存四句半,约当此歌诀的七分之一。又经查对,此件与P. 3984V本为一件,分裂后,其前部现存巴黎,后部存北大图书馆,从书法、内容、裂痕看,完全可以拼合。换言之,此件《六甲纳音歌诀》前部约七分之六的内容在P. 3984V上。另需注意者,文中旁注有“天地合”、“天地离”、“日月合”、“日月离”等内容,仍需我们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逐步加以认识。



第二部分共四行半多一些文字，下部稍残。其内容是 10 个天干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 12 个地支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各自所主的吉凶宜忌。每个干支字下用双行小字加以注释，如“丁”字下注：“不剃头，头多生疮，又不洗头”；“卯”字下注：“不凿井，百泉不通”；“戌”字下注：“不买狗，狗必登（？）床，又不度（？），必有凶亡”；如此等等。现存 20 个干支字中，“戊”有 2 处，而无“己”。其 22 个干支字的排列次序是：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戌、亥。一望便知，它虽解释天干、地支字各自所主吉凶宜忌，但其次序仍以六十甲子表为基础。

我所以说上面这些内容同具注历日有关，是因为它们是历日中一部分术数文化内容的编排依据。“六甲纳音”这部分内容，一般出现在历日序言和全年各日。如 S. 1473《宋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982）具注历日》，历日题名之下就有双行小注：“干水支火纳音木。”此年干支壬午，而壬午纳音木也，故有此注。又，进入历日正文之后，正月“一日癸巳水定”，癸巳纳音为水也。

至于天干、地支字所主吉凶宜忌，就目前所知，仅是一些历日序言的一部分。如 S. 2404《后唐同光二年（924）具注历日》序中有云：“子日不卜问，丑日不买牛，寅日不祭祀，卯日不穿井，辰日不哭泣，巳日不迎女，午日不盖屋，未日不服药，申日不裁衣，酉日不会客，戌日不养犬，亥日不育猪。”十二地支各自所主吉凶宜忌，同“北大 D195V”第二部分内容完全契合，从而使我们知道了历日序中这部分内容的由来。

从以上讨论可知，“北大 D195V”的两项内容，均属于术数文化，是唐五代宋初制历者必须参考的一些依据。历日中术数文化很多，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长期担负撰历任务的人，单靠脑子也记不住，必须抄在纸上，便利翻检，此件的作用大抵



如此。

简言之，这些术数文化是编制历日的一部分依据，但还不是历日本身，就像砖瓦和木料是建房子的构件，但它们不能被称为房子。因之，历日的基本特征是有年月日，具注历还要加上吉凶注等。只有吉凶注，而无年月日的，不能成其为历日，遑论“具注历”。

以上补说，期望有益于对这两件敦煌文献的认识，若有错误，还望是正。

【注释】

[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

[2] 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59页。

[3] 载《图书月刊》3卷1期，1943年11月出版。

[4] 载《东方学报》（京都版）45册，第399页。

[5] 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见第325、352页。

[6] 同注[2]，第558页。

[7] 详参拙作《敦煌古历丛识》，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1期，107~118页。

（原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4期，第90~91页）

敦煌三篇具注 历日佚文校考

我在已经出版的《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1]和《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2]二书中，对敦煌吐鲁番所出具注历日做了尽可能的裒辑。但是，在编著这两本书时，国际上有些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资料尚未公布。近年来，随着一批资料陆续公开，就发现前此二书尚不完备。迄今至少发现有七件东西我此前未曾寓目，当然更未收到书中。这7件东西，四件出自德国国家图书馆“吐鲁番收集品”^[3]中，两件敦煌历日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另一件敦煌历日则藏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本文将对前述分藏于俄国和日本的敦煌历日佚文进行释录和校考。

一、《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 具注历日》校考

此件图版刊布在《俄藏敦煌文献》第10册第109页上栏，编号为俄ДХ02880。这是一块前、后、上、下均已残断的印本历日小残片。残存部分以原刻界栏为界，大体可分作三栏：上栏为月神方位日期残文、月大小和月九宫残文；中间一栏是“蜜”日（星期日）注；其下一栏为日序、干支、纳音和建除。给我的感觉是，其版式、内容与S. P. 006号《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4]大体相同。由于原件残破严重，所以编者未予定



年，仅题为“具注历”。我们在考定其确年之前，需先将文字释录。释文共分两部分进行，上栏为第一部分；由于第二栏的“蜜”日注是配合第三栏的日期使用的，所以，将这两栏放在一起释录，作为第二部分。凡属推补文字，放入“[]”中，在讨论中将说明推补的理由和依据。为便于讨论，释文前加了行号；原为竖行，今改横排（本文以下相同，不另说明）。

第一部分：

[前缺]

- 1
- 2 寅天德乾。
- 3 卯月德丙。
- 4 酉月合辛。
- 5 午月空壬。

（说明：原件寅、卯、酉、午四字与其下面文字并不十分对齐，更无对应关系）

- 6 [六] 月大。
- 7 [黄] [白] [碧]
- 8 [绿] [白] 白
- 9 [紫] [黑] 赤

[后缺]

第二部分：

[前缺]

- 1 [十八] 戊辰 [木]
- 2 十九己巳木
- 3 廿日庚午土
- 4 廿一辛未土
- 5 廿二壬 [申金]
- 6 廿三癸酉 [金]



- 7 廿四甲〔戌火〕
- 8 蜜廿五乙亥〔火〕
- 9 廿六丙子〔水〕
- 10 廿〔七〕丁丑〔水〕
- 11 廿〔八戊寅土〕
- 12 廿九〔己〕卯土
- 13 一日庚辰金
- 14 二日辛巳金
- 15 蜜三日壬午木
- 16 四日癸未木
- 17 五日甲申水除
- 18 六日乙酉水满
- 19 七日丙戌土平
- 20 八日丁亥土定
- 21 九〔日戊子火执〕

〔后缺〕

下面对残历年代进行考定并加讨论。

（一）第一部分 2~5 行的天德乾、月德丙、月合辛、月空壬属于具注历日中月神日期方位的内容。由这几个月神对应的日期，可知它们属于五月月序之内容^[5]。但是 6~9 行却属于六月的内容。为什么呢？我们注意到，第二部分 17~20 行残文中，有注入的除、满、平、定四个建除十二客的内容。依据建除十二客在各“星命月”中同纪日地支的对应关系^[6]，除与申对应、满与酉对应、平与戌对应、定与亥对应，都属于“星命月”六月的内容。由于第一部分 2~5 行为五月月神，可知残历第二部分十八至二十九日（1~12 行）为五月的历日，而其下一至九日（13~21 行）应是六月的历日。显然，在五月廿九日和六月一日上面一栏的“月大”（第 6 行）二字前应是一个“六”字，“六月



大”与第三栏的六月一日是对应的。

(二) 残历第一部分 8~9 行残存“白”“赤”二字。根据敦煌县注历日的编排特点和经验,我们知道这是六月的月九宫图。由此图右下角为“七赤”,即可知其中宫为“六白”,从而根据九宫图的构图规则将残失的七个九宫字全部填出来。由于六月为六宫,逆推回去,可知正月是二宫,而正月为二宫的年份则是孟年(巳、亥、寅、申)^[7]。这样,我们通过残历六月九宫图查出了它的纪年地支范围,范围就被缩小了。

(三) 由于残历第二部分为五月后半月和六月上旬的内容,且知五月共廿九天,是个小月;六月是大月,朔日庚辰,从而用于支表上逆下顺地去推,得出:[五月小],[辛亥朔];六月大,庚辰朔;[七月?],[庚戌朔]。

(四) 我们将前述五、六、七三个月的朔日,同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公元 800~1000 年间的巳、亥、寅、申年相对照,其中同唐文宗大和八年甲寅岁(834)相一致。

(五) 残历在五月廿五日和六月三日有两个“蜜”日注。其中五月廿五日合西历公元 834 年 7 月 5 日,六月三日合西历同年 7 月 12 日,查《日曜表》,此二日均是星期日,残历“蜜”注与《日曜表》亦相合。由以上考证,我们确认此件为《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县注历日》。

前已指出,本件残历是一个印本历日。正由于此,它就不仅仅限于历法史研究的范畴,而且同雕版印刷技术史的研究密切相关。以往我们一直认为敦煌所出《唐咸通九年(868)〈金剛经〉》^[8]是现存从中国发现、有确切年代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现在看,印本《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县注历日》应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它比咸通九年提前了 34 年。可以预期,随着出土文物的增多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个年代还有可能提前。

唐文宗大和八年时,雕版印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册府元



龟》卷160帝王部“革弊二”记载：“[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私印历日“满天下”便是对当时雕版印历的描述。正由于私印历日极多，冲击了皇帝的“颁历”特权，才有冯宿上奏要求禁断，也才有皇帝发敕禁止。但实际效果恐怕不大。可以说，这件大和八年印本历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它是官印历日，还是私印历日，目前尚不能妄断；但它是由敦煌以外的其他地方流入的，则大致不会有问题。因为就敦煌本土而言，大和八年还是吐蕃统治的后期，敦煌同中原唐王朝的联系尚未恢复。而在同年，敦煌当地使用的是自编历日，有P. 2765写本《唐大和八年甲寅岁具注历日》为证。所以，此件到底是在何时、由何种途径传入敦煌的，都还需要再加研究。

二、《后晋天福十年乙巳岁（945） 具注历日》残文缀合

此件图版刊布在《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第182~183页，编号ДХ01454、ДХ02418V。原件前部、后部、上部残失严重，主要保留着年历总序中的部分文字，正、二两月月序的部分文字，和一些选择残文，纪年干支不存。由于条件太少，所以编著者仅题为“具注历日”，而未定年代。

当我第一眼看到此件图版时，觉得是那么“面熟”，相信自己早已见到过，而且怀疑它是可以同别的具注历日缀合的。经与刊布在《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上的图版比对，发现它可以同S. 0681背面的《后晋天福十年乙巳岁（945）具注历日》缀合。不仅笔迹相同，而且撕断的字划也能上下对上。换言之，S.



0681 背所存为此件残历的上半截，而此两号则存其下半截。今后在收入释文和图录时应将它们加以缀合，题为《后晋天福十年乙巳岁（945）具注历日》，编号为 S. 0681 背加 ⅡX01454 加 ⅡX02418V 方妥。

此件 S. 0681 背部的释文见于《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第 460 页至 465 页。如果现在再在这里对其俄藏部分单独释文，似无必要，故从略。将来如有机会修订《辑校》一书，再补充进去为宜。

三、《后周显德二年乙卯岁（955） 具注历日》校考

此件现藏日本国会图书馆，编号 WA37—9。其图版和释文从未公布过。1997 年夏天，日本东京一位研究天文历法史的学者西泽宥宗先生从国会图书馆发现了此件。他也注意到敦煌研究院施萍婷先生于《敦煌研究》1995 年第 4 期公布的日本“国会图书馆古写本”^[9]目录未著录此件。据云，这是由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忘了提示施先生造成的。我虽然有幸看到了此件的照片复印件，但同时获知，西泽先生已撰文考证，准备将照片一起刊布。我们应该尊重西泽先生的发现功绩和他的优先刊布权^[10]。因此，这里只将文字释录并考证其年代。尽管这样，我也首先要向西泽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感激之情。

下面先将文字录出。依据历日规则推补出的文字不出校记，以免繁琐。

[前缺]

1 [九月][白][绿][白][]

2 [小建] 赤 [紫][黑] 在[]月厌

3 [丙戌] 碧 黄 [白] 用 乙、辛、丁、癸 时 [吉]。



- 4 一日丁卯火破 往亡 岁对、地囊^①
- 5 二日戊辰木危 岁后、天恩
- 6 三日己巳木成 蜚虫坏户 岁对，加冠
- 7 蜜 四日庚午土收 罡。
- 8 五日辛未土开 岁对、不将、母 [仓]
- 9 六日壬申金闭 岁对、不将、嫁 [娶] 殡吉。
- 10 七日癸酉金建 岁对、天恩^②，拜官、升坛、沐浴、解吉。
- 11 八日甲戌火除 上弦 水始涸 岁位、血忌、母仓，修造、解除吉。
- 12 [九日] 乙亥火满 岁位，祭祀、加官、拜官、修仓库吉。人 [神在尻尾]。
- 13 [十日] 丙子水平 魁 人神 [在腰背]。
- 14 [蜜十] 一日丁丑水定 岁位、母仓，起土、沐浴、解厌吉。日游在外兑宫，人神 [在鼻柱]。
- 15 十二日戊寅土执 岁位、归忌，市买、伐木、符、镇解吉。人神 [在发际]。
- 16 [十三] 日己卯土执 寒露九月节鸿雁来宾 岁位、天恩、不 [将]，嫁娶、祭祀吉。人神 [在牙齿]。
- 17 [十四日] 庚辰金破 岁位、大败^③，破屋、坏垣、治病吉。人神在 [胃管]。
- 18 [十五日辛] 巳金危 望 岁对、血忌、天恩、母仓，嫁娶吉。 昼四十八刻，夜五十二刻。 人神在 [遍身]。
- 19 [十六日壬午] 木成 岁对、不将、天恩、母仓，嫁娶、葬吉。日游在外乾宫，人神在 [胸]。
- 20 十七日癸未木收 罡^④。人神在 [气冲]。



21 蜜十八日甲申水开 雀入水为蛤 岁对、八魁^⑤，通渠、□□、出行吉。人神在股内。

22 十九日乙酉水闭 岁位，修造、□□□□人神在足。

23 二十日丙戌土建 岁前、母仓，□□□□人神在[内踝]。

24 二十一日丁[亥土]除 岁前，祭祀治□□□□人神在手[小指]。

25 二十二日戊子火满 岁位、归忌，拜官、□□□□人神在外踝。

26 二十三日己丑火平 下弦 菊有[黄]花 罡。昼四十九刻，人神在肝。夜五十一刻^⑥。

27 二十四日庚寅木定 行狼、九焦、九坎、起[土]□□□□

28 蜜二十五日辛卯木执 绝[阳]、母仓^⑦□□□□

29 二十六日壬辰水破 绝阳、八魁^⑧□□□□

30 二十七日癸巳水危 绝阳、血忌□□□□

31 二十八日甲午金成 霜降九月中 豺乃祭兽 绝阳、地李，人[学?]□□□□

32 二十九日乙未金收 魁□□□□

33 [十]月[赤]碧 黄自十月十四日立冬，已得十月之节□□□□

34 小建[白]白 白^{甲己上取土及宜修造吉。}月厌在丑。月杀在戊。□□□□

35 [丁亥]黑绿紫[用甲、庚、丙]壬时[吉]。□□□□

[后缺]



〔校记〕

①地囊：“星命月”之八月地囊在丙寅、丙申二日，可知当注在此前一日之“丙寅”下，注于此日误。

②天恩：癸酉日非天恩日，注于此日误。

③大败：九月大败在卯日，注于此日误。

④罡：误。九月建除十二客之“收”日为“魁”日，而非“罡”日。

⑤八魁：误。秋三月（七、八、九月）之八魁在己亥、丁未日，夏三月则在甲申、壬辰日，制历者误。

⑥昼四十九刻，夜五十一刻：误。按，夏至后白天日短，夜晚渐长，十五日已是昼四十八刻，夜五十二刻，则此当作“昼四十七刻，夜五十三刻”。

⑦母仓：九月母仓在辰、戌、丑、未、巳、午日，注于此日误。

⑧八魁：秋三月（七、八、九月）之八魁在己亥、丁未日，注于此日误。参见校记⑤。

下面对残历的年代进行考定。

（一）残历 16 行有“寒露九月节”，31 行有“霜降九月中”，是九月的节气和中气。由于节气注在“十三日”，而不是下半月，因此可以不考虑因置闰而使节气与月份错开。换言之，可以直接判定：残历 1~32 行为九月的历日内容，而 33~35 行为十月月序之内容。

（二）九月为小月，朔日为丁卯；十月亦小月，朔日干支当为丙申。

（三）残历九、十两月的月九宫均有残文。根据其残存文字，可知九月为九宫，十月为八宫。逆推可得，正月为八宫。而与正月八宫相应的年份为仲年（子、卯、午、酉）^{〔11〕}。

（四）以九、十两月的朔日同《二十史朔闰表》中的子、卯、



午、酉年对照，在公元 800~1000 年的范围内，同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完全相同；同后周显德二年（955）相近似。

（五）残历九月四日、十一日、十八日、二十五日均有蜜日注。若认为残历属于显德二年，则九月四日相当于西历公元 955 年 9 月 23 日，查《日曜表》，此日确为星期日，亦即“蜜”日。由此可以确认，残历为《后周显德二年乙卯岁（955）具注历日》。将残历九、十两月朔日与同年中原历相比较可知，中原历九月丙寅朔，残历九月丁卯朔，晚一日；中原历闰九月丙申朔，残历十月朔日亦丙申，朔在同日。

在以往的敦煌具注历日中，后周显德二年的历日未曾被发现，此历为我们增添了一份新资料。

【注释】

[1]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以下引此书简称《辑校》。

[2]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收在《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一册。以下引此书简称《通汇·天文卷》。

[3] 德藏四号的录文由荣新江先生提供。其中对 Ch. 3506 号，我已撰有《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具注历日〉考》，刊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另三号残破过甚，难于成文，暂置不论。

[4] 释文见《辑校》198~231 页。图版见《通汇·天文卷》第一册，359~361 页。

[5] 参《辑校》第 738 页《月神方位、日期表》。

[6] 参《辑校》第 741 页《各星命月中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对应关系表》。

[7] 参《辑校》第 746 页《年九宫、正月九宫与年地支对应关系表》。

[8] 编号为 S.P.002 号，现藏英国图书馆。

[9] 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三）》，《敦煌研究》1995 年 4 期，51~70 页。

[10] 据有关人士讲，西泽宥宗先生将把此件照片连同他撰写的文章一



齐刊发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科技史料》杂志上。

[11] 同注 [7]。

（原载《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108~112 页）

我国发现的现存 最早雕版印刷品

——《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

长久以来，在雕版印刷技术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在我国发现的有确切年代的最早雕版印刷品，是出自敦煌石室、藏在英国图书馆的《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S. P. 002 号）。1998 年底出版并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的《敦煌学大辞典》也是这样著录的（见该辞典 682 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总条）。最近，中国文物研究所邓文宽教授的一项研究成果改变了这一结论，他将在我国发现的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雕版印刷品的年代提前了 34 年。

邓教授的这个结论，是通过对一件敦煌石室所出具注历日进行研究得出的。这件历日残片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为“俄 ДХ02880”。图版刊布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 10 册第 109 页上栏，刊布时仅题为“具注历”，未标明确切年代。

原件是一块雕印历日的小残片，上、下、前、后均已残损，考定起来甚为不易。邓教授的考证程序大致如下：（1）凭借右上角“天德乾”等四个“月神方位日期”注记，获知其下面的十八至二十九日具注历日属于五月；（2）凭借左下角“除、满、平、定”四个“建除十二神”与纪日地支的对应关系，确认残历一至九日属于六月，从而推知上栏中间“大”字及其上面的半个残字



的完整内容是“六月大”。由于知道了六月大、朔日庚辰，五月二十九天是个月小，从而推出五、六、七共三个月的月朔；（3）凭借残历左上角的“白”、“赤”二字，推知此历六月九宫图为“六白中宫”，进而推出本历正月九宫图为“二黑中宫”，从而找出其纪年地支为孟年（巳、亥、寅、申），缩小了残历的年限范围；（4）以五至七月的朔日同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巳、亥、寅、申年对照，在从公元 800~1000 年的可能范围内，发现与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完全一致；（5）残历在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三日有两次“蜜”日（星期日）注，此二日合西历公元 834 年的 7 月 5 日和 12 日，查《日曜表》，全是星期日，从而可将残历的绝对年代加以确定。

唐文宗大和八年时，民间雕印历日数量巨大，分布很广。《册府元龟》卷 160 帝王部“革弊二”记载：“[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私印历日“满天下”就是对当时民间雕印历日的形象描绘。正由于私历太多，冲击了皇家的“颁历”特权，所以才有冯宿上奏要求禁断，也才有皇帝发诏禁止。但雕印历日具有丰厚的经济效益，禁是禁不住的，客观上却推进了雕版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进步。这件唐文宗大和八年的印本历日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它是官历还是私历，尚难确定。大和八年正值吐蕃统治敦煌的后期（公元 848 年张议潮举义归唐）；敦煌文献 P. 2765 号又是同年敦煌人自编的写本历日，因此，这件残历不大可能是在敦煌本土雕印的，似应由外地流入。其流入的途径和方式，现在也还不易说明，有待今后考查。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0 年 2 月 2 日第三版，署名“苏雅”）

敦煌文献 S.2620 号 《唐年神方位图》试释

敦煌文献 S.2620 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曾拟题为《大唐麟德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此件放大照片,台湾出版黄永武博士主编的《敦煌宝藏》,拟题均同。英人翟林奈所编《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7037 号,题为《大唐麟随历》,“随”系“德”之误释。众口铄金,确乎为历书无疑。笔者在整理敦煌历日时反复审览,无论如何它都不是历日,更不存在是所谓《大唐麟德历》的可能。然对其确切内涵,仍觉茫然。后求教于天文学史专家席泽宗教授,方知是一件年神方位图。由此出发,笔者对其性质、内容、作成年代进行探讨,披露管见于此,敬请海内外方家是正。

此件前缺,存残图二幅,整图六幅。在第三幅整图之外,倒写“大唐麟德历”五字,正是各家拟题所据。此外有尾题二行,内容如下:

右从下元天宝九载(至)庚寅,覆前勘算至乙未。天宝十五载改为至德,自后计算于今,却入/上元甲子旬中已来,一十八年至辛巳年。

由是可见,确定此件性质和年代时,除去应注意“大唐麟德



历”五字，尾题和六图更为重要。先考释尾题如下。

由尾题得知，原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天宝九载庚寅（750）至乙未即天宝十四载（755）共六年，为“覆前勘算”部分。“勘算”内容如何，因前缺而难详。第二部分自天宝十五载改元至德起，逐年计算，直至再入“上元甲子”。古代历家有上元、中元、下元亦即“三元”之说。所谓上元甲子，系由隋仁寿四年（604）甲子岁起算，此六十甲子为上元，至唐麟德元年（664）甲子岁转入中元，开元十二年（724）转入下元，至兴元元年（784）又回到上元甲子，如此往复不穷。显然，天宝九载正在下元年中，故尾题谓“下元天宝九载”云云。所谓“计算于今，却入上元甲子”，当即计算至此一下元之最后一年即唐建中四年癸亥岁（783），然后再转入兴元元年（784）之上元甲子。这与残存六幅整图的纪年干支颇为一致。

原件各图均注纪年干支，残存六幅整图顺次为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纪年连续。癸亥为六十甲子之末，结合尾题，可知它是原件下元年之最后一年，即建中四年（783）。进而可知，残存的六幅整图是由大历十三年戊午岁（778）至建中四年癸亥岁（783）共六年，每年一图。尾题云“计算于今”，此“今”就是这件文献的写成年代，即唐建中四年（783）。

原件从天宝十五载（756）计算，至建中四年（783）共二十八年，年各一图，当有图二十八幅。存留部分仅当原图的四分之一，而四分之三的图业已残失。

此外，尾题末云“却入上元甲子句中已来，一十八年至辛巳年”。兴元元年甲子岁后的十八年是辛巳岁（801）。原件尾题至此，语意欠明，颇疑尚未写完。

次考存图内容。为方便起见，我们以大历十三年图和建中二年图为例，分项考释如下：

（一）方位



每图四周以十二地支和乾、艮、巽、坤表示方位，各图全同，无一例外。其所示方位是，子居下为北，午居上为南，卯居左为东，酉居右为西，其余各地支分别表示一定方位。用八卦表示的方位，乾为西北，艮为东北，巽为东南，坤为西南。古代这类图形完整的方位共有二十四个。除十二地支和八卦中的乾、艮、巽、坤，还有十干中的八个，即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因此，本件图中的方位是不完整的。但就其所要表现的年神方位来讲也已够用。

（二）年神

方位之外的害气、岁破、岁煞、黄幡、太阴、豹尾等均是本年神将，与一定的方位相对应。依堪舆家和阴阳家说，凡年神所在之地，均应避忌。这在敦煌具注历日中颇为习见。如 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序云：“凡人年内造作，举动百事，先须看太岁及已下诸神将并魁、罡，犯之凶，避之吉。”接着详列雍熙三年各神将所在方位。这部分内容本采自阴阳家和堪舆家的陋说，俗不可耐，但每年年神所在方位同该年地支却有固定对应关系，从而可以利用年神方位准确地找出对应的年地支，成为敦煌残历定年的方法之一。其对应关系如附表^[1]。

方 位 年 神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岁 德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太 岁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岁 破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大 将 军	酉	酉	子	子	子	卯	卯	卯	午	午	午	酉
奏 书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续表

方 年 神	年 位	地 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博	上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力	上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害	气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蚕	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蚕	官	未	未	戌	戌	戌	丑	丑	丑	辰	辰	辰	未	
蚕	命	申	申	亥	亥	亥	寅	寅	寅	巳	巳	巳	申	
丧	门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太	阴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官	符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白	虎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黄	幡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豹	尾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病	符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死	符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劫	煞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灾	煞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岁	煞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伏	兵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岁	刑	卯	戌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大	煞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飞	鹿	申	酉	戌	巳	午	未	寅	卯	辰	亥	子	丑	



以此表检查大历十三年图，岁破在子，岁煞在丑，〔大〕将军在卯，太阴、豹尾在辰，太岁、岁刑在午，黄幡在戌，其对应年地支均是“午”。图中框内第一行所示“戊午”即大历十三年纪年干支，完全对应。依照此表检查其它五幅整图，也无不相合。

（三）纪年干支

各图框内第一行第一项即本年干支，如大历十三年图“戊午”，建中二年图“辛酉”，意义明确，兹不赘。

（四）年九宫，即九星术或称九宫飞位

大历十三年图“戊午七”之“七”，即该年七宫居中；建中二年图“辛酉四”之“四”，即该年四宫居中。九宫飞位亦是星命家的说教，以隋仁寿四年上元甲子（604）为一宫，此后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配入各年，依次倒转。星命家又以七种颜色配入各宫成为：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故时而以数字表示九宫，时而又标以颜色。大历十三年图框内前为“戊午七”，三、四行间有一“赤”字，“七”与“赤”对应。建中二年图框内前为“辛酉四”，与四宫对应的颜色应为“绿”，可是二、三行之间先注一“紫”字，圈掉后改为“碧”。原作者发现“碧”仍不对，故在框外乾、亥之下注明“碧错黄是”。然而这仍是错误。此年既是四宫居中，其对应颜色作“绿”方是。同样，我们发现建中元年图作“庚申五”，对应颜色应为“黄”，可是却错注为“白”；建中三年图作“壬戌三”，对应颜色应为“碧”，却错注为“绿”。残存六幅整图中有三幅中宫颜色注错，足见原作者对九方色是何等生疏！可以相信，如果全部二十八幅图都保留下来，那么九宫颜色注错的则更多。



黑	赤	紫
白	碧	黄
白	白	绿

(建中三年)

绿	紫	黑
碧	黄	赤
白	白	白

(建中元年)

白	黑	绿
黄	赤	紫
白	碧	白

(大历十三年)

白	白	白
紫	黑	绿
黄	赤	碧

(建中四年)

碧	白	白
黑	绿	白
赤	紫	黄

(建中二年)

黄	白	碧
绿	白	白
紫	黑	赤

(大历十四年)

九宫颜色图复原

这件文献中同年九宫相关的还有两项内容。一是夹杂在方位之间表示颜色的字，如大历十三年图子、丑间的“碧”字，未、坤间的“绿”字；大历十四年图丑、艮间的“紫”字，寅、卯间的“碧”字等。这些字是表示该年中宫以外其它有关各宫颜色的。为便于比较，我们将这六幅图正确的九宫颜色图复原如图一（依原图次序，由右至左，先上后下）。很清楚，大历十三年图子、丑间的“碧”字，正当该年九宫图下行正中“碧”字，“绿”字在右上角，处于未、坤之间，完全对应。同样，其它五图各方位之间表示颜色的字也是表示中宫以外有关各宫颜色的。但由于原作者对九宫颜色不熟悉，注错的也不在少数。如大历十四年图寅、卯间当作“绿”，却错注为“碧”。其它只要认真核查即可自明，恕不一一指出。

另一项内容即各图的方框。原件每图方框有两个特点，一是不闭合，各图不闭合部位各异；二是方框中的一些小段颜色很



浅，如建中二年图的左下角。起初我感到十分费解，但当我同九宫图联系起来分析时，问题便迎刃而解。

用前面复原的各年九宫图与原图对照，凡是方框不闭合的部位均是白色的位置。如大历十三年图右下、左下、左上全是白色，这正是原图不闭合的三个部位。建中二年九宫图上行中间，右上角、右行中间全是白色，原图相应的部位均不闭合。诚然，由于原作者对九方色生疏，也有涂错的，如建中元年图的下行。

原图方框中的浅色部分也同九宫颜色有关。大历十四年图右下角、建中二年图左下角颜色都很浅，而对应部位九宫颜色是“赤”。由此明确，在黑白照片上反映出的浅色部位，原件都是红色。尽管限于条件，我们无法看到藏在英国图书馆的原件，也未得到原件的彩照，只能使用黑白照片，且是黑底白字的正片，仍然可以确信这个推断正确无误。只是由于原作者对九宫颜色的生疏，也将一些部位的颜色涂错，如建中四年图“赤”在下行正中，原图却在右上角“白”的部位涂上红色，这是很有趣的。

由以上分析可得如下结论，原图方框不闭合的部位是白色，闭合部位是其它各色。由于年代已久，这些用不同颜色涂成的方框，在黑白照片上似乎都成了黑色（亦即正片上的白色）。可以确认，原图方框部分是彩绘而成的。它们同前述方位之间表示颜色的字，以及图中中宫颜色字，共同组成该年的年九宫图。类似的组图方法，亦见于斯坦因编号 P.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历日》之各月九宫图^[2]。

九宫颜色也用于表现吉凶。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序有一首《三白诗》云：“上利兴功紫白方，碧绿之地患痈疮。黄赤之方遭疾病，黑方动土主凶丧。五姓但能依此用，一年之内乐堂堂。”足见紫、白二色主吉，其余五色主凶。这些无疑都是迷信、无稽之谈。

（五）建除十二客，又称建除十二直



大历十三年图“戊午七危”之“危”，建中二年图“辛酉四开”之“开”均属此。《史记·日者列传》褚先生曰：“臣为侍郎，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可知远在西汉，建除即为一家，与其它各方术之家并称。建除十二客是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二个字各主一定吉凶。此件残存六图的建除十二客顺次为危、成、收、开、闭、建，次第相连，估计是与本年相配的。我们在敦煌石室和吐鲁番出土的北魏、初唐、晚唐至宋初的历日中看到，每日之下都配有建除十二客，而未见同年相配，此件是一个特例。但无论如何都是表示吉凶的。至于它同年份的配置关系及配年规律，仍有待深究。

（六）六壬十二神

大历十三年图“玄武中宫”之“玄武”，建中二年图“功曹中宫”之“功曹”，以及其它四图中的天后、贵人、六合和勾陈均属此。清儒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七《六壬十二神》条云：“六壬家又有贵人、腾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天空、白虎、太常、元（玄）武、太阴、天后十二神，分布十二方位。”所谓“玄武中宫”于此件当指玄武居九宫之中宫，而非分布于十二方位，其余依此。这些六壬神将配入九宫之中宫后，所主吉凶如何？通观六图，仅大历十四年图为“天后中宫，宜修，吉”。清《协纪辨方书》卷六义例四引《总要历》曰：“天后者，月中福神也。其日宜求医、疗病、祈福、礼神。”故将二者配在一起。其它五图，仅建中元年图云“贵人中宫，不宜修”，另四图全注明“不宜修，大凶”。所以如此，除了这四年的中宫颜色主凶外，配入的神将也是主凶的。如大历十三年图中宫七赤所配之“玄武”，建中四年中宫二黑所配之“勾陈”，《协纪辨方书》引《神



枢经》云：“玄武、勾陈者，月中黑道也。所理之方，所值之日，皆不可兴土功、营屋舍、移徙、远行、嫁娶、出军。”黄道主吉，黑道主凶，无怪乎它们所配入的年九宫均是“不宜修，大凶”了！

（七）魁月、罡月

大历十三年图“年中又忌二月、八月，修之凶”；建中二年图“又忌五月、十一月，修者凶”，这里的月份全是魁、罡之月。魁月、罡月之间相距六个月，以正、七，二、八，三、九，四、十，五、十一，六、十二月分成六组，依次配入各年，是年中的忌月。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序又云：“今年六月天罡、十二月河魁。魁、罡之月，切不得修造动土，大凶。”恰可作为此件各年应避忌月份的注脚。

以上就笔者学识所及，对 S.2620 号的性质、内容和作成年代作了考释。从以上考释可知，这件文献的性质是年神方位图，作成于唐建中四年（783）；残存六图包括了大历十三年至建中四年的内容，因此应题名为《唐年神方位图》。同类图形不仅见于一些较为完整的敦煌具注历日，如 P.3403，而且一直沿用到清代。清乾隆六十年《时宪书》第二页的《年神方位之图》^[3]，与此件各图大致相同，可作为此件定性、定名的参考。

那么，为什么前贤均拟题为《大唐麟德历》呢？如前所述，这是源自第三幅图上部倒写的“大唐麟德历”五字。然而细审原件胶卷，此五字同这件文献的关系却十分暧昧。原件各图和尾题在同一张纸上，纸的上部边沿到图为止，磨破的纸沿尚十分清晰；而“大唐麟德历”五字却在纸沿之外，显然是写在另一张纸上的。写此五字的那张纸是否用来裱托这件《年神方位图》的呢？因未睹原件而难下断语。但可以确定的是，“大唐麟德历”五字同此件《年神方位图》无关，故不能以它作为定名、定性的依据。



年神方位图纯属迷信，无科学意义可言，属于古代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但它们又多包含在古代历日中，成为研究敦煌历日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文化史角度看，研究它不仅必要，而且也有一定意义。

【注释】

[1] 此表采自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 1644~16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并作了少许补充、修正。

[2] 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66~67页。

[3] 参见前揭陈著 1618~1619页。

（原载《文物》1988年2期，第63~68页）

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 七年(630)历日》考

1986年10月，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新出土一件历日残片。两年后我得知这一消息。由于研究的旨趣所在，我极想看到原件或其照片，以便进行探讨。但迟迟未能如愿。在耐心等待七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1995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吐鲁番召开“敦煌吐鲁番学术著作研讨会”，我应邀赴会。承蒙东道主柳洪亮先生的厚意，得以目睹原物。感激之情，不尽言表。这里对这件残历作一整理和研究。

—

原件编号为 86TAM387: 38—4^[1]，残高 19.7 厘米，残长 11.5 厘米，汉文墨书。现将文字释录如下 [顶端从右到左 1~10 为行号，右侧从上到下 [一]~[一〇] 为列(排)号，均为笔者所加]：

据有关著录，残历是从墓内女尸右脚纸鞋中拆出的。此墓出有墓志，知女尸是领兵将领张显祐的妻子，死于麹氏高昌延寿十三年(636)三月^[2]。原历被剪作鞋样使用，残存部分应是鞋样的前半部。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用途，所以残存的十列中，有的日数多，有的日数少。



的信息仅此而已，但十分重要，它们正是我们考定其年代的依据和出发点。

“小雪中”三字所在的纪日干支和建除十二客已残。但从其左边（即下一日）为“辛丑满”，不难推知“小雪中”所在之日为“庚子除”，再前一日是“己亥建”。据此，我们可以确知此历“小雪”所在日的干支为“庚子”。

很显然，这件历日原来是注有全年二十四节气的，只是除小雪这个十月中气外，其余二十三个节气全部残失了。但我们已知“小雪中”在庚子日，则其余残失掉的二十三个节气所在之日的干支就有可能推求出来。

我们知道，我国中古时代历日所注节气是按照平气进行计算的，使用定气是很晚近的事情。因此，可以设定这份历日用的也是平气。同时又知，二十四节气是以太阳回归年长度 365.2422 日为依据建立的。二十四节气的平气值是将一个回归年长度平分 24 等份，每份为 15.218425 日。既然已知“小雪中”的纪日干支是庚子，以此为基点，向下顺推，向上逆推，就可推出各节气所在之日的干支来。不过，平气值 15.218425 日不是一个整数，每过四个节气多就会多占一日；再者，所取“小雪中”在庚子也非原历计算平气位置的起始点。因此，所推出的二十三个节气日期干支只能是近似的，而非绝对位置，容有一日甚至二日的误差。尽管如此，我们获得的二十四节气所在之日的干支对确定残历的年代仍极具价值（说详下）。经依前述方法推算，此残历“小雪中”之外二十三个节气所在之日近似日期之干支是：立春节（辛亥），雨水中（丙寅），惊蛰节（壬午），春分中（丁酉），清明节（壬子），谷雨中（丁卯），立夏至（壬午），小满中（丁酉），芒种节（癸丑），夏至中（戊辰），小暑节（癸未），大暑中（戊戌），立秋节（甲寅），处暑中（己巳），白露节（甲申），秋分中（己亥），寒露节（乙卯），霜降中（庚午），立冬节（乙



西)，大雪节（乙卯），冬至中（庚午），小寒节（乙酉），大寒中（庚子）。

残历出自阿斯塔那古墓，其历法依据与同一时代中原王朝颁布的官历或有出入。但中古时代所用的回归年长度和平气值不会有太大的差距。换言之，我们可用上述推算出的节气干支与同一时代的中原历进行对照，找出其相近的年份，再用其他条件加以考定。此墓所出墓志已告知女尸死于高昌延寿十三年（636），相当于唐贞观十年。可知，公元636年是这份残历的年代下限，历书的实际年代应在公元636年及其以前不太久的一段时间内。

历法专家张培瑜教授的大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3]一书，对中国古代自秦朝以来每年二十四节气的日期干支有十分详明的著录。我们将前述推出的残历各节气干支同张著对照，发现从公元600年至636年，仅公元630年的节气干支相近，其余均相距太远或全无可能。张著所列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二十四节气的干支是：立春（上年闰十二月辛亥），雨水（丁卯），惊蛰（壬午），春分（丁酉），清明（壬子），谷雨（戊辰），立夏（癸未），小满（戊戌），芒种（癸丑），夏至（戊辰），小暑（甲申），大暑（己亥），立秋（甲寅），处暑（己巳），白露（乙酉），秋分（庚子），寒露（乙卯），霜降（庚午），立冬（乙酉），小雪（辛丑），大雪（丙辰），冬至（辛未），小寒（丙戌），大寒（壬寅）。

由此可以确定，残历的年代是公元630年，即魏氏高昌延寿七年。残历的这个年代，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进一步提供证据并加以考定。

三

残历被剪作鞋样，残存纪日干支仅71个。其本始面貌如何，



我们可否将各日干支复原出来呢？回答是肯定的。

对中国古代历法有过接触的人均不难判断，残历是以类似表格的形式编制的。其本始面貌应该是：顶端从右至左纪日期，即由一日到卅日；其右侧从上到下纪月份。在这样一份类似表格的历日中，虽然月份不同，但每日之下各月同一日期的干支应该是对齐的，残历现存面貌正是如此。困难在于，它已被剪作鞋样，月份、日期均不可见，仅存 71 个干支及其建除；其左、右两边各被剪去多少日子也难于知晓。以下我们将逐一解决，最终将其加以复原。

（一）现存残历的月份

由于原历右侧纪月份部分已失，我们无法直接获知残存部分的月份。但是，如前所述，残历每日包含干支和建除两项内容。其中纪日地支同建除十二客间有着固定对应关系，我在几篇文章中已反复申论^[4]。特别是在《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一文中，我曾经给出了在各“星命月”中纪日地支与建除十二客对应关系表，可以当作工具使用。简言之，建除注日有如下几个特点：（1）由立春后的第一个“寅”日注“建”，顺次下排；（2）凡逢节气（非中气）之日重复其前日的建除一次，接续下排；（3）由于建除十二客（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与纪日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均是 12 个，又使用了上述节气之日重复一次的办法，于是形成了各“星命月”[由一个节气（非中气）到下一个节气（非中气）]二者间的固定对应关系，如“正月”“寅”日注“建”，“卯”日注“除”，“二月”“卯”日注“建”，“辰”日注“除”等等。尽管这种固定对应关系仅限于“星命月”，但历日中的历法月份（正月至十二月）同“星命月”相距不会太远，至多是将本月节气（非中气）提前注在上个月的后半月而已。因此，我们仍可利用这种固定对应关系判定现存残



历的月份是：第一列三月，第二列四月，第三列五月，第四列六月，第五列七月，第六列八月，第七列九月，第八列十月，第九列十一月，第十列十二月。

（二）残历左、右两侧残失的日数及其干支

前已考出，此历是麹氏高昌延寿七年（630）的历日，而且也知现存部分十列是由三月到十二月部分。因此，只要获知延寿七年三月到十二月间任何一个月的朔日，便可判断各列右侧残失的日数，并用逆推法将各日干支补出。幸好，高昌出土墓砖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高昌赵悦子妻马氏墓表》载：“延寿七年（630）庚寅岁七月□□朔，十六日己卯……”^[5]十六日己卯，则朔日为甲子。残历第五列正是该年七月的历日，现存最右边的一日干支为辛未，其前逆推七日方得甲子日。换言之，残历七月右侧被剪掉了七日。又由于此历采用类似表格的形式进行编制，各月同一日干支上下对齐，从而可知：第一列三月右侧失去十四日，第二列四月右侧失去九日，第三列五月右侧失去八日，第四列六月右侧失去七日，第六列八月右侧失去七日，第七列九月右侧失去八日，第八列十月右侧失去九日，第九列十一月右侧失去十日，第十列十二月右侧失去十一日。进而用干支表向右逆推，可得：四月朔日乙未，五月乙丑，六月甲午，七月甲子，八月癸巳，九月癸亥，十月壬辰，十一月壬戌，十二月壬辰。知道了四至十二月的朔日干支，即可先将残历左、右两侧四至十一月所缺日期干支全部补出。

至于三月朔日和十二月的月大小，我们拟另加解决。三月一整月仅残存“建”字的下半部。依据建除十二客同纪日地支的固定对应关系，“星命月”三月“建”与“辰”对应，从而可知“建”字所在纪日地支为“辰”。由“辰”日顺推地支至“午”日，与四月朔日之“未”相接，则三月只能是小月。由于四月初一是乙未，将天干逆推加入三月“建”字所在“辰”日，知



“建”字所在干支为庚辰。再将干支逆推十四日，便可得出三月朔日为丙寅，同时也已将全月各日干支补出。

十二月朔日是壬辰，顺推干支至二十九日为庚申。但本月是大月还是小月？《高昌曹妻苏氏墓表》载：“延寿八年（631）辛卯岁，正月辛酉朔，十三〔日〕水（癸）酉。”^[6]延寿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庚申与延寿八年正月朔日辛酉正好相接，则延寿七年十二月只能是小月。

《高昌曹妻苏氏墓表》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它不仅使我们确定了高昌延寿七年十二月是小月，更证明了我们确定残历年代为高昌延寿七年完全正确，这是不言而喻的。

至此，我们已将残历三月至十二月共十个月的日期、干支全部补出并加以确定。

（三）残历正月至二月的内容

残历上部残失严重，既不见日期（一日至卅日），也不知正月至二月的任何内容。如果简单操作，就会认为上部原来除有日期一列外，仅有正、二月两列。实际情况却非如此。在本文前面推定本历二十四节气的干支时，已知“立夏节”在三月壬午（十七日），“谷雨中”在三月丁卯（二日），则“清明节”在二月中旬的壬子日，“春分中”在二月初的丁酉日，“惊蛰节”壬午应在二月前一个月中旬的十五日左右，本月可能无中气。这种情况提示我们，二月前的一个月很可能是无中气之月，即闰月。

我国古代使用阴阳合历。阴历一个月只考虑月亮围绕地球一周的时间，即一个朔望月，合 29.53 日；阳历一年只考虑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周的时间，即 365.2422 日。十二个朔望月合 354 天或 355 天，与回归年长度相差 10 到 11 天。为使二十四节气在各农历月份的位置相对稳定，不违农时，就必须置闰，从而形成阴阳合历。自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颁行《太初历》始，我国一直采用无中气之月置闰的办法，所谓“朔不得中，是谓闰月”。



这种置闰方法一直延用到现代。例如 1995 年农历闰八月，这个闰月仅有一个九月的节气寒露，注在十五日，而无中气。因此，残历二月前一个月无中气，应是闰月，即此延寿七年历日闰正月。从而可知，残历三月之上在日期一列下原有三列，即正月、闰正月和二月。我们可先将这三个月的列次设定下来。

在此基础上，很需要知道正月、闰正月和二月的朔日，以便将此三个月的各日干支全部补出。遗憾的是，尚未有直接的出土材料可资利用。不过，我的同事王素先生此前曾有《麹氏高昌历法初探》^[7]一文，依据出土资料和必要的历法知识对麹氏高昌历法进行过推拟，可供参考。现在即据王素先生的推拟意见补为：正月丁酉朔，闰正月丁卯朔，二月丙申朔。进而将其余各日干支一并补出。

在前述分项讨论的过程中，事实上我们已将残历全年的各日干支全部补出，现在再总括为一表（表一）。

表一 高昌延寿七年（630）历日复原表

册 日	廿九日	廿八日	廿七日	廿六日	廿五日	廿四日	廿三日	廿二日	廿一日	廿日	十九日	十八日	十七日	十六日	十五日	十四日	十三日	十二日	十一日	十日	九日	八日	七日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一日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正月
	乙未	甲午	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巳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闰月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二月
		甲午	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巳	庚辰建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三月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定	戊申平	丁未除	丙午	乙巳建	甲辰闭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四月
		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巳	庚辰开	己卯收	戊寅成	丁丑危	丙子破	乙亥执	甲戌定	癸酉平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五月



续表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六月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亥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七月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癸巳	八月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亥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九月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癸巳	壬辰	十月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亥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十一月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癸巳	壬辰	壬辰	十二月

需要说明的是,三到十二月所补各日干支均有确凿依据,正月到二月共三个月所补是以推拟结论为据,实际情况如何,仍有待检验。这一年因有闰月,共有 13 个月,全年 384 天,原历残存 71 天,我们补出 313 天。其次,原历注有全年二十四节气和各日建除十二客,我们未予补出。这是由于前述推出的节气干支位置是相对的,有一日至二日的误差,不宜强行拟补。建除十二客的重叠日又正好在节气(非中气)日之下,节气日尚未确定,则建除日也难确定。虽然中气日附近的建除也可按照规律推补出来,但意义不大,从略。

(四) 对原历闰正月的历法检验

在表一中,我们根据推算出各节气所在日的干支位置,设定高昌延寿七年闰正月。这个设定是否可信,仍需接受历法和出土



资料的检验。

中国古代历法的基本闰周是十九年七闰，即十九年中加入七个闰月。在一个闰周中，一般采用前八年加三闰和后十一年加四闰的闰法。虽然南北朝时代，各国也采用了一些更大的闰周，以求将闰月安排得精确一些，但均是以前述闰周和闰法为基础的。据王素先生的意见，高昌国是以延昌三十二年（592）为一闰周之始安排闰月的^[8]。第一闰周在公元 592~610 年，则第二闰周在 611~629 年，第三闰周在 630~648 年（640 年唐灭高昌）。高昌延寿七年（630）正是闰周之始。依照闰法，此年当闰正月。这同我们依据残历推算的结果颇为一致。

我们再以出土资料为据进行检验。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寿四年（627）参军汜显祐遗言文书》：
延寿四年丁亥岁，闰四月八日^[9]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寿四年闰四月威远将军麴仕悦奏记田亩作人文书》：

□□岁润（闰）四月五日……^[10]

由此可知，高昌延寿四年历闰四月。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寿九年（632）闰八月张明熹入剂刺薪条记》：

壬辰岁闰八月剂刺薪一车……^[11]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寿九年调薪车残文书》：

□□至闰八月初……□□^[12]

由此又知，高昌延寿九年闰八月。

自延寿四年五月至九年八月，相距五年有奇，中间必有一个闰月，否则是说不通的。依前述所说的闰周和闰法，延寿四年在第二闰周的后十一年，安排四个闰月，故闰月设置在四月；延寿九年在第三闰周的前八年，安排三个闰月，故闰在八月。显然，因延寿七年是第三闰周之始，也属于前八年置三闰的范畴，故闰



月当在正月。这三次闰月在闰周和闰法上正好是互相衔接的。

以上从闰周、闰法以及出土资料所作的检验表明，此残历原来确实闰正月。

四

高昌国有其独立的历法，最早是由已故李征先生提出的^[13]。后来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李先生的启迪。出土文书、墓志、墓砖表明，高昌历法的朔日、闰月同中原历有所不同。即以本件延寿七年历日为例，与同年唐历比较，可知：唐历闰上年（贞观三年）十二月，高昌历闰本年正月，闰迟一月。十三个月的朔日中，唐历二月丁酉朔，高昌历为丙申，早一日；唐历四月丙申朔，高昌历为乙未，早一日；唐历十二月辛卯朔，高昌历为壬辰，迟一日。其余各月朔日同。这再次表明，李征先生生前不仅为吐鲁番古墓的发掘和文书整理做出过重要贡献，而且对高昌历法的认识先声夺人，尤为卓见。

对于魏氏高昌历法的认识，以往因无直接材料，尚难睹其真颜。现在有了延寿七年的历日实物，使我们的认识深入了一步。但毕竟仅此一件，仍嫌太少。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北朝历日实物出土，以便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

五

我们也有必要将这件历日的形制放在中国古代历日形制的总体发展中加以考察。

中国古代传世历本以《南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14]为最早。近世以来，由于汉简历日和敦煌吐鲁番历日相继面世，使研究者对早期历日的内容和编制形式有了具体而真切



的认识。就汉简历日而论，一般通用历日可分为四种形制：(1) 单板横读月历，如本始二年、神爵元年；(2) 单板直读月历，如五凤元年、居摄元年；(3) 单板直读简便年历，如永光五年、永始四年；(4) 编册横读日历，如元康三年、神爵三年等^[15]。就敦煌吐鲁番历日而论，除《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16]与汉简历日的单板直读简便年历(第三种)相类，其余虽有繁、简之分，但内容日趋增多，形制日益复杂，与汉简历日多不相同^[17]。显然，中国古代历书形制的演变受到了书写质材的影响。写在竹简上的历日内容不可能太多，写在纸质上的历日内容逐步增多，这是必然趋势。

但是，这件《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虽以纸为书写质材，编制形式却与汉简历日的编册横读历日(第四种)相同，即保存了汉简历日编制形式之一种。换言之，它是早期历日到后世具注历日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也是迄今所见此种形制写在纸上的惟一一件。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历日形制看成一个发展链条，此件高昌历日上承汉简历日，下接后世具注历日，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仅此一端，也可看出其价值不容小视。

【注释】

[1]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1986年阿斯塔那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2期。

[2] 柳洪亮《新出麴氏高昌历书试析》，《西域研究·新疆文物特刊》1993年2期，16~23页。

[3]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4] 参见拙作《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文物》1986年12期；《敦煌古历丛识》，《敦煌学辑刊》1989年1期；《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文物》1990年9期；《关于敦煌历日研究的几点意见》，《敦煌研究》1993年1期。

[5] [6] 黄文弼《高昌砖集》，第65页。



[7] [8] 《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148~180页。

[9]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70页。

[10]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78页。

[11] 同注 [9]，第193页。

[12] 同注 [10]，第248页。

[13] 说见李征与穆舜英、王炳华合撰《吐鲁番考古研究概述》，《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第20期（总第120期）。

[14] 日本金泽文库藏宋刊本具注历日半页9行。照片见《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三号插图；又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613~1615页。

[15] 各历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形制分类参见陈久金《敦煌、居延汉简中的历谱》，《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111~136页。

[16] 此敦煌出北魏历日1997年回归敦煌研究院。1994年冬，我应饶宗颐教授之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饶公面谕，他于1982年率领学生赴日实习，期间得以参观“八代聚珍展”，看到此历陈列在展品中，后向主人索得照片一份。1993年初，日本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亦赠我此历拷贝扩印件一份，与饶公所得同。关于此历日内容，参见拙作《敦煌本北魏历日与中国古代月食预报》，《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360~372页。

[17] 参见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原载《文物》1996年2期，34~40页）

跋吐鲁番文书中 的两件唐历

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曾出土两件唐代写本具注历日。一件出自二一〇号墓（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73~76页），一件出自五〇七号墓（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231~235页）。虽残破过甚，但均是唐代早期历日实物，对研究初唐历日制度和历日内容的演进，仍堪称珍贵。

—

二一〇号墓历日释文如下（序号为行数，原为竖行，下同）：

〔前缺〕

1 恩天赤^[1]母

2 四月小

3 ☐月大 八月☐小 九月☐ 十月大 十一月☐

4 ☐月大

5 ☐☐甲申水破 岁位、阳破阴冲。

6 ☐日乙酉水危 岁位、小岁往后（“往后”二字间原有互乙符号）亡、葬吉。

7 ☐日景戌土成 岁对小岁后。

8 四日丁亥土收 岁对小岁后、嫁娶、母仓、移徙、修



宅吉。

9 五日戊子火开 岁对母仓、加冠、入学、起土、移徙、修井灶、种蒔、疗病[吉]。

10 六日己丑火闭 岁对归忌、血忌。

11 [][][][][][] 三阴孤辰。

[中缺]

12 [][][][][][][][] [岁]前九坎、疗病、斩草吉。

13 [][][][][][][满] 岁后小岁前，母仓。

14 []九日己亥木平 岁后，祭祀、纳妇、加冠吉。

15 廿日庚子土定 岁后，加冠、拜官、移徙、坏土墙、修宫室、修碓硙吉。

16 廿一日辛丑土执 岁后，母仓、归忌、起土吉。

17 廿二日壬寅金破 岁后，疗病、葬吉。

18 廿三日癸卯金危 岁后，结婚、移徙、斩草吉。

19 廿四日甲辰火成_{下弦} 阴错。

[中缺]

20 [][][][][][] [九][月][节] [岁][对]天恩、[母][仓]、祭祀、拜官、结婚、[嫁][娶]、入[学][修][][][]

21 四日癸未木收 岁对天恩，纳征、嫁娶吉。

22 五日甲申水开 岁对葬、解除。

23 六日乙酉水闭 岁位小岁前，塞穴、解除、葬吉。

24 七日景戌土建 岁位小岁前。

25 八日丁亥土除 岁位小岁前，修井、碓、硙，疗病、解除，扫舍吉。

26 九日戊子火满_{上弦} 岁位归忌。

27 十日己丑火平 岁位。



28 十一日庚寅木定 行□。

29 □二日□□□□ □□□□

(73TAM210: 137/1、137/3、137/2)

残历7行、24行两“丙戌”均作“景戌”，系避唐先祖名讳而改，可知为唐代历日无疑^[2]。对于其确年，原编者在释文前说明如下：“本件纪年已缺。知前为正月，并推知元日为甲申。又据行二〇‘九月节’一句，知此段为残九月历，并推知一日为庚辰。12至19行虽残，未知何月，亦可推知一日为辛巳。查《二十史朔闰表》知唯高宗显庆三年元日为甲申，九月一日为庚辰，其年七月一日为辛巳。因定本件纪年为唐显庆三年。”所定年代正确无误，这里略加分析。

其一，关于第20行“九月节”。查二十四节气，九月节为寒露；四日癸未，一日当为庚辰，即其朔日，以此段为九月历日亦无误。所可注意者，古代历日所标某月节气与历日月份并不完全对应。节气是按照太阳在黄道位置确定的，而历日月份则是朔望月，以月亮圆缺为依据。因此，十二个朔望月同二十四节气一周相差近十一天。古人为使节气所在农历月份相对稳定，以利农业生产，便需置闰。而一旦发生闰月，节气与原在月份就会错开，进入闰月之后半月，约经十多个月才能逐渐恢复到对应的月份。如此历所标“九月节”在九月三日，若此前数月内有一闰月，“九月节”就会提前，注在八月后半月某日之下，本文以下讨论的第二件历日即属此类。因此，单凭节气月份判断残历月份并不可靠。幸好显庆三年无闰月，显庆二年虽闰二月，但相去已远，故这里的“九月节”与九月正好相当，否则就需格外注意。

其二，原编者说明12至19行一段历日“未知何月，亦可推知一日为辛巳”。辛巳为此段历日月朔无疑，月份亦可考知。依据残历14行“〔十〕九日己亥木平”，并据六十甲子纳音^[3]及建除十二客的排列次序^[4]，逆推可得：13行是“十八日戊戌木



满”，12行是“十七日丁酉火除”，再前一日是“十六日丙申火建”。建除十二客虽是古代历日中推算吉凶的迷信方法，但“建”字与所在日期地支间却有一定规律，其对应关系是：

“建”字所在日期范围	对应日期地支
立春——惊蛰前一日	寅
惊蛰——清明前一日	卯
清明——立夏前一日	辰
立夏——芒种前一日	巳
芒种——小暑前一日	午
小暑——立秋前一日	未
立秋——白露前一日	申
(以下依次排列，略)	

立秋为七月节，白露为八月节。由残历推出的“十六日丙申火建”，“建”与该日地支“申”相应，正处于二节之间。由残历“九月节”寒露在九月三日又可推知，该年立秋、白露二节分别在七月初和八月初，可知此段历日当在七月初至八月初。残历日期又都在下半月，故知此段历日当属七月。这样，此墓出土的三段历日，分别为正月、七月和九月，朔日依次为甲申、辛巳和庚辰。以此三月朔日并结合2~3行所记各月大小，与《二十史朔闰表》相对照，同唐显庆三年完全一致，就可确知其均为显庆三年（658）历日。

显庆三年，唐用傅仁均《戊寅历》。此历颁行于武德元年（618），至显庆时误差已多，故又于麟德二年（665）改行李淳风的《麟德历》^[5]。从历法史角度看，残历是《戊寅历》行用后期的历日，也是现知《戊寅历》实行期间的惟一历日实物。此时定朔尚未引入历日，残历中的朔日都应是平朔，节气也是平气。



二

五〇七号墓历日释文如下：

[前缺]

- 1 丑金破_望
- 2 八日景寅火危
- 3 十九日丁卯火成
- 4 廿日戊辰木收
- 5 廿一日己巳木开
- 6 廿二日庚午土
- 7 廿三日辛未土
- 8 廿四日壬申金
- 9 廿五日癸酉
- 10 廿六日甲戌土^[6]
- 11 廿七日乙亥 祭祀内财
- 12 廿八日景子 位祭祀加冠纳
- 13 廿九日丁丑 归忌。
- 14 卅日戊寅土 岁位解除吉。
- 15 土危 岁位天恩往亡结婚
- 16 辰金成_{后伏} 岁对厌天恩母仓
- 17 金收 岁对天恩加冠
- 18 木开 岁对天恩加冠
- 19 木闭 岁对天恩母仓
- 20 水建 岁对复



21 [] 除 三阴 [疗] []

22 [] [满] 处暑
七月中 []

[后缺]

(73TAM507: 013/4—1)

以下还有数段，因过分残碎，于断年无补，从略。

残历2行“景寅”、12行“景子”，仍系讳“丙”而改，知其为唐代历日。至于确年，原编者态度审慎，仅题为《唐历》，不作定论。笔者认为也可考明。

残历15行以下日期全失，但14~15行间系两纸粘连处，本身已具有纪日连续性的可能。从纪日干支看，14行卅日戊寅，15行当为下月一日己卯，16行二日当为庚辰。16行干支残存一“辰”字，正相符合。以下可逐日填齐，直至八日“景戌”。从六十甲子纳音看，14行卅日戊寅为土，下一日己卯亦为土。残历15行虽失日期干支，但仍存一“土”字，也与所推干支相符合。从建除十二客看，第5行廿一日己巳为“开”，第15行为“危”，中间残失某月廿二日至卅日的建除十二客。二十一日既作“开”，以下由二十二日至卅日依次当作：闭（廿二日）、闭（廿三日）、建（廿四日）、除（廿五日）、满（廿六日）、平（廿七日）、定（廿八日）、执（廿九日）、破（卅日），与15行的“危”正相衔接。“闭”字所以重复一日，亦取决于建除十二客的特殊规律：节气（非中气）所在之日重复前一日一次。以此检查残历，22行注有“处暑七月中”，为八日，则此前的“立秋七月节”当在处暑前15天多（其时用平气），即第7行廿三日之下。廿二日为闭，则廿三日应重复一次，仍作“闭”^[7]。以上说明，残历的干支、六十甲子纳音、建除十二客都是连续的，应是连续书写的历日。

残历月份。由前述考察可知，第8行“廿四日壬申金[]”，



“金”字下当填“建”字。“建”字所对应的该日地支“申”之日期，应在立秋七月节和白露八月节之间（详前）。前又推得“立秋七月节”在第7行“廿三日辛未”，正当其前。但这并不能说明残历前14行是某年七月的历日。前已说明，只要此前数月内曾有闰月，则节气就会提前进入上月之后半月，节气月份与农历月份不再对应，本件历日即属此类。“处暑七月中”注在22行八日（推算所得），则“立秋七月节”所在的上月廿三日应属六月。换言之，残历所存是某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部分。而由残历日期干支又可推得，六月大，己酉朔；七月□，己卯朔。

残历确年。前由讳“丙”为“景”得知，此历为唐代历日。以六月己酉朔与七月己卯朔，同《二十史朔闰表》相对照，有唐一代仅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和唐文宗大和三年（829）与此相当。同墓所出数十件文书，有确切纪年者，上限为高昌延寿六年（629），下限为唐高宗调露二年（680），仪凤四年（679）正在此一时间范围之内，而文宗大和三年在一百数十年之后，相距甚远。再检以《二十史朔闰表》，仪凤三年闰十月，致使节气和月份错开，正是残历立秋七月节注在六月下旬的原因。因此，应定此件为《唐仪凤四年具注历日》。

仪凤四年，唐朝行用李淳风的《麟德历》。此历有两大创新，一用定朔排历谱，二以无中气之月置闰，但节气仍用平气^[8]。不过，使用定朔并不彻底。为了克服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相连的现象，制历者或将朔日下推一日，使第三个小月变为大月，或上退一日，使第四个大月变为小月。故残历的朔日并非一定全是定朔，节气则是平气。

传世文献所载仪凤三年之闰月，《旧唐书·高宗纪》为闰十月，《新唐书·高宗纪》为闰十一月，故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两说并存，遂成千古之谜。以此残历“处暑七月中”在仪凤四年七月八日，逆推可得，仪凤三年冬至十一月中气在十一月一



日，且上月为小月，则大雪十一月节气必在该小月之十五日，此月遂成无中气之月，即闰月。质言之，仪凤三年当闰十月，而不闰十一月。此谜由此而涣然冰释。反之，由闰月的确定也可证明我们所定年代正确无误。

三

历书行用区域，是封建王朝权力所及的重要象征。唐于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国，设西州，开始对高昌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两件历日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亦是明证。

两《唐书·历志》所载《戊寅历》和《麟德历》，主要是其推步方法和数据，而此前却未见到二历的实物样本^[9]。显庆三年和仪凤四年唐历的出土，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

古代历日内容如何演变发展，以往由于实物太少而无从寻觅其发展轨迹。见于敦煌文献的数十件历日，最早者为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历和十二年（451）历^[10]，此外大多是晚唐至宋初的敦煌地方具注历日，间有中原王朝历日，也为数甚少。唐前期的历日则未见到。这两件历日实物的出土，使我们有了粗略地勾画历日内容演进轨迹的可能。

北魏太平真君历内容至为简单。如十一年历正月是：“正月大，一日壬戌收，九日立春正月节，廿五日雨水。”其下各月仿此，间有社日和腊日的注记。总体上看，也只有月大小、朔日干支、建除十二客和二十四节气。除建除十二客属于迷信，其余都很实用。至唐初，显庆三年历和仪凤四年历不仅包含了北魏历日的基本内容，而且又增入如下各项：（1）序言中注明各月大小；（2）逐日日期、干支、六十甲子纳音；（3）弦望；（4）三伏天；（5）逐日吉凶注。（1）、（3）、（4）为实用内容，（2）、（5）多为迷信。但内容仍较简单。至晚唐五代，不仅敦煌地方历日，而且



中原历日，如《唐乾符四年历日》^[1]，内容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晚唐至宋初的敦煌历日大体可分繁简两种。简本历日与显庆三年和仪凤四年历大致相同，而繁本迥异。一般来说，繁本历日包括八项内容：(1) 日期、干支、六十甲子纳音、建除十二客；(2) 弦、望、往亡、没、籍田等注记；(3) 节气、物候；(4) 逐日吉凶注；(5) 昼夜时刻；(6) 日游；(7) 人神；(8) 蜜日（星期日）注，以朱书或墨书注于当日顶端。每件历日都有较长的序言，内有年九宫图、年神方位、五姓吉凶月所在等。每月之首有月九宫图、月大小、月建干支及天道行向、月神所在位置、四大吉时等。科学和迷信内容几乎是在同步猛增。其中星期制度系经西域引入，当时仍用于占卜^[12]，但也反映了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月建干支传为唐代方士所创^[13]，一改此前长久的以地支纪月。繁杂的吉凶注，则由汉代以来阴阳家、堪舆家、建除等家著述中的陋说撮取而成。晚唐五代繁本历日的内容，奠定了宋至清代历书的基本格局，可知这是古代历日由简到繁的转折时期。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阿斯塔那墓地所出两件唐历都很有价值。

【注释】

[1] 赤：当释为“赦”，此行残存四字，前当填“天”，成“天恩”；后当填“仓”，成“母仓”。依堪舆家说，天恩、天赦、母仓均是吉辰，于此并列而言。就每项而论，在敦煌历日中颇为习见，释“赤”即难通解。

[2] 五代后唐以唐为正宗，历日亦改“丙”为“景”。如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所收后晋天福四年己亥岁（939）具注历日。此时已入后晋，但敦煌不知中原改年号，仍奉后唐正朔，历日以“丙”作“景”。故不可一概而论。

[3]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纳音说》。

[4] [7] 建除十三客的排列次序为：建、除、满、平、定、执、破、



危、成、收、开、闭。凡节气（非中气）所在之日重复前一日。如残历 20 行当是“三日壬午木成寒露九月节”，则上一日是“二日辛巳金成”，一日注“危”字。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 3 册 1646 页及 1647 页注⑤，1665~166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5] [8] 参见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中国天文学史》第 83 页，科学出版社，1981 年。

[6] 土：原字残存上半，依六十甲子纳音法，甲戌徵音属“火”，释“土”误。

[9]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斯坦因劫经录》2620 号注录《大唐麟德历》，误。这件文献的确切内容是唐大历十三年（778）至建中四年（783）的年神方位图。台湾所出《敦煌宝藏》亦未辨明。

[10] 苏莹辉将录文刊布于所作《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一文，载台湾《大陆杂志》1 卷 9 期。

[11] 藏英国图书馆，编号 S. P. 6，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66~67 页，文物出版社，1980 年。

[12] 参见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见《敦煌遗书论文集》116~133 页，中华书局，1984 年。

[13] 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 3 册，第 136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原载《文物》1986 年 12 期，第 58~62 页）

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八年 (720)具注历日》释文补正

吐鲁番阿斯塔那 341 号墓出土 1 件唐代历日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8 册第 130 ~ 131 页)。历日虽仅存 5 行,且文字不全,但仍然是极为难得的唐代历日实物。残历经整理已发表释文,笔者不揣谫陋,特试作补正如下。

为便于讨论,兹将原释文和注释逐录如下(原为竖行):

唐开元八年具注历

1. 八[日][]……[岁][位][加][官][拜][官][修][宅][吉]

2. 九日庚寅木危 大暑六月中
伏退乳至岁位斩草祭祀吉

3. 十日辛卯未^①成 岁位

4. 十一日壬辰收 岁位疗病修宅吉

5. 十二日癸巳水閤(闭)没 岁位

[后缺]

[校记]

①“未”应为“水”字之误。

编者将此残历定在唐开元八年(720)是完全正确的。在说明文字中曾指出:“据‘大暑六月’一句,知是六月残历,并知初一为壬午。据《二十史朔闰表》知武周永昌元年、唐开元八年、天宝五载,



六月初一皆为壬午。今依《麟德历》推之，开元八年大暑干支适为六月庚寅，与此残历所记相吻合。”这里再作一点补充说明。据张培瑜先生新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1]一书，武周永昌元年（689）大暑在六月二十七日戊申，唐开元八年（720）大暑在六月九日庚寅，天宝五载（746）大暑在六月二十六日丁未。此墓出土文书所见纪年，最早为武周大足元年（701），其余有开元早期的纪年，只有开元八年是惟一吻合的，因此所定年代正确无误。

但在这五行残历的具体释文中有数处错误和遗漏，今分别补正如后。

（一）关于九日正文下面的小注

原释文为：“大暑六月中伏返瓠至。”“大暑六月中”一句意义完整，清楚无误，也是本残历据以确定为唐开元八年的主要依据。问题在于“伏”字到“至”字4个字如何理解。这个“伏”字应与三伏天有关。我国古代历日注三伏，即初伏、中伏、后伏，以表示一年中最热的天气，唐以后概以农历夏至后第三庚日起为初伏，第四庚日起为中伏，立秋后第一庚日起为末伏或后伏。据前引张培瑜书，开元八年夏至在五月八日庚申，则第二庚日在五月十八日庚午，第三庚日在五月二十八日庚辰，即为初伏日。因五月是小月，则第四庚日在六月初九日庚寅，是为中伏日。但从原释文看，“大暑六月中”自成一句（说明文字中将“大暑六月”断为一句不当），意思是大暑是六月的中气。此类句型屡见于敦煌文献中唐至宋初历日，并不为奇。由此可知，原释文中的“伏”字不能说明开元八年六月初九日是中伏，“伏”字前必脱一“中”字。“大暑六月中”与“中伏”恰好有两个“中”字相连，唐人于此种情况对第二个“中”字多用重文符号“ㄣ”来代替。此处释文脱漏一重文符号，或原脱而释文未予补足，以至使“伏”字意义不明。

“伏”字后面的3个字，最后一个“至”字清楚无误，前二



字仅是对原卷的摹写，而未弄清其真实含义。依据现知唐代历例，在注明节气之后，一般要在相应的日期下注明本节气所含的3个物候。“伏”字后面的3个字也应是一个物候名称。《旧唐书·历志》载有李淳风的《麟德历》和僧一行的《大衍历》，并详细记载了两历各节气所含物候。《麟德历》大暑下的3个物候是温风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大衍历》大暑下的3个物候则是腐草为萤、土润溽暑和大雨时行。《大衍历》是开元十七年(729)才开始行用的，开元八年行用的是《麟德历》。我们从残历中看到“至”字清楚无误，且此前只有两个字与“至”字相连，那么这个物候名称就只能是《麟德历》大暑下的“温风至”3字。

归纳起来，残历九月正文下面的小注应作：“大暑六月中之伏温风至。”这样，六月的中气是大暑，中伏开始，物候是温风至，三层意义便完全连贯晓畅了。

(二) 关于“十日辛卯”之后的“未”字

编者在注释中说明：“‘未’应为‘水’字之误。”原历如作“未”字，固属错误，但注释改为“水”字仍不正确。这份残历的内容与敦煌写本历日大致相同，日期、干支之后用金、木、水、火、土所记的字，是表示各干支同纳音的关系。六十甲子纳音，清儒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卷三《纳音说》一节述之甚详。我曾据钱氏此说绘成一表^[2]，用以核对敦煌历日，证明钱说完全正确。六十甲子与纳音的对应关系，见于敦煌文献的也有4件，编号为S.1815(2)、S.3724(3)、P.3984背和P.4711，内容均是“甲子乙丑金，丙寅丁卯火……庚寅辛卯木，壬辰癸巳水”等等。显然，同干支“辛卯”对应的纳音只能是“木”，既不能是“未”，也不能是“水”。

(三) “十一日壬辰”与“收”字间脱一字

从残存历日可以看出，干支“壬辰”之下必然注有与之相对



应的纳音关系。由于壬辰和癸巳的纳音均为“水”（详上），则“壬辰”和“收”字间当补一“水”字，历日内容方能完整，并合乎历例。

（四）“十二日癸巳水”后的“闭”字误

敦煌吐鲁番所出唐至宋初历日，一般各日开头均是4项内容，即日期、干支、纳音和建除十二客。这里的“闭”字当属建除十二客的内容。建除十二客共12个字：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各主一定吉凶，在战国时的秦简中已有记载^[3]，后世历日多沿用不改。其排列特点主要有二：一是自立春正月节后的第一个寅日注“建”字，顺次往下排列；二是凡节气（非中气）所在之日的建除十二客要重复前日一次，于是各星命月里纪日地支同建除十二客之间便形成了固定的对应关系^[4]。依照12字的排列顺序，“收”字后只能是“开”字，而不可能是“闭”字；依照上面提到的固定对应关系，本历六月十二日的纪日地支为“巳”，从小暑六月节到立秋七月节之间，亦即古代星命家的“六月”中，与纪日地支“巳”相对应的建除十二客也只能是“开”，而不是“闭”。由此可知，此“闭”字乃“开”字之误。

【注释】

[1]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版。

[2] 参拙作《敦煌古历丛识》，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1期，107～118页。

[3] 见《文物》1989年2期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一文及同图版伍甲1～甲12简。

[4] 参拙作《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文物》1990年9期，83～84页。

（原载《文物》1992年6期，第92～93页）

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1407)具注历日》考

1996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我编著的《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一书，对敦煌所出天文历法文献作了释录和校考；1997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拙编《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1]，又专就两地所出历日的图版加以汇集并做了释文。如今，绝大多数的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可从这两部书中见到。不过，仍然难称完备。随着新资料的陆续公布，有些文献就需要再做工作。本文研究的《明永乐五年丁亥岁具注历日》残片就是其中之一。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所使用的录文资料是由荣新江教授提供的，对此，谨表诚挚的谢忱。

原件今藏统一后的德国国家图书馆，编号 ch.3506。据荣新江抄录时所做记录，此件系一刻本，前、后和下部均残，顶端有一小截粗墨线边框，残存尺寸为 8×22cm。就残存部分看，原历在边框内至少由细线隔为四栏：现存上栏有“未伏”注记；其下一栏为日序、干支和六甲纳音；再下一栏为建除和二十八宿之注历；再下一栏为吉凶宜忌等选择事项。现在录文时要做如下技术处理：原为竖行，为便于排版而改横书；为便于讨论和省览，每行前施以行号（1~9行）；原件残失严重，据上下文推补的文字放入〔 〕中，不出校记；中间残字数量不能确定者，施以 表示。

〔前 缺〕



- 1 [] [二] 十一日 [癸卯金] 成 [张] 宜 []
- 2 [] [二十二日甲] 辰 [火] 收翼, 宜纳财、 []
- 3 [] [二十] 三日乙巳火开轸, []
- 4 [] [二十四日丙] 午水闭角, 宜祭祀、立券、交易、剔头、安葬, [] 不宜出行、 []。
- 5 二十五 [日丁未] 水闭亢, 立秋七月节, 宜祭祀, 不宜出行、栽种、针刺。
- 6 二十六日戊申土建氏, 日入酉正三刻, ^{昼五十六刻,}_{夜四十四刻。}宜祭祀、嫁娶。^{宜用}_{辰时。}不宜动土。
- 7 [二十] 七日己酉土除房, 宜祭祀、沐浴, 不宜出行、[移] 徙、栽种。
- 8 末伏 二十八日庚戌金满心, 宜进 []、裁衣, ^{宜用}_{辰时。}开市、交易、纳财。
- 9 [二十九日辛] 亥金平尾, 宜 []
[后缺]

下面将根据残历提供的条件, 对其准确年代进行考定。

(一) 关于残历的月份

由残历第5行所注“立秋七月节”即可推知, 残历是七月或七月前后的一段历日。中国古代自汉武帝《太初历》以后使用二十四节气注历, 每月一节气、一中气。但是, 节气所注日期并不一定就在其对应的月份。如本历“立秋”是“七月”的“节气”, 它可以注在农历七月的上半月, 也可以注在农历六月的下半月。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游移, 是因为使用闰月产生的结果。人们知道, 二十四节气属于阳历系统, 而朔望月则属阴历系统。十二个朔望月为三百五十四五天, 与一回归年相差十一天左右, 故需置闰, 才能使节气相对稳定在一定的月份之内。尽管如此, 一旦置



闰,就会使下月节气提前进入上月之后半月。这种情况,我们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仪凤四年(679)具注历日》^[2]中已经遇到过,不足为奇。本件历日残存日期为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立秋七月节”又注在二十五日,我们根据前面所说节气位置游移的原因即可判断,此段属于某年历日中六月下旬的一段。

(二) 关于“立秋七月节”

这个七月节注在二十五日丁未。由于前已考知,此段历日属于某年六月下旬,那么“立秋七月节”就是注在六月二十五日丁未这一天的。历法专家张培瑜教授在其《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3]一书中,给出了自秦朝以来“历代颁行历书摘要”,内含每年的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我们从宋朝立国的公元960年起开始检查,一直到辛亥革命,立秋在六月二十五日丁未的,只有明永乐五年(1407),此外一例相同的也没有。因此,可以初步认为,此历日为明永乐五年的具注历日。对于这个年代,我们还需用残历提供的其他条件加以考订。

(三) 关于二十八宿注历

迄今为止,在以往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北朝至北宋初年的历日中,尚未看到用二十八宿连续注历。这很正常。因为用二十八宿连续注历是从南宋时起历家为演禽术所加的历注类目,此前自然尚未在历日中连续出现,但用二十八宿连续注历具体起于何时,清人已经说不清楚^[4]。不过,传世本《南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已用二十八宿注历了。此后连绵不断,以迄今日东亚民用《通书》而不绝如缕。如果残历确实是明永乐五年的,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自南宋以来二十八宿注历是否与这件明历相连。需要指出的是,1983~1984年间,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在黑城曾发掘出土一件印本残历^[5],其中也用二十八宿注历。张培瑜先生考证此历为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授时具注历日^[6]。此残历使我们增多了一次检验的机会,看看这三件历日



的二十八宿注历是否都在南宋以来二十八宿注历的序列链条上。下面进行具体检查。

《南宋宝祐四年会天万年具注历》四月一日为“四月一日壬戌水破角”。“角”宿为二十八宿的开头，可知，此年四月一日为某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之始。

《元至正二十五年具注历日》七月五日为“七月五日辛酉木满轸”。“轸”宿为二十八宿的最末一宿，可知，此年七月五日是某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的终结。

自宋宝祐四年四月一日至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五日，共有 39900 天。

$$39900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1425 \text{ (周)}$$

可知，其间用了 1425 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

《元至正二十五年具注历日》七月六日是“[六日壬]戌水平角”，又是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之始。

《明永乐五年丁亥岁具注历日》六月二十三日为“二十三日乙巳火开轸”，是某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的终结。

自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六日至明永乐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共 15344 日。

$$15344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548 \text{ (周)}$$

可知，其间用了 548 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

还可知，自南宋宝祐四年四月一日至明永乐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共得：

$$(39900 \text{ 天} + 15344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1973 \text{ (周)}$$

大约在 151 年间共用了 1973 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

检验结果证明，无论黑城出土的《元至正二十五年具注历日》，还是吐鲁番出土的《明永乐五年具注历日》，都符合二十八宿注历的规则，也都在这一连绵不断的长序列上。这也可以证明残历是明永乐五年的历日。



(四) 关于“末伏”

中国古代用三伏注历，表示一年中最热的天气，自汉代即已开始。但那时注在夏至或立秋后第几“庚”日尚不规则。大约从唐代开始，三伏日期固定为：夏至后第三庚日为初伏，第四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庚日为末伏。残历二十八日最上面一栏注有“末伏”二字，其日干支为庚戌。检张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明永乐五年五月九日壬戌夏至，其后第一庚日为五月十七日庚午，第二庚日为五月二十七日庚辰；五月为小月，则第三庚日为六月八日庚寅，此日即初伏。六月十八日庚子为夏至后第四庚日，亦即中伏。六月二十五日立秋，六月二十八日庚戌为立秋后第一庚日，即“末伏”，或称“后伏”。残历所存“末伏”笔记与明永乐五年夏至、立秋日期及三伏所在完全吻合。

(五) 关于二十六日“日入酉正三刻，昼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的纪时内容

“酉正三刻”这样的纪时用语最早是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使用的。《元史·历志》一“昼夜刻”载：“日出为昼，日入为夜，昼夜一周，共为百刻。……春秋二分，日当赤道出入，昼夜正等，各五十刻。自春分以及夏至，日入赤道内，去极浸近，夜短而昼长。自秋分以及冬至，日出赤道外，去极浸远，昼短而夜长。以地中揆之，长不过六十刻，短不过四十刻。……今京师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夏至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黑城所出《元至正二十五年具注历日》残片上，七月月序内容有“一日丁巳午初初[刻](下残)”的用语。明永乐五年时使用的是明代《大统历》(详下)，但纪时用语一仍其旧，以至到清代《时宪书》也还在使用^[7]。

至于残历所纪“昼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显然是“百刻”纪时制的产物。元代实行百刻纪时制已见上引《元史·历志》一，明代实行的仍是这一制度。只是到清代后才改为96刻制^[8]。由



此可见，残历的纪时制度也在我们推定的年代范围之内。

从以上检验可以确认，残历是《明永乐五年丁亥岁具注历日》。

永乐五年时，明朝所用《大统历》实即著名的元朝《授时历》的延续。郭守敬所制《授时历》，是中国传统历法最高成就的体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以后，于公元 1367 年的十一月冬至，太史院使刘基率其属下高翼上呈次年历书，即《大统历》。名虽有别，但实际却同《授时历》完全一样。无怪乎 1384 年漏刻博士元统上书时曾说：“历以‘大统’为名，而积分犹踵‘授时’之数，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此历后在元统任钦天监监令时做了一些修改，一直使用到明末。故薄树人先生认为：“从实质上说，也就是授时历一直行用到明末。”^[9]

如前所述，此残历属于刻本历日。而黑城所出《元至正二十五年具注历日》也是刻本。写作本文时，我虽然未见到《明永乐五年具注历日》的照片，但将本文使用的录文与黑城所出元历对照，发现栏次、板式基本相同，一如本文开头所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两件残历都属于《授时历》系统的实行历书。

那么，这件明朝官颁历日是如何到达吐鲁番地区的呢？就该地区的历史来说，大约从公元 1283 年至 1756 年，是蒙古民族统治的时代。这期间，元朝在公元 1368 年灭亡后，吐鲁番地区被察合台汗国所占领。后来又经过几种势力的消长变换。但总体上说，吐鲁番地方王国对明朝是表示臣属的，并且朝贡不绝，与明朝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往来^[10]。而“颁正朔”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权力所及的重要象征。吐鲁番地方王朝既向明朝称臣，明朝历书颁行到该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或许正是这件残历出现在吐鲁番地区的原因^[11]。

还要指出的是，大约从明朝中叶起，明清两朝近 400 年历书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12]。但明初的历书实物仍属少见。我们



这件《明永乐五年具注历日》虽仅剩一小残片，但对研究《大统历》早期的内容、形制，以及与《授时历》的关系，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一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2] 参拙作《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年12期，58~62页。

[3]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4] 参（清）《协纪辨方书》卷一“二十八宿纪日”条。见《历代方术概观·选择卷上》，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98~99页。

[5] 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载《文物》1987年7期，1~23页，残历见此文配图37（F19：W18）。

[6] 见张培瑜《黑城新出天文历法文书残页的几点附记》，载《文物》1988年4期，91~92页。

[7] 参（清）《协纪辨方书》卷十二“日出入昼夜时刻”条。

[8] 参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117~118页。

[9] 参同[8]，第87页。《明史·历志》一云：“惟明之《大统历》，实即元之《授时》，承用二百七十余年，未尝改宪。”

[10] 胡戟、李孝聪、荣新江《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年，82~85页。

[11] 由于德藏吐鲁番文书多从佛寺的藏书室中发现，我们不排除它也可能由别的途径到达吐鲁番。

[12] 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见“前言”2页。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第263~268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 岁（1182）具注历日》考

由俄罗斯著名敦煌学家孟列夫教授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公布了一大批以前未尝面世的中古时代文献，尤以刻印本文献居多。这批文献的价值，各界学者正在就其研究领域之所在展开探讨，其价值将日益彰显。由于个人研究的主旨所在，笔者对其中刊布的具注历日尤为关心。本文将考察一件印本残历日。此件编号为“俄 TK297”，刊布在《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第四册第 385 页下栏至 386 页上栏。刊布时仅题“历书”，而未标明其确切年代。孟列夫教授在此前出版的《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中也曾对此件作过著录。他指出：“两件木刻本残片，卷子装，按某本书的面幅剪下来的残片，宋体字，宋刻本（12 世纪前 30 年的）。残片 1.43×19.5 厘米，卷子的一部分，两残纸，从某月的 11 日至 23 日。……残片 2，11.5×12 厘米，卷子的下半截，第 4 和第 5 纵行，第 4 纵行的末尾有干支‘丙午’……”^[1]

为了讨论方便，笔者根据自己对图版的观察，再做说明如下：原件确为一雕版印本历日，前、后、上、下均有残失。就现存面貌看，残存内容由上到下至少有五栏：（1）日期、干支、六甲纳音和建除；（2）二十八宿注历；（3）望、蜜、沐浴、归忌等；（4）鸿雁来等物候内容；（5）月神、日神、时神等神煞及选



择宜忌。第五栏每栏有2~5行字。这样，我们在录文时就必须做一些特殊处理：原则上以日为单位，每日一栏，标为1、2、3……；每日第五栏内的行次再分为①、②、③……。我们在讨论时可能同时提及，比如1①行便是第1行第五栏的第①小行，如此等等。依据历日推补的内容放入〔 〕中，不出校记，讨论时将予说明。

先释文如下：

残片一：

〔前缺〕

1 〔十日辛巳金〕〔 〕坎九五；公渐；葬事出兵〔 〕〔 〕
(按，此三小句各在一栏，不能连读)

2 〔十〕一日壬午木定 心

①吉日。岁位、天德合〔 〕

②月空、天喜、天马〔 〕

③民日、鸣吠、时阴〔 〕

④宥、招集贤良、纳綵〔 〕

⑤会亲姻、远行、移〔徙〕、〔 〕

3 〔十〕二日癸未木执 尾

①吉日。岁位、天恩、枝〔 〕

②玉堂黄道，宜宣政〔 〕

③舍宇、和会交关、捕捉〔 〕

4 〔十〕三日甲申水破 箕

①大耗、天牢黑道、徙〔 〕

②伐日。不宜临政事〔 〕

③师旅与修造动〔 〕

5 〔十〕四日乙酉水危 斗 沐浴

①吉日。岁对、小岁后〔 〕



②守日、神在□□

③宜葬埋、祭祀□□

6 十五日丙戌土成 牛 鸿雁来

①吉日。岁对、小岁后□□

②三合、天府明星、司□□

③四相。宜造宅舍□□

④药、尊师傅、会□□

7 十六日丁亥土收 女 望 辟泰

①天魁、重日、劫杀□□

②勾陈黑道□□

③嫁娶、开仓、剃□□

④词讼、迁居、筑□□

8 十七日戊子火开 虚 蜜

①天火、天狱、不举□□

②不宜论讼、上官□□

9 十八日己丑火闭 危 归忌、除手甲

①吉日。岁对、七圣□□

②执储明星、明堂□□

③宜祀神祇□□□□

10 [十九日庚寅木建 室]

①小时、天刑黑道□□

[后缺]

残片二：

[前缺]

11 [廿三日癸亥] □□□□

①四月十六日乙酉（按，当为丙辰）其夜子初三刻后，艮时

□□□□

②坤乾时、寅前□□□□



12 [廿四日甲子金] ☐家人

- ①月刑、小时、地火、土府、土符、伐日、
- ②兵禁、月厌。不宜兴发军师，攻
- ③讨城寨，掘凿动土，盖屋、经络、
- ④嫁娶、纳亲、牧放群畜。

13 [廿五日乙丑金]

- ①吉日。岁后、月德合、六合、兵宝、大明。
- ②吉期、神在。宜修宫宅第，兴发
- ③土工，训卒练兵，祀神市估。

14 [廿六日丙寅火] 鸛始鸣

- ①吉日。岁后、月空、驿马、天后、天巫、大明，
- ②兵吉、福德、相日、神在、鸣吠、岁德
- ③青龙黄道、七圣。宜训练军师、营葬
- ④坟墓，安置产室，进口、经络。

15 [廿七日丁卯火]

- ①天刚、五盗、死神、天吏、天贼、致死、五离、
- ②复日。不宜动土工、出远行、会宾客、
- ③营葬礼、兴词讼、合交关。
- ④开(?)导井泉 ☐ ☐ 针刺。

16 [廿八日戊辰木]

- ①岁后、小岁位、天恩、月恩、四相、生气、
- ② ☐ 安、夏天德、天岳明星、神在、七圣、
- ③时阳。宜宣覃恩宥，旌拜功勋，策试
- ④贤良，崇尚师傅，祭祀神祇，出行牧放。

17 [廿九日己巳木]

- ①吉日。岁后、四相、王日、玉堂、七圣。
- ②宜临政、上官、闭塞孔穴、修补垣墉，
- ③泥饰宅舍。



18

①自四月二十七日丁卯午正三刻芒种，已得五月之节

②宜向西北行，又宜修造西北维。天德在乾，月厌

③月德在丙，月合在辛，月空在壬，丙、辛、壬上取

19 丙午（二字较大） 用艮巽、丑后、辰后

[后缺]

以上我们共录出十七天具注历日的内容(1~17行)和两行月序文字的内容(18~19行)。现在对其年代进行考定并加讨论。

(一) 残历十至十九日(1~10行)的月份

残历共存两断片，第一片即1至10行，第二片为11~19行。第一片中，十五至十八日(6~9行)的日期是完整的，其前数日则可依日序和干支表补齐。残存八日中，每日均有建除注历。依据建除十二客同纪日地支的对应关系，定与午、执与未、破与申、危与酉、成与戌、收与亥、开与子、闭与丑相对应，全是星命月中正月的内容^[2]。残历6行又有一个物候注“鸿雁来”。而在传统历书中，它是“雨水正月中”气下的一个物候。由此我们即可判断，残历1~10行属于正月历日。从十五日干支为丙戌可推知正月朔日为壬申。

(二) 残历的纪年天干范围

第18行有“天德在乾”、“月德在丙”、“月合在辛”、“月空在壬”等月神方位日期，而这些全是五月月序的内容^[3]。第19行又有较大的“丙午”二字，当是五月的纪月干支。五月为丙午，则正月经月干支为壬寅，与之对应的纪年天干是丁或壬^[4]。就是说，此历的年天干不是丁，便是壬。

(三) 残历11~17行的月份与日期

前已说明，18行是五月月序内容。那么在其前面且与之相连的11~17行当是四月的历日。但我们不知四月的月大小，无法确定17行是四月二十九日还是三十日。可是18①行有“自四



月二十七日丁卯午正三刻芒种”云云，即可获知四月二十七日干支为丁卯。如果四月是大月，则此丁卯日当在 14 行；如果是小月，则在 15 行。我们看到 15②行有“复日”注记。从敦煌历日中众多的复日注记，我们知道，复日仅与天干对应，而不与地支配对应。在“星命月”的五月里，复日是注在“丁”日的。由于芒种五月节不在 14 行，就在 15 行，而一进入芒种就算进入“星命月”之五月，所以，由复日可知，15 行天干当是“丁”，此日也必是丁卯日，不可能是 14 行了。既然 15 行是二十七日为丁卯，则 16 行为二十八日戊辰，17 行为二十九日己巳。再往下便是五月一日了，五月朔日当为庚午。四月二十七日为丁卯，则四月朔日当为辛丑。现将已考出的三个月朔整理如下：正月 [?]，[壬申朔]；四月 [小]，辛丑朔；五月 [?]，[庚午朔]。

(四) 残历的年份

第 19 行注有“四月二十七日丁卯芒种”，说明某年的芒种五月节在四月二十七之丁卯日。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5]一书给出了自秦朝以来每年的节气所在日期及干支，使用起来极为方便。由于此残历有二十八宿注历（见 2~9 行），而此法连续使用始于南宋，故南宋以前可不考虑。我们从公元 1127 年查起，发现宋孝宗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的芒种是在四月二十七日丁卯，与残历相一致。故可初步考虑它就是残历的年份。

(五) 残历 8 行，即正月十七日戊子有一“蜜”日（星期日）注

如果认为此历为公元 1182 年历日，则此日合西历 1182 年 2 月 21 日。查《日曜表》，恰是星期日。淳熙九年干支为壬寅，与前此考出的此历纪年天干不是丁便是壬也符合；正、四、五月的月朔也相一致，故可将残历的年代加以最后确定。

(六) 从对残历进行定年的角度而言，我们的工作到此应该说已经结束，但是此历是用二十八宿注历的，于是就给我们提供



了一次对所定年代进行检验的机会

残历2行注“心”，是十一日，反推上去，则十日为“房”，九日为“氐”，八日为“亢”，七日为“角”。“角”宿是中国传统二十八宿的第一宿。因此，宋淳熙九年正月七日是某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的开始。

传世南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也是用二十八宿注历的，其三月最末一天为“三十日辛酉木执轸”^[6]，“轸”宿是二十八宿的最末一宿，可知此日是某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之末。

从淳熙九年正月七日至宝祐四年三月三十日共有 27104 天^[7]。

$$27104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968 \text{ (周)}$$

可知在这 74 年左右的时间里，共用了 968 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淳熙九年的二十八宿注历与宝祐四年的二十八宿注历是连贯的，与黑城出土的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历日、吐鲁番出土的《明永乐五年丁亥岁（1407）具注历日》^[8]也是连贯不断的。它证明我们所定年代完全可靠。

淳熙九年宋朝行用的是《淳熙历》。此历颁行于淳熙四年（1177）。宋朝自南迁之后，命运多舛，理国维艰，所制历法无太多优长可言者。此淳熙历的历法亦无太明显的长处，以致行用十年后，国学进士石万上奏指出：“《淳熙历》立元非是，气朔多差，不与天合。……南渡以来，浑仪草创，不合制度，无圭表以测日景长短，无机漏以定交食加时……”^[9]尽管如此，此件残历也是南宋早期的历日实物，十分珍贵。

这里我们还要指出两点：第一，此淳熙九年历日是现存用完整二十八宿注历最早的一件，而且与其后的宝祐四年历日相连贯。以二十八宿连续注入历日，各主吉凶，以往仅知始于南宋，而且南宋实物仅有传世的宝祐四年历。此历比宝祐四年历早了



75年。显然，用二十八宿注历一法比淳熙九年还早。相信以后随着出土实物的增多，此法之起始点会日渐明朗。同时，因为与宝祐历相连，所以，残历注入各日的二十八宿也可当做检验坐标，尤其是淳熙九年正月七日为“角”，更应成为一个标尺。第二，敦煌历日中最晚的一件是《淳化四年癸巳岁（993）具注历日》，至此淳熙九年共过去189年。我们发现，此历所注入的一些神煞内容，如七圣、天魁、玉堂、民日、天喜、天马、伐日、小时、土府、土符、神在、福德、相日、驿马、天巫、天后、大明、月恩、四相、生气、时阳等，在敦煌历日中尚未见到。这就说明，自中唐至南宋，是中国传统历日中术数文化内容大步发展的时代。众所周知，清人辑成的《协纪辨方书》是术数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但是，这一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以往并不十分清楚。仰赖出土文献和文物，其发展线索才逐渐清晰起来。我们期待着再有更多的历日实物出土，以便对术数文化的发展史能获得更深层次的认识。

【注释】

[1]〔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24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2]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第741页，见《各星命月中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对应关系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以下引此书简称《辑校》。

[3]参见《辑校》，第738页，附录三《月神方位、日期表》。

[4]参见《辑校》，第745页，附录一〇《正月月建与纪年天干对应关系表》。

[5]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6]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一册，第695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7]依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朔闰表计算。

[8]拙作《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1407）具注历日〉考》，



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集，263～2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9]《宋史·律历志十五》。

（原载《华学》第四辑，第131～135页，
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8月）

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 (1211)具注历日》三断片考

在近年陆续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一书中，刊布了一些具注历日的断片，颇受关注。其中“俄 TK297”号我已考定为《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1]，属于南宋“淳熙历”的实行历书。今再考察另外三个残段，最终证明它们都是《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三个断片中，“俄 TK269”号、“俄 ИHB NO.5469”号已正式刊布^[2]，而“ИHB NO. 5282 号加 8117 号”则是我国著名西夏文专家史金波教授于 2000 年夏赴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整理该所未编目文献时发现的。其发现之功不可泯没，著录于此，以表敬意。

一、ИHB NO.5282 号加 8117 号

此号即史金波教授新发现的一段。从照片复印件看，上下左右均有残失，估计下部残失更严重一些，但属于一印本历日无疑。现存部分由两片组成，分别编为 8711（一）和 8711（二）；自上至下仍存五栏，分别是：（1）日序、干支、纳音和建除；（2）二十八宿注历；（3）往亡、除手甲、蜜日注等；（4）物候注；（5）吉凶宜忌等选择事项。我们在释文时，原则上仍以日为



单位进行；因现存第（5）栏有4到5行文字，我们在各日之下又分别用①、②、③、④、⑤来标具此栏内的各行，以示区别。一般不出校记，需说明时以“按”说明之。先释文如下：

〔前缺〕

1 〔二〕十三日乙亥火破 女 下弦

①不宜嫁娶、出行、开

②启攒、栽植、种蒔

2 〔二〕十四日丙子水危 虚，沐浴、蜜、往亡（按，自沐浴至往亡共3项占一栏）

①吉日。大小岁前、天德

②天愿守日，岁德、不将

③七圣、兵吉。宜修

④理垣墙，集福、祈恩和合

3 〔二〕十五日丁丑水成 危 归忌、除手甲（按，归忌与除手甲占一栏）

①吉日。大小岁前、天喜、天

②七圣、（ ）宜尊

③祷祀神祇，泥饰庐舍

4 〔二〕十六日戊寅土收 室 卿比

①天牢黑道、天刚、月

②土符、伏罪、伐日、不

③伐，兴作土工，远出征行

④事营葬、祭祀、扫饰

5 〔二〕十七日己卯土开，辟（壁）王瓜生

①吉日。岁前、天恩、月□、母

②生气、普护、神在、时阳

③五合（ ）宜宣覃

④勋庸、立木、上梁、安置栏



⑤师傅、祭祀、远行。

6 [二] 十八日庚辰金闭 奎

①吉日。岁后、天恩、月德[]

②神在、复、天德、天府、明[]

③(模糊不清)

④塞穴、筑墙、祷祀神[祇][]

7 [二] 十九日辛巳金建 娄

①小时、重日、土府、伐日、王勃黑道。日出寅正四刻

②伐日、王[]黑星。[]讨伐城、[]

③塞穴、发土、上(?)营葬迁居筑[]

④室、远出、[]图、嫁娶[] [日入] 戌初初刻

白 白 白

8 四月大紫 黑 绿 建癸巳

黄 赤 碧

(以下四月月序即④⑤两栏原并作一栏，今不改)

①自三月十七日己巳[][]初刻立夏，已得四月[之节]。

②即天道西行，[宜向西行]，又宜修造西方。天[德在辛]，

③月厌在未，月煞在辰，[月德]在庚，月合在乙，月[空在]甲，乙、庚上取土及宜[修造]。

④此月初七日戊子戌[正[]刻]后，甲时、丙时[]

⑤及壬时，卯前、午前、[]

9 [一] 日壬午木除 胃

①吉日。岁后吉期。天[][]龙黄道[]

②圣心、兵宝，官日、吠(?)，神在[]

③大(?)明、宜宣赦宥，[]建修饰[]

④垣墉、祭祀、解除[]

[后缺]

下面对其年代进行考定。



（一）残历的月份

第8行有醒目的“四月大”三字，可知其前的1~7行属于三月的历日，第9行属于四月一日历日。因原件上部有残失，故我们在录文时作了增补，共得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一日的历日。从录文可知，三月二十九天，是小月；二十三日乙亥，则月朔为癸丑。四月大，朔日壬午。又可推得五月朔日为壬子。这样，残历三、四、五共三个月的月朔已可获知。

（二）残历的纪年地支

残历四月月九宫为二黑中宫（第8行）。因月九宫是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次序逆向排列的，今反推回去，可知正月月九宫为五黄中宫，而正月五黄中宫，则其纪年地支为丑、未、辰、戌^[3]。

（三）残历的纪年天干

残历第8行月九宫图下有“建癸巳”，则此历正月建庚寅；正月建庚寅，则其纪年天干当作丙或辛^[4]。

（四）残历的纪年干支

将上述所得两个天干与四个地支相配，共得丙辰、丙戌、辛丑、辛未四个干支，此即残历应在的四个纪年干支，必在此四个年份求得。

（五）残历的绝对年份

我们注意到，此历是以二十八宿注历的。而就目前所知，连续用二十八宿注历始于南宋，故南宋以前可不考虑。我们以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为据，从公元1127年查起，在丙辰、丙戌、辛丑、辛未四个干支年份里，与上述所推的此历三、四、五三个月份月朔全合者为南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因此可考虑此年为其应选年份。残历三月二十四日有“蜜”日注（第2行），而此日合西历公元1211年5月8日，查《日曜表》，确为星期日，由此可知，此历为公元1211年，即宋宁宗嘉定四年的具注



历日残片。

二、俄 TK269 号

俄国著名敦煌学家孟列夫教授在其以往出版的《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中，曾对此件著录道：“历书，保存下来的是中间一条的3栏：①指出吉凶征兆；②太阳经过黄道的周相；③“庇护神”。“木刻本，原先大概是卷子装，54×8厘米的长条，两残纸。11天的栏目（第1和第11天的残），宋体字，宋版本，12世纪前30年的。此长条被剪开作封皮用和被叠成为折面为5×3厘米的折子……”[5]

现在再根据我对原件图版的观察说明如下：原件确实被剪成了折子形状，乍一看好像是册子装的书页。现存内容共三栏，第一栏为神煞和宜忌，第二栏为日出日入时刻及昼夜时刻；第三栏为人神流注。第三栏的内容是将“人神”二字刻或排在中间，余字分布于“人神”两侧。如“人神在胸”，“在”字居于“人神”之右，“胸”字居于“人神”之左。今录文时为方便计，一律改为直行即“人神在胸”，好在并不妨害原意。释文时，我们以“折”为单位进行，每折中的栏次分为1、2、3（无内容者跳过），每栏中的行次为①、②、③……，推补文字放入[]中。

[前缺]

第一折：

1 [] ①动土 []

② [] 留(?) 进入

3 [人神在] 气冲。

第二折：

1 [] ① [鸣] 吠对，

② [] [] 守日。



③ 狱缓刑，

④ 官(?)视官。

2 ①昼五十三刻；

②夜四十七刻。

3 人神在股内。

第三折：

1. ① 天德舍

② 宝明星，

③ 续世，

④ 恩行庆。

3 人神在足。

第四折：

1 ① (图版模糊)

② (图版模糊)

③ 至(?)

3 人神[在]内踝。

第五折：

1 ① 九空

② 伐日

③ 盖(?)造舍

④ 征行运。

3 人神在手小指。

第六折：

1 ① 复日

② 食

3 人神在外[踝]及胸。

第七折：

1 ① 七圣



② 胗(?) 盖

③ 药疗病

④ 德(?) 相口。

2 ①日入酉正二刻。

3 人神[在][] 阳明。

第八折:

1 ① 七圣

② 出使

③ 进人

3 人神在胸。

第九折:

1 ① 触水龙,

② 不宜命、

③ 舟船兴

④ 理灶

2 ①日出卯初三刻,

②日入酉正初刻。

3 人神在膝。

第十折:

1 ① 合、金堂,

② 宜修葺、

③ 学、立契

3 人神在阴。

第十一折:

1 ① 道 德

② 结会亲姻

③ 执(?) 捕寇盗

3 人神在膝胫。



第十二折：

1 ①□九醜（二字左侧字划残半）

[后缺]

现在对残历的内容进行研究并考定其年代。

（一）残历十二折的各自日期

残历第三栏的内容是人神流注。而根据我们对众多敦煌具注历日的研究，在每月三十天中，每天所注人神是固定不变的，即：一日在足大指，二日在外踝，三日在股内，四日在腰，五日在口，六日在手小指，七日在内踝，八日在长腕，九日在尻尾，十日在腰背，十一日在鼻柱，十二日在发际，十三日在牙齿，十四日在胃管，十五日在遍身，十六日在胸，十七日在气冲，十八日在股内，十九日在足，二十日在内踝，二十一日在手小指，二十二日在外踝，二十三日在肝，二十四日在手阳明，二十五日在足阳明，二十六日在胸，二十七日在膝，二十八日在阴，二十九日在膝胫，三十日在足趺^[6]。以此与本件残历各折对照，可知：第一折为十七日，第二折为十八日，第三折为十九日，第四折为二十日，第五折为二十一日，第六折为二十二日，第七折为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第八折为二十六日，第九折为二十七日，第十折为二十八日，第十一折为二十九日，第十二折暂不明了，下面再议。由是可知，这段历日基本上是连续的，只是缺了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或二十五日中的一日。

（二）残历的月份

残历第九折第1①行中有“触水龙”注记，而此折属于二十七日（详前）。在一个甲子六十日中，只有三天即丙子、癸未、癸丑属于“触水龙”^[7]。第十折1①行又有“金堂”一目，其排列规则依“星命月”为：正月辰日，二月戌日，三月巳日，四月亥日，五月午日，六月子日，七月未日，八月丑日，九月申日，十月寅日，十一月酉日，十二月卯日^[8]。而此折属于二十八日



(详前)，与第九折相连贯。所以，此“金堂”所在日的日支必须与第二十七日可能的三个纪日干支（丙子、癸未、癸丑）相连。而子下为丑，未下为申，丑下为寅，对照“金堂”所在各月日支之日期，可能的月份为八月、九月、十月共三个月，其它均不在应选择条件之内，换言之，此残历之时限是“星命月”八、九、十共三个月中的某一个月。

残历第二折第2①行和2②行有昼夜时刻注记，即“昼五十三刻，夜四十七刻”。我们知道，在中国古历实行百刻纪时制时，夏至白昼六十刻，夜晚四十刻；冬至白昼四十刻，夜晚六十刻。春秋二分昼夜平分各五十刻。过了夏至，白昼减刻，夜晚增刻，过了冬至，白昼增刻，夜晚减刻，因此，历注中的“昼五十三刻，夜四十七刻”每年共有两次，一次在二月，约在清明三月节与谷雨三月中之间；一次在处暑七月中前后^[9]。由于前面我们已将此残历的月份考定在“星命月”的八、九、十共三个月中，则此处之“昼五十三刻，夜四十七刻”当靠近“处暑七月中”这个中气，可以考虑的月份是历日的农历七、八两个月，而九、十两月应被排除。那么，此残历的农历月份到底是七月还是八月呢？读者如果细心的话，准会注意到我们几次提到“星命月”这个概念。历日中的农历月份是每月一日至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但“星命月”则是以十二个节气（非中气）各自所在之日至下一个节气的前一日为一月，编入历书时处在游动状态，以至本月节气可注在上月的下半月至本月的上半月，而中气则在本月一个月內游动。前述我们所考“触水龙”注在二十七日，“金堂”注在二十八日，而这两天虽然是农历日期，但其前必然已注了“白露八月节”，否则不会符合它们各自在“星命月”八月的安排规则。换言之，它们虽在“星命月”之“八月”，而历日的农历月份应为七月。简单说，我们可确认此段残历属于农历七月。

（三）残历各日干支



前已指出，第十折 1①行“金堂”一日于“星命月”之八月在丑日，九月在申日，十月在寅日。而我们已排除此历在九、十两月的可能，只剩一个“八月丑”日了。因此，第十折的二十八日当为“丑”日，即其纪日地支是丑。其前一日之“触水龙”的干支为丙子、癸未、癸丑三者之一，在丑日前且能够与“丑”日相连的只有丙子日，也就是说残历二十七日的日干支为丙子（第九折）。由此上推下移可知，二十八日（第十折）为丁丑日，二十九日（第十一折）为戊寅日，二十六日（第八折）为乙亥日，二十五日（可能第七折）为甲戌日，二十四日（也可能是第七折）为癸酉日，二十三日（佚失）为壬申日，二十二日（第六折）为辛未日，二十一日（第五折）为庚午日，二十日（第四折）为己巳日，十九日（第三折）为戊辰日，十八日（第二折）为丁卯日，十七日（第一折）为丙寅日。再往前推，可知此段七月历日的月朔为庚戌。

那么，七月是大月还是小月呢？我们发现第十二折 1①行的“九醜”二字残文十分有用。己卯日是“九醜”之一，其余八日（戊子、戊午、壬子、壬午、乙卯、辛卯、乙酉、辛酉）全然不能同其前之二十八日戊寅（第十一折）相连。由此可以确认，三十日干支是己卯，此七月共三十日，是大月，八月朔日为庚辰。

（四）残历年份

根据前述推出的七月大、庚戌朔和八月庚辰朔，我们从宋朝立国的公元 960 年起，在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上进行检索，直至清末，共得到以下十一个年份与残历相同：宋天禧四年（1020）、元祐二年（1087）、绍兴十四年（1144）、嘉定四年（1211）、咸淳四年（1268），明洪武三十年（1397）、景泰五年（1454）、正德十六年（1521）、万历六年（1578）、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可喜的是，我们在本文上节考出的 ИФФ NO 8117 号为宋嘉定四年（1211），亦在上述十一



个年份之中。由于它们都是印本历日，且字迹相同，则此段七月残历当是原来宋嘉定四年具注历日中的一部分残片。因被剪裁后派作它用，故残破过甚，致使我们不得不用过多的笔墨进行考辨，好在终于找到了它的原始归属！

为保险起见，我们对所定年代再检核如下。在前述讨论时，我们已指出，残历二十七日（第九折）所注“触水龙”、二十八日（第十折）所注“金堂”，是历日已进入星命月八月的表征，亦即是说，在此二日之前历注已有“白露八月节”了。查检张培瑜教授《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10]一书，此年白露八月节在七月二十一日庚午，从此日始便进入了“星命月”之八月。它表明我们对此残历所定年、月均与事实相符。

三、俄 ИВВ NO.5469 号

先释文如下：

〔前缺〕

1 〔十九〕日戊戌木除 室 侯 归妹内

① 月害、

② 不宜官上事 刺受

③ 奴婢，出放资财

2 〔廿〕日己亥木满 辟（壁） 沐浴

① 吉日。岁后，，月德

② 天后、天巫、相日、七圣

③ 宜上梁、立木、安置枋

④ 宜穿穴取土追纳

⑤ 络、裁缝。

3 〔廿〕一日庚子土平 奎

① 天魁、死神、兵禁、往亡



②九虎、天吏。宜训练兵

③攻击城池，修盖邸第，筑垒

④嫁娶、出行、经络、赴任

4 [廿] 二日辛丑土平 娄 寒露九月节鸿雁来宾 兑九
侯 归妹外

①月虚、天刚、月煞、死神

②狱日、武、、阴私、黑

③不宜盖屋、上梁、筑墙、取土

④结会亲姻、兴狱讼、葬死丧

⑤请医、冠带、合酱。

5 [廿] 三日壬寅金定 胃 下弦 除足甲

①吉日。[岁] 后、月空、三合时

②明星、七圣、鸣吠、四相

③命黄道大明，宜盖宅

④木、筑墙、结会亲姻、营葬

6 [廿] 四日癸卯金执 昴 蜜

①吉日。岁后、六合、枝德、鸣

②圣心、四相、不将、五合、七圣

③宜结会亲姻，修饰庐舍，修

④土畋仇。

7 [廿] 五日甲辰火破 毕 大夫无妄

①大耗、四击、五盗、

②远出征行、挂服、举哀、开仓

③结亲、行嫁、营葬墓坟

8 [廿] 六日乙巳火危 觜 上

①吉日。岁后、母仓、续世、执储

②阴德、七圣、明堂黄道

③神在 () 宜请求



④祭祀鬼神，修葺庐舍，筑垒

9 [廿] 七日丙午水成 参 雀入大水□为蛤

①吉日。岁前、小岁对，天德、月 [德]

②母仓、天□、三合、要安、岁德

③神在、鸣吠、天仓、宜□□

④释放禁□，命将出师，发

⑤开拓疆境，选择贤能，结定

⑥安葬□□竖立契券，合和

10 宪皇后大忌 [廿八] 日丁未水收 井

①天魁、月刑、五虚、朱雀黑道

②□刑、□□

③盖屋、造宅、取土、筑墙、迁居

④渡水乘舟，合□药餌兴□

11 [廿九] 日戊申土开 鬼 沐浴

①吉日。岁前小岁对、天赦

②□□、生气、金堂、神在

③天宝、明星、二仪、绝阳

④金匮黄道，宜行庆□赏

⑤立木、上梁、安栏置枋、修础

⑥神祇。

12 [卅] 日己酉土闭 柳 沐浴 除手足爪

①吉日。岁前、天恩、天对、明

②天德黄道、七圣、鸣吠、神

③火(模糊不清)宜修

④舍庐安置础碓，泥墙、塞穴、祀

⑤筑堤 [防]

黄 白 碧

13 [九] 月小绿 白 白 建戌戌



紫 黑 赤

- ① (按, 全残, 今不见)
 ② 天道南行, 宜向南行, 又宜 [修]
 ③ 月厌在寅, 月煞在丑, 月德在 [丙]
 ④ 丙、辛上取土及宜修造。
 ⑤ 用癸、乙
 ⑥ ☐ 月十五日甲子卯正二刻后
 ⑦ 丁、辛时 [吉] (与⑤连读为“用癸、乙、丁、辛时吉”)。

14 一日庚戌金建 星 蜜 卿 明夷

- ① 阳错、小时、白虎黑道、牢日、兵禁
 ② 天棒、黑星 (?)、土府、☐☐ 不宜出
 ③ 师、讨伐、动土、筑墙、经络、迁居、举
 ④ 官赴任竖造栏 ☐ 兴 ☐ 词讼

15 [二日辛] 亥金除 张 沐浴 菊有 [黄花]

- ① 占日。岁前, 天德合、月德 ☐ 天 [恩]
 ② 天 ☐☐☐ 五富、☐ 期、敬安
 ③ 兵宝、相日、玉堂黄道、岁德
 ④ ☐ 旌赏功勋、策试良贤

⑤ ☐ 择 ☐☐ 修 ☐☐☐ 饰屋庐

16 [三日壬] 子木满 翼 血忌

- ① 天火、天狱、大杀、天牢黑道
 ② 天狗、九醜、不宜盖造邸第结
 ③ ☐☐ 词 迎娶、归家、祭祀、决水

17 ☐ 皇后大忌 [四日] 癸丑木平 轸 土王用事

- ① 天刚、月 ☐、死神、☐☐ 黑
 ② 阴 ☐ 黑星、狱日 ☐ 日触水
 ③ 八专、章光、[月] 虚、不宜 ☐



①赴任、□□请医、嫁娶、会亲、放□□□

⑤渡水、迁移宅舍、兴发讼词□□□□

18 [五日甲]寅水定 角 除足甲

①吉日。岁后，天府、□□、阳纯(?)□□□□

②七圣□□□司命，黄道□□□□

③三合、□五合□鸣吠□□□时□□□□

④宜破土、启攒，修德□□惠。

19 [六日乙卯]水执 亢 手足爪

①岁后、□□□□枝

②守日、七圣、神在、五合、鸣吠对□□□□

③宜畋猎捕兽、请福祀神□□□□

20 [七日丙辰]土破 氐 霜降九月中 兑六三 豺乃祭

兽 □□困

①大耗、四击、五□□□□□

②往亡、雷公黑道□□□□□□

③攻战、□□、讨击贼城、临丧□□□□

④征行、理灶。

21 [八日]丁巳土危 房 上弦 蜜

①吉日。岁前小岁后，神在□□□□

②执储明星，明堂黄道，兵(?)□□□□

③□□□德宜训习戎师、选择□□□□

④□□修葺邸舍，筑垒墙壁，贮纳□□□□

⑤库、求嗣、祭神。

22 [九日戊午火成 心]□□□□□□

①吉日。岁前、母仓、大会□□吉。

[后 缺]

以上我们共录出 22 行文字。其中第 13 行属于月序内容，一览便知；其前有 12 天历日内容，其后有 9 天历日内容，共 21



天。下面对其年代进行考定。

(1) 残历月份。从图版看,此历上部已残,有缺字。但第4行有“寒露九月节”,由此可知靠近九月。又因置闰原因,节气(非中气)的位置总是注在本月上半月或上月下半月。此“寒露九月节”在某月下半月,可知,13行前的12天内容属于农历八月,13行是九月月序的内容,14~22行属于九月一至九日的内容。又据残历可知,八月大,庚辰朔;九月小,庚戌朔;十月[?],己卯朔。

(2) 残历的纪年地支。由13行九月月序可知,此历九月九宫为六白中宫,则正月为五黄中宫,与之对应的纪年地支为辰、丑、戌、未^[11]。

(3) 残历的纪年天干。又由13行九月月序得知,九月“建戌戌”,则正月应建庚寅,对应的年干为丙或辛^[12]。

(4) 残历的纪年干支。以上述所得两个天干与四个地支相配,可得丙辰、丙戌、辛丑、辛未。此即残历应在的四个纪年干支,必是其中之一。

(5) 我们从南宋开始的1127年起,在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上进行检查,上述四个干支年中,与残历八、九、十共三个月月朔相合的为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

(6) 残历八月廿四日、九月一日和八日均有“蜜”日注。此三日合西历公元1211年10月2日、9日和16日,查《日曜表》,全是星期日,由此可将残历的绝对年代加以确定。

上面经过严密的考证程序,我们证明俄 ИВБ NO. 5285 加 8117 号、俄 TK269 号、俄 ИВБ NO. 5469 号的共同年代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也就是说,它们是《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的三个断片。为稳妥起见,我们再对这个年代进行一次检验。

我们已注意到此历是用二十八宿注历的。残历三月二十七日



所注为“辟”，其前十四天当注“角”，即在三月十四日。我们又知传世《南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也是用二十八宿注历的，其中三月三十日注“轸”^[13]。自嘉定四年三月十四日至宝祐四年三月三十日共 16436 日。

$16436 \text{ 日} \div 28 \text{ 日} = 587 \text{ (周)}$

可知，其间共用了 587 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

残历三月十四日注“角”，九月四日注“轸”，这期间共有 168 日。

$168 \text{ 日} \div 28 \text{ 日} = 6 \text{ (周)}$

又知，这期间又用了 6 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

检验结果，证明我们所定年代正确无误。至于 TK269 号，因其过残，看不到二十八宿注历的痕迹，我们就不能使用同一方法进行检验了。

四、残历属于南宋《开禧历》的实行历书

在中国历法史上，有宋一代，制定和颁历虽多，但多数不出唐历范围，多数情况下是增损积年日法，演撰强弱之率，以求合于当时，多未经过实际观测，所以行之不久，便有误差，需要改历^[14]。

在《开禧历》产生之前，南宋行用的是《统天历》。此历为杨忠辅所撰，修成并颁行于庆元五年（1199）。此历的最大优点是回归年数值最准确，并认为回归年数值在变化，古大今小^[15]。但也存在缺点，行用数年后，日食便不准确。开禧三年（1207），大理评事鲍澣之对《统天历》提出批评；秘书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曾渐也有微辞。“于是，诏〔曾〕渐充提领官，〔鲍〕澣之充参定官，草泽精算造者、尝献历者与造《统天历》者皆延之，于是《开禧新历》议论始定。诏以戊辰年



(即嘉定元年, 1208 年) 附《统天历》颁行之。”不久, 布衣阮泰发就指出《统天历》和《开禧历》皆有差。至三年, 邹淮又“言历书差忒, 当改造”。至四年春, 新历成, 未及颁行, 其事遂寝。韩侂胄当国时, 又议改历。有人认为属不急之务, 于是“《开禧历》附《统天历》行于世四十五年”,^[16]至公元 1252 年被《淳祐历》所代替。

从以上讨论可知, 黑城所出《宋嘉定四年(1211)具注历日》属于《开禧历》的实行历书, 而且是现知《开禧历》的惟一实行历书, 其在中国历法史和学术史上的价值则是勿庸赘言的。

【注释】

[1] 见邓文宽《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 载《华学》第四辑, 131~135 页,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0 年 8 月。

[2] “俄 TK269”号, 图版见《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第四册, 355~357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俄 ИВВ NO. 5469”号刊于同书第六册第 316~318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3] 参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附录一“年九宫、正月九宫与年地支对应关系表”,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第 746 页。

[4] 同上书附录一〇《正月月建与年天干对应关系表》, 第 745 页。

[5] 王克孝译本, 第 239 页,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 同 [3] 附录九“逐日人神所在表”, 第 744 页。

[7] 参见(清)《钦定协纪辨方书》卷四“义例二”。

[8] 参同上书卷六“义例四”。

[9] 参同 [7] 卷三十五“推测日刻”。

[10]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11] 同 [3]。

[12] 同 [4]。

[13] 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一册, 第 695 页,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14] 参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 1476~1477 页, 上海人民出

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三断片考



版社，1984年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第56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

[16] 见《宋史》卷82《律历志十五》。

【附记】

本文写作于2000年冬，所用资料由史金波教授提供，谨表谢忱。今从新近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第六册公布的图版获知，ИHB. NO. 5306、5229两号也是同本的历日，存七月一日至十日的历日。因本书版面已设定，今不再收入，特此说明。

天水放马滩秦简 《月建》应名《建除》

《文物》1989年第2期发表了何双全先生《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一文，概述了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据文章叙述，此墓出土《日书》有甲、乙两种，内容大部分相同。文章介绍了甲种《日书》的主要内容，并将其分作8章，给第1章定名《月建》。《文物》同期图版伍还刊载了此章12枚竹简的全部照片（甲1~甲12）。《综述》将此12枚竹简作为一章定名为《月建》，似有未谛，特提出商榷。

《综述》首先介绍了12枚简中的月序、建除十二客及十二地支的各自起讫顺序，并逐录了甲1简的释文和甲2简的部分释文，然后分析说：“三统历中，夏正建寅，农历正月为岁首；商正建丑，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正建子，农历十一月为岁首。据此，1至12简的内容当为夏正的《月建》。”这正是《综述》定名《月建》的依据。为便于讨论，兹将甲1简的原释文抄录于下：

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执未、彼申、危酉、成戌、收亥、开子、闭丑。

我们首先讨论上简释文的断句。将“正月建寅”断为一句，



并理解为夏正“正月建寅”，显然认为此“寅”字是正月的纪月地支。那么，其后的文字与“正月建寅”一句是何关系？这是无法说明的。通观该简内容，所表达的是正月里建除十二客与各纪日地支间的对应关系，而不是其它。因此，应断句如下：

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执未、彼申、危酉、成戌、收亥、开子、闭丑。

简文含义是，正月里“建”字与“寅”日对应，“除”字与“卯”日对应，等等。这样，该简的内容便十分完整，贯为一气了。其余 11 枚简亦当作如是读。

其次，“正月”“建寅”之“寅”字，“二月”“建卯”之“卯”字等等，在这些简中均代表纪日地支，而非用于纪月，说已详上，可不赘述。

再次，也是更重要的，简中的“正月”、“二月”至“十二月”等月序，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历法中的月序，而是星命家的“月份”。星命家的“月份”以二十四节气中的十二个节气（非中气）作为各月的开始，如正月是从“立春正月节”那天开始，二月是从“惊蛰二月节”那天开始。古代建除家在历日中安排建除十二客，正是按照星命家的“月份”而不是按照历法月份进行的。不论“立春正月节”是在上年十二月的某日，还是在当年正月的某日，凡遇“立春正月节后”的第一个“寅”日，便开始注“建”字，由此循环下排。以后至各月第一日（即节气所在之日），则需重复其前一日的建除十二客一次，然后再接续下排。由于十二纪日地支同建除十二客均以十二为周期，又使用了上述节气所在之日重复前日一次的办法，就导致了各月建除十二客与上月纪日地支相差一日，故正月“建”与“寅”日对应，“除”与“卯”日对应，二月“建”与“卯”日对应，“除”与“辰”



日对应，如此等等。

对于以上建除十二客的排列规律，陈遵妫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第1647页注⑤曾作过解释：“建除十二神……它的循环排列是每逢一个月的开始就重复一次，这里所谓一个月的开始是指星命家的月，即以节气起算。例如某年一月（按，应作‘十二月’）六日为‘闭’，七日小寒（笔者按：即十二月的节气），则七日仍为‘闭’。”^[1]陈先生又指出：“正月节后最初的寅日的十二直为建，翌日即卯日为除，再翌日即辰日为满，余类推。”^[2]陈先生的这些意见，我在整理数十件敦煌历日文献时反复对照，证明完全正确。现在再用这个结论去检验前述放马滩12枚秦简的内容，也相合不悖。笔者曾撰有《敦煌古历丛识》一文^[3]，对建除十二客的特点及其安排规律，以及星命家的“月份”，亦有论列，均可参阅。

《综述》最初在概括这12枚简的内容时曾说，它们是“记述正月至十二月每月建除十二辰相配十二地支的对应循环关系”。应该说这已开始接近其内容实质。但在其后的阐述中却偏离了这个正确轨道，以至最终归结为是“夏正的《月建》”，并以此定名，这未免令人惋惜。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放马滩所出这12枚简的内容，是星命家的各月份中，建除十二客同各纪日地支间的对应关系，而不是其它，故应定名为《建除》，与《日书》第二章所题《建除》属于一类。《综述》所区分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其内容差别仅仅在于，所谓“第一章”是讲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的对应关系，“第二章”则讲各个建除十二客所主吉凶宜忌，本质上同属《建除》一类，不宜各自分章。

在明确前述12枚简的内容及其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我们可绘表如下：



纪 日 星 命 月 份	建 除 十 二 客	建	除	盈	平	定	执	彼 (破)	危	成	收	开	闭
正月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二月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三月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四月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五月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六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七月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八月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九月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十月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十一月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十二月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上表读法是：“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执未、彼申、危酉、成戌、收亥、开子、闭丑。”“二月：建卯、除辰、盈巳……”其余各月读法同此。它不是对原简的逐字、逐句释文，而是采用表格形式对其内容进行解释。表虽简略，却囊括了12枚竹简相关部分的全部内容，也便于表现它们的内容实质和内在联系。

尚需说明的是，简中建除十二客的“彼”字，在汉简和敦煌吐鲁番同类文献中均作“破”。《综述》在介绍《四时音》时，对乙209简曾有如下释文：“春子夏卯秋午冬酉是，是人彼（破）”



日，不可筑室、为鬻夫。娶妻嫁女，凶。”如果此简中“彼”字当作“破”释读不误，那么循此例，甲1~甲12简中的“彼”字亦当作“破”。简中建除十二客的“盈”字，在后世文献中多作“满”。“满”、“盈”同义，可以互训。之所以改盈为满，或许是西汉初年因避惠帝刘盈名讳而改^[4]，此后便成为定式。

附带指出，《综述》一文在《秦用寅正问题》一节中也存在问题。《综述》云：“秦使用的是以夏正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但这是秦统一后颁布实施的历法。那么秦统一前使用的是什么历呢？甲、乙种《日书》中的《月建》章整理时按原出土次序排列，得出了以正月、二月、三月至十二月为次的建正表。始正月建寅，止十二月建丑。未发现以十月为岁首的任何文字。由此可见，当时秦使用的是以正月建寅为岁首的夏历。”《综述》这个看法，是从对甲1~甲简的释读引申出来的。我已指出这12枚竹简应该如何断句，以及它们的内容实质和内在联系。显然，由于释读和理解不当，由此引申出战国时秦用“以正月建寅为岁首的夏历”的看法也是难于成立的。从这12枚简中，我们只知道古代星命学家在安排建除十二客同各月纪日地支间的对应关系时，在星命家的“月份”中“正月”是从“寅”日开始排列的，以及其后各星命月份中两者间的对应关系，尚难做出战国时秦用夏历以正月为岁首的结论。至于战国时代秦用何种历法，以何月为岁首，目前由于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的不足，学术界异说纷呈，还处在继续探索的阶段，无法从放马滩这12枚竹简做出最后结论。

【注释】

[1]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2] 同上书第1666页。

[3] 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4] 汉惠帝名刘盈，因避讳改“盈”为“满”。见陈垣《史讳举例》第13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原载《文物》1990年9期，第83~84页）

【附记】

这篇小文发表后，关于这12枚竹简应定性为《建除》而非《月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并被接受。但是，关于建除十二客的“叠日”方法的看法却存在问题。本文认为自古迄今都用“星命月”进行安排并重复各“星命月”的第一日。金良年先生曾发表《建除研究——以云梦秦简〈日书〉为中心》（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六集第261~281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提出批评，认为秦和西汉建除安排，是每月朔日重叠上月晦日一次，用“星命月”叠日是东汉以后才有的。金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见解，本文存在以偏概全的失误，当予改正，并向读者致歉。

尹湾汉墓出土历谱补说

1993年2月江苏省连云港市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文献，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经过考古与文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1997年岁末，中华书局终于将《尹湾汉墓简牍》一书出版，实是学术研究的幸事。

笔者由于长期致力于出土历日研究，故对 M6 出土汉代历谱怀有特别的兴趣。历谱共两件，编号分别为木牍 10 正面^[1]和木牍 11。两件历谱的年代，被整理者定在汉成帝元延元年（前 12）和元延三年（前 10）五月，是完全正确的。就定年工作来说，此两件历谱并不十分困难。因为 M6 所出简牍已有“永始”和“元延”年号出现，可知为汉成帝晚期之物。借助一些年表如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之类工具书，便可将历谱年月确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此两件历谱，尤其是元延元年历谱的形制有其独到之处。诚如原编者所说：“先将该年十三个月名（包含‘闰月’，即闰正月）分列两端，注明月的大小及朔日干支；然后将其余干支分书于两旁，并将四立、二至、二分、三伏、腊等各为某月某日注于相应干支之下。由于排列方法巧妙，六十干支正好按顺序围成一个长方形。此历谱把一年的历日浓缩在一块木牍的一面之上，颇具巧思。”的确如此。此年共 13 个月，384 天，仅用一个甲子周期便将如此丰富的内容表达了出来，映照出编历



者（或是抄写者）的聪明才智，为两千年后的今人所叹服。

历谱的具体内容，有些易于理解，有些不太好理解。今略加补说，裨便对原历内容加深认识。不妥之处，仍祈方家指正。

关于元延元年历谱：

（一）两个“立春”

我们注意到，原历历注有两个“立春”：在历谱右侧干支“壬子”下注有“正月十四日立春”，干支“丁巳”下又注有“十二月廿四日立春”。这是为什么呢？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前者为元延元年之立春日，后者为元延二年（前11）之立春日。由于节气是根据阳历（回归年，365.2422日）系统来划分的，而月份则为朔望月（29.53日）；两个节气之间的平气长度为：

$$(365.2422 \text{ 日} \div 24) \times 2 = 15.218425 \text{ 日} \times 2 = 30.43685 \text{ 日}。$$

长于朔望月的长度。因此，尽管理论上各月都有自己的节气（非中气），如“立春正月节”、“惊蛰二月节”、“清明三月节”等等，但实际上，节气（非中气）的具体日期总在上个月的后半月与本月前半月之间游动，而不能固定在某一日。本历谱立春在正月十四日，下月便为无中气之月，即没有正月的中气“惊蛰”，只有二月节气“雨水”^[2]，“朔不得中，是谓闰月”，故该历闰正月。又由于此年闰了正月，故自二月起，节气又提前注在上月之下半月，这就是历谱中“立夏”（理论上为四月节）注在三月十九（“九”当作“六”，详下）日，立秋（七月节）注在六月廿日，立冬（十月节）注在九月廿二日的原因。顺此而下，下年（元延二年）的立春（正月节）也提前注到元延元年的十二月廿四日了。本历谱中所以出现两个“立春”，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二）立夏日期与释文校正

历谱左侧干支“癸未”下注“三月十九日立夏”。按，“三月十九日”当是“三月十六日”之误。正月为大月，十四日立春，余16日；闰正月小，29日；二月大，30日，“三月十九日立



夏”，立春至立夏共得 94 日。在实行平气的情况下，立春至立夏的时间应为：

$$15.218425 \text{ 日} \times 6 = 91.31055 \text{ 日}。$$

此为一回归年长度的 $1/4$ ，断不为 94 日，可知“十九日”为“十六日”之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历法专家张培瑜教授的大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立夏在三月十六日癸未^[3]，甚是。再者，就历谱本身来说，元延元年三月戊辰朔，十六日正为癸未，现于“癸未”下出现“三月十九日”，已是两不相谐矣。细检原书图版“YM6D10 正”（页 21），此“三月十六日”之“六”字不十分清晰，易误释为“九”，当用历法知识予以校正。

（三）后伏日期

历谱右侧干支“庚申”下注“六月廿五日后伏”。此历五月丁卯朔，三日夏至为己巳，四日庚午，十四日庚辰，廿四日庚寅，故历谱左侧干支“庚寅”下有“五月廿四日初伏”之历注。五月为小月，六月五日庚子为夏至后第四庚日，故历谱右侧“庚子”下有“六月五日中伏”之历注。历谱六月廿日乙卯立秋，其后第一庚日为庚申，故历谱右侧“庚申”下注“六月廿五日后伏”。简言之，此历谱三伏之历注与后世全同。但我们注意到，汉成帝元延元年之前一年，即永始四年（前 13）的历谱已有出土^[4]。此历出自中国西北敦煌、居延一带，初伏、中伏的安排与元延元年历谱相同。但“后伏”却在立秋后第三庚日（七月九日庚戌立秋，十九日为庚申，廿九日庚午为后伏）。此历仅在元延元年的前一年，但后伏安排却两不相同。对此，张培瑜教授解释说：“唐以前三伏并无统一规定，随各历家不同。而唐以后情况则全按《阴阳书》之规定。”^[5]可供参考。

（四）分至八节日期

用前引张培瑜教授《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与此历谱对照，分至八节（四立、二分、二至）日期同，即：正月十四日壬子立



春，三月十六日（历谱释文误作“十九日”，详前）癸未立夏，六月廿日乙卯立秋，九月廿二日丙戌立冬；二月一日（朔）戊戌春分，八月六日庚子秋分，五月三日己巳夏至，十一月九日壬申冬至；次年立春在本年十二月廿四日丁巳。出土历谱证明《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对此年历谱的推算完全准确。

以下补说元延三年五月历谱：

（一）“乙亥十日”当作“乙亥廿日”

我们注意到，此五月历谱由“丙辰一日”到“[甲申九日]”共29天，干支是连续的；但在用数字纪日时，则成为“一日”至“十日”，又一个“一日”至“十日”，再“一日”至“九日”共三旬。由于干支连续，所以在对日序的理解上不至于发生错误。但就纪日方法而言，第二个“一日”至“十日”当作“十一日”至“廿日”方妥。同墓所出有元延二年纪事日记，以单月（正、三、五、七、九、十一月）和双月（二、四、六、八、十、十二月）各为一组简编制而成，其二十日写作“第廿”（原书页140、143）；元延元年历谱中也有“五月廿四日初伏”、“六月廿五日后伏”、“九月廿二日立冬”、“十二月廿四日立春”的历注，均可成为此一“十日”当为“廿日”的佐证。历谱中“乙亥”日为第二十日，故所书“乙亥十日”宜校正为“乙亥廿日”。

（二）丛辰项目

历谱最上一栏由右至左书写“五月小”、“建日午”等9个项目。除最末一项仅残存一“子”字外，其余均较清楚。这9项中，除“五月小”表明本月是小月29天，其余8项应是来自《日书》类书籍的丛辰（又名“选择”）项目。从出土的简牍《日书》和历谱看，两汉之际，《日书》内容绝大部分仍未直接编入历谱（编入的仅反支、八魁、血忌几项），而是以单独存在为主。诚然，它的使用仍离不开历谱，两者需配合使用。此五月历谱先将8个丛辰项目抄在历谱上部，配合下面的历谱使用，为迄今所



仅见。

(三) “建日午”

此项属于建除十二客(又名“建除十二直”、“建除十二辰”)的内容。历谱仅说“建日午”,即此月地支为“午”的日子需注“建”字,顺次便是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 11 个字,但不一定写出来。这 12 个字各主一定吉凶,供选择使用。此时的“建除”安排规则,看来与东汉以后的历谱不同:它是依据历法月份(即一日至廿九日或卅日),而不据“星命月”[即一个节气(非中气)至下一节气(非中气)之前一日],每月朔日再叠值上月晦日一次^[6],西汉地节元年(前 69)历谱^[7]、元康三年(前 63)历谱^[8]均是如此用建除注历;而至东汉永元六年(94)历谱,则使用“星命月”叠日,即使用在交节之日叠两值日的方法了^[9]。故此,我意此五月历谱所注建除,仍用历法月,尚未用“星命月”。若理解不误,则三日戊午、十五日庚午、二十七日壬午均当注“建”。

(四) “反支未”

“反支”是现知最早用于历注的丛辰项目,见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历谱^[10]。《后汉书·王符传》:“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唐·章怀注引《阴阳书》曰:“凡反支日,用月朔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此五月历谱朔日丙辰,“己未四日”,故“反支未”,与文献所记正合。但文献所记其义未尽。事实上,以上所论仅是注各月第一个反支日的日期,此下在每个历法月份之内,凡间隔六日便注一反支,元光元年历谱可为佐证^[11]。具体到本五月历谱,“己未四日”为第一个反支日,以下十日乙丑、十六日辛未、二十二日丁丑、二十八日癸未均是“反支”日。

(五) “解衍丑”



“衍”字与“魘”字同音，故借作“衍”，即“解魘”在“丑”日也。“魘”为后起字，古字为“厭”，因此古书多写作“解厭”。汉代好“厌胜”、“厌魅”之术，用迷信方法祈祷鬼神或诅咒，陷人于祸，对付的方法便是“解厌”，行之予以禳除。据此五月历谱，知其时五月于“丑”日行解禳之术。

(六) “复丁、癸”

其义为：五月的“复日”，注在天干为丁和癸的日子。历中二日、八日、十二日、十八日、二十二日、二十八日，因纪日干支或为丁，或为癸，故皆是复日。此丛辰项目在后世历日中亦多使用。笔者在整理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时，经反复排比，其安排规则为：正月在甲、庚日，二月在乙、辛日，三月在戊、己日，四月在丙、壬日，五月在丁、癸日，六月在戊、己日，七至十二月将前面一至六月的安排重复一遍即可^[12]。它与本五月历谱复日安排亦相吻合。

(七) “𠂔日乙”

意谓纪日天干为“乙”的日子属“𠂔日”。“𠂔日”用于历注，目前在汉简历谱中以此为首见，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已不使用。可喜的是，我们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找到了“𠂔日”的立意与安排规则。《日书》云：

四月甲𠂔，五月乙𠂔，七月丙𠂔，八月丁𠂔，九月己𠂔，十月庚𠂔，十一月辛𠂔，十二月己𠂔，正月壬𠂔，二月癸𠂔，三月戊𠂔，六月戊𠂔。……凡𠂔日，可以取（娶）妇、家（嫁）女，不可以行，百事凶。……^[13]

可知，“𠂔日”也是供选择使用的。“五月乙𠂔”与历谱五月“𠂔日乙”正相一致。

(八) “月省末”



“月省”这个丛辰项目为迄今所仅见，仅知五月注在“未”日。其原始立意和总体安排规律尚未明了，俟考。

(九) “月煞丑”

意谓历谱中“丑”日注“月煞”，即注在十日乙丑和二十二日丁丑。敦煌历日中此项排列结果是：正月丑，二月戌，三月未，四月辰，五至八月、九至十二月各再重复前四个月的安排一遍^[14]。它与本五月历谱月煞安排亦相一致。

(一〇) “□□子”

这是一个五月安排于“子”日的丛辰项目，惜已残失。从敦煌历日得知，五月注于子日的丛辰项目有月破、月虚和天李。此五月历谱中究竟该注哪一项，尚难遽定。

以上就笔者学识所及，对尹湾汉墓所出两件历谱做了一些疏证与补说，尚未敢完全自信，欢迎读者参与讨论并赐正。

这里尚需特别说明的是，历谱中这些丛辰项目的安排，与后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此时历谱是据历法月份安排丛辰的；而东汉以后却是据“星命月”进行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北魏至宋初历日，现代东亚地区的民用通书中，丛辰均据“星命月”去划定月份。这一点，我们在读古历时应予注意，不可将历法月份同“星命月”相混淆。否则，极易产生混乱，也找不出丛辰项目的准确安排规则。

【注释】

[1] 原书“前言”在解说该历谱时，将“木牒一〇”的反面亦注作历谱（页3），恐不确。细观此件释文（127页），其内容为借贷契约，似当单独作一项内容来处理。

[2] 此时历谱中“惊蛰”为正月中气，“雨水”为二月节气，与后世不同。

[3]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93页右下。



[4] 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37页图②，原说明文字为“永光五年历谱”，误，实为“永始四年历谱”。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释文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118页。

[5] 见张培瑜等《古代历注简论》，《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1期，101~108页。

[6] 参见殷光明《从敦煌汉简历谱看太初历的科学性和进步性》，《敦煌学辑刊》，1995年2期（总第二十八期），94~105页。

[7] 图版见同上刊封三，释文见同上刊第105页。

[8] 图版同注④，《图集》36页图一；释文同注④，《论集》第112页。

[9] 参前引注⑥殷光明文；又，张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载《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135~147页。我在《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载《文物》1990年第9期）一文中曾认为，战国秦时“建除”也是依“星命月”而非历法月去叠日的，看来并不准确。就现有资料看，“建除”之叠日法曾有变化：西汉以前大约是本月朔日叠值上月晦日，东汉后才是节气日叠值其前一日了。随着出土资料的增多，我们的认识将更加丰富，我的这个错误的认识也应予以纠正。

[10] [11] 参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插图“《元光元年历谱》（复原表）”。

[12] 参见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13]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第202页。



[14] 同注[12]。

（原载《简帛研究二〇〇一》，第451~455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20 世纪出土的第一支 汉文简牍》献疑

《文物天地》2000 年第 5 期刊发了胡平生先生《20 世纪出土的第一支汉文简牍》一文（以下简称“胡文”），读后耐人寻味。为探求真理，现就其中的三个问题提出质疑，以就教于胡先生和学术界同仁。

一、“青”字非指“青草”

依据胡文的说明，该简正背两面书写，胡文释读如下：正面为“囊思纳青壹硕（石）壹斗伍升了，六年九月廿五日官检怀弥惟（？）”；背面是“青一石一斗五升，阿闭娑，青一石一斗惟（？）”。

此简是何含义？据胡文介绍，此前布舍尔（Bushell）博士、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沙畹都曾作过解释。胡文转述斯坦因在《古代和田》一书中的话说：“布舍尔博士对文字的释读是，它指的是青的重量，约重一石一斗（一斗是十分之一石），并且他还注释道：总的重量大约是一个男子的负重，这使我想到中间的两个汉字‘阿闭娑’，如果不是‘青’的外国名称，就可能是一个男子的名字。‘青’的意思是‘蓝’或‘绿’，是靛蓝，天青石或其它更普通的染料我无法猜测。”胡文对这个解释批评道：“这段语



焉不详的描写，对于想要弄清这枚木简内容的中国学者，几乎毫无意义。”胡文接着说：“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沙畹用法文在这里加了一条注释：‘在这个木片凸起的一面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字：青一石一斗，我认为这些字似乎是指出青谷的数量，主要是用这些词表达的：一石一斗五升，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对沙畹的注释，胡文评论道：“沙畹似乎高出布舍尔一筹。释读了较多的汉字，介绍了较多的情况，不过错误仍较多。”显然，胡文对这三位学者的解释均不满意，于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关于“青”，胡文是这样解释的：“‘青’到底是什么？按近代汉地口语，青就是青草，应当是用以饲养牲畜如马、驼之类的草料，与染料、青谷无关。”

这个解释，未免令人大惑不解。

首先，胡文是“按近代汉地口语”释“青”为“青草”的。不错，在近代乃至当代汉人口语中，尤其在西北地区的汉人口语中，以“青”指“青草”是存在的，但更多的是用指未成熟的庄稼。可是，近代汉地口语哪里存在用石、斗、升表示青草数量的呢？依据生活常识，石、斗、升这样的容积量词是用以表示颗粒状、粉末状物质的；古时也用指液体，如几斗酒。自古迄今，我们何尝见过用石、斗、升来表示“青草”的数量？真有些匪夷所思。

其次，这枚木简出自西北边陲，那么试检一下，西北地区出土的其它简文是如何表示饲草数量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载：“今余茭五千六百五十束”（3.15）；“出茭九束，正月甲子以食□□”（24·5）；“□丙辰出茭卅束食传马八匹，出茭八束食牛”（32.15）；“出钱卅买茭廿束”（140.18B）；“定作卅人伐茭千五百束，率人五十束，与此三千八百束”（168.21）。《居延新简》一书又载：“受六月余茭千一百五十七束”（E.P.T52：85）；“驷望隧茭千五百束直百八十，平虏隧茭千五百束直百八十，惊虏隧茭



千五百束直百八十。凡四千五百束直五百卅尉卿取当还卅六□” (E.P.T52: 149A); 以“束”表示“茭”者其例甚夥, 不备举。何为“茭”? 《说文》云: “茭, 干刍。”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云: “刈取以用曰刍, 故曰‘生刍一束’。干之曰茭。故《尚书》曰‘峙乃刍茭。’”简言之, “茭”即饲养牲畜用的干草。至于青草, 徐锴所云“生刍一束”, 语出《诗·小雅·白驹》: “生刍一束, 其人如玉。”“生刍”即未晒干的青草。汉简中也有关于青草的记录。《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有云: “……出二十五毋菁十束, 出十八韭六束” (175.18); “需菰十束” (213.50)。而据《说文》, “菁”乃韭花, “菰”即茅草芽, 自然均是青草而非干草。它说明, 居延地区韭菜、韭菜花、茅草芽均是用“束”表其数量的。从《诗经》到汉代, 青草一直是用“束”作计量单位的, 与表示干草(茭)用“束”无别(秦汉时代表饲草重量也用“石”, 详下), 哪里有用容量词石、斗、升的呢? 此外, 我们还注意到, 居延地区芦苇也用“束”作计量单位, 如《合校》载: “……定作十七人伐苇五百□/率人伐卅/与此五千五百廿束” (133.21); “……四人伐苇百廿束” (317.31)。均是其例。

第三, 以“束”表示饲草, 在西北地区具有连续性。上举各例为汉代居延所出资料, 这里再看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一些唐代资料。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 465 ~ 466 页, 第九册第 23 ~ 25 页, 第十册第 252 ~ 254 页, 记载了 60 余笔牲口饲草账, 均是用“束”作量词的。如第十册第 252 页文云: “蒲昌县界, 长行小作[状]□ (另行低二字) 当县界应营易田粟总两顷共收得□□[叁]阡贰佰肆拾壹束 (原注: 每粟壹束准草壹束) ……”说明不仅是“草”, 而且“粟”秆也是用“束”表其数量的。

总之, 胡文以“青”指“青草”是不能成立的。



二、表重量之“石”不同于表容量之“石”

毫无疑义，该简文中的“一石一斗五升”是表示容量的，也是我们认为它不能用于表示饲草数量的主要原因，已如上述。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造成胡文误断的另一原因是混淆了表重量之“石”与表容量之“石”的区别。

胡文曾引用《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秦代《田律》中的一条律文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其律文云：“入顷刍藁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藁二石。刍自黄蘗及茆束以上皆受之。”胡文在引过之后作进一步的解释说：“分了田，不管种不种，都要缴纳刍藁，每顷交饲草三石，秸秆二石。”显然是只注意了这条律文中“刍三石”、“藁二石”的内容，却忽略了其中的“黄蘗”和“茆”（均是“刍”，即饲草）同时也用“束”表示数量。而所云“三石”、“二石”之“石”，又是用来表示重量的，与简文中表容量的“石”风马牛不相及。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在为这条律文所作的第二条注释中已指出：“石，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秦一斤约为今半斤。”（《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28 页，文物出版社，1978 年）。可惜胡文疏而不察。应该说，整理小组所作的这条注释是有文献根据的。直至汉代，以“石”表示饲草重量依旧存在。如《汉书·赵充国传》云：“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千八十六石。”颜师古注：“茭，干刍也。藁，禾秆也。石，百二十斤。”而就在同一传中，汉宣帝于批评赵充国的信中却说：“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刍藁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刍藁束数十”，据师古注，即每束刍藁值数十钱。居延汉简也有用“石”作饲草重量单位的。如《居延新简》载：“第四积茭四百一石廿五斤建昭二年□□。”（E.P.T50：162）“石”、“斤”并用，说明“石”指



重量。由上可知，秦汉时代表示饲草数量的词有“束”和“石”（表重量），而以用“束”为常见。至于用硕（石）、斗、升为量词表示的物种，从汉简中看到的有粟、麦、大麦、糜、谷、黍米、米、稗米、粗米、青粟、青黍、粱粟、米糒、秬麦、薑、胡豆、穞程、盐等，唐代也是用以表示谷物及盐米，尚不曾见到用于表示“青草”数量。

总之，无论在传世文献中，还是在出土文献中，表重量之“石”与表容量之“石”迥然有别，必须严格区分。

三、“差徭”系“差科”之误释

胡文在讨论该简年代时，转引了同遗址所出一件唐代大历三年（768）纸质文书沙畹所作释文的部分文字，其中第2行有“杂差徭”，第4行有“所着差徭”，第5行有“小小差徭”。我们姑且不论胡文在引述时将第4行行次漏标，从而将原文的5~7行误作4~6行，就是依据唐史的普通知识，也可断言这三处“差徭”均是“差科”之误释。张广达、荣新江二先生的《于阗史丛考》（140~154页）、陈国灿先生的《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535~536页），均有该文书的释文，都作“差科”而非“差徭”。所谓“差科”，在中古时代的基本含义是差点兵防，征科赋役。敦煌文书中有唐天宝年间的“差科簿”（P.2657加P.3559V，加P.3018加P.2803），中外学者西村元佑、池田温、王永兴、唐耕耦等先生为之考释，成果卓著。古籍中“差科”一词也很习见。如《三国志》卷48《孙休传》记永安二年（259）诏书：“今欲广开田业，轻其赋税，差科强羸，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唐代文献中“差科”一词更多。如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六月中书门下奏文有：“其逃亡户口赋税杂差科等，须有承佃户人，方可依前应役。”（《旧唐书·懿宗本纪》）“杂差科”即



杂徭役。《全唐文》卷二收有唐高祖李渊的《罢差科徭役诏》和《申禁差科诏》。故尔，“差科”一词为普通语词，并非深奥。然而，胡文不仅未能纠正沙畹释文的错误，反而在此错误基础上踵事增“华”，加以发挥，愈走愈远。胡文在引过这件唐大历三年的文书后说：“这份唐大历三年（768）的文书，记载当地胡人百姓为缴纳‘差徭’向当局投诉之事，文书虽然加以安慰，但是又宣布今年还有‘小小差徭’，不过可以宽限到秋熟以后再缴纳。这份文书使我们想到，木简上的‘青’，可能就是文书里所说的‘差徭’。秦汉以来也称为‘刍藁’。”显然，胡文是以“青”为“徭”，“徭”同“刍藁”，于是在这三者之间找到了所谓联系。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慎哉！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7日第7版）

“20 世纪出土的第一支 汉文简牘”新释

——再与胡平生先生商榷

《中国文物报》2001 年 2 月 7 日第 7 版发表了我写的《〈20 世纪出土的第一支汉文简牘〉献疑》，对胡平生先生发表于《文物天地》2000 年第 5 期的这篇文章提出了质疑。近来，胡先生对我的质疑给予了答复（见《中国文物报》2001 年 4 月 11 日第 7 版）。另一方面，《献疑》发表时，由于对这枚木简的内容尚未通解，故尔我一直处在求索之中。迄今所得结论，与胡文及其答疑文章大有径庭，特略陈管见如后。

一、“青”是“青麦”（青稞）的简称

我在写作《献疑》时，仅指出该简中的“青”不是青草，但对“青”字究何所指，未敢妄断。《献疑》发表后，承蒙学术界师友赐教，从而获知，“青麦”可以简称作“青”。敦煌文献 S. 5822 号为《杨庆界寅年地子历》，其开头是“青麦四驮半九斗，小麦四十驮二斗”，后面则用“青”代替青麦，用“小”代替小麦。用“青”代替青麦者见于第 5 行王光俊、第 6 行董元忠二人名字下。“驮”是吐蕃的一种量制单位，一蕃驮等于二十蕃斗（姜伯勤先生《突地考》，《敦煌学辑刊》总第 5 期第 15 页）。又



从其单用地支“寅”纪年可知,《地子历》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的纳租账。如果说《地子历》是在先用“青麦”和“小麦”做过限定后再简称作“青”和“小”的,那么,P.2162背《吐蕃寅年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就是全部直截用“青”和“小”加以指代了。其中出现“青”34例,“小”39例,“麦”7例,“烂麦”1例。杨际平先生(《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第383页)和姜伯勤先生(《突地考》)一致认为这件文书中的“青”即“青麦”,“小”即“小麦”,杨际平先生还指出“青”就是“青稞麦”。我们还注意到,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有一件出自唐代西州(今吐鲁番)的地亩文书残片,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先生对之做了研究,指出:“第9行云‘张君君欠青稞税六亩’,而第12行末有‘已上青,七十二亩’一句,‘七十二亩’4字朱书。‘已上青’的‘青’即青稞……”(《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第69页)。在唐代,青麦不仅是敦煌、吐鲁番,而且也是和田地区的农作物之一种(见陈国灿先生《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507页);敦煌陷蕃(786)后不久,于阗也落入吐蕃手中,同样经历了一个吐蕃占领时期。因此,那里青麦自然也可简称作“青”。更由于出自丹丹乌里克的这枚木简上的“青”已被紧随其后的容量词“一硕一斗伍升”所限定,所以,“青”是“青麦”的简称,当无疑义。还要指出,由于当年英人翟林奈编目时不慎,误将此简及另外一些和田出土文书混入敦煌文献,此简居然也获得了一个“敦煌文献”S. 5891的编号。十余年前,周绍良、沙知、宁可、宋家钰、张弓、荣新江、郝春文诸先生在编辑《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时,未予剔除,且定名为“纳青麦历(木简)”(第9册第19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此册由宋家钰先生主编)。这说明此简中的“青”指“青麦”,早在一批敦煌学家眼中达成共识,只是胡文不察罢了!



二、唐代青草、干草的计量与换算关系

由于胡先生的答疑不仅仍然坚持该简中的“青”是指青草，而且根据他曾用“筐”计量铡碎了的牲口饲草的亲身经历，断然“认为在简文中使用石、斗、升这样一些容积单位表示‘青’的计量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就有必要将唐代的真实情况加以说明，以正视听。

首先，唐代青草仍用“束”作计量单位。唐人称青草为“青刍”，且被后世沿用。杜甫《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诗有“为君酤酒满眼酤，与奴白饭马青刍”句（中华书局排印本《全唐诗》第2308页）；宋·范成大《华严寺》诗有“我本紫芝曲，误落青刍栈”句；清·金农《送贺十五德舆之辰州》诗有“此去悲老马，谁与秣青刍”句。可知，用“青刍”称青草历时甚久，其意义与《诗·小雅·白驹》中的“生刍”无别。“青刍”也以“束”论多少。杜甫《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诗有“束比青刍色，圆齐玉著头”句（《全唐诗》第2426页）。“薤”即菹头。上句意谓，一束束菹头像青草一样鲜嫩。五代贯休《书陈处士屋壁二首》诗有“青刍生阶除，撷之束成束”句（《全唐诗》第9318页）。“束成束”也就是捆成捆。如果说上面这些材料均出自诗人之口，有文学化之嫌，那么再让我们看一下真实的生活记录。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第292~293页为《唐大历三年（768）僧法英佃菜园契》，内云：“（前略）园内起三月□□送多少菜，至十五日已后共生菜供壹拾束。（中略）□□葱内所种芥，寺家取壹佰束（后略）。”同书第301页《唐孙玄参租菜园契》内云：“（前略）5.（行号，下同）□□拾束与寺家。秋菜一畦从南□□ 6. □□入孙，一分与寺家。收秋与介（芥）壹佰束（后略）。”我在《献疑》中已举证，《诗经》、居延汉简均用“束”



表示青草和青菜，唐代这种表达方式难道不是其子遗吗？

其次，唐代干草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大唐六典》卷十九“司农寺”云：“其诸州藁秸应输京都者，阅而纳之。”可知，唐代行政法典以“藁秸”称干草。又称“厩刍”，见《新唐书》卷126《韩休传》：“（玄宗时）出为虢州刺史。虢于东、西京为近州，乘輿所至，常税厩刍。”亦称“禾草”，见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第250页。也称“茭”或“秋茭”，见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第116～117页。又称“茭草”，见《太白阴经》卷五“人粮马料篇”。“刍”、“茭”、“藁”及“刍藁”这些字、词，我们不是在秦汉时代的材料，包括居延汉简和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多次遇到过吗？事实表明，历史并未中断，只是干草的名称发生了某些变异而已。从唐人这些对干草的称谓中，我们能体味到的依然是秦汉乃至先秦时代的遗韵。

那么，唐代干草如何计量呢？概而言之，曰“束”曰“围”，二者又可换算成“斤”，与秦汉时代用“束”和“石”（表重量）无本质区别。用“束”表示者，我在《献疑》中已举出不少吐鲁番出土资料，这里不赘。用“围”表示者，除见于《太白阴经》卷五“人粮马料篇”外，亦有出土资料为证。敦煌文献P.2862背和P.2626背《唐天宝时期应见在账》有：“13. 郡草场 14. 合同前载月日见在草总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七围。”至于“束”、“围”与“斤”三者间的换算关系，唐代文献亦有记载。唐人元稹曾上奏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励非法苛敛百姓。其中有云：“严励又于管内诸州元和二年（807）两税钱外，加配百姓草，共四十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七束，每束重一十一斤。”（中华书局影印《全唐文》第6612页）。“束”与“斤”的换算关系，目前仅此一见。我怀疑法定数额应为每束10斤，因严励苛敛百姓而加征1斤。元稹在《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中又说：“山南西道管内州府，每年两税外，配率供驿禾草共四万六千四百七十七围，每围



重二十斤”。(《全唐文》第 6615 页)。如果我推测每束禾草应重 10 斤不误的话,则 1 围相当于 2 束。

这些便是唐代青草、干草的计量及其换算关系的真实情况。至于我们所讨论的这枚木简中的“石”、“斗”、“升”,是否像“筐”一样“理所当然”地用来计量铡碎了的饲草,以及历史与现实是否会有这样的用例,相信读者自会鉴别,无须我再饶舌。

三、“20 世纪出土的第一支汉文简牍”新释

胡文所谓“20 世纪出土的第一支汉文简牍”,实即斯坦因于 1900 年 12 月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编为“D.V.5”号(= S.5891)的汉文本简。但其确切内容如何,为便于讨论,再将胡平生先生的释文逐录如下:正面:“☐囊思☐纳青壹硕(石)壹斗伍升了,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官检怀弥惟(?)”;背面:“青一石一斗五升,阿闭娑,青一石一斗惟(?)”。

写作《献疑》以来,我一直在求索这枚木简内容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但颇多困惑。近读业师张广达先生和荣新江先生合写的《八世纪下半至九世纪初的于阗》一文(《唐研究》第 3 卷第 339~361 页),深受启迪,终于豁然开悟,对木简内容获得了较为明晰而准确的认识,现申述如后,并再次质疑于胡平生先生。

(一)关于思略其人。胡文所释的“思☐”实际应为“思略”。据张、荣统计,思略又名斯略,在此前的 12 件汉文和于阗文文书中已出现过多次,现知其活动年代在公元 777 到 788 年间,身份曾是杰谢百姓、城主和“萨波”(类似将军,《唐研究》第 3 卷第 351 页“思略年表”)。而胡文却说:“‘思’下一字有点像‘嗨’,不能确定。”失矣。此字笔画稍欠清晰,但其大致轮廓仍可看出是“略”字。再者,此简编号为 D.V.5 号,而同遗址



所出 D.V.6 号 (= S.5864) 就是思略于大历十六年 (781) 所写的牒文。只要稍加比对, 就可确认其名字。胡文却未做这样的工作, 令人备觉遗憾。

(二) 关于史怀珍其人。胡文所释的“怀弥”二字实际应为“怀珍”。“珍”字俗写作“玼”, 胡文不辨, 误释作“弥”。此人名字亦出现于同一地区所出 Hedin (代表斯文赫定编号) 24 号汉语—于阗语双语文书上 (《唐研究》第 3 卷图版一及第 340 页释文)。因“玼”字残半, 故张、荣十分审慎, 作“史怀□”处理。细审图版, Hedin 24 号文书上的“玼”字右半虽残, 但左半草书斜玉旁与 D.V.5 号之“玼”字偏旁写法相近。由此可知, 木简上的怀珍便是 Hedin 24 号文书上的史怀珍。此人名字目前仅此二见。

(三) 关于富惟谨其人。胡文在木简正、背两面的“惟”字后加了问号, 表示不确定, 且云: “末一‘惟’字, 不明确切意义, 依文书体例推测, 应是核收校验之意。”又失矣。此二“惟”字均是“富惟谨”其人名字的省略, 是负责官员署名, 而非“核收校验之意”。富惟谨名字已出现于 Hedin 15、16、19、24 和 DumaquC、D 双语文书上多处。在 Hedin 15、16 和 DumaquC、D 四文书中, 其共同署名是“判官富惟谨” (《于阗史丛考》第 84 页、《西域文明》第 215~218 页); 在 Hedin 24 号文书上则署为“判官、简王府长史富惟 [谨]”。长史为上佐, 是长官之副贰, 判案时为“通判官”, 故富氏自称“判官”。又因 8 世纪下半叶时于阗王朝奉唐正朔, 属于唐朝管辖范围, 所以实行唐朝行判之制, 也就完全正常。

(四) 关于“官检”二字。释文不误, 但理解却误。胡文说: “‘官’下的‘检’字不知应从上读抑或从下读, 从上读则为职官名, 从下读当为人名。”今按, “检”即“检案”之省略。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7 册第 506 页是一件唐景龙年间西州高昌



县处分田亩案卷，其开端存二大字“检，晏”，即由名字简称为“晏”的人进行了“检案”。而“检案”即“检履前案”，亦即审核已成之案卷，是唐代实行勾检制的必要程序。唐代履行勾检责任的是各级官府勾检官。其职掌则《唐律疏议》卷五名例律“同职犯公坐”条疏议曰：“检者，谓发辰检稽失，诸司录事之类。勾者，署名勾讫，录事参军之类。”前谓检查是否违反办事程限，后谓检查是否违反有关规定。史怀珍在 Hedin24 号文书上是“典”，而在 D. V. 5 号木简上担负着勾检之责。在同简上的富惟谨则是“判官”，即长史、别驾之类（详下）。考虑到此，推测史怀珍在为木简署名时的职位是录事参军或他官摄（代理）录事参军，或者仍是胥吏，但却担负勾检之责（关于无品胥吏也可担任勾官，请参王永兴先生《唐勾检制研究》第 34 页）。

（五）关于所谓“了”字。此一拉长了的“了”形符号，不在简文正文之内，而在“升六年”三字之右侧。而“勾检符号”画在所勾内容之右侧，正是唐代财务文书勾检的重要特征之一（《唐勾检制研究》第 208 及 211～212 页）。因此，它并非“了”字，而是勾检官史怀珍审核无误后所画的“勾检符号”。胡文不明唐代勾检制度，误释作“了”，且拉入正文，大失矣。此种勾检符号亦见于其它文书，如麻扎塔格遗址所出《唐贞元六年（790）神山馆馆子王忤郎抄》，详参陈国灿先生《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 507 页及第 61～62 页，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2 册第 121、122、124、131、136 及 240～266 页等多处，此处不赘。

（六）关于所谓“囊”字。木简上部已残，“思”上有文字及残存字划，胡文释作“囊”，且解释说：“‘囊’字中部已残，‘思’下一字有点像‘嗨’，不能确定。这个名字（按，胡文是将‘囊思□’当做一个人名看待的）使人想起西汉绥和元年立为乌珠留若鞮单于的囊知牙斯（《汉书·匈奴传》）。简文的意思也大体



可以明白，简文说，囊思□缴纳青壹石壹斗伍升，已经了结，六年九月廿五日，由官员怀弥核收。”失之远矣。细审图版，“思”上残存二字，当为“日辰”，其上更有另一字残痕。Hedin24 号文书末署：“贞元十四年闰四月四日辰时……”这组文书除记明年月日外，又记时辰，是其特点。“辰”时相当于今之上午 7~9 时。故而我推测，木简“思”字以上之内容应为“×年×月×日辰”（“时”字略写），是记录思略交纳青麦时间的，时在公元 8 世纪之末（详下）。因此，它并非“囊”字，更与西汉匈奴单于囊知牙斯相距 800 年，毫无关涉！

（七）关于富惟谨在木简上的地位。我们注意到，木简正背两面二“惟”字均写于木简下部右侧，且字体略小，这正是唐代通判官署名的习惯性特征之一（参《唐研究》第 3 卷第 343 页）。在 Hedin24 号文书上，“富”字较大，“谨”字已残，而“惟”字同样较小，所反映的依然是唐代判官署名特征。因此，木简上二“惟”字仍是判官富惟谨署名，其身份与地位未变——还是长史之类的副贰之职。

（八）关于史怀珍和富惟谨署名不具姓氏。简中此二人只有名字（富惟谨这里只省作“惟”）而不具姓，也是唐代判案署名特征之一。《朝野僉载》卷四载：“高阳、博野两县竞地陈牒，[权]龙襄判曰：‘两县竞地，非州不裁。既是两县，于理无妨。付司，权龙襄示。’典曰：‘比来长官判事，皆不著姓。’……”长官判案署名不具姓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其例甚夥，不备举。至于唐代官员署名仅写一字，例证极多，请参《唐勾检制研究》第 115、170~172 页，《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第 344 页注释①。

（九）关于木简背面内容。根据我们所见多例敦煌吐鲁番“帐（同账）历”文书，如前引《地子历》和《突田历》，“阿闭娑”应是当地一个胡人名字，“阿闭娑青一石一斗”是一项内容，意即阿闭娑缴纳了青麦一石一斗，不能断开；其上面的“青一石



一斗五升”是另一人所缴青麦，前面应有人名。但此人名字已失，故当在“青”上施以缺文符号□。

至此，我们对这枚木简的内容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概括如下：某年某月某日之辰时，思略缴纳青麦一硕一斗五升。勾检官史怀珍于六年九月廿五日进行勾检，审核无误，于是署名并画上了“了”形勾检符号。判官富惟谨署名认可。背面是另两笔同一性质的账目，富惟谨也署名认可。其内容属于“帐历”，故应定名为《唐思略等纳青麦历（木简）》。

那么，此简年代又如何呢？如前所述，现知思略活动年代在公元 777~788 年间；而富惟谨以“判官”身份署名的文书多在公元 798、801 和 802 等年份（《唐研究》第 3 卷第 349 页）。此二人名字又同时出现于 D. V. 5 号木简上。而勾检官史怀珍既出现于这枚木简上，又与富惟谨同时出现于 Hedin24 号文书上。综合这些因素，我推测木简上史怀珍所署“六年九月廿五日”，或为贞元六年（790），或者更晚；而胡文所简单比定的唐大历六年（771）可能性较小。不过，这仅是推测，能否成立，仍有待证实。

根据以上所考，现将简文重新释读并标点如下：正面：“[× 年×月×] 日辰，思略纳青一硕一斗伍升。六年九月廿五日官检，怀珍（勾）。惟。”背面：“□青一石一斗五升，阿闭娑青一石一斗。惟。”全简残存 40 个字和 1 个符号。

最后，我在对这枚木简内容进行考释的过程中，胡文所附摹本使我受益良多，这是要特别声谢的。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1 年 5 月 30 日第 7 版）

附录：

《敦煌吐鲁番研究》弁言

当时代的步伐迈入公元 1996 年的时刻，敦煌吐鲁番学的一块新园地——《敦煌吐鲁番研究》诞生了。

《敦煌吐鲁番研究》是应运而生的。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探索，人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发现于敦煌、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众多文物和文献，有其相通之处和内在联系性，只有将它们作为整体去考察，才能拓展视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和中亚文明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敦煌吐鲁番研究》是一座桥梁。研究成果是沟通学术交流之公器，读者评论则是促使成果更加成熟的砺石。有鉴于此，我们将以较多的篇幅刊登书评，约请有关专家撰写评论文章，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借以沟通作者与读者的联系，切磋琢磨，以利于良好学术风气的推进。

《敦煌吐鲁番研究》是面向全世界的。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内外学者焚膏继晷，为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壮大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现在它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显学之一。为学者们提供一块展示成果的园地，正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敦煌吐鲁番研究》也是面向新世纪的。到公元 2000 年，当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时，我们也将迎来敦煌石室“石破天惊”那



一刻的百周年。继往开来，是我们的责任；培植新苗，是我们的心愿。壮大我们的队伍，创造出更丰硕的研究成果，才是我们对先民和西北大地慷慨赐予的应有回报。

我们热切期盼海内外学者，以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这块学苑新圃挥洒汗水，植树、栽花，辛勤耕耘，和我们一起迎接春色满园的明天。

我们期待着。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法国汉学》第五辑 (敦煌学专号) 编后记

公元 2000 年是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和开启一百周年，也是“敦煌学”这门国际显学建立的第一个世纪的结束和第二个世纪的开始，国际学术界的同仁们正以多种形式纪念这一盛事。为此，《法国汉学》特别编辑了本期“敦煌学”专号，以为献礼和庆祝。

由于历史的原因，无论是在敦煌文物与文献的收藏方面，还是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法国近百年来都占有一席之地。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物多为上乘之作，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精品同样居多，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此外，在敦煌文献及艺术品的保护方面，法国有关机构也不惜花费巨资，不断提高保护的科学技术，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

法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众多分支学科中，几代法国学者传承接力，取得了成绩。他们所关注的一些学科，比如语言学、敦煌写本的纸张等物质形态、阴阳术数文化等，是其他国家研究工作相对薄弱或着力尚少的领域，从而与别国学者的研究工作形成了互补。同时由于东、西方文化底蕴有别，对同一个问题的研究会出自不同的认识视角并产生结论上的差异。因此，就像法国学者要从东方学者那里受到启发一样，法



国学者的看法对东方学者的研究或许也会产生启发，正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情况在本集《法国汉学》专号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尽管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由于语言障碍，中国“敦煌学”学者能够直接读懂法文原著的为数寥寥，自然就成了一件憾事。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翻译工作显得格外重要。近十多年来，已有不少法国学者的“敦煌学”专著或单篇论文被译介到中国，但也还有一些鲜为人知。因此，我们在本期专栏之末附编了一份“法国学者敦煌学论著目录”，或许能够给中国同行进一步了解和借鉴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提供些许方便。借此机会，我们向那些为《法国汉学》的翻译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们怀着一份学术热情，与大家共同迎接“敦煌学”新世纪的到来。回首既往，我们为了一份共同的事业曾经进行了合作，并建立了友谊；面向未来，我们坚信这种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友谊也将会得到巩固和加深。《法国汉学》作为沟通东西方学者的一架桥梁，愿意为此继续殚精竭虑，贡献绵薄之力。

（原载《法国汉学》第五辑，第336~337页，
中华书局，2000年11月）

“第 36 届亚洲北非研究 国际会议”简介

“亚洲北非研究国际会议”前身为“国际东方学家会议”。1873 年在巴黎召开首届大会，此后至 1973 年的第 1~29 届大会，全在欧洲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国家纷纷独立，参加会议的亚非学者越来越多，会议议题也以亚非人文和社会科学为主要课题，学术重心已经东移。1993 年曾在我国香港举行第 34 届会议，与会学者近 2000 人。1996 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第 35 届会议，中国学者去的很少。

世纪之交的 2000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3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召开了“第 36 届亚洲北非研究国际会议”，与会者 600 余人，比预定人数少了近一半。主要原因恐怕是第三世界学者经费困难，不便赴会。大会给祖国大陆 50 多个名额，港台 20 多个名额，大陆地区赴会的仅 10 余人。我遇到的有社科院宗教所何劲松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郝春文教授、北京大学南亚所杨保筠教授、宁夏大学历史系张天教授，业师张广达教授则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赴会。

会议规定语言为英语和法语。这对欧美学者来说非常方便。但作为国际会议，各国学者都努力按要求的语言宣读了论文。不过，我也看到，有的华裔学者已加入外国国籍，仍用中文宣读论文，听者倒也安之若素。



8月27日下午举行了半个小时的开幕式，然后是一个自助餐聚会。从28日早开始，一直到9月2日下午，十几个小会场同时举行专题报告会。会议发给每人一个程序手册和一本论文提要（英文）。每位代表在安排的时间内作报告，不得超过20分钟。报告之后便可自由与会。我进过一些会场，有的台上主讲者四人，台下听众也只有三四个人。有的议题甚至就是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几个轮流登台，互相当听众。28日上午第一场便是法国的马若安、华澜和我三个人关于敦煌历日的专题演讲。法国学者很注意互相配合，他们去了十几个人，一人演讲，其他人几乎全去听讲。俄国学者也很注意团队精神，他们将每个人的论文摘要全部汇编起来散发，以扩大影响。日本学者仍然保持着他们的优良传统，踏实认真，张广达先生评价他们“一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我进过他们研究宋史的专题会场，确实极为认真，每位学者都努力用英语宣读自己的论文。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也出席了会议，他到处听会，几乎不漏一场，令人感动。

会议议题一如既往，极为广泛。既有古代历史、文化、语言等广阔领域的内容，也有当代的现实问题。有的问题研究有素，颇有深度，但有些问题也颇肤浅。例如，一位已经加入加拿大国籍的华裔女士，研究当代中国大陆妇女问题，她所依靠的主要是每年回国几次听到的消息以及国外的华文报纸，显然研究不深。精通英、法、俄、日等多种语言的张广达师也是抓紧一切时间，四处听会。他步履矫健，精神饱满，对国内年轻一代学人寄予殷切希望。但在对本次会议学术水平的评价上他略有保留。

会议决定：第37届大会将于2004年在莫斯科召开。

（原载《华林》第一卷，第82页，中华书局，2001年）

敦煌学科技著作评介

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日益昌明，受到空前的重视和肯定。近百年来，由于敦煌学这门学问非同凡响的地位，在众多分支学科中，科技方面的研究也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日益被重视。这里我拟对敦煌学科技类著作略加评介。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敦煌科技类著作约略包括医学、天文历法、建筑艺术与技术史三个门类。而且，这些著作都是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现分类介绍于下。

医学类著作。敦煌医药学文献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所以此类著作也为数最多。在北京，以研究中医文献学著名的马继兴教授为首，王淑民等中青年学者参加，先后有三部关于敦煌医药文献的著作问世。1988 年，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敦煌中医药文献加以整理与研究之作。此书分“导言”和“古医籍考释”两部分。“导言”主要阐明敦煌医药文献的来源、保存情况、文献学特征、时代考察和学术价值等；“古医籍考释”则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敦煌医药文献划分为医经、五脏论、诊法、伤寒论、医术、医方、本草、针灸、辟谷服石杂禁方、佛家道家医方、医史资料等 11 个大类。书中对每件文献以“提要”、“原文”、“校注”、“按语”和“备考”等形式进行释录与研究。10 年之后，1998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马继兴教授领衔重编的《敦煌



医药文献辑校》，皇皇一巨册，作为周绍良先生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之一种面世。此书是对《考释》一书的进一步修订与完善，纠正了前书的不少错误，在分类、文字释录等方面更形精审。鉴于“前两部书中方剂卷子与其他各类医书合编在一起，又无方剂索引，不便检索使用”，王淑民女士又独立编著了一本《敦煌石窟秘藏医方——曾经散失海外的中医古方》，由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于1999年5月出版。全书收录较为完整的医方475首，分为65类进行著录与研究，使用起来较为方便。

我国研究敦煌医药文献的另一重镇是兰州。兰州是敦煌学的故乡，当地学者对敦煌学具有超越他人的热情，自是情理中事。1994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甘肃中医学院院长丛春雨先生主编的《敦煌中医药全书》，计120万字，757页，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敦煌医药学著作。该书除了整理敦煌医药文献，突出的一点，是它注意到了敦煌壁画中的形象医学资料，从而开辟专章，加以论述。在“形象医学是敦煌中医药文献的稀世之宝”一目中，介绍了如下内容的敦煌壁画：（1）行医施药疗病疾；（2）出诊患家救病儿；（3）揩齿刷牙，剃头洗澡，讲究个人卫生；（4）修改水井，改建厕所，丰富和发展中医卫生学；（5）运动与气功，强身与保健，充实发展中医运动医学。由于融进了这些内容，从而使敦煌医药学的涵盖面更为广泛。1995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张依先生的《敦煌石窟秘方与灸经图》，从书名即可看出，它是研究医方与针灸图象的。这位学者非常重视古穴位考证和《灸经图》的现代临床应用。他运用《灸经图》治疗多种疾病均取得疗效，书中收有27个医案，从而使敦煌古典针灸图谱在当代大放异彩。1989年1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健雄先生等编著的《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是选取了医药学价值较高者而进行的释录工作。以上6种敦煌医药学



著作，虽各有少许侧重，但总体上都是对敦煌医药文献所做的基础性工作。由于多是各自为战，又几乎是先后出版的，所以内容雷同较多。当然，这种情况在敦煌医药文献的研究中在所难免，因为研究对象本身已经决定了这一点。

天文历法类著作。这主要是笔者编著的两本书。一本是《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也是周绍良先生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之一种，于1996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天文书、星图”，下编为“历书”。全书收录敦煌文献60余号，每件均以定名、录文、提要、校勘记四项内容进行著录。书末有附录13种，多由研究古代历书的基本方法所形成，可以当作工具使用。所以，中科院院士席泽宗教授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说：“不但鸳鸯绣了从教看，而且也把针线和原料全部托出给读者用。”这本书是敦煌天文历法文献的首次集成之作。特别要提到的是，该书揭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历日》曾做过两次准确的月食预报，为前人所未发现，从而给中国天文学史增添了新内容。另一本书是笔者编著的《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是应薄树人教授（已故）之约，为《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编写的图文对照本，已于1997年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虽然有400多页，但未单独发行，而是收在《通汇·天文卷》第一册之中。从书名即可看出，它的内容仅限于历书，但不限于敦煌所出，吐鲁番出土品也包容了进去。

这两本书从1983年做起，直到出版，费时14年之久。虽然耗去了多年的心血，也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认可，但我自己并不十分满意。原因有二：一是当年工作时使用的照片效果欠佳，一些本该认出的字而未认出，尤其是少量朱笔字在黑白胶卷上反映不出来，从而未能录出；二是编著这两部书时，国际上的一些藏品尚未公布。二书出版后，我从陆续刊出的藏品中发现至少还有如下历书需加收入：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敦煌1件，俄罗斯科学院



亚洲民族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 2 件、黑城 2 件，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 4 件。这 9 件中，俄藏“Дх.02880”号为公元 834 年（唐文宗大和八年）的雕印历日，比 S.P.002 号咸通九年（868）雕印的《金刚经》早了 34 年（参《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拙作《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也是在我国发现的有绝对年代可考的现存最早雕版印刷品，从而在雕版印刷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而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 Ch.3506 号是明永乐五年（1407）的印本历日，学术价值同样很高。目前，我一方面对已经出版的二书进行修订和补充，希望有一个更完善的整理本同读者见面；另一方面，正在以此二书为基础，撰写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吐鲁番历日研究》一书。我期盼这些工作能早日完成，将自己的新著再次呈现于读者面前，接受学术界的检验和批评。

建筑艺术与技术史类著作。建筑艺术方面主要是萧默博士的《敦煌建筑艺术》一书，由文物出版社于 1989 年 10 月出版。作者所以选择这个课题，是由于在中国建筑史上，自魏晋南北朝到中唐以前大约 500 多年里，可供研究的实物资料实在缺乏。而敦煌建筑资料的精华所在，恰恰反映了南北朝和隋唐的建筑面貌，填补了盛唐和盛唐以前近四百年的空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同时我国古代建筑画（宋代以后又称“界画”），素有以现实为师的优良传统，画家须对建筑有详尽的了解，甚至可能亲身参加过建筑工程。此书作者曾在敦煌莫高窟生活和工作过 15 年之久，因此其著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均受到重视。全书凡分引论、洞窟形制、佛寺、阙、城垣、塔、住宅、其他建筑类型、建筑部件与装饰、建筑施工、建筑画、唐宋窟檐、莫高窟附近的两座宋塔、莫高窟第 53 窟窟前宋代建筑复原等专题，逐一剖析与研究，全面而深入，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由于内容多涉及专门之学，不是我这个门外汉可以肆意饶舌的，故不作更具体的评说。



几乎是在《敦煌建筑艺术》出版的同时，1989年11月，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敦煌研究院王进玉先生的《漫步敦煌艺术科技画廊》一书。这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科普著作，但并非易于为工之事。作者为了辨别了解敦煌壁画中的科技内容，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多数消耗在洞窟之中；又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将这些内容描述出来，我读后十分佩服和感动。全书由42篇小文构成，内容包括农业（10篇）、纺织轻工（6篇）、建筑（7篇）、交通工具（3篇）、医疗卫生（3篇）、天文地理（4篇）、军事装备（3篇）、化学冶金（4篇）、造纸与印刷（1篇）、衡器（1篇）。可见内容十分广泛。不过，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应该属于技术史，真正属于科学史的不是很多。尽管如此，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中古时代的技术水平，有与通过萧默前书了解建筑史具有同样的意义。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博士也曾经把目光放在敦煌壁画上。而通过《画廊》一书，我们可对敦煌壁画上的技术史内容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这是该书的一个贡献。当然，作者如能将这些技术史内容写成一部研究专著，我相信价值会更大。也许已有这样的专著问世，仅仅是我未能寓目而已。

这里，我们还要介绍一本虽非技术史本身，但对研究技术史关系十分密切的著作，它就是敦煌研究院马德博士的《敦煌工匠史料》，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11月出版。建筑艺术也好，各种技术也罢，都是需要人，也就是工匠去实现的。《史料》一书正是从工匠的社会学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此书篇幅不大，32开，123页，分“研究篇”和“史料篇”。研究篇对工匠的类型、技术级别、身份、生活、经济特色等进行了论述，而且是放在唐宋时代的总体背景下进行的。但我更看重的是“史料篇”所做的工作。如果说在古代科技曾被认为是“雕虫小巧，壮夫不为”的话，现代有一些人也喜欢大发“宏论”，制造“学说”，并贬低整理研究史料这项基础工作的价值。其实，平心而论，做史料整理



和考据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只有这项工作做好了，才能升华出理论来，凭空臆撰的理论恐怕只能贻害学林。最近几十年的历史难道不是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吗？当然，我不是说不必重视理论研究，而是说应该宽容一些，允许不同学术风格并存，不要老是用个人所好苛求别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史料篇”所做的工作是十分可贵的。作者对敦煌石窟壁画、题记、文字材料，包括诗歌中所能见到的工匠史料，逐一耙梳，然后进行分类，共得到 680 条（包括重复者近百条），从而大大方便了研究者。由此我想到，如果能有更多的学者不惮辛劳地从事此类工作，也许我们的学术事业才有大发展的希望。

除了以上介绍的三个门类 11 种科技类专著之外，我们还要介绍两种著作。一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著名学者季羨林教授的《糖史》，是 1998 年 8 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季羨林文集》的 9、10 两卷。此书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制糖及其传播历史的。书末附录了作者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发表的《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以及对此文的《补充》。作者声明，他所以下决心撰著《糖史》，与研究这份敦煌残卷有关，由此足见敦煌文献研究的学术魅力。另一本书是 1999 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之“科技卷”。此书由笔者与马德博士主编，是《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全 13 卷中的第 11 卷。书中收录了 1949 年以前的全部科技史论文，1949 年后的酌情选录，共收论文 41 篇，便于研究工作中参考使用而已。

以上我们对敦煌科技类著作做了一点鸟瞰式的评价，显然十分粗疏。加之，涉及的具体学科较多，个人学识又很有限，不是全部可以做出准确学术评估的。此外，现在的出版物极多，虽然笔者平日很注意收求，但也可能会有遗漏。若此，仍祈作者与读者见谅。我只是恳切希望，学术界要继续摒弃“雕虫小技”这一历史偏见的遗毒，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科技史研究行列中来。至



于如何开辟研究的新领域，转换研究视觉，从而加深研究的深度和加大研究的力度，也还都是亟待探讨的问题。

（原载中华书局《书品》2000年3期，第51~55页）

史道德族出西域胡人 的天文学考察

《文物》1985年第11期发表《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后，就史道德的族属问题，学术界曾展开讨论^[1]。199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罗丰先生编著的《固原南郊隋唐墓地》一书，公布了包括史道德在内的五位史姓人物墓志及其出土文物，扩大了我们思考史道德族属问题的范围。然而，除了明确史索岩同史道德是叔侄关系外，也未能提供更直接的材料，史道德的族属问题依然作为悬案而存在。

研究史道德族属问题的关键性困难在于：墓志称“其先建康飞桥人事”。建康地处甘肃酒泉，位居河西走廊。而唐代林宝在《元和姓纂》卷六“建康史氏”条云：“今隶酒泉郡，史丹裔孙、后汉归义侯苞之后。至晋永嘉乱，避地河西，因居建康。”据此，建康史氏是汉人从内地迁去的。这样，就很难认为史道德家族源出西域胡人。

为了对史道德先祖的民族所出获得较为明确的认识，这里我们要用古天文知识对其墓志中的相关文句加以释读。先录墓志原文一段于下：

公讳道德，字万安，其先建康飞桥人事。原夫金方列界，控绝地之长城；玉斗分墟，抗垂天之巨鼎。棱威边鄙，



挺秀河湟。盟会蕃酋，西穷月窟之野；疏濬太史，东朝日域之溟。于是族茂中原，名流函夏。正辞直道，史鱼簪谏于卫朝；补缺拾遗，史丹翼亮于汉代。龙光迭袭，龟剑联华，绵庆缔基，斯之谓矣。远祖因宦来徙平高（按，即固原），其后子孙家焉，故今为县人也。

对于这段叙述史道德家族历史的文字，如果只关注头尾，就会认为，其祖先原在甘肃酒泉一带，后来因宦而迁至宁夏固原，至史道德去世的仪凤三年（678），已成为固原人。墓志语义是完整的，而且在理解上也不存在困难。但是这却是很不够的。因为墓志开头还有其他文字，特别自“原夫金方列界”至“东朝日域之溟”共50个字，并非全是溢美之词，而是隐含着一些实在的内容。现对关键词句考释如下：

（一）“原夫”。唐人撰写墓志时，有一些程式化的语言，此即其一。“原夫”、“若夫”、“其先”所引出的文字，一般都是追述墓主祖先之所从来的。例如：

《大唐张君墓志》：“君讳通，字进达，清河人也。源夫大汉之初，辑宁区宇，殄櫜枪于垓下，消薄蚀于鸿门。……”^[2]

《唐故颜君墓志铭并序》：“公姓颜，讳相，字仁肃，河南洛阳人也。源夫洙泗弘风，颜回著昭邻之美；海沂虚尚，颜盍驰高节之誉。于后……”^[3]

《唐故杨君墓志铭并序》：“君讳贵，字元宗，弘农华阴人也。原夫本系，出自有周。”^[4]

《唐故南阳张府君墓志铭并序》：“君讳怀文，河南洛阳人也。原夫良居汉幄，是曰师臣；华处晋朝，实惟鼎辅。”^[5]

由上引可知，“原夫”又作“源夫”，确有追根溯源之意，史道德墓志中的“原夫”无别。换言之，墓志此下的一段文字，当是追述其先祖来历的。



(二)“金方列界”。《隋书·五行上》引《洪范五行传》曰：“金者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中古时代，方位同天干、五行相配时有以下顺口溜：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这是时人极为熟悉的常识，可知“金方”即西方。“列界”之“列”，即“裂”之古字。“裂界”同“裂地”，指分野。“金方列界”是说其分野在西方。

(三)“控绝地之长城”。“控”谓“控扼”，即占有。“绝地”指极远的地方。《汉书·韩安国传》：“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后汉书·马援传》：“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乐归哉？”“长城”此处似非实指，当是泛喻边塞防御系统。“金方列界，控绝地之长城”大意是说，从分野来看，其先在西方绝远之地，而且曾拥有大片土地。

(四)“玉斗分墟”。“玉斗”即玉衡，指观测天文的仪器。北周庾信《燕射歌辞·宫调曲》：“玉斗调元协，金沙富国租。”“分墟”与“列界”为对文，“列界”是指地上的分野，“分墟”则是指天区的划分。我们知道，古天文许多星官名词是由地上搬到天上的。因此，“玉斗分墟”就是用玉衡观测天空而划分之。

(五)“抗垂天之大昴”。“抗”即对也。《史记·陆贾传》：“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索隐引崔浩曰：“抗，对也。”今有“对抗”一词，亦是同义复词。“大昴”指二十八宿中的昴宿。首先，我们知道，古人将二十八宿划分为四陆，与四方相配，东方七宿为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为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为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七宿为井、鬼、柳、星、张、翼、轸。昴宿配位于西方，墓志上文“金方”亦指西方，二者一致。其次，昴宿在古代天文星占中是用来代表少数民族的“胡星”。《隋书·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目也，



主西方，主狱事。又为旄头，胡星又主丧。昴、毕间为天街，天子出，旄头罕毕以前驱，此其义也。”“昴……大而数尽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一星独跳跃，余不动者，胡欲犯边疆也。”引文与《晋书·天文志》略同。唐《开元占经》卷六二“昴宿占”亦有意义相同的文字记载。在中古时代的具体星占实践中，“昴”宿的天文现象也是同地面上的“胡”或“虏”的动向相联系。如《魏书·天象志三》记：

太祖皇始元年夏六月，有星彗于髦头（按，即昴宿，见上引《隋书·天文志》文，“旄头”同“髦头”）。彗所以去秽布新也，皇天以黜无道，建有德，故或凭之以昌，或由之以亡。自五胡蹂躏生人，力正诸夏，百有余年，莫能建经始之谋而底定其命。是秋，太祖启冀方之地，实始芟夷涤除之，有德教之音，人伦之象焉。

太宗永兴二年五月己亥，月掩昴。昴为髦头之兵，虏君忧之。

泰常三年十月辛巳，有大流星出昴，历天津，乃分为三，须臾有声。占曰：“车骑满野，非丧即会。”明年四月，帝有事于东庙，蕃服之君以其职来祭者，盖数百国也。

〔太平真君〕十年五月，彗星出于昴北。此天所以涤除天街而祸髦头之国也。时间岁讨蠕蠕。

可知，昴宿七星代表胡人而成为“胡星”，毋庸置疑。因此，“玉斗分墟，抗垂天之大昴”，其义是说，如用玉衡指向天区加以观测，与之相对的正是那个代表胡人的“胡星”——昴宿。

（六）“棱威边鄙”，当指史道德先祖在西方绝域曾有威势；“挺秀河湟”，当是炫耀史道德的先人在河西亦有荣光，与前文的“其先建康飞桥人事”相呼应。文中均有溢美之词，但文义不难



理解，不赘。

(七)“盟会蕃酋，西穷月竈之野”。“盟会”即会盟，此处用为动词。《史记·楚世家》：“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汉书·地理志上》：“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蕃酋”当指少数民族国君或酋长，意义显明。“月竈”即月窟，指极西之地。《文选》颜延之《宋郊祀歌》之一：“月竈来宾，日际奉上。”吕延济注：“竈，窟也。月竈，西极。”亦作“月域”。此二句是说，史道德先祖曾在极西之地同蕃人国君结盟，且为盟主。

(八)“疏澜太史，东朝日域之溟”。“澜”本义为大波浪，引申为流派。“疏澜”即远枝，疏属。“太史”指汉人史姓之祖史佚。《元和姓纂》卷六史姓云：“周太史史佚之后。”“疏澜太史”是说史道德家族是周太史史佚的远枝。“日域”是“月竈”的对文，指极东之地。此二句大意是说，作为周太史史佚的远枝，由极西而向东方迁徙过来。

通过以上疏证，墓志“原夫”及其以下 50 个字的意义应该说是比较清楚了。在这段文字中，同西方或西域有关的词语有“金方”、“大昴”、“月竈”，同胡人有关的词语有“大昴”、“蕃酋”。将这些词语的综合含义理解为“西域胡人”，恐不为过。墓志作者自地至天，由西而东，讲了个周遍，但概括言之，地在极西，在汉人眼中自然是胡地，天又是胡天（大昴），那么，这简直就是一片胡天胡地了。它所要说明的史道德族出西域胡人也就不言自明。

这里仍有一个问题需加讨论。就多数墓志来说，用“其先”二字引出下文追述先祖也就够了，但史道德墓志在“其先建康飞桥人事”之后，又用“原夫”引出另一段追述先祖的文字。墓志同时说史道德先祖是西域胡人，又说是汉族史姓远枝，并以春秋时卫国史鱼、汉代之史丹为其同宗而自相标榜，岂非荒谬？这



确实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放诸唐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并考之于胡人在华化过程中表现出的某些特征，仍可给予合理的解释。

唐承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之余韵，社会心理上仍以出身贵族名门而自高，因此，所谓的高门大族也就有不少冒牌存在于世。唐人刘知几在《史通·邑里篇》曾论道：“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浸以成俗，迷而不返。”显然，史道德墓志称其先人为周太史史佚之疏属，且与史鱼、史丹攀附，也只能目为唐初这种恶劣“积习”的表现之一了。

这些攀附行为，除了全社会风气使然外，作为西域胡人的史氏家族，同时也就具有了胡人华化过程中的一些特征。胡人华化后，多以汉人先哲名王为其先祖，这在唐代诸多蕃将中均有表现。如，原为契丹酋帅的李楷洛，身后碑称其为汉代李陵之后^[6]；突厥出身的将领李怀让，也冒认李陵为其先祖^[7]。但是透过这些假冒行为，我们也看到，很多胡人在汉地久居之后，汉化程度日趋加深，从而产生了与汉民族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心理状态，这也正是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史道德家族概莫能外。

史道德家族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虽也冒称汉人史佚之后，但又不愿意数典忘祖。在墓志中同时将这两层意思表达出来，实在是一个困难。不过，墓志作者却处理得极为巧妙：用显白的文字公开同汉族史姓名人攀附，用隐晦的文字说出其真实族出，可谓用心良苦！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自然是攀附内容于史无征，属于假冒；而曲折表达族出西域胡人者，才属于历史的真实。



【注释】

[1] 参见赵超《对史道德墓志及其族属的一点看法》，载《文物》1986年12期；罗丰《也谈史道德族属及相关问题——答赵超同志》，载《文物》1988年8期；马驰《史道德的族属、籍贯及后人》，载《文物》1991年5期。

[2]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4页。

[3] 同上，第198页。

[4] 同上，第205页。

[5] 同上，第320页。

[6] 《全唐文》卷四二二，杨炎撰《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

[7] 《文苑英华》卷九五一，常袞撰《华州刺史李公墓志铭》。

（原载《'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658~66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

凉山彝族二十八宿初探

四川省大凉山地区，地处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之南，西至西昌地区，东与宜宾地区毗邻，山陵峻拔，风景秀丽，是我国彝族同胞最大的聚居区之一。许多世纪以来，彝族人民为开发祖国的大西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创造了富有本民族特色的科学文化。凉山彝族对二十八宿的认识就是这些文化宝藏的一部分。研究这个问题，不仅对发掘彝族的文化宝库，而且对提供解决世界各地二十八宿之间关系有关问题的新线索，都很有裨益。

一、星名和四陆

二十八宿在凉山地区流传非常广泛，大凡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但多数人只能顺口背诵，对其更深的内容却已遗忘。惟有少数在民主改革前担任“笔摩”（巫师）的人，对二十八宿的了解较多。除民间传说外，甘洛县文化馆收藏的古彝文经典《年算书》也连续记载了二十八宿中的二十六个，脱写民间传说的鸡翅鸡尾和豹尾两宿。但就在该书记载十二生肖的部分又找到了这两宿，由此可以补齐。《年算书》所载二十六个星座，只有名称和用来算命的使用方法，星数和有关二十八宿的其他内容全不记载。同时在峨边县也见到了近人的传抄本，惟古彝文本尚未见到。这是两本不可多得的用彝文记载二十八宿的珍贵



文献。

彝族二十八宿的汉译名称（见附表），目前除第二和第十二不能确定外，其它几乎全同动物有关。其中用鹦鹉命名的四个星官；鸡五个星官；豹子七个星官；豪猪一个星官；犀牛三个星官；马一个星官。其他是：时首、时尾、明亮露水、槌枷和牛枷档。时首和时尾正好是一个恒星月的开头和结尾，明亮露水是指露露珠的，后两个是生产工具，意义都很明确。

在用鹦鹉和豹子命名的星官中，所用方法完全相同。即将这两种动物身体的各个部位分属到每一个星官中去。用鸡命名的那一组星官则是分为鸡的不同种类，如灰褐鸡、黑鸡等。而用犀牛命名的那三个星官则是分为公、母和犀牛吞吃东西的动作形状。这样就使原来彼此独立的星官连成顺序，既便于认识，也便于记诵。至于豪猪和慧马，则不言自明。可以看出，彝族给星宿起的名称十分质朴，完全不同于后来阶级社会中在星宿名称上所加入的神学迷信。这说明它的产生历史十分悠久。

彝族人民对恒星的颜色和形状也非常熟悉。附表所列的二十八宿中，三颗属于红色，两颗属于黄色，其它均为白色。红色星即参宿四、翼宿和心宿二。除翼宿颜色不确切外，参宿四和心宿二都是有名的红色亮星，作为观测的标志十分理想。心宿二是汉族古籍记载中的“大火”，彝族在形容它的颜色时常说“豹口红彤彤”，十分形象。其他颜色的星也大体相近。表中提供出恒星形状的八个星官，既形象生动，又富于生活气息。昴宿彝语字面意义是“一群山羊”，民间传说为“一群小鸡”，总是盼望同鸡妈（月亮）相聚会。称毕宿上部七星为犁地用的铧口也颇为逼真。觜宿几乎呈一等边三角形，在民间也能找到相仿的东西，这就是彝族人民做饭时绝对不可离开的三块石头——锅桩。亢宿确实是“弯弯的”。壁宿两颗星他们说是“老马走平路”，当然会给人以“笔直”之感。右更五颗星即使在汉族人看来也完全像一个打谷



用的“槌枷”。胃宿虽也是三颗星，但毕竟离得较远些，呈一等腰三角形，因而同觜宿具有完全不同的形象称呼——“牛枷档”。也许在彝族同胞看来，把这个“枷档”套在牛脖子上耕地再合适不过了。垒壁阵东四星组成的图案确为一个棱形，用“梭子”形容它也非常恰当。总之，这些对星宿形状的形容，或是日常生活用品，或是生产工具，或是家畜，但都与奴隶们的生产和生活须臾不可离开，并且符合这些星宿的图案形状。同时，对这些星宿形状的分析，也为我们判定彝族二十八宿究竟包含哪些星官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彝族二十八宿是否也具有四陆（即四象）的特征呢？彝语有对四象的完整称呼，苍龙还称苍龙，白虎还称白虎，朱雀称为孔雀，玄武暂译为“男女”（?）。汉族古代玄武图象做蛇缠龟形，《文选注》曰：“龟与蛇交曰玄武。”彝族称玄武为“男女”，显然也有相交之意。可见彝语同汉语四象名称几近一致。

其次，仔细分析彝族星名的组合，也能看到四象的痕迹，大体可将彝族二十八宿分为如下四组（按以豹角为首，详见下节）：

第一组（八宿）：明亮露水（亢），豹角（氏），豹眼（房），豹口（心），豹腰（尾），豹心（尾），豹尾（尾），豹过完（箕）；

第二组（六宿）：豪猪（建星），牛来（狗国），公犀牛（女），母犀牛（虚），犀牛吞咬（垒壁阵东四星），慧马（壁）；

第三组（八宿）：槌枷（右更）；时尾（胃），时首（昴），继续前进（?）（毕），鸚鵡头（觜），鸚鵡红翅膀（参），鸚鵡腰（井），鸚鵡尾（南河）；

第四组（六宿）：黑鸡（鬼），灰褐鸡（柳），鸡神雄（星），鸡神雌（轩辕御女），鸡翅鸡尾（翼），降露（?）（轸）。

可以看出，第一组以豹子为主组成；第二组以犀牛为主，另加豪猪和慧马组成；第三组以鸚鵡为主组成；第四组以鸡为主组成。



这种组合方法也许是将汉族的苍龙、玄武、白虎、朱雀改变而成的，即，苍龙变成了豹子，玄武成了犀牛，白虎成了鸚鵡，朱雀成了鸡。虽然改变得不再成为汉族每陆七宿，星宿和名称都做了变化，但四陆的基本面貌没有变化却是事实。这也说明，彝族和汉族的二十八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二、起首星官

彝族二十八宿有三种完全不同的起首方法。一般说来，圣乍方言区（包括甘洛、喜德、昭觉、越西、西昌一带，俗称“中裤脚”）以昴宿为首；义脑方言区（包括峨边、雷波、马边、美姑一带，俗称“大裤脚”）则以氐宿为首；所地方言区（包括普格、金阳、布拖一带，俗称“小裤脚”）偏重于以氐宿为首，个别地方也以昴宿为首。与此相应，《年算书》甘洛本从昴宿开始，峨边本从氐宿开始，同民间传说完全一致。独特的是，西昌一部分地区既不从昴宿，也不从氐宿开始，而是开始于垒壁阵东四星，但尚未得到文字证明。

二十八宿从哪一宿开头非常重要，它与二十八宿的来历关系密切。下面就这三种起首方法逐一试作分析。

（一）昴为首

昴宿彝语一读 [chyt ku fut]（吃库夫）。“吃库”为“一群山羊”；“夫”为六，指星数。另一读音为 [tat bop]（塔布）。“塔”是“约定时间”，“布”为“开始”，合为“约定开始的时间”，因此译为“时首”，对恒星月来说就是其开头。

《晋书·天文志》记有：“昴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狱事。又为旄头，胡星也。”又说：“昴主戎狄蛮夷。”很清楚，即使在古代汉族看来，昴宿也与西方少数民族关系密切。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上述引文中古代星占学家的某些迷信谬说，但昴宿



在古代与西方少数民族相关却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多数民族学工作者认为彝族先民来自我国古时甘青一带的氐、羌部落,《后汉书·西羌列传》对古羌人的一支迁往凉山的过
程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约在秦献公时(前384~前362年),这
可能是彝族至今如此重视昴宿并作为二十八宿开头的原因之一。
一。

其次,冬至黄昏昴宿上中天也是彝族先民一年之首的天象标志。竺可桢先生生前曾对《尧典》“四仲中星”做过很仔细的研究。他指出,“日中星鸟,以正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正仲秋”三句,是“殷末周初之天象”,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则是公元前二千四百年的天象^[1]。前已指出,古代彝族先民对昴宿十分重视,另一方面,古代周民族与彝族先民一样,同出于羌族部落^[2]。周民族建正为子,以建寅之十一月为年首正月,正好是冬至前后。彝族迄至现在,除与汉人同过春节外,各部落还在冬至前后任择一日过彝族年。唐人樊绰《蛮书》记载乌蛮的《蛮夷风俗第八》曰:“每年十一月一日(本文作者按,指汉历)盛会客,造酒礼,杀牛羊,亲族邻里,更相宴乐,三月(日)内作乐相庆,惟务追欢。户外必设桃茆,如岁旦然。”说明彝族冬至过年十分古老。同时也反映了彝族先民和古代周族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是,古代羌族是否能在公元前二千四百年就定为以冬至过年呢?现在无法得到证明。可是这些材料至少能反映如下一个事实,古羌人对昴宿的认识十分古老。由于岁差的缘故,殷末周初的冬至黄昏就不再是昴宿上中天了。但岁差是晋朝人虞喜的发现,与殷末周初相差甚远,古羌人不可能认识到岁差现象。因此,这并不妨碍他们后来在确定冬至为年首时,继续将已经熟识的昴宿作为年首的天象标志。还要指出,我们说彝族先民将冬至作为年首,并不是准确地冬至那一天,而是在冬至前后各十多天里任择一日。考虑到这一点,岁差的变化对他



们来说就不是太了不起的事情了。

由此，我们推测，彝族先民在很古老的时候对昴宿就很重视，并在后来确定为年首的天象标志，这可能就是昴宿为首的来源。

（二）氐为首

氐宿为汉族二十八宿的第三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为什么在彝族却成了二十八宿的一种开头呢？竺可桢先生曾引《左传》“天根见而成梁”，《国语》“中根见而水涸”，因此说：“天根，氐也。在春秋战国时代春秋左右黄昏时东升故云。”^[3]由于地球一夜之间自转 180° ，那么氐宿在春秋战国时代春分左右黎明时就是西落了，而在冬至左右黎明时则是上中天。这同样也是古代彝族先民一年之首的天象。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彝族以氐宿为二十八宿之首，是根据春秋战国时代冬至左右黎明上中天的天象而定，这或许正是它的来源之所在。

以昴和以氐为二十八宿之首都是彝族先民一年之首的天象，为什么却要使用这两种不同的开头呢？这是因为：第一，两种开头属于彝族先民两个不同部落的使用方法，至今分别在圣乍和义脑方言区保存着。第二，圣乍方言区沿用冬至黄昏昴宿中天的天象，而义脑方言区则根据春秋战国时代的实际天象而定。第三，观察时间不同。观察昴宿是昏中，观察氐宿却是旦中。汉族古籍记载“昏旦中星”，说明观测时间或昏或晨。我国西南地区古有“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说法^[4]，而且义脑方言区至今还有黎明观察北斗斗柄指向以定季节的做法^[5]，说明早晨观星是当时一般人的常识。

（三）奎壁阵东四星为首

奎壁阵东四星正当黄道，而且是在现今春分点上。可能是近代为了掌握农时节令的需要才设定的。但推测这种设定时间不会太长，从它只存在于西昌极小一部分地区也可以看出。



三、在天区的分布

如果全面观察彝族二十八宿在天区的实际分布，似乎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彝族二十八宿是按黄道分布的。二十八个星宿中有十六个在黄道带内，它们是：亢、氐、房、心、箕、建星、狗国、女、虚、垒壁阵东四星、右更、昂、毕、井、鬼和轩辕御女。其中亢、氐、房、建星、垒壁阵东四星、右更、井、鬼和轩辕御女等九个星官正当黄道，其他十二个星官不在黄道带内，但距黄道也不是非常遥远。所以这样分布，是由古人观察月离所致。黄白二道只有 $5^{\circ}9'$ 的交角，差不多是重合的，因此今天我们标在星图上就好像是按黄道分布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观察二十八宿在天区的实际分布是一回事，度量二十八宿距度时到底使用赤道度数抑或黄道度数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观察汉族二十八宿在天区的实际分布，也可以说是按黄道分布的，这也是观察月离所致。但汉族古代度量二十八宿的距离是以赤道度数为基准的，因此不能说汉族二十八宿是按黄道分布而计量的。同样，仅仅根据彝族二十八宿在天区的实际分布，仍然不能得出它以黄道度数度量的结论。可惜这个问题目前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摸到，仍旧有待于今后的深入调查和文献证据。

不过有一点却很值得注意。根据竺可桢的计算，战国时代汉族二十八宿正当赤道的有八宿：参、星、翼、轸、亢、氐、虚、危。这八宿除危宿在彝族没有外，其他七宿全都保留着。上节我们已指出，彝族先民与古代甘青一带的氐、羌部落有关，迁往凉山是在战国年间。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揣测：在战国年间，彝族先民认识的二十八宿可能是用赤道度量离度的；迁往凉山后根据实际观察的情况才做了一些改变，以致形成今天的面貌。



四、对恒星月周期的认识

月亮在星空背景上不停地移动，27.32 天一个周期，周而复始，从不间断。汉族古代称为月离。彝族人民在认识二十八宿的过程中，对恒星月的周期长度也有一定的认识和掌握。

一般说来，民间对恒星月的周期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有 27 天、27 天、27 天、28 天的周期性；另一种认为有 27 天、27 天、28 天的周期性。对这两种认识，我们只要进行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看出：

第一种：

$$27 \times 3 + 28 = 109 \text{ (天)} \text{ (按彝族说法计算，下同)}$$

$$27.32 \times 4 = 109.28 \text{ (天)} \text{ (按恒星月测定值计算，下同)}$$

这里，四个恒星月的实际时间长度比他们掌握的时间长度只多 0.28 天，即 6.7 小时。

第二种：

$$27 \times 2 + 28 = 82 \text{ (天)}$$

$$27.32 \times 3 = 81.96 \text{ (天)}$$

这里，三个恒星月的实际时间长度比他们掌握的规律只少 0.04 天，即 58 分钟，不到一小时。

由此可见，这两种认识都同实际的恒星月周期相差不远，而尤以后一种认识更接近实际。按照第一种方法，只要经过几个这样的周期，误差就会加大，而第二种方法误差较小。有的使用第二种周期方法的人提供说，第三次会合的具体时间要比第一、二次提前一小时（即第一、二次如果晚上某宿与月亮十点会合，那么第三次九点就会合了）。这与我们上述对第二种方法推算的结果颇相符合。

历史上彝族除了算命的“笔摩”以外，没有汉族那样专门进



行测量的天文官员，数学也不很发达，不可能测出恒星月的准确数值来。但仅凭千百次的肉眼观测，就能认识到这样深刻的程度，怎能不使我们叹服！

彝族人民不仅认识到恒星月的周期，而且将这种认识运用到预报月亮同某宿会合的日期上。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各地起首星官不同，预报的方法也不同。以氐为首的地区一般在汉历七月初七、初八、初九三天观察氐宿何时与月亮会合，记下这一天，以后就依上述所讲的那两种周期之一进行推算，到次年七月再校正^[6]。以昂为首的地区有几种不同但很具体的方法，现在试推算如下：

1. 观察是否准确，以正月初八、七月二十二月亮是否与昂宿会合为依据。

农历正月初八到七月二十二，朔望月的时间长度约是：

$$29.53 \times 6 + 22 - 8 = 191.18 \text{ (天)}$$

这期间月亮在恒星背景上移动七个周期，计有：

$$27.32 \times 7 = 191.24 \text{ (天)}$$

恒星月的总长度比朔望月的总长度长 0.06 天，约合 86 分钟。也就是说，如果正月初八月亮同昂宿会合，那么七月二十二就一定再次会合，不过比正月初八会合的具体时间晚 86 分钟而已。

2. 如果四月初一月亮同昂宿会合，那么十月十四或十五就一定再次会合。

四月初一到十月十四朔望月的总长度约是：

$$29.53 \times 6 + 14 = 192.18 \text{ (天)}$$

这期间月亮在恒星背景上移动七个周期，计有：

$$27.32 \times 7 = 191.24 \text{ (天)}$$

恒星月的总长度比朔望月的总长度长 0.06 天，也就是说，如果四月初一日月亮同昂宿会合，那么十月十四日就一定再次会



合，只不过具体会合的时间比四月初一那天晚 86 分钟，与 (1) 结果一致。

十月十五日再次会合是中间有连大月的情况，那时朔望月的总长度是 192.18 天，比七个恒星月长 0.94 天，不到一天，基本相符。

彝族也认识到在一个阴历年中 (354.36 天) 月亮大约在星空转 13 周 (355.16 天)。还有一些方法，这里不再一一推算。

上述推算中，我们只就正常情况下一段时间里朔望月同恒星月的总长度进行了比较，未将闰月考虑进去，如加考虑，出入还会略微加大。即令如此，这些成绩的取得亦属难能。

值得重视的是，彝族对恒星月周期的认识完全驱散了以往人们在二十七宿和二十八宿一宿之差以及二十八这个数字的来历上造成的迷雾。有的学者在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上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未免失误。认为：“二十八宿这条线是量度月球运动的刻度标尺，而它的数目二十八则是古时求得的月球基本周期的平均长度。因为月球完成它从望到望或从朔到朔的相周（朔望月）需时 29.53 日，而回到恒星间的同一位置（恒星月）则只需 27.32 日。这两个周期总是无法调和的，但 28 日这个平均数使用时很方便。”^[7]有的论者甚至以中国只有二十八宿，没有二十七宿；印度虽有二十七宿、二十八宿两种，但始终以二十七宿为主，认为由少到多，印度二十八宿应早于中国^[8]。还有人企图从土星的恒星周期与会合周期的关系来寻找二十八宿这个数字的来历。这些都不免出于主观想象，经不起推敲和证实的。

本文题为“凉山彝族二十八宿初探”，是仅就其大数而言，并非指凉山彝族只有二十八宿一种情况，事实上同一体系中还存在着二十七宿。彝族有将亢、氐二宿或者合并或者分开的做法。这是因为恒星月一周天需时 27.32 天，取整数值应为 27 天。如



果第二周再取 27 天，将余数全积在第三周，则是 27.96 天，整数值应取 28 天了。彝族将亢、氐二宿合并使成二十七宿时，彝话称为“叠”，亦即重叠，是适应第一、二两周的需要；将亢、氐分开使成二十八宿时，是为了适应第三周的需要，完全适合恒星月在二十七天和二十八天完成的两种情况。

其实，汉族古代也有二十七宿、二十八宿两种。《史记·天官书》就有将室、壁合为“营室”的，《尔雅·释天》亦是如此。当然，一个恒星月在二十八天完成时，室、壁也就分开了。

还需要指出，彝族以氐为首的二十七宿，是将开头和末尾的两宿重合的。这说明一个恒星月需 27 天还是 28 天，在义脑方言区的彝族先民看来，需在一个恒星月的末尾才能确定，而那种将室、壁合为营室的做法已是约定俗成的东西。

总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月离二十七宿还是二十八宿，都是古人观察月亮经天实际定出来的，完全符合对恒星月视运动的认识。合乎逻辑的结论应当是：凡是有二十八宿的地方就应当有二十七宿，反之也一样。

五、对二十八宿的解释和使用

我国汉族所以会产生二十八宿，是因为古人要利用满月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来间接地辨认太阳在恒星中的位置，以便确定春夏秋冬四季。为此，还将二十八宿分为朱雀、苍龙、白虎、玄武四陆，每陆七宿，各主一季。虽然经过漫长的阶级社会，二十八宿被星占学家们披上了迷信的外衣，但用以确定季节的本来意义和作用却未变化。那么，二十八宿在彝族的用途是什么呢？

无论民间传说，还是《年算书》所载，至民主改革前，二十八宿在彝族已经完全被禁锢在迷信之中了。科学的二十八宿变成了思想统治的工具。奴隶主们在酒足饭饱之后，除了叙家谱，炫



耀祖宗的威势，用皮鞭和棍棒驱赶奴隶从事永无休止的劳役，还要宣扬月亮同二十八宿会合时的吉凶祸福，以此来规范奴隶们的衣食住行。在这个问题上，《年算书》最具代表性。它在月亮同某宿会合的条文中，全是盖房、起灶、娶妻、嫁女“宜”与“不宜”的说教。比如，月亮同下列星宿会合时：

(1) 时首：不宜娶妻嫁女，此外都宜作。

(2) 继续前进(?)：不宜立房进房，此外都宜作。

(3) 鹦鹉头：宜“作帛”(祭祖)生子，娶妻嫁女，不宜缝织衣服。

(6) 鹦鹉尾：不宜出行、开土，此外都宜作。

(27) 时尾：宜念经安灵，不宜生子。

《年算书》这些“宜”与“不宜”的说教，与汉族中古时代的历注内容几乎别无二致。它从人们的生产劳动、婚丧嫁娶、外出行动，以至生儿育女等方面都作了严厉的限制，甚至妇女生孩子的时间都要规定下来！

不过我们要问，难道二十八宿在彝族一开始就同人们的生产活动没有任何联系吗？

仔细将彝族二十八宿的名称同上述对二十八宿的解释和使用进行对照，人们不难发现，这里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名称同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使用内容却是神学迷信。当然，不能说名称同使用的内容就一定要有必然联系，但从直观来说，名称是质朴的，使用内容却大相径庭，属于两种思想体系。

其次，我们从汉语对彝族二十八宿某些星宿的直译名称上，还能找到一点与生产联系的痕迹。据彝文工作者研究，彝语“鸡翅鸡尾”(翼宿)另有“夏送夏跨”的说法，也即是“送夏跨夏”的意思。我们知道，南宫朱雀七宿(彝语是孔雀)是春天的天象。翼宿居井鬼柳星张翼轸为第六宿，接近末尾。在整个春天，黄昏时这七宿依次中天，而到翼宿黄昏中天时就是春末夏初了。



这样“送夏跨夏”也就是说春天的天象快过完了，看到下面中天的天象就要跨入夏季了。彝语豹口（心宿二）与月亮会合也称为“秋天头”，就是秋天开始的意思。心宿二是夏季黄昏中天的天象。彝族为何称为“秋天头”呢？这是因为彝族相当一部分地区只有春、秋、冬三季，而无夏季，因此把“夏天头”说成了“秋天头”。这些都说明，二十八宿在古代彝族是用来预报农时季节的，罩上神学外衣是后来的事情。

彝族二十八宿是直至目前为止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保存得最完整的。它在民间流传比汉族都要普遍得多，确是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些知识的取得反映了彝族人民的聪明和智慧。它的被发现，也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天文学历史的宝库。彝族传说二十八宿是一个叫沙普吉尔的人发现的。此人很注意天象，他经常带着口粮到一座高山上进行观察，发现了月亮每晚在二十八宿中超过一宿，二十八天或二十七天一轮回。诚然，不可排除某些个人在观察二十八宿时的贡献较大，但却需要更多的人长期努力。每当晴朗的夜晚，星星露出天幕后，彝族总有不少人坐在院落里观察，预报月亮同星宿会合的时间。彝族人民对二十八宿这些内容的认识，正是千百万人长期实践的结果。

【注释】

[1] 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见《科学》杂志，1926年12月。

[2] 尚钺《中国历史纲要》。

[3] [4] 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见《思想与时代》1944年第34期。

[5] 见《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2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

[6] 徐益棠《雷波小凉山之僮民》，见1944年4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乙种。



[7] 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文学）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

[8]（日本）桥本仲吉《支那古代历法史研究》。

附 凉山彝族二十八宿表

	彝语拼音 符号	直 译	起 首 星	星 数	形 状	主星	相应的汉 族星名	主星 颜色	备 考
1	tat bop	时 首	△	6	一群雏鸡		昴宿	白	原名 chyt ku fut, 意为“一 群山羊”
2	hlut jjup	继续 前进		8	铍 口	毕宿 六、七	毕宿	黄	
3	jjyp o	鸛鹑头		3	三块石 锅 棒		觜宿	白	
4	jjyp lot	鸛鹑红 翅膀		4		参宿四	参宿一至四	红	
5	jjyp jjut	鸛鹑腰		3			井宿二、三、 四	白	
6	jjyp hmy	鸛鹑尾		2			南河一、二	白	
7	va nuo	黑 鸡		3			鬼宿一、二、 三	白	
8	va hxo	灰褐鸡		5			柳宿一至五	白	
9	va sy dur	雄鸡神		3			星宿二、三、 四	白	
10	va sy ma	雌鸡神		4			轩辕、御女十 四、十五、十 六	白	



续表

	彝语拼音 符号	直 译	起 首星	星 数	形 状	主星	相应的汉 族星名	主星 颜色	备 考
11	Va ddur Va hmy	鸡翅 鸡尾		4			翼宿一至四	红	甘洛本脱写, 峨边本作 nyi shyp, 意为“夏 送”。
12	zhet tsu	竖立的 露水		6			轸宿、左辖、 右辖	白	有“降露”的 含意
13	zhet nbop	明亮的 露水		4	弯弯的		亢宿	白	die 义为“重 叠”, 周期为 27 天时, 此宿 与“豹角”合 并一宿; 周期 为 28 天时, 此 宿单独各为 一宿
	ssyt ho die	豹角(叠)	△	4		氐宿 一、二	氐宿一、二、 三、四	白	
14	ssyt nyuo	豹眼		4			房宿一、二、 三、四	白	
15	ssyt ke	豹口		1			心宿二	红	
16	ssyt jjut	豹腰		4		尾宿二、 三	尾宿一、二、 三、四	白	
17	ssyt hxie	豹心		1			尾宿五	白	
18	ssyt hmy	豹尾		3			尾宿六、七、 九	白	
19	ssyt ddur	豹过完		4			箕宿一、二、 三、四	白	峨边本作 sat bba



续表

	彝语拼音 符号	直 译	起 首星	星 数	形 状	主星	相应的汉 族星名	主星 颜色	备 考
20	bbo bu	豪猪		6			建星	白	
21	le mga	牛来		4			狗国	白	
22	si bu	公犀牛		3			女宿一、二、 四	白	
23	si mop	母犀牛		1			虚宿一	白	
24	si til	犀牛 吞咬	△	4	四星成 菱形		垒壁阵东四	白	有的方言称 此星为“梭子 星”。峨边本 作 nyu tit, 意 为“牛咬”。
25	mu yi	慧马		2	两星相 连如一 直线		壁宿	白	有“老马走平 路”的说法。
26	hleþ kep	槌枷		5	槌 枷		右更	黄	圣乍方言作 hlip ko
27	tat hmy	时尾		3	牛枷档		胃宿一、二、 三	白	

(与陈宗祥先生合撰。原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
1979年1期，第66~75页；又见《中国天文学史文
集》第2集，第86~100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

斛律光寨巡礼

山西稷山县汾河北岸，吕梁山南沿紫荆山前坡上，残存着两座气势雄伟的古城堡。我就出生在古堡所在山脚下一户贫困的农家。12岁时，因父亲有病不能替生产队放牛，我经常从学校请假替父放牧，于是古堡及其周围山坡便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去处。我多次把牛群赶进古堡城内或附近山坡，任其自寻草叶果腹。然后，我要么站立于古堡的城墙上，要么坐在古堡西面的一片平台上，极目远眺潺潺汾水和滔滔黄河。夏日的夕阳照亮了汾、黄两水，犹如血染的激流。背后则有“文中子洞”，其山势堪称鬼斧神工。坡下的村庄升起了袅袅炊烟，透露出乡民们在困苦中顽强挣扎的无限生命力。古堡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似乎也更加雄壮，出神入化。我多次凝神自问：这堡子是谁修建的？孩童时代的我不能回答。我找过本队一位读过书的曹姓老人请教，他只说是“百里为王”时修筑的。13岁起，我便离乡外出读书。转瞬二十余载，其间多次返回故里，古堡仍是我必去凭吊之地。直到1980年，村民加永杰先生（现为稷山县政协委员）才告诉我堡名“斛律光寨”。回京后查阅史书，数十年疑团消除于一旦。于是便产生了介绍它，以便为更多人知晓的念头。

古堡位于稷山县路村乡张开西村的北坡上。出村半里，便可登坡而上，直达古堡。堡东西长约百米左右，南北最宽处约六七十米，呈一不规则长方形。此堡依山为势，铲削而成，从堡外仰



视，城墙残高约七八米，但站在城内，目力所及，城墙仅高一二米，显系人们习称的“卧牛城”。城南偏西，有一门洞，为出入城堡的惟一孔道。城内地面大体展平。五十年代初期，还能看到中部的一些断壁残垣；西北角原有一口枯井，今则全部夷为平地。

古堡东北方向，与之相距约五六十米，又有一座小城堡，地势略高于前面的大堡，城墙高度与大堡相仿，当地俗称“小堡子”。大小二堡，珠联璧合。每当天气晴朗，在阳光照射下，远在数十里外，人们便可一眼望见。站在古堡上，南望汾水，西眺黄河，两水交会，波光粼粼，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古堡今被村民称作“斛律光寨”，但古时却名为“华谷城”。“谷”通“峪”，古堡东面吕梁山中的山涧今名为黄华峪。据《北齐书·斛律金附子光传》记载：“其冬（按，指北齐武平元年，570年），〔斛律〕光又率步骑五万于玉壁筑华谷、龙门二城。”龙门城在今河津县，地近禹门口，华谷城当即本文所说的斛律光寨。但说筑“于玉壁”，实误。玉壁城在今稷山县西南汾河南岸，距县城约二十里，为西魏大将王思政所筑。华谷城在汾北约二十里的吕梁山南沿，旧史作者未经实地考察，误三为一。《资治通鉴》卷170也有斛律光筑华谷、龙门二城的记事。但胡注“华谷”引《水经》说：“涑水出河内闻喜县黍葭谷。《注》云：涑水所出，俗谓之华谷。又曰：汾水过临汾县东，又屈从县南西流，又西过长修县南，又西与华水合，水出北山华谷。”胡注所引《水经注》二华谷原文不误，但《通鉴》正文所称华谷城，只有郦注《水经》汾水条与之相合，涑水条与之无涉。《水经注》所称汾水“与华水合，水出北山华谷”，与事实相符。黄华峪是吕梁山南部的一大峪口，张开西村今仍俗称“峪口村”。每当秋季山洪暴发，洪水猛泻，水头高可一米乃至更高，至峪口道分四途，然又总汇于汾水。胡注疑不能定，故两说并存。



斛律光所以要修这座城堡，是因北周与北齐对峙，争雄割地使然。其时北周都长安，北齐都邺城，但晋阳（太原）却是北齐的实力所在。两雄对立的前哨阵地之一，即在今稷山县境的汾河南北。西魏时王思政已在汾南修筑了玉壁城，成为西魏的前沿重镇。后来思政移治荆州，荐韦孝宽代其镇守。孝宽数十年中经营于此，深悉其中要害。北周天和四年（569），韦孝宽就对其部下说：“宜于华谷及长秋速筑城，以杜贼志。”如果对方先我一步，则“图之实难”。他于是画出地形图，派使者往长安报告，但主持北周实政的宇文护却不同意。不料事隔一年（570），北齐大将斛律光“果出晋州（临汾）道，于汾北筑华谷、龙门二城”，控扼吕梁山南沿的重要隘口。二城筑后，“〔斛律〕光乃进围定阳，筑南汾城，置州以逼，夷夏万余户并来内附”。可知斛律光寨在齐周争雄时曾发挥过重要军事作用。

北周韦孝宽失了先机，不能得志于汾北吕梁山进入晋州的通道，于是便使了反间计。北齐后主高纬年幼无知，又有佞臣进献谗言，竟然中计，于武平三年（572）以谋反罪将斛律光及其三子、弟斛律羨及其五子全数杀死。斛律光死时才 58 岁，令人痛惜！《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称杀斛律光是“主暗时艰，自毁藩篱之固……内令诸将解体，外为强敌报仇”，“后之君子，可为深戒”。

又据史称，斛律光在修筑华谷、龙门等城寨时，凡“版筑之役，鞭撻士人，颇称其暴”。这又说明，斛律光寨的修筑，曾使鲜卑族和汉人士兵付出过血与肉的代价。

斛律光于公元 570 年冬修成华谷城，坚守年余，至 572 年被诬杀，此堡仍在北齐控制之下。直到 576 年，亦即齐亡的前一年，齐军还在坚守。次年随着齐国的灭亡，华谷城终于落入北周之手。名将罹难，古堡犹存。当地村民所以不依旧史称古堡为“华谷城”，而称之为“斛律光寨”，或许仍旧蕴含着对一代名将



的丝丝眷恋。

逝者如斯夫。从公元 570 年到 1992 年，古堡屹立在吕梁山南沿已有 1422 个年头。我不知道斛律光死后葬于何处，有无墓碑铭记；如果有，是否已被发现和发掘。但这些对我全然无关紧要，因为在我心灵深处，黄华峪口的斛律光寨就是历史为这位鲜卑族大将留下的一座永久性丰碑。

（原载《文物天地》1992 年 3 期，第 14~15 页）

后 记

这是我的第二本论文集。第一本题名为《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96年出版。现在这本小书的内容以天文历法为主题，也是我这二十多年来的主要着力之处。它如同《耕耘录》一样，是我在这个专门领域辛勤耕耘的记录，其区别仅仅在于，这本小书所收文章属于专题性质而已。

书中所收文章分为七组，大致区别如下：第一组基本属于天文星占学范畴；第二组偏重于敦煌历日的全面性论述；第三组是关于敦煌历日的具体问题或个案研究；第四组是关于吐鲁番出土残历日的年代考定与释证；第五组是关于黑城所出几件残历日的年代考定与释证，虽非敦煌吐鲁番所出，但同出西域，且性质相同，故一并收入；第六组是关于简牍研究的几篇文字，或多或少都同古历研究有关系；第七组为“附录”，前三篇是在为“敦煌学”这门学问做学术性服务时的文字记录；《凉山彝族二十八宿初探》一文，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工作时所做的一项研究工作，迄今仍不失参考价值；关于史道德民族问题的小文，则是用天文学手段解决历史问题的尝试。至于最后一篇《斛律光寨巡礼》，显然已越出本书主题范围，我之所以收录于此，确有自己的苦衷，必须多说几句话。

这篇小文是考证我的家乡山西省稷山县路村乡张开西村村北吕梁山前沿一座古堡历史的。那是我出生与度过少年时代的地



方。我在古堡里玩耍过、淘气过，还当过牛童。更为重要的是，就在离古堡不远的地方，迄今长眠着我的双亲——父母为我读书求学忍受了诸多贫困、煎熬，以至屈辱，却未能来得及接受我的回报——这是我为人之子永久的痛与悔！可以说，北齐鲜卑大斛律光所修的这座古堡，始终牵系着我的亲情、我的关爱与痛楚，以及少年时代的几多忧伤！也因此，它将伴我走向生命的终结。

我生性愚直，为人耿介，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便显得不合时宜。不过，在我看来，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倒也不妨有自己的一定之规，那就是：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态度和健全人格。虽不能完全做到，但心向往之。知我罪我，悉听尊便。小书中有些篇章是与学术界同仁切磋学问的，但愿不以为忤。至于平素一些学人对我的某些学术观点提出的异议乃至批评，只要是出于探求真理，无论正确与否，我都愿意认真聆听。还是那句老话，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人人得以发言，不得而私。我相信这于我于我都无区别，且很公平，因为学术所求乃客观真理，不必以权势为俯仰。

最后，我素所景仰的业师张广达教授从大洋彼岸为这本小书作序，使我深受感动，谨向师尊致以诚挚的谢忱。责任编辑薛英昭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也是我将终生铭记并致感谢的。

2001年9月10日于北京寓所



责任编辑 / 薛英昭 封面设计 / 徐晋林 甘肃教育出版社



ISBN 7-5423-1046-1



787542 310460 >